



# 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

## 目 录

---

<b>第一章 冷战、遏制与国家安全战略 .....</b>	1
第一节 界定冷战 .....	3
第二节 解析战略 .....	8
第三节 解读遏制 .....	16
小 结 .....	21
<b>第二章 凯南与遏制战略雏形 .....</b>	23
第一节 “长电” .....	23
第二节 国家利益观 .....	32
第三节 非等称遏制 .....	41
小 结 .....	49
<b>第三章 杜鲁门与遏制战略实施 .....</b>	51
第一节 以美援预防危机 .....	51
第二节 以“堡垒防御”重建均势 .....	60
第三节 以“楔子外交”分化苏东阵营 .....	71
小 结 .....	81
<b>第四章 遏制战略的转折 .....</b>	83
第一节 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	83

第二节 宣布亚洲“环形防御圈” .....	93
第三节 考虑对苏核威慑 .....	103
小 结 .....	113
<b>第五章 重新界定美国安全利益与苏联威胁 .....</b>	<b>116</b>
第一节 以美国战略目标重审冷战态势 .....	117
第二节 以意识形态描述“苏联威胁” .....	123
第三节 以能力界定“苏联威胁” .....	129
小 结 .....	138
<b>第六章 选择全面和无差别遏制 .....</b>	<b>141</b>
第一节 谈判不作为战略选择 .....	141
第二节 在维持现状、回归孤立与实施战争之间 .....	147
第三节 “全面遏制”成为唯一的选择 .....	158
第四节 “全面遏制”的实施要点 .....	166
小 结 .....	173
<b>第七章 全面遏制的资源配置要求 .....</b>	<b>177</b>
第一节 美国实施冷战的政治资源 .....	177
第二节 美国实施冷战的经济资源 .....	183
第三节 美国现实的与潜在的军事能力 .....	192
第四节 核军备的冷战功能 .....	197
小 结 .....	206
<b>第八章 全面遏制战略遭遇“朝鲜战争” .....</b>	<b>209</b>
第一节 出兵朝鲜与“中立台海” .....	209
第二节 打过三八线“收复失地” .....	220
第三节 “回家过圣诞节” .....	233
小 结 .....	243

---

<b>第九章 对全面遏制战略的历史评估</b>	248
第一节 从“修正”到“后修正”	248
第二节 “新冷战学者”的评判	259
第三节 全面遏制战略制定者的反思	277
小 结	287
<b>第十章 历史、现实与未来</b>	290
第一节 美国冷战遏制战略的误区	290
第二节 美国冷战对华战略思考与决策	300
第三节 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新冷战	306
小 结	324
<b>附件一 凯南“长电”</b>	329
<b>附件二 国家安全委员会 20 之 4 号文件</b>	347
<b>附件三 国家安全委员会 68 号文件</b>	357
<b>冷战国际关系研究英文文献书目与简介</b>	423



# 第一章

## 冷战、遏制与国家安全战略

国际社会刚刚进入 21 世纪,便经历着大国关系的一个重大变化:中美从“冷战[Cold War]”后期的“战略伙伴[Strategic Partner]”,逐渐成为“后冷战”的“战略对手[Strategic Competitor]”。就美国而言,中国的崛起,成为对其超级大国地位最为严重的挑战之一。美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对“中国威胁”的渲染,使国际社会仿佛又重新回到了 40 年代后期西方对“苏联威胁”的制造。如何对待“中国威胁”,华盛顿的答案似乎不一而足。老布什后期实行“动态遏制[dynamic containment]”,克林顿八年执政极力推行所谓“既接触又遏制[congagement]”政策,小布什上台以来似乎大有回归“动态遏制”的势头。

美国是否企图延续在亚洲似乎早已结束的冷战或是发动新的冷战?更确切地说,美国是否仍将沿用遏制战略对待所谓“中国威胁”?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国内外学者仁者见仁。持否定态度者认为,冷战作为现代国际关系的一个特例已经成为历史,美国针对中国的冷战更是不可思议。主要依据是:自“9·11”以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重点是全球性反恐,对外与国防政策的核心是通过“国防转型[Defense transformation]”和“政权变迁[Regime change]”消除来自“四个邪恶轴心国”——伊拉克、伊朗、叙利亚、朝鲜——的威胁,特别是所谓大规模杀伤武器(WMD)的威胁。据此,美国 21 世纪

\* 本章部分内容已在《社会科学》2006(10)期第 66—75 页发表,特予说明。

的长期安全战略,充其量是实施一场针对支持“极端伊斯兰主义”的穆斯林国家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全面圣战。冷战结束以来,随着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制度转型”的完成和与西方世界的不断加深的“融合”,随着中国现代化乃至西方化程度的持续和快速提升,随着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全球性扩张的不断推进,任何一个理性的美国领导人和战略家都会认定,华盛顿对正在“和平崛起”的而且一心一意将自己融入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系的中国发动一场以遏制为核心的冷战,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不可思议——由于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没有一个美国政府能取得国内和传统盟友对遏制中国政策的支持和响应。更有智者认为,一个受到美国和西方遏制以至力量削弱的中国,并不符合美国的长期利益。<sup>①</sup>于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做出的一系列的军事安排,至多只是将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对手”而实施“有限的防御”。<sup>②</sup>

然而,对美国是否会对——或已经开始——发动一场以遏制中国“崛起”为核心的新冷战的认知,若能以分析美国冷战期间“遏制战略”的起源为起点,并探讨其遏制战略的形态变化,不仅对研究判断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有着十分重要的政策意义,也对理解当代大国关系中的战略思考与运作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对此分析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最高决策层将遏制所谓来自外部的威胁作为冷战的战略选择,并在政治、外交、国防和军事等层面进行不间断地运作。建立在这种立意基础上的分析至少应涵盖三个层面。第一,冷战状态;第二,战略选择;第三,遏制内涵。在这三个层面上,至今仍存在着一系列具有国际关系理论意义的问题,而中外学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

---

<sup>①</sup> David M. Lampton, “Paradigm Lost: The Demise of ‘Weak China’,” *The National Interest*, Fall 2005, pp. 67 – 84.

<sup>②</sup> Andrew Murray, “Challenge in the East — The U. S. is using the war against terror to establish new bases around China, its emerging rival in Asia”, *The Guardian*, January 30, 2002.

## 第一节 界定冷战

到底什么是冷战？冷战状态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产生？冷战状态下的国际关系又是怎样发展与调整的？对这些问题，西方学者均通过自身的研究，试图提出直接的或间接的解答。他（她）们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经过数十年的整合，实际上已经推出了一个以冷战国际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多元且交叉的学科，即：冷战国际关系学。尽管外交史、国际政治学者仍占据该学科的主控地位，越来越多的新兴学科——诸如行为学、心理学、传播学、文化学等——学者的参加研究，使得这一领域由较为单一、传统的研究逐渐转向多元化与跨学科。<sup>①</sup>特别是由于近期中国、俄罗斯、东欧国家国际关系学者的加入，<sup>②</sup>冷战国际关系研究

---

- ① 美国国家级“国际关系”研究机构“威尔逊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为了推动对“冷战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于1995年成立了“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项目”。美国的哈佛大学、俄亥俄大学，以及英国的伦敦大学也分别成立了“冷战国际关系”研究与教学机构。
- ② 参考：Zhai, Qiang, *The Dragon, the Lion, and the Eagle: 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8*. (Kent, OH: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Shu Guang Zhang,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 1949–1958*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and *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Westad, Odd Arne, e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Sheng, Michael M.,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真正开始“国际化”了。应该说，这门始于 20 世纪中叶的年轻学科充满活力。

然而，如果透视现存的研究结果，不难发现：对于冷战起源的研究，假设仍多于结论，概括仍胜过理论。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学派，即：“传统派”、“修正派”、“调和派”或“后修正派”与“国际派”。<sup>①</sup>在 50 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所谓“传统”派认为：冷战作为相对于“热战”——如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种“非战非和”的大国关系，是由国际政治结构所决定的。二战的结束，并未产生使国际社会“长治久安”的国际体系。随着传统大国——如英、法、德、日、意——的衰退，作为新兴大国的美国与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战争中担纲主力的苏联当仁不让地成了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然而，在“主角”间却存在着“势力范围”的不平衡。在这个“不平衡”的关系中，苏联由于其传统“不安全”意识的主导、“集权”制度的制约、“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导向、领导人“机会主义”倾向的影响等“非理性”因素，在对外政策中推行“霸权”与“扩张”，因而造成对美国与所有“非共产主义”国家安全的所谓威胁，美国为了维护自身国家利益，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得已以“非战争”的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的方式——如 1946—1947 年间对土耳其、希腊的援助，1948 年对欧洲实行的马歇尔计划，乃至建立联邦德国和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等——对抗苏联。因此，冷战是苏联的“非理性”挑战与美国的“理性”应对的结果。<sup>②</sup>

---

① “传统派”的英文为 Traditionalists、“修正派”的英文为 Revisionists、“调和派”的英文为 Reconciliationists、“后修正派”的英文为 Post-revisionists、“国际派”的英文为 Internationalists。

② 关于“传统派”，参看：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Foreign Affairs* 46 (1967): 22 - 52; George F.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1900 - 19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William H. McNeill, *America, Britain and Russia: Thei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1941 - 1946*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这种依据于结构的不平衡导致大国关系的不稳定,以至苏联“挑战国际现状”的观点,很快受到“修正派”的批驳。虽然也承认战后国际秩序的不平衡与不合理,但“修正派”认为美国更应该对冷战的出现负责,主要原因则是华盛顿对外政策“充满了非理性”。根据“修正派”学者的研究,美国政府领导层出于满足国内“垄断寡头”的经济利益需要,利用美国二战后所拥有的特殊的国际政治地位,企图构建“世界经济霸权秩序”,推行“开放式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于是,同样被认为是出于“理性”基础的美国冷战政策与举措——如对土耳其、希腊的援助的杜鲁门主义,援助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加强西半球政治稳定的第四点计划和大西洋公约组织等,无一例外被认为是经济驱动的结果。当然,盛行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修正派”,难免受到当时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政治与文化氛围——如反“越战”运动、反文化思潮、“新左派”思想等——的影响与制约。<sup>①</sup>其学术视角的片面与研究方法的单一,随着学术界政治热情的不断降温,自然受到了新一代学者的质疑。

质疑者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形成所谓“调和派”或“后修正派”。基于美国首批解密的冷战初期外交、军事和国家安全档案与文献,“调和派”回归到“传统派”的一个基准点,再次强调战后国际政治结构“不平衡”是冷战爆发并延续的“病根”,但同时也指出,美苏两国决策者均应对冷战的产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

<sup>①</sup> 关于“修正派”,参看: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New York: Norton, 1958); Walter LaFeber, *The New Empir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3) and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1980*, 5th ed. (New York: Knopf, 1985); Gabriel Kolko, *The Rot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and Gabriel Kolko and Joyce Kolko, *The Limits of Pow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2); Lloyd Gardner, *Architects of Illusion*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70); Gar Alperovitz, *Atomic Diplomac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7); and Richard Barnet, *Roots of War* (New York: Atheneum, 1972)。

任”。如美国将“冷战全球化”的结果，尽管不是受严格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思想所驱动，但带有显著的“帝国构建倾向[Empire-Building or Imperial Inclination]”。此外，不少的学者沿用国际关系研究盛行的一些理论假设和分析框架，从华盛顿战略思考的错位、国内政治对理性决策的制约、官僚机制的惰性和狭隘、决策者的个人局限性，甚至情报的虚假和不确定性等方面，论证了美国政府的冷战战略思考和实施的非理性部分；并试图诠释其产生的原因。<sup>①</sup>

以 90 年代初苏联、东欧解体为标志的“冷战结束”，使学术界对冷战国际关系的研究热情又创新高。特别是由于原“共产主义阵营”学者的加盟和来自“对方”的档案文献的有限公开，<sup>②</sup>以及多个新兴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影响，使得对冷战的研究日趋多元化与国际化，从而也形成一个所谓“国际派”，或如约翰·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所称“新”冷战学派（“New” Cold War historians）<sup>③</sup>，其鲜明的特点是：能够熟练使用“对方国”语言，有幸接触“对方国”刚刚解密的档案和文献，并能够将冷战的经历放在一

---

① 关于“调和派”，参看：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Wiley, 1978),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The Long Pea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and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Deborah Welch Larson, *Origins of Contain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Gaddis Smith, *Morality, Reason, and Powe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6); Melvyn P.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② 为了推动苏联和东欧国家涉及冷战的档案文献的解秘，位于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于 90 年代中期成立了“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项目”，并不断地公布最新解密的档案与文献。参考：[www.cwihp.si.edu](http://www.cwihp.si.edu)。

③ Gaddis, *We Now Know*, pp. 281–295.

个互动的环境中描述与分析。<sup>①</sup>“新”冷战研究至少对“旧”冷战研究的一些假设——诸如盖迪斯所归纳的“权力的多元化对冷战进程的影响要比权力的平衡大”、“尽管实质有异但美国和苏联均试图在战后建构各自的帝国”、“民主制度在维护同盟方面要比专制制度优越”以及“核武器导致破坏性与长久性换位”等<sup>②</sup>——提出了部分的佐证和说明。然而，目前的成果仍表现出明显的“重实证、轻理论”以及“重描述、轻分析”的研究倾向。此外，由于苏联、东欧国家甚至中国的档案文献的解密仍处于初级阶段，公布的，并能为学者研究所提供的材料仍不够全面、系统，迄今，学者们所能够接触的资料反映的只是冰山的一角。

显然，各个学派均有各自明显的优劣势，但如果能采纳各派之长，走“理论指导”与“历史实证”相结合的路，冷战的研究领域必定得以拓宽、夯实。本书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做此尝试。在“理论框架”构建上，提出三个基本假设：

第一，冷战是一种以国际安全或冲突解决为主轴，并以权利的平衡为动力的大国国际关系“对冲”的系统；

第二，冷战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自身的思维、逻辑、认知与话语，而正是由于这个意识形态使得冷战不仅持续地主导着 20 世纪下半叶的国际关系，而且渗透于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sup>③</sup>

① 如：Odd Arne Westad, Kathryn Weathersby, David Wolff, Vladislav Zubok, Mark Kramer, Ilya Gaiduk, Christian Ostermann, Chen Jia, Qiang Zai, Shu Guang Zhang 等。中国加入了这一“阵营”的学者有：沈志华、李丹惠、牛军、杨奎松、章百家等。

② Gaddis, *We Now Know*, pp. 283 – 295.

③ 参看：John G. Stoessinger, *Crusaders and Pragmatists*, 2nd ed. (New York: Norton, 1985); Kenneth W. Thompson, *Traditions and Values in Politics and Diplomac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Eugene R. Wittkopf, *Faces of Internation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Shu Guang Zhang, *Mao's Military Romanticism*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4)。

第三,冷战作为现代国际关系的一个特殊时期,核武器的出现和继之而来的核军备,使得大国权力的运作、安全利益的确定、安全威胁的认知和战略资源的积累发生本质上的变化。

此外,在实证层面上,本书采取依据史料、精读档案、推敲概念相结合的“深度案例解读”方法。

## 第二章 解 析 战 略

---

研究现代国际关系——特别是研究 20 世纪的冷战国际关系——的西方学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将研究的视角放在所谓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或称之为“大战略[Grand Strategy]”的层面。他(她)们的一个基本认知是:冷战看似为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经济体系、两种政治制度和两个军事阵营的较量,实际上却是关系到民族国家——特别是大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殊死斗争。据此,冷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被认作是一场大国间国家安全战略的长期博弈。

那么,什么是国家安全战略?简言之,国家安全战略指:国家权力机构为了国家安全利益(其中包括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国家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与机构的不受外力压迫而改变,以及人民的福祉、文化的传承与繁衍得以保障),<sup>①</sup>将可以动员的公共资源(或称战略资源[Strategic assets])在国家对外与国防政

---

① 这里所指的国家安全利益是狭义上的国家利益。学者研究国际安全问题时,常常将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国家的公共利益相混淆。关于两者的内涵与外延的区别,参看: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国家安全利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 年);周建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征求意见稿)(上海社科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2002 年);閔學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年)。

策中,按“成本与效益”的理性原则做最佳配置的政策指导系统。这里需要指出的,战略与政策(policy)、策略(tactics)或理论(theory)和教义(doctrine),有内涵和外延方面的不同。<sup>①</sup> 国家安全战略至少具有以下六方面基本特征:

第一,时间向度的长期性。作为国家级的安全战略,必须确定一个或数个“总目标”,因而,这些总目标一般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不会——也得——发生变化,除非发生预料之外的重大变故。如美国的冷战战略的总目标,经 20 世纪中期确定后,一直未曾重新确定,直至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的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才开始受到重新评估。因此,国家安全战略是一个中长期的指导性政策。

第二,政策涵盖的整合性。作为国家对外与国防事务的总体政策指导,国家安全战略要求包括军事、国防、外交、外国情报、对外经济、科技研究与发展和文化交流等国家所有“涉外”行为必须服从之。值得指出的是,现代国家行政体制,无论处于何种政治体制中,都会因所谓的部门利益而窝里斗,特别是涉外机构往往以各自所服务的国家利益为由,为了自身地位的孰重孰轻,为了争得国家战略资源的优先配置,积极或消极影响最高层的决策。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具有整合官僚机构利益的功能。

第三,政策体系的稳定性。现代民族国家的权力变更是一个常态,专制国家体制如此,民主国家体制更是如此。除非国家发生形态上的根本性的变化(如分裂、被占领、加入其他国家等),国家安全的总目标一般不会——也不应——发生改变。因此,国家安全战略要求不因国家领导人或集体的变迁而变化。例如,根据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约翰·盖迪斯的研究,美国冷战初期确定的遏制安全战略,至少历经九任总统(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

<sup>①</sup> 关于此点,参考: Peter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863–872。

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和老布什),除了操作层面上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基本延续了遏制的战略方向。<sup>①</sup>

第四,政策内涵的可操作性。作为“大战略”的国家安全战略一旦确定,所有国家涉外权力机构,便必须根据所确定的战略原则,制定各自的“子战略”以及“操作战略”。常见的如:军事战略、国防战略、外交战略、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科技研发战略和对外文化战略等,同时所有这些子战略都不同程度地确定不同时期的操作战略,以便行动实施与绩效评估。

第五,政策外延一定的模糊性。由于战略的制定往往基于对发展态势的判断,这就要求战略设想——包括总目标、政策目的、资源配置和实施原则——留有一定的余地。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概莫能外。关于国家安全战略是否应该消除模糊性,西方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反对模糊者认为,一国对外安全战略的模糊性容易导致对手对该国实施这一已经宣示的战略的意愿、决心和利益底线产生误解和误判,以至铤而走险;赞成者则持恰恰相反的立场,认为正是由于一国安全战略的模糊性,才迫使对手猜测该国的意愿、决心和利益底线,以至不敢贸然行事。本人认为这样的争论实际上将国家安全战略的模糊要求与服务于这一战略的分项战略(如军事、外交战略等)的模糊功能相混淆了。国家安全战略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其外延上的模糊。

第六,政策的政治动员功能。即一旦确立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得以宣传、“教育”和“说服”公众,以求得公众对相关立法、政策、政治行为、机构变迁和资源配置的理解、支持与参与。反之,在国家安全战略长期缺位的国家,一旦外部压力和威胁加剧,国内的舆论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将会出现迷茫、混乱和裂变,以至恶化国内政治生态,国家有效地应对外来威胁的能力受到来自内部的制约。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的行政首脑机关——白宫——经常公开发表

---

<sup>①</sup>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并对报告进行广泛宣传的一个重要原因。<sup>①</sup>

具有上述特征的国家安全战略,并非一蹴而就。其形成首先经过战略思考的过程。无疑,战略思考的主体是“人”。这里的“人”,既可以是“个体”(如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或助理、国防部长和国务卿),也可以是集体(如美国于1947年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简称 NSC]);既可以是政府内的官员,也可以来自“非政府”或“公共”机构——即所谓的“智库[Think-Tank]”,<sup>②</sup>后者往往通过政府委托、投标或合同的形式,取得对涉及国家安全战略和政策的专项课题的研究。

此外,安全战略思考的客体,即战略“思考”和研究的对象,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政策议题,诸如:(1)国家安全利益(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并非国家发展利益或国家公共利益;(2)现实的与潜在的外在威胁(present and potential external threats);(3)可以动员的国家战略资源(national strategic resources);(4)国家安全目标(national security objectives)和分项政策目的(policy aims);(5)国家可能的战略选择(strategic al-

① 例如: The White House,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 December 1999. [www.whitehouse.org](http://www.whitehouse.org).

② 在美国,比较显赫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智库有: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s Institute,简称 AEI)、大西洋理事会(The Atlantic Council)、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联邦研究所/防务选择研究项目(The Commonwealth Institute/PDA)、海军分析中心(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Corporation)、布鲁金斯研究所(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Policy Studies)、战略与国际安全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国会图书馆,“国会研究服务”(Th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The Library of Congress)、防务与军控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fense and Disarmament Studies,简称 IDDS)、史汀生中心(The Henry Stimson Center)、反扩散研究中心,蒙特利国际问题研究所(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尼克松中心(The Nixon Center)、兰德公司(Rand)以及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

ternatives)。当然,战略思考和研究的对象也可能涉及如战略环境、战略态势等其他议题,但上述五个政策议题是国家安全战略思考的常项。

同时,国家安全战略思考的表现形式包含了诸多方面,其中最为常见的有:认知(perception)<sup>①</sup>、描述(description)、测算(calculation)、分析(analysis)、推理(reasoning)、评估(assessment)、结论(conclusion)与建议(recommendation)。而所有这些表现形式,均需要通过语言文字、数字、图表等载体体现。所以,战略思考的过程也是战略思想(strategic thought)和“论述话语形成[discursive analysis]”的过程。必须指出的是,战略思考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和话语,相互关联,相互支撑,其不断互动的结果往往产生一个思维惯性,既而构建出一个机制文化,而这种文化,一旦形成,为了适应客观现实变化而进行根本变化的概率便十分渺小了。<sup>②</sup>因此,如果说国家安全战略思考的起点是贴近现实、体现理性的话,其末端便有可能与现实和理性渐行渐远了。

国家安全战略形成的第二个环节是战略制定。这一环节的成效决定于国家安全与对外决策机制的建立与运作。其机制行为涵盖如下几方面:

第一,专题研究。由专人或专门小组对国家中长期安全战略进行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形成系统的政策报告。比如在美国,通常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牵头组成专门研究小组(Task force),以国安会系列报告形式成稿。

第二,跨机构咨询。国安会将专门研究小组的研究结果形成专门政策报告,并以“征求意见稿”的形式,提交给国家行政机构的

---

① 秦亚青在翻译 Robert Jervis 的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一书时译作知觉和错误知觉。见[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

② 参考: Jon G. Stoessinger, *Why Nations Go to War*, 8th ed. (New York: St. Martin's, 2001), pp. 253–264.

相关部门——美国的冷战时期,主要牵涉到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海陆空各部、中央情报局、财政部、预算局、对外经济委员会、能源部、核能委员会等——评估,以取得反馈和修改意见。这个过程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通过跨机构咨询与这些部门进行战略决策前沟通,并努力形成对重大议题的共识。

第三,最高层确定。如美国的决策程序,主要由总统主持的通常由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或顾问、国务卿、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财政部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参加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讨论,做出是否“采纳[adopt]”的决定,并对总统应该如何下达指示做出决议。<sup>①</sup>

第四,立法部门确认。从美国冷战战略决策经验看,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是否应取得国会的认可,文件的哪些部分应以何种方式提交给国会的哪些委员会——重要常设委员会包括:参议院的“对外关系委员会”、“武装力量委员会”,众议院的“国际关系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情报问题(小型)特别委员会”——<sup>②</sup>或议员,争议非常大,立法与行政的“明争暗斗”异常激烈,然而若考虑到保证战略的长期性、稳定性与可操作性,则必须使其取得合法性,而立法部门的“认可”则是获得合法性的最为重要的标志。

第五,建立战略监督与监测机制,以对确定了的战略的执行进展(progress)以及调整(adjustment)要求做出定期的和不定期的评估与改进建议。美国冷战期间最常见的战略监测体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系列“进展报告[Progress Reports]”,这些报告不仅反映确定战略指导下政策的操作结果与“绩效”,也时常就国际安全局势和态势的变化进行分析和描述,偶尔也提出战略和政策修正的建议。

<sup>①</sup> 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形成与运作背景,参看:张曙光,《美国对华战略思考与决策:1949—1972》(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11页。

<sup>②</sup> 参看:孙哲,《左右未来:美国国会的制度创新和决策行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7—230页。

国家安全战略形成的第三个环节是战略指导执行。这里主要牵涉到对外与国防政策执行的七个方面。第一,预算与税收。国家安全“可动员的”战略资源的配置,首当其冲将在财政预算中得以反映,其中包括国防建设、军事采购、对外援助、文化交流和国际情报工作等方面年度(或连续年度)支出计划。而与此相关联的则是税务政策,如增税或减税计划,或如何增减税的方案。由此而产生了现代国防经济学。

第二,军队结构调整。国家安全战略的落实,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制约军事建制(Military Establishment)的变化。是优先发展战略力量还是常规力量,或是重点发展这两个力量中的哪部分,都成为战略决策的结果之一。例如在冷战初期,美国的杜鲁门政府曾就核力量和常规力量、常规力量的空军和海军在优先发展的排序上出现过激烈的争论。<sup>①</sup>

第三,国防与对外决策建制。由于战略的需要,决策与执行机构将发生变化:现存的机构或得以扩大或遭到缩减,同时,新的机构也可能产生。此外,机构间的工作关系也会相应受到重新界定。例如在冷战初期,美国为了适应新的国家安全需要,曾于1947年、1949年两次通过《国家安全法案》,对外交、国防、安全和情报机构做出一系列调整,如取消战争部,新建国防部,取消陆军参谋部,新建参谋长联席会议。此外,新建的内阁级机构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

第四,调整盟国关系。国家安全战略通常要求对“敌我友”进行明确划线。通过军援、经援、与外交运作,以加强与同盟国家的长期合作,或“诱惑”友好国家成为盟国。为了应对所谓苏联威胁,美国在冷战初期,一反和平时期“不结盟”的传统,不仅构建双边的和多边的政治与安全合作同盟,而且一反“共产主义”的大旗建设

---

<sup>①</sup> 张曙光,《美国对华战略思考与决策》,第16—20页。

属“准同盟”关系的“自由世界”合作机制。<sup>①</sup>

第五,国防科技研发。长期的国家安全战略必定要求对国家的潜在战略资源进行有序开发,而研究、发展与国防有关的科学技术,则成为战略实施的重要途径。战后发展起来的美国著名安全战略智库兰德公司早期的重要科研项目,即为空军委托的科技研发的规划和部署。特别是当冷战成为核生化力量的对抗,成为大国间对人类共有的时空资源、自然和人力资源的争夺时,国家就必须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国防的科技研发做出战略性的制约。

第六,发展与运作“软力量”。这里指如何动用一切“非军事”手段为国家安全目标服务,其中包括“经济外交”——正面的如经济援助、贸易准入、财政贷款、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等;负面的有禁运、经济制裁、海上封锁甚至冻结“敌国”资产等<sup>②</sup>——“心理战”、政府主导下的对外宣传以及文化影响等。假如冷战是对核对抗条件下的“热战”的一种“冷处理”,加强对国家软力量的全面和不间断的实施,是冷处理的必要条件。

第七,制定应急方案。预测未来危机情景与模式,并制定出相应的应急方案,而这些应急方案也应随着“情势”的变化而变动。贯穿冷战时期的一个十分重要且敏感的应急议题就是在何种情况下、如何使用以及使用何种核武器。根据美国军方解密的档案,冷战的最初十年间(1946—1956),隶属空军的战略力量指挥部,随着战术核弹头技术的发展,曾就对苏和对华使用核武器不下十次制定所谓应急方案。<sup>③</sup>

<sup>①</sup> 参考:孙德刚,《准同盟理论与美国对外关系实践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初稿),2005年,第一章。

<sup>②</sup> 参看: Shu 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 - 1963*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Wilson Center Press, 2002), "Introduction".

<sup>③</sup> 参看: Marc Trachtenberg, *History and Strateg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A Wasted Asset".

任何一个国家安全战略的考虑、制定与执行，都是个复杂的系统。就美国而言，其战略决策历经变迁。但若要更深入地了解华盛顿的对外与国防战略，就必须追溯其战后初期的“基础奠定”阶段。据此，本书的第二个目标，便是通过解读冷战初期美国杜鲁门政府的有关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档案文献，以求为读者研究美国对外与国防战略的思考、制定与执行——特别是推断其进入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动向，提供一条线索。

### 第三步 解 读 遏 制

美国在整个冷战时期所奉行的国家安全战略是所谓遏制战略。对此，西方冷战国际关系学者多有共识。耶鲁大学讲座教授、著名的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约翰·路易斯·盖迪斯由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2 年出版的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遏制战略：对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批判与评估）专著，详尽地分析了自杜鲁门到尼克松的各届政府，是如何思考、制定和实施这一战略的。此书至今仍不失为对此类专题研究的最具权威的专著。<sup>①</sup>然而，即便是这样一本经典之作，仍旧缺乏对遏制战略的“理性框架”和“非理性影响”做出全面的描述。

遏制的第一个基本思辨点是对战略对手或潜在对手的“根本企图[Basic Objectives]”的判断，而这个判断的结果必须是：对手具有长期以“非全面战争”的方式，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既可能是区域，也可能是全球），不间断地推行全面（既可能是政治的、军事的，

<sup>①</sup>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chapter 1.

也可能是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扩张[expansion]”的意图、能力和行为。第二个基本思辨点是对对手或潜在对手扩张意图而造成威胁的认知。这个认知的结果必定是：对手或潜在对手的扩张意图、能力和行为，已经、正在或可能对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造成多方面和长时期的威胁。第三个基本思辨点是对战略应对的多项选择，而这一选择的结果必然是：发动全面战争以求消灭对手、允许对手扩张的绥靖政策和无所作为的“光荣独立”，都将是得不偿失。据此，遏制便成为唯一的战略选择，即以“非全面战争”的方式，其中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一些可控制、可动员的手段，阻止对手进一步的“扩张”，削弱对手扩张的能力，并试图使对手最终取消实施“扩张”的意图。这个意义上的遏制，实际上是对“战略目的”的描述大于对“战略手段”的界定。作为一种“国家安全战略”，遏制具有如下几个十分具体的内涵。

遏制战略的第一个内涵是“围堵[Encirclement]”。对战略对手实施全面围堵的目的，是以“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的方式，“束缚”——而不是“斩断”——对手进行“扩张”的手脚。在操作层面上，它通常包括：(1) 在战略对手可能“扩张”的地区建立“国际安全同盟”，既可能是区域性的(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等)，也可以为双边性质的防御安排(如“美日共同防御协定”等)；(2) 对战略对手及其控制的国家实施“贸易禁运”与“经济防御”，比如冷战期间的“东西方经济关系”限定，所谓“中国禁运[The China Embargo]”等；<sup>①</sup> (3) 通过“双边”与“多边”谈判，“解决”部分冲突，将对手“扩张”的能力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如对“核控制[Nuclear arms control]”——而非核裁军[Nuclear disarmament] ——机制设定的谈判。

遏制战略的第二个内涵是“威慑[Deterrence]”。威慑的基本假

<sup>①</sup> 参考：Zhang, *Economic Cold War*, chapters 2 - 7；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定为：只要展示充分的“报复”能力(Capability)与实施“报复”能力的政治意愿(Political Resolve)，迫使对手对“企图挑战现状”的后果做“理性”的“利弊分析[Cost-Effective Analysis]”，并得出“弊”必将大于“利”的分析结果，从而不得不放弃挑战现状“企图”。其核心是迫使对手“不得如是行为”。<sup>①</sup>当代国际关系中对威慑的运用，通常在三个层面上进行。首先是“战略威慑[Strategic Deterrence]”或核威慑，即以展示自身的核打击能力——包括“第一次打击[First Strike]”与“第二次打击[Second Strike]”力量——与决心，迫使对手不敢冒“遭受”核打击的风险而轻举妄动。其次为“延伸威慑[Extended Deterrence]”，<sup>②</sup>指创造一种“如果对手打击我的盟国，其本土便会受到我核打击报复”的态势，以阻止对手“侵害”盟国。再次，“常规威慑[Conventional Deterrence]”。这里专指展示使用“非核”的所有常规武装力量以“抗击”并“报复”对手的任何“不可接受”的“军事

① 关于西方威慑理论的经典著作，参看：Robert E. Osgood, *Limited War: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n Strate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Bernard Brodie, *Strategy in the Missile 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Daniel Ellsberg, “The Crude Analysis of Strategic Choi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1 (May 1961): 471 - 478; Thomas C.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and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Glenn Snyder, *Deterrence and Defens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② 参看：Alexander L. George and Richard Smoke,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Richard K. Betts, *Nuclear Blackmail and Nuclear Balance*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7); Paul Huth and Bruce Russett, “What Makes Deterrence Work? Cases from 1900 to 1980,” *World Politics* 36 (January 1984): 496 - 526; Paul K. Huth,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the Prevention of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and Stephen J. Cimbala, *Extended Deterre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NATO Europe*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1987)。

侵略”行径——特别是发动“有限战争”或低烈度冲突——的可能。<sup>①</sup>简而言之，威慑成败的关键是：展示足够的军事力量，表达使用这些力量的政治意愿，同时“明白无误”地传递“警告”。

遏制战略的第三个内涵是胁迫(Compellence)。胁迫的基本假定与威慑一致，即战略对手完全是在“理性”的状态下，对可能的“后果”做“利弊分析”，并必定产生“心理效果”。然而，胁迫与威慑所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目标是迫使对手“不得如此轻举妄动”，而前者的目标则是逼迫对手在经过“计算”后按“我所要求”的去做，含有“迫其就范”的“积极”意义。如在对手已经通过武装侵略或政治运作得以“扩张”，为了“劝导”其退回原位，便运作“胁迫”——而不是通过“实际使用武力”的方式——施加军事压力。在实施方法的具体安排上，胁迫与威慑并无根本性的差异，均依赖于如何最有效地展示“惩罚”能力，行使“惩罚”的决心，与明示“结果承诺”的内容。但是，胁迫结果的另一关键则是如何为对手“指出出路”，即所谓的“出路安排[exit arrangements]”。<sup>②</sup>

遏制战略的第四个内涵是预防(Preemption 或 prevention)。预防指在战略对手并未采取任何实际“侵略”行动之前，为了“预防”对手实行“破坏现状”的企图，而“主动”予以军事打击，故也称

① 参看：John J. Mearsheimer,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chapters 1 - 3; Samuel Huntington,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and Conventional Relation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8 (Winter 1983 - 1984): 32 - 56; Richard K. Betts,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Predictive Uncertainty and Policy Confidence,” *World Politics*, 37 (January 1985): 153 - 179; and Jonathan Shimshoni, *Israel and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② 现代国际关系学界对于“胁迫”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十分薄弱，应该引起学者的重视。参看：Shu Guang Zhang,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 1949 - 1958*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chapter 1。

作“预防性打击[Preemptive Strike]”。预防的实质是采取“有限的”、“集聚的”、短暂的武装行动，打击对手可能用于对外“扩张”的实际军事能力与潜在战略资源。前者即所谓的“军力反制打击”——如对对手在某地“集聚”的兵力或建立的“前进基地”实施“预防性打击”，后者为“价值反制打击”——如对对手正在研发或部署的战略武器基地或“前进”指挥所的“通讯、指挥、控制与情报”系统的“集中打击”。预防行动常常被赋予“一石击二鸟”的使命：一方面破坏对手对外“侵略”的实际与潜在的军事能力，使之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难以“恢复元气”；另一方面以实际的“打击手段”警示对手，令其“真实”地感受并确信遭受“报复”的结果。由于“预防性打击”属“攻击性”，结果是破坏——尽管是面临崩溃的——“现状”，决定是否实施、何时实施、以何种手段实施等，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获得国内公众与国外盟友的支持。<sup>①</sup>

遏制战略的第五个内涵是“解放[Liberation]”。实际上，遏制并非仅仅为了“维持”对抗现状，完全有可能“滑入”旨在“打破现状”、“逼迫对手从其已经控制的势力范围内退回[Roll-Back]”的战略态势。然而，遏制所“倡导”的“解放”，是所谓的“政治解放”——并非通过军事占领的“军事解放”。其主要方法包括：(1) 离间对手与其盟国或“附属国”之间同盟关系的所谓“楔子策略”；(2) 挑拨对手国内公众对“政权”或“领导人”的不满直至“反叛”的“心理战术”；(3) 以自身“政治理念”、文化“价值观”动摇对手“挑战现状”信心的“政治较量”。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冷战初

---

① 参看：Robert Jervis, *The Illogic of American Nuclear Strateg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and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and Robert Jervis, 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值得指出的是，美国2001年宣布的所谓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布什主义”的核心，即是“预防逻辑”。

期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就曾大力宣扬遏制战略的“解放”逻辑。<sup>①</sup>当然，对“解放”的运作一旦失去控制，在“解放”的借口下对战略对手使用武力甚至“发动战争”均不失为一种可能。

上述五个“内涵”构成了遏制战略的主要成分。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中国以及所谓“共产主义阵营”的遏制，均在不同程度上包含了这五个部分。那么，华盛顿对遏制的最初思考到底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做出这种战略选择？本书的第三个目的，就是依据杜鲁门时期的国家安全决策的档案文件，寻找对这些问题的答案。

### 小 结

因此，本书从时间向度上将着眼于美国冷战遏制战略形成的最初阶段，即 1946—1950 年间。分析的重点将围绕着乔治·凯南 (George F. Kennan) 的战略思想“思辨”与 1950 年 4 月出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68 号 (NSC - 68) 文件”。前者在 1946—1949 年担任国务院的“政策计划署”主任的期间，实际上成为美国冷战遏制战略的始作俑者，而后者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用正式“最高级别”政策文件的形式确立了遏制作为“国家安全战略”。两者间虽在实施遏制的总体思维上基本一致，但就如何实施、实施的重点等诸方面差异甚大。如果说凯南奠定了美国冷战的战略思维，NSC - 68 则以美国建国以来设定“大战略”的第一份文件，指导了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对外、国防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这份文件无疑也是美国确定、制约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最重要的政策基础），因此

<sup>①</sup> Richard H. Immerman, *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Diplomacy of the Cold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是美国“后冷战”时期战略决策的基础与范本,故而对分析美国“面向 21 世纪国家战略”思考与制定,具有重要的参照作用。

作为中国从事于现代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安全问题——学习与研究的研究生参考读物,本书的结构安排,参照了哈佛大学欧内斯特·梅(Ernest May)教授为他在哈佛的学生所编写的 *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 Interpreting NSC 68* [美国冷战战略: 解释 NSC - 68]一书的格式,同时也吸取了由纳尔逊·德瑞(S. Nelson Drew)为美国国防大学研究生班所编著的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NSC - 68: 制定遏制战略]一书的特点,<sup>①</sup>分别侧重于“背景分析”、“政策解读”与“文件编辑”,同时,国内外学者对 NSC - 68 文件以及冷战国际关系的研究与评判也尽可能全面地呈现给读者。

最后,本书的一个最为基本的假设是:历史、现实与未来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即便是国家安全战略思考与制定行为,也不例外。因此,本书并非只是描述美国冷战遏制战略的形成过程,更重要的是对美国冷战后的战略动向提出一个历史的参照。进入 21 世纪的大国关系,是否已经——或者可能——出现一场以遏制中国扩张为核心的新冷战?本书试图对这个具有现实和未来意义问题作出学术性的解答,以求引发更深层面的思考和研究判断。

---

<sup>①</sup> Ernest R. May, ed., *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 Interpreting NSC 68* (Boston: Bedford Books, 1993); S. Nelson Drew, ed.,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第二章

# 凯南与遏制战略雏形

二战硝烟的消失，给世界带来的并不是和平，而是潜藏着更大危机的冷战。冷战伊始，美国作为西方所谓“自由世界”的“领头羊”，很快便自觉与不自觉地担负起“阻止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势力全球扩张”的重任。华盛顿如何才能不负众望？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成为此时的杜鲁门政府对外政策思考的重中之重。经过近五年的摸索与比较，白宫的决策者最终认定遏制作为美国冷战全球战略指导思想。然而，这种战略思想要变成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全面性、权威性的大战略，其过程无疑是复杂的，而演变的背景更具有研究意义。

## 第一节 “长电”

任何一种战略考虑与形成都与一个或数个具体人紧密相连，遏制战略也毫不例外。根据西方冷战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美国遏制战略思想的始作俑者是乔治·凯南。目前西方对凯南对美国

冷战决策影响的研究甚多。<sup>①</sup>综合起来看,凯南作为一个苏俄问题学者、一个美国资深的职业外交官,却又如何成为华盛顿如此有影响的战略决策者,这仍是一个十分重要却仍无确切答案的问题。

凯南与美国战后遏制战略思想形成的渊源关系,最初几乎可用“意外”加以界定。凯南从未受过系统的战略训练,也没有在军方服务过,应该说毫无参与军事战略制定与运作的背景与经验。由于他擅长研究俄罗斯历史与文化,从其加入美国的“外交团队”的最初,便被作为俄罗斯-苏联专家使用。二战结束后不久,为了加强对莫斯科对外政策的监测,凯南被国务院派至美国驻苏联大使馆担任调研参赞。最初的两年中,由于驻苏使馆完全在深受白宫信赖的资深外交官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大使控制之下运作,凯南并没有任何特别引人注目的见解与作为。1946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凯南得以脱颖而出。

随着美苏在重新划定政治势力范围的过程中矛盾不断尖锐化,杜鲁门的国务院对究竟如何与“俄国人”打交道显得一筹莫展,特别对苏联领导人在公开讲演与报告中表现出的“反美、反西方情绪”不断升级现象感到“头痛”,情急之下便要求驻苏使馆对莫斯科“反美”倾向做出解读。调研参赞凯南抓住这个机会,很快写出“调研报告”,并将这份长达8 000字的报告于1946年2月22日用加密电报发回国务院,这便是被西方冷战国际关系学者冠以所谓“凯南长电[Kennan's Long Telegram]”的文件。<sup>②</sup>

---

① 关于对凯南的研究,参考: David Allan Mayers, “Containment and the Primacy of Diplomacy: George Kennan's View, 1947–1948,” *International Security*, XI(summer 1986), pp. 124–162; Wilson D. Miscamble, *George F. Kennan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7–195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另外参看: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25–89。Gaddis目前正在完成他历经数十年研究的《凯南传》。

② George F.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1900–19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pp. 107–128.

凯南在这份“长电”中，表现出明确的反主流立场。在他看来，苏联对美采取“对抗”政策，根本原因之一是由于美国战时与战后采取了“完全错误的”对苏政策。无论是罗斯福试图通过“势力范围重新划分”以及共同运作“国际组织”的方式使苏联“融入”正常的国际体系，还是哈里门强调的“以一换一”的“讨价还价”机制，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因素：即苏俄“由来已久”的“不安全意识”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促使莫斯科“向外扩张”的直接动因，因而，无论美国如何做——是采取“硬的一手”，还是采取“软的一手”，都不足以“改变”苏联政权的对外“扩张”企图与行为。而出现这种“错误”的最主要原因，凯南直言不讳地指出，是由于美国对外情报分析部门对俄罗斯历史以及苏俄政治文化缺乏“最基本的了解”。虽然在“长电”中并未明确列举他的“证据”，凯南后来解释说，他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是他对美国战时情报分析机构“战略服务办公室[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1943—1945年间对战后苏联对外政策“取向”的一系列“调研”文件的解读。这些文件包括：OSS于1943年2月23日提出的题为“政治取向与苏联的士气”的第523号报告，1943年6月19日提出的题为“苏联与南斯拉夫”的第959号报告，1943年9月1日题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基点”的第1109号报告，1944年5月1日题为“俄国在德国的企图与三大国合作问题”的第2073号报告，1944年6月29日题为“解决欧洲问题的美国安全利益”的第2284号报告，以及1945年1月5日完成的题为“战后苏联能力与企图分析”的第2669号报告。<sup>①</sup>

根据他对俄国历史以及苏联政治文化的“长期研究”，凯南认为莫斯科对外政策制定“几乎”不受其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华盛顿试图通过对苏政策以构建“新”的国际秩序来影响苏联领导人委实

<sup>①</sup> 这些 OSS 报告目前均藏于美国国家档案馆，The Office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 Files, 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s, RG 59, Diplomatic Branch。

是一相情愿。“[苏俄]党的路线，”他在“长电”中分析道，“不是基于对俄国境外情形的任何客观的分析，而主要源于俄国内部对战前与现在所存在的基本需要的推动。”过去的沙俄以及现在的“苏共领导人”都没有“成熟”到完全相信并接受“除了镇压之外仍有其他别的方法统治”理念的地步。因此，莫斯科统治者需要找“借口”去“强化独裁”，去“实施暴政”，去“强求别人奉献”。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故而，苏联领导人将俄国以外的世界“想象成充满[对俄罗斯]的敌意、妄想与危险”的外部环境，而这一环境正为他们对内强化“集权统治”提供了现成的“借口”。“一个被渲染成充满敌意的外部环境，”凯南强调指出，“是这个政权赖以生存的必不可少条件[a breath of life]。”<sup>①</sup>

对外部心存“疑惧”与敌意，凯南认为，是苏俄政权的外在实质使然。而这一“外在实质”在俄国“漫长的历史演变”与“传统”的延续中，变得“难以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凯南解释说，“苏共领导人”长期形成的“与外部世界的不合作，逐渐导致自身的强力反弹”。久而久之，这就出现一种定式：“对每个领导人，只要他能证明自己将整个[外部]世界当作敌人是正确的，他都将享有一种不容剥夺的特权；因此，当他不断做如此证明，并将他的证明成为其政策决策行为的出发点，长此以往，他最终必定能证明自己的永远正确。”在这种定式的主导下，莫斯科对外交往行为所表现出的“秘密行事、躲躲闪闪、口是心非、疑惧战争以及不顾后果”等特征，便不足为奇了。据此，凯南肯定地预测，“只要苏俄政权的内在实质一天不发生根本变化，其对外交往的行为逻辑也一天不会改变。”在苏联政治文化产生“实质性”变化的那一天前，他强调，苏联的对外战略与目标“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会改变。<sup>②</sup>

---

① Kennan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22 February 194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 VI: 699 - 700.

② 同上，第 701 页。

当然,凯南强调,“苏共领导人”所奉行的将西方势力当作“夙敌”的政策,并不意味着莫斯科已经有了“推翻资本主义世界的时间表”,也不表明“苏共政权”已经开始“为此全力奋斗”了。因此,他认为,克里姆林宫“目前并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压力而不得不尽快去实施对其长远目标的追求”。首先,他分析,正如教会组织一样,苏联领导人“奉行的意识形态理念基于自身的长期有效性,故而不必失之耐心而仓促行事。他们无权为了星点华而不实之得而冒使目前革命所得丧失殆尽的风险。即便是列宁的教诲,也明确要求在追求共产主义目标时必须小心谨慎、灵活处事,而列宁的这些训示完全得到了几个世纪里俄国与那些游牧势力在毫无防卫设施的无际平原上反复交战的历史教训的测验与证实”。其次,他认为,历史教训表明,“俄国人或者整个东方人生来便不予排斥、自然地乐于接受谨慎、迂回、灵活、欺诈等政治素质”。据此可以判断,克里姆林宫在面对绝对优势的外部敌人时,“断然不会因受压而自动退却。”同时由于没有时间表的压力,克里姆林宫即便断定有退却的必要,也不会为此而惊慌失措、自乱阵脚。最后,凯南坚信,“苏联心理学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既定目标必须在预设时间段内实现”。<sup>①</sup>

那么,美国将应如何调整其对苏政策而有效“抗拒”苏联的长期挑战?凯南的答案非常明确:美国必须放弃急功近利的“小打小敲”与“一相情愿”,代之以采取“长期、耐心但又坚定、警惕的遏制[*long-term, patient, but firm and vigilant containment*]”<sup>②</sup>政策。对凯南而言,对苏实施遏制并非权宜之计,它起码必须追求三个长期战略目标。第一,有效地堵截住苏俄的“不断扩张”,同时又避免与苏联大规模地“兵戎相见”;第二,在遏制苏联的同时,有目

<sup>①</sup> Kennan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22 February 194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 VI, 702–704.

<sup>②</sup> 斜体为作者所加,以示强调。

的地促进苏俄内部变化,最终令莫斯科改变其革命所追求的大目标;第三,以能否对苏长期遏制,检验美国民主制度下能否实行现实的、聪明的、长远的对外政策。<sup>①</sup>对于第二个目标,凯南做了展开说明。他认为:

[美国]拥有力量,足以使能够束缚苏联的牢套大大地紧缩,足以通过施加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在过去从未经受的不得不做出改变与迂回,足以在上述策略的作用下推动苏共政权走向最终分裂或不断崩溃。这是因为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诸如克里姆林宫那样神秘行事并以救世主自居的政权能够长期面对压力的困扰而无需在国家事务运作的逻辑上哪怕做一丁点的调整与改变。<sup>②</sup>

有趣的是,这段激越的文字,40年后当苏联解体时,被后人奉为“先见之明”的圣言。<sup>③</sup>

至于遏制是否是美国对苏战略的最佳选择,凯南持极为肯定的态度。根据他的分析,美国完全有能力、有资源为此长期运作。现代国家实力的核心,凯南认为,应该也只能是工业制造能力,而战后的美国控制着世界范围内的主要“工业中心”。在他看来,二战结束后,国际工业“板块”将经历重新组合,最终将凸显出“五个工业中心”,即美国、英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以及苏联。其中,美国与其现在的、未来的盟国就囊括了四个工业中心,而苏联仅控制着一个。以四对一,凯南测算,应该“绰绰有余”。因而,西方对苏联长期遏制的“重中之重”,则是将苏俄限制在其目前所能

① Kennan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22 February 194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 VI: 705–706.

② 同上,第 706 页。

③ 参看: John Spanier, and Steven W. Hook,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4th ed. (Washington DC: CQ Press, 1998), p. 41.

控制的那个唯一的工业中心之内，阻止其对其他中心范围的任何“侵犯”与“扩张”企图的实现。因此，凯南在他“长电”的结尾反复强调，实施对苏遏制战略的难题，不是美国有无实力保证此战略的实现，而是华盛顿是否有耐心、有智慧去具体实行，直至最后成功。<sup>①</sup>

作为一个驻外使馆参赞的凯南，将长达 8 千字的电文发回华盛顿，这在美国外交史上可谓大破天荒。然而在“长电”发出后，凯南似乎言犹未尽，于 3 月 20 日又对国务院秘密陈词，再次表述他遏制苏联的思想。美国目前所面临的难题之所以重大，他强调，“是因为我们正在为了对付一群不可缓和的敌手中已步入危险之路的苏联而做出利益选择。”随着德国与日本作为美国“真正敌人”角色在二战后消失，苏俄已不容置疑地替代德、日成为对“西方自由世界”的主要威胁。为了对付这一威胁，凯南指出，西方国家“除了增强美英力量以填补[二战后遗留的]战略空间之外，已没有其他任何选择。”这一结论并非源于“异想天开”，而是经过严密的推论。在此报告形成前，凯南解释，“我们驻苏使馆的几位研究人员首先研究了苏俄的政治性格，并得出了苏共政权的对内合法性完全建立在对外部威胁进行演义的基础之上的结论。”此后，“我们又做了其他几种政策选择的比较研究，”发现：“即便我们彻底地解除武装，把我们全部的空军、海军力量交给俄国，甚或让美国的共产党来当政，这对解决所谓的苏联问题都毫无帮助；即使到那时候，我们相信——决无戏言成分——莫斯科仍会觉得我们是在设下陷阱，诱其就范，因而仍将继续对我们心存恶感和疑惧。”鉴于“或多或少总是对外部采取怀疑敌视态度是苏维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凯南在报告中申明，“我们的外交必须针对这样一种政治气候

<sup>①</sup> 参看：John Spanier, and Steven W. Hook,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4th ed. (Washington DC: CQ Press, 1998), p. 41。

做调整,而不是去适应那些一相情愿的异想天开”。<sup>①</sup>

凯南这两篇近万字的“机密”报告,并未系统地构建战后美国对抗苏联的战略蓝图。实际上,作为美驻苏使馆的一位地位并不显赫的“专家式”外交官,凯南多年后解释,他当时也决无这样的意图。但是,凯南的“长电”的确涉及美国的对外与安全大战略的几个重要方面。

首先,凯南提出美国对苏的战略考虑,不能仅仅停留在就事论事、立足于政治外交运作层面的平面视野与短期行为上,而应该拓展到长期、稳定、坚持不懈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综合实施的高度与宽度。这就为大战略的制订设置出了思考框架。从一定“效果”意义上讲,他提出战略思考的框架与思路,是对杜鲁门的前任小罗斯福总统多年关于战后国际体系以及围绕这个体系美国应采取的战略选择的设计与安排的直接挑战。这不仅是对小罗斯福死后国际“现实”的急剧变化的简单回应,同时也是作为“现实主义忠实信徒”的凯南借机要求美国战略思考与决策从“理想主义为主、现实主义为辅”的“罗斯福外交观”完全地向传统的“以利益为目的、以实力为依存”的“现实主义”方向回归。对凯南而言,只有“现实的”战略选择,才是“唯一的”、“理性的”、“有效的”、“充满智慧的”选择。

其次,正是在这种现实主义哲学思维的制约下,凯南对所谓“苏俄威胁”做了“现实”的描述。毫不夸张地说,他对战后美国面临的“长期威胁”界定是“长电”最重要的部分。作为此时“人微言轻”的凯南,尽管可能有提出“大战略”思考的动机与企图——多年后他一直否认自己曾试图担当美国冷战战略的思想者,但若从当时华盛顿的政治“现实”考虑,凯南一开始便提出“大战略”思维,不仅难以受到重视,对他自己的职业生涯也将产生难以估计的“负面

---

<sup>①</sup> Kennan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20 March 194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 VI, 723.

影响”。此时杜鲁门政府对外政策制定的主要部门仍为国务院，而核心人物则是杜鲁门接任后不久任命的国务卿詹姆斯·波恩司（James F. Byrnes）。杜鲁门启用波恩司并非由于他“外交才华”出众，而是看中他处理内政事务——特别是如何对付国会——的非凡能力。由于深知总统对他的期盼，波恩司在国务卿任上的兴趣点一直在解决国内问题。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特别是处理对苏关系上，波恩司显得“平庸”、“缺少想像力”。就他而言，“苏俄威胁”并不可怕，充其量只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相争，不足以为虑。<sup>①</sup>凯南选择全面“认知”苏联威胁作为切入口，隐含着他批判波恩司“苏俄威胁无关碍”这一思维逻辑的企图。

最后，凯南的“长电”虽然没有系统地阐述美国应该如何对苏实施遏制，但却有明显的战略建议意图。在充分认识“苏俄威胁”长期性的同时，凯南强调对苏打交道要“迅速”建立起以“坦率、勇气、自信”为主要特征的战略“态势”。具体内容包括：(1) 美国无需再试图隐瞒美苏间的分歧，反之应该公开地、直接地说明分歧之所在，但只需注意不必过于刺激对方便可；(2) 美国必须不再为苏联做出任何妥协，实际上必须将苏联未来有可能扩张的目标“划入”美国的全球防线内，但同时不必宣称将试图“解放”已经在苏联控制下的国家与地区；(3)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美国必须重建武装力量，并且积极为盟国提供其所需要的军事与经济援助；(4) 华盛顿应该继续与莫斯科谈判，但谈判的功用最多只能是将苏联接受美国的立场与要求“记录在案”，或是将苏联不妥协的态度“公布于众”，以求争取盟国与美国国内舆论的支持。<sup>②</sup>有趣的是，凯南的这些“隐含”着的战略建议，却“意外”地受到波恩司的接受。在 5 月

<sup>①</sup> 关于波恩司的“外交观”，参看 Patricia D. Ward, *The Threat of Peace: James F. Byrnes and the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 1945 – 1946*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22 – 23。

<sup>②</sup> 摘自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p. 21 – 22。

20日的一次广播讲话中,波恩司大谈凯南的上述建议,并总结为“坚定而有耐心[patience and firmness]”的对苏政策。<sup>①</sup>然而,波恩司只字不提战略。

## 第二章 国家利益观

作为国务院有史起收到的最长的调研报告电文,凯南的“长电”在华盛顿对外与国防决策圈内引起极大的震动。国务卿波恩司接到电文后,立即指示在国务院内传阅,并要求各部门对报告进行评估。在初步认为“报告极有价值”后,国务院将“长电”呈报了白宫,同时也送给了军方(主要是时任陆军参谋长的乔治·马歇尔将军[General George Marshall])评论。<sup>②</sup>由于“长电”大胆的设想、“严谨的推理”以及“流畅的文笔”,瞬间使原来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中下级外交官凯南声名大振,以至一时间谈论“长电”变成华盛顿圈内人士的“社交话题”。“如果说我以前的所有报告对这些人哪怕丝毫影响也没有的话,”凯南多年后回忆道,“这份报告似乎一下击中要害,并在以后的几个月内造成极大的震荡,这个[结果]着实令我惊讶不已。”<sup>③</sup>

“长电”成为凯南从一般对外政策研究人员变成战略思考者的重大转折点。电文在华盛顿决策圈内受到如此的重视,无疑为凯南赢得了美国“思想最深刻”的苏俄问题专家的盛誉。此时,再将

---

① Bynres radio address, 20 May 1946,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14 (June 2, 1946), p. 950.

② H. Freeman Matthews memorandum, “Political Estimate of Soviet Policy for Use in Connection with Military Studies,” *FRUS*, 1946, I : 708 – 709.

③ Kennan, *Memoirs: 1925 – 1950*, pp. 294 – 295.

凯南留驻莫斯科显然已不适宜。时任美国海军部长的詹姆斯·福来斯特(James V. Forrestal)捷足先登,于1946年下旬将凯南调任刚刚成立不久的国家战争学院(National War College),负责“对外事务”的研究与教学工作。这一调动实际上非同小可。由于军方一直对国务院的对苏政策不满,同时对国家安全“大战略”研究未受到白宫关注也深感担忧,便成立了这个“国家战争学院”,并作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在最高层面上研究[国际]政治与军事问题”的机构,而凯南便被认为是“最理想的对外事务研究主管”。毫无疑问,福来斯特看中的正是凯南的“战略视野”。<sup>①</sup>

时隔不久,十分关心国家安全战略问题的马歇尔将军取代波恩司担任国务卿。为了加强国务院的对外战略研究与咨询能力,马歇尔上任不久便成立了国务院“政策计划署[Policy Planning Staff,简称 PPS]”,并授权计划署“为了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实现,考虑、策划、发展……长期政策”。该署的第一任主任,在马歇尔看来,非凯南莫属。凯南便抓住机会,于1947年5月离开了国家战争学院,走马上任美国“政策计划署”的第一任主任。<sup>②</sup>

凯南在国务院内担任 PPS 主任的位置十分特殊。首先,由于“长电”的影响,华盛顿决策圈内对战略问题研究的兴趣陡然高涨,不仅是军方,即便是文官各部,也突然兴起对所谓“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与咨询,而美国国家安全研究的主要对象则是苏联。这样,凯南作为公认的苏俄问题专家,其影响力与权威性可想而知。其次,此时的杜鲁门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建美国“国家防卫建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计划建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此委员会被赋予的最主要功能,便是作为美国对外与国防战略与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此时的国务卿马歇尔是建“国安会”的最有影响的推动者。直接听命于马歇尔的凯南,可谓“如鱼得水”。其所受到的

<sup>①</sup> Kennan, *Memoirs: 1925 – 1950*, pp. 307 – 309.

<sup>②</sup> 同上,第327页。

重视程度,是他在国务院内同级的任何一个部门主管所难以项背的。再次,由于 PPS 的使命是进行“长期的政策研究”,这就使得凯南得以专心对苏战略进行思考与策划,得以充分地发挥他的长项与专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时的凯南“地位显赫”,更重要的是,他在利用自己的地位极力使他的“战略观”最终成为美国的长期战略。

对后一点,凯南似乎显得过于心急。为了推行他的战略观,凯南不仅注意影响华盛顿决策圈内高级官员,同时也“迫切”地要“教育”美国公众与舆论界。上任两个月后,他将自己的“长电”基本未加修改,送给美国对外政策讨论最具影响力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季刊,该刊于 1946 年的 7 月号以作者为“X 先生”发表,并冠以显赫标题:“苏联行径的渊源。”此文的发表似乎给正值盛夏的华盛顿的酷暑添加了“政治热度”。文章所指出的苏联对美国“长期的”、“根本不会自动消失的”威胁让仍对国际事务不甚了解也不关心的美国人感到震惊,而文章首次提出的遏制设想似乎又使美国公众看到“希望”,感到“欣慰”。然而更令舆论界有兴趣的则是要查出“X 先生”到底是谁。大概纯粹为了“商业炒作”,一个在报界有头有脸名叫阿瑟·克劳克(Arthur Krock)的记者,不顾职业限制贸然公布了“X 先生文章”即为国务院“政策计划署”主任凯南。经克劳克如此公布,“X 文”便被认作是美国对苏政策的公开宣言。从而导致了在舆论界一阵喧哗之后,美国的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撰写一系列文章,评论凯南的“X 先生文章”。李普曼的评论既有肯定也充满了批驳。遗憾的是凯南由于受到政府纪律约束,未能公开与李普曼交锋,澄清许多似乎被这位专栏作家所曲解甚至误解的观点,特别是对李普曼公开宣称凯南的“X 先生文章”是发起对苏冷战的宣言书,凯南并不以为然,认为李普曼走得太远,可他却无法予以纠正,无形中背上了黑锅。这一桩“凯南对李普曼”的公案,不仅对影响、动员当时的美国舆论以支持华盛顿的对苏“强硬”政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同时

也为此后美国研究冷战国家关系的学术界留下了一个难题,以至引发众多的文人对“什么是凯南的观点”、“什么是李普曼的发挥”产生极大的兴趣,而迫使凯南在卸去公职的第一时间,便考虑写回忆录,以期“还给自己一个清白”。然而时至今日,凯南的回忆录早已出版多年,但关于“凯南到底是什么意思”的争论仍喋喋不休。<sup>①</sup>

尽管在担任 PPS 主任期间无法公开阐述自己的观点——有一种观点认为凯南实际上并不十分清楚自己的全部思想,还有学者提出他原本就没有使其战略思维系统化的企图,<sup>②</sup>但凯南在此后的一系列以“政策计划署”名义提交的报告,不断地完善了他的遏制观,而且也形成了一套可操作的政策体系。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凯南倡导的大战略思维逻辑。这一逻辑的一个最主要的表现层面为国家利益的界定。

任何一个“长期”、“稳定”、“有权威性”的国家战略,凯南提出,都必须、也只能从界定国家相对于外部环境的长期利益为出发点。对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而言,无论其国力大小,无论其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无论其政治体制、经济社会制度如何,也无论其领导人信奉何种意识形态,在其界定国家利益时,无疑都会归结到一个“平淡无奇但无懈可击”的目的:国家需要一个有利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环境。“我们最基本的对外政策目标,”凯南在 1948 年 8 月 20 日的一份题为“关于我们对外政策趋势的评论”PPS 文件中指出,“永远只有两个。”第一是“保卫国家的安全”。这里国家安全的含义,他解释,“是指国家具有能够保证在不受外界干涉或不受外界威胁干涉的前提下得以自主地、不间断地追求自己的生活的能力。”第二则是“提高国计民生水平”。为了这一目标,凯南强

<sup>①</sup> Kennan, *Memoirs: 1925 - 1950*, 另参看: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 26。

<sup>②</sup> 参考 Mayers, “Containment and the Primacy of Diplomacy: George Kennan's View, 1947 - 1948,” *International Security*, XI (summer 1986), pp. 124 - 125。

调，美国对外政策就必须力求建立“一个[合适的]国际秩序，以便本国为其他国家的和平有序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进而也保证本国为自己的经验和能力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凯南同时提醒白宫决策者，对这两个目标的追求以及对其实现程度的衡量，必须考虑到目标本身的“相对性”，而决不能一味强求达到目标的“绝对性”。这是因为，他解释说，“完全的安全或构建一个完美无缺的国际环境绝对不会实现。”尽管国家领导人可以公开地宣传要致力于这两个目标的“完全实现”，但充其量只能是为了“国内动员”而“指出一个奋斗方向，并不是去描绘最终目的地”。<sup>①</sup>

毫无疑问，凯南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并无惊人之处。然而，凯南就是用这样平淡的安全利益观向美国传统的“国家利益观”——即所谓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提出明确的挑战。美国自建国以来，在对外事务的处理上，相当大程度上受到这种源自欧洲文艺复兴后盛行的所谓“国际法制哲学”的影响，认为一个和谐的国际环境的首要条件是建立超出国家主权，并为所有现代“文明”民族国家所接受的“统一的”、“普遍的”的国际制度与制约规范。似乎只要“世界大同”了，所有导致战争、阻碍发展的诸如民族国家“对实力孜孜不倦的索求、对其他民族的偏见以及对他者非理性的仇恨与嫉妒”等等“丑恶”设置“罪孽”因素，都会在统一的国际法律制度内逐渐消失直至最终消亡。<sup>②</sup>正是在这种“普遍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凯南认为，美国在威尔逊与小罗斯福时期，才会对建造诸如国际联盟以及联合国等国际制约与合作机制如此地投入。然而结果却根本无法杜绝国际战争，却使美国的安全利益受到威胁。

---

① Draft paper, “Comments on the General Trend of U. S. Foreign Policy,” 20 August 1948, George F. Kennan Papers, Box 23, Mudd Libra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New Jersey.

②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 27.

用“普遍主义”思维界定美国国家利益，凯南特别指出，难以避免一个内在的认识误区：即“普遍主义者”固执地假定“世界所有地区的人都和我们自己无异，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以及所寄予的希望和我们无实质上差异，此外他们对同一情况的反应也和我们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这种假定之所以极易造成“误区”，凯南分析，是因为现代国际社会的一个最本质的特征是“多样性”，而不是“一致性”。如果否认这种认识误区，而不余遗力地试图将一个“多样化”的国际环境，按“美国式的制度”改造成一个“一致”的国际社会，根据凯南的推测，结果十分可怕——由于美国在追求自己力所不能及的目标，最终也将使自己的“制度”受到危害并可能毁于一旦。“我们是很伟大，而且十分强大，”他指出，“但是我们的伟大与强大，尚不足以能够单独强制、改变或完全控制国际上所有具有侵害企图与能力或只是对外行为不负责任的力量。如果我们去追求这些目标，这就意味着要求我们的人民做出牺牲，而这个要求民众为此目的献身的本身，就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们赖以生存的政治制度，最终必将迫使我们在捍卫这些生活方式与政治制度的同时而丢弃我们应该追求的真正目标。”<sup>①</sup>

此外，凯南认为，从“普遍主义”出发去设定国家长期利益，必将产生一个“目标盲点”，即：根据“普遍主义”的要求去追求杜绝国际生活中的任何武装冲突现象的目的，这不仅不可能，也不可取。现代国际关系的现实，决定了国家间暴力冲突的“必然性”。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它的实力有多么强大，最可能实现的企望只是将国际现状“冻结起来”，或是将国际间的冲突限定在最小范围之内。尽管国家对外行为充满着“非理性”，但现代社会人的基本行为内涵仍表现出理性大于非理性。在国际运作中，只要别国领导人或他的人民认识到“和平地保持国际现状符合其最大的利益”，便不会轻而易举地去“破坏现状”。依此类推，只要别国领导

<sup>①</sup>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 28.

人或人民相信“我们为维护这样的国际现状做出了不以我们的影响力主导国际事务而于国际安全与稳定都有利的模糊但克制的承诺”，目前的“国际现状”完全有可能平稳地延续下去。这个结果本身，凯南坚持，也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根据他对国际冲突的认识，战争并不一定都是“魔鬼”，同时“和平”也并不一定都是那么“完全的可取”，比如“完全由监狱的高墙支撑的‘和平’就不可取”。对此，凯南进一步展开分析：“尽管令人生厌，但我们可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现实：世界上某些地区发生规模不大的武装冲突，可能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另一种可能的情况——即世界大战——会更坏。”根据他的推断，一旦战争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美国“完全有可能不得不牵扯进去，而在全球大战的条件下，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成为赢家，人类各个文明体都将不能幸免”。因此，他认为，“就我们国家安全而言，控制在某些地区的暴力冲突比为了和平所做的国际[建制]安排恐怕更为可取。对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面对这样的事实，凯南指出，“世界和平的总体想法恐怕目前仍显得幼稚，至多是毫无现实意义的夸夸其谈，甚至是白日做梦。”<sup>①</sup>

依据“普遍主义”哲学制定国家利益体系的另一个危害，凯南认为，是将“有限”的资源与精力投放在根本没有实际意义的“国际建制”上，而忽略真正能够保卫国家利益的力量构建。在这点上，他的矛头直指联合国。所有认为甚或期待这样一个“国际组织”所通过的“决议案”或决定采取的行动会对国际事务产生什么影响的人与国家，凯南认为，最终都会发现这只是一个丝毫与实际无关的“空想”。起码到目前为止，凯南指出，联合国里所有已经或正在进行的工作，都极易让人得出“这不过是一场装腔作势的表演比赛”。联合国的弱点目前已经暴露无遗：“会前总是要经过拖拖拉拉、半隐半现的准备工作，然后舞台的大幕才徐徐拉开，照明灯突然间闪

<sup>①</sup>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p. 28–29.

亮起来,各路角色纷纷登场,将五彩缤纷的身段在照相机前定格,似乎在乞求摄影师的首肯,最终的赢家则是那些表演最得体、站位最令人难忘的家伙们。”如果人们真的要为这样的“议会体制下、形同在与假想对手做拳击练习确定什么现实功用的话”,充其量只能发现“这些表演至多只是为理想中解决国际冲突提供一种优美绝佳的[表演]程式”。美国显然不需要这样的程式。如果让这样的表演继续下去,凯南推测,对美国国家利益有百害而无一益。而其中一害就是让美国人民产生和平的“错觉”,而无暇顾及真正应该关心的国际问题;此外,如果联合国长此以往,最终别无出路只会将这个“国际组织变得滑稽可笑,成为国际笑柄”。<sup>①</sup>

那么,现实的国家利益应该如何确定?凯南提出美国必须完全抛弃“普遍主义”的任何幻想,全面采纳另一种思维哲学——“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其基本原则就是美国完全按照自己“特殊”的国家利益要求,对国际事务做“现实的”、“有利于我”的“特殊”运作,核心则是为了安全利益构建国际间的“实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凯南在1948年12月的一次对国家战争学院学员讲话中强调,“我们的安全,只能依赖我们在世界上对我们有敌意以及我们不能信赖的势力间所建立的均势。”具体地说,就是在必要时,“迫使这些势力处于自相残杀的状态之中,迫使它们为了互相斗殴花费本有可能用来对付我们的精力与资源,迫使它们为了自相残杀直至筋疲力尽,从而保证世界上谋求稳定的国家与势力得以不受干扰地生活下去。”<sup>②</sup>国际“和睦”是难以实现的,但是凯南告诉“国家战争学院”的学员,国际“安全”在“细心周到”的“势力平衡”运作条件下是完全有可能的。

根据凯南这一阶段的报告论述,他的“特殊观”包含了几个“逻

<sup>①</sup> PPS/23, 24 February 1948, *FRUS: 1948*, I : 527.

<sup>②</sup> National War College address, 21 December 1948, Kennan Papers, Box 17, Mudd Libra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New Jersey.

辑要素”。首先，美国在界定国家利益时，应该承认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区域都与美国的安全“息息相关”。关于“利益”，凯南在1948年8月20日的报告中写道，“我们必须首先选出那些我们根本无法接受落入对我充满敌意的势力或国家控制之下的地区。”在此前提下，“我们应该明白无误地确定，作为我们政策的第一个特殊的目标，为了保证我们国家安全不受丁点的损害，我们必须在这些地区维护一个至少是对我力量的延续以及国家的独立有利的政权力量存在。”符合凯南这一定义的地区包括所谓A、B、C三类：

- A. 大西洋区域内的国家与疆土，具体包括加拿大、格陵兰岛与冰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英伦三岛，西欧，伊比利亚半岛、摩洛哥、非洲西海岸到大陆的凸出部以及南美自北端凸出部以南；
- B. 地中海国家以及中东向东包含伊朗的地区；
- C. 日本与菲律宾。

为了使这些地区的国家对“我们的国际观持赞同的政治态度，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应该是我们外交所有精力与智慧的集中投放点”。<sup>①</sup>

可能觉得报告中并未说得明白，凯南一个月后再次将他的美国“核心利益”区域界定义加以系统阐述。在给国家战争学院的学员讲美国国家战略时，他指出设计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不要过多“注意细节”，避免只见树木无视林子。尽管美国的全球利益有多方面，而最主要的则是“五个对我们国家安全极为重要的工业与实力中心”。这些中心包括：美国、英国、德国与中欧、苏联以及日本。“世界上只有这五个地区”凯南分析，“才具备在我们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所需要的动员反击力量的气候条件、工业力量、人

---

<sup>①</sup> Draft paper, “Comments on the General Trend of U. S. Foreign Policy,” 20 August 1948, George F. Kennan Papers, Box 23, Mudd Libra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New Jersey.

力资源以及文化传统。”目前五个“中心”中只有一个“控制在对我心存敌意的势力[苏联]手中”，因此，美国的战略目的就是要保证其他“中心”不会落入这个敌对势力范围之内。<sup>①</sup>值得注意的是，凯南并不是强调美国的“核心利益”只包括这“五个中心”，而是通过这个“中心”论提出了一个判断国家“核心利益”的标准，即“工业军事力量”，他所列出的这五个地区完全符合他所提出的标准。

以工业军事力量作为确定国家“核心利益”的另一重要意义，是明确承认任何一国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因此对“利益”的认定也必须依照“先后顺序”、“轻重缓急”进行。1949年11月在位于纽约的美国政治学院一次公开演讲中，凯南要求听众注意一个“不易引起注意”的事实：“我们国家或者任何其他国家可用于对外事务资源的有限性比我们所臆想的要大得多。”为了更“现实”、“有效”地保卫美国“利益”，他强调“唯一的办法就是最为经济地使用我们有限的资源，以期将这些有限的资源使用在能够产生最大效益的地方”。<sup>②</sup>

### 第三节 非等称遏制

由于苏联对美国的威胁具有长期性以及“不可妥协性”，而且威胁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不断地”对世界上其他“工业军事中心”实行“蚕食”，同时这种蚕食最令人担忧之处来自莫斯科施加

---

- ① Draft paper, "Comments on the General Trend of U. S. Foreign Policy," 20 August 1948, George F. Kennan Papers, Box 23, Mudd Libra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New Jersey.
- ② Kennan's address to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23 November 1949, Kennan Papers, Box 1, Mudd Library, Princeton University.

的“政治心理”——而不是立即的军事侵略——压力，凯南认为华盛顿的战略运作就必须具有明确的“针对性”。与此同时，他坚持，美国领导人、公众以及美国的主要盟国也应该认识到，美国可用于全面对抗苏联战略资源的有限性。因此，美国“大战略”考虑的最佳选择，便是采纳“特殊主义”的思维逻辑。依此类推，对苏联潜在“扩张”企图的遏制，美国就必须基于政治的、外交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军事的综合手段，而不是仅依赖军事与外交，同时应特别“突出重点”、“区别对待”，而不是“全面出击”、“不分轻重缓急”。

据此，凯南提出了的对苏的所谓“非等称遏制”思维框架。在他担任 PPS 主任期间，凯南初步提出了实施“非等称遏制”的具体步骤。按他的设计，遏制苏联的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经过至少三个过程：第一，重新恢复国际间的“势力平衡”；第二，弱化苏联对国际事务的影响能力；第三，最终迫使苏联改变其奉行的对外政策思维并接受通过谈判解决它与外部世界的分歧与冲突。有趣的是，每当凯南在谈论这三个步骤时，他的排列顺序常常先后有变。此外，凯南也从未明确地推测过，这三个阶段共需多少时间，或者每一阶段需要多长时间。他这种战略思维的模糊性与灵活性似乎是刻意的。<sup>①</sup>

凯南所强调重新恢复国际间的“势力平衡”的重点地区，是欧洲与亚洲。在他看来，这两个地区不仅仅由于其包含着“五个工业军事中心”中的三个，也因为该地区已经出现严重的“势力真空”。二战结束，使原先“称霸一方”的德国与日本失去了政治、军事大国地位，与此同时，欧洲的传统大国诸如英国、法国由于战争的拖累，已经欲振不能，只有大国的空壳而失去大国的实力。美国致力于在这两个地区重建势力平衡已刻不容缓，而最明智的办法则是加强那里的“自然抵抗力量 [natural forces of

---

<sup>①</sup> 关于此点，参看：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 37.

resistance]”。

为此目标,凯南认为,有效地使用美国经济武器应为优先考虑。具体操作则是为欧洲的主要国家以及日本提供“长期的经济与物资援助”,并将这一“长期援助”政策公布于众。凯南假设经济武器的使用可以产生多种效果。首先,美国对这些“特殊”地区与国家提供经济、物资援助,可以对苏联以及受援国家与人民起到“心理”作用。就莫斯科而言,美国的“资源投入”起码让其知晓华盛顿将这些地区与国家视为“核心”地区。此“防卫线”一旦清晰地划出,苏联必将对“压迫”这些地区“有所顾忌”。而对这些地区的国家与人民,美援能使他们“心理振奋”。这些地区之所以在苏联“扩张”压力面前显得软弱无助,凯南在 PPS 于 1947 年 11 月 6 日完成的第 13 号文件中分析,并非因为这些国家在担心一场新的战争即将爆发,而是由于那里的“工业制造能力与人民精神力量已经完全耗尽”,只有美援能够给他们“增加力量”,“恢复自信”,以致自然抵抗力量能“坚定不移”地向往“民主、自由与富裕”。<sup>①</sup>

其次,美国对那些“确有需要”同时也“主动要求”援助的国家施予援手,可以进一步测试“到底哪些国家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然抵抗力量”。在此前由凯南主持撰写的 PPS 第 1 至 4 号 PPS 文件中,他已经数次提出有必要“区别对待”战后欧洲各国:不仅要看其对影响美国安全的地理位置,更重要的是考察其对“协同美国”抵抗苏联的态度;只有在两者都肯定的前提下,该国才可视为有用的“自然抵抗力量”。因此,在决定发放美援时,“欧洲主动”原则必须得以贯彻。无论美国“如何乐善好施”,凯南认为,“美国人民决非愿意去帮助那些不愿意自助的人。假如那些需要帮助的欧洲政府不愿担负公共责任而主动要求、愿意接受我们的援助,那将意味着我们原先所了解的欧洲公共体已经完全泄气,这也意味着

<sup>①</sup> PPS/13, 6 November 1947, FRUS, 1947, I, 771.

即便我们无条件地提供援助恐怕早已经错过了可以改变那儿情势的时机。”<sup>①</sup>如果能够及时得出这样或与此相反的结论,华盛顿都会掌握着“下一步如何行动”的主动,同时也不至于无效浪费有限资源。

再次,美国可以通过“经济、物资援助”,牢牢地控制着德国与日本,以期达到既不过分刺激苏联,又能避免德、日经济彻底崩溃而完全倒向“共产主义势力”。根据凯南的分析,美、苏、英、法四大国对德国的“占领”不可能长期维持,而美国的目的是既防止苏联控制德国的工业力量,又保证英法能够利用德国的工业基础恢复国力。为此,凯南于1948年2月提交的PPS-23号报告建议,美国通过经济援助可以将德国的经济“逐步纳入西欧经济体制”,并使德国人“跳出已为大多数德国人所崇尚的自我中心,鼓励他们用更宽泛的眼光看世界,激起他们对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发生兴趣,教会他们将自己看作世界大家庭的一部分而不仅仅只是德国人”。将德国“西欧化”对欧洲安全非常关键,因为“一个没有德国参加的欧洲联合体是绝对不可能产生或持久,而没有欧洲联合体,欧洲其他国家就根本无法保全自身不受到霸权势力的侵害”。<sup>②</sup>对日本也是如此,美国对日占领的当务之急,是通过经济援助扶持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能够对抗苏俄共产主义势力“扩张”的“自然抵抗力量”,而不是对日进一步实施“惩罚”。据此,凯南提议对日要注重日本的“经济复苏”与“政治改革”,美国应不急于“签署对日和约”,起码应等到日本已经“建立起充满自信的社会基础后”方考虑

---

① PPS/1, “Policy with Respect to American Aid to Western Europe,” 23 May 1947, *ibid.*, III: 225; PPS/4, “Certain Aspects of the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tandpoint (Preliminary Paper),” 23 July 1947, in Thomas H. Etzold and John Lewis Gaddis, eds., *Contai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and Strategy, 1945–1950* (New York, 1978), p. 110.

② PPS/23, 24 February 1948, *FRUS: 1948*, I: 515–518.

结束盟军的对日占领。<sup>①</sup>

在恢复“国际势力均衡”的同时或以后，凯南认为，美国的“非等称遏制”的第二步，应着眼于弱化苏联对国际事务——特别是对共产主义国家——的影响力。他的这一设想，实际上是此后杜鲁门政府不断形成的所谓“楔子”外交政策的雏形。根据凯南的观察，苏联对其疆土以外的国家与地区施加影响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其一，在一些国家——主要是东欧——建立共产党控制的政府；其二，支持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积极“夺取政权”的活动。美国“正面”去堵截莫斯科在这些地区与国家的“泛共产主义运动”的可能性已十分渺小，而且耗费将会巨大。最“理性”的选择则是通过政治运作在苏联与这些地方的“共产主义势力”间打进“楔子”，造成“隔膜”，“分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求最终将苏联的外部触角压缩在其国界边沿。

凯南认为美国完全有可能达到这一目的，而成功的保证恰恰是苏俄政治文化中“不能容忍多样性”的行为特征与惯性。“共产国际的历史表明，”1948年夏天由凯南主持完成的一份PPS政策分析报告指出，“非俄罗斯人的个人与团体在极力效仿、追求莫斯科的教义时，总是碰到重重的困难。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总是那么漠视他人，那么不留情面，那么傲慢专横，对其追随者约束又是那么严厉残酷，几乎没有谁能够长时间忍受它的威权。”虽然“共产国际”得以勉强恢复，但莫斯科、斯大林已经恶名在外，难免令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心存余悸，稍有分歧，便可冠以与苏联分庭抗礼的罪名。特别是对那些已经掌握政权的共产党，PPS报告分析，如果说它们在试图夺取政权时不得不遵循苏联的教义学说，以获得莫斯

---

<sup>①</sup> PPS/10, “Results of Planning Staff Study of Questions Involved in the Japanese Peace Settlement,” 14 October 1947, *FRUS: 1947*, VI: 537 – 543; PPS/28, “Recommendations with Respect to U. S. Policy Toward Japan,” 25 March 1948, *FRUS: 1948*, VI: 694.

科的政治军事撑腰，但在取得政权后对苏的依赖度将大打折扣。“一旦他们取得政权变成头面人物，一种新的、微妙的力量将开始发生作用。权利，即便只是对其丁点的浅尝，对共产党人与对自由党人一样发生腐蚀作用。特别是当这些领导人的民族与个人利益不断膨胀起来时，与苏联推行的殖民主义政策的分歧与冲突必将难以避免。”<sup>①</sup>

在凯南看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易发生对苏挑战有三个国家与地区：东欧的南斯拉夫，亚洲的中国，以及地中海地区的希腊与土耳其。1948年夏天，南斯拉夫的铁托不屈服于斯大林的压力，“公然”宣称走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明确表示要接受西方经济援助。这一变化令凯南极为振奋。<sup>②</sup>随之，凯南领导下的PPS开始研究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是否也有可能“挑战”苏联的“威权”。早在1947年2月，凯南已经推测，毛一旦在中国取得政权，苏联将会失去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控制。“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他对弗吉尼亚大学的听众说，“会发现他们原先以为已经完全玩弄于股掌之中的那个易变且微妙的东方共产主义运动，突然间已从他们的掌缝中悄悄流失，而留下的只是一只空荡荡的饭碗和礼貌但又让人难以琢磨的吱吱笑声。”在毛领导下的“共产党中国”，凯南曾推测，对苏联的安全以及对苏联控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地位的威胁，从长远看，恐怕要比可能造成对美国的安全威胁要大得多。无论中国怎么发展，它都难以在近期内取得可以威胁美国的海空力量，而对苏联则另当别论。<sup>③</sup>尽管地中海地区的希腊与土耳其的共产党势力正在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斗争，凯南的分

① PPS 59,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the Soviet Satellite States in Eastern Europe,” 8 December 1949, FRUS: 1949, V: 48–49.

② PPS/13, 6 November 1947, FRUS: 1947, I: 773–774.

③ PPS/39,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 7 September 1948, FRUS: 1948, VIII: 147–149; PPS 39/1, 23 November 1949, FRUS: 1948, VIII: 208–209.

析指出,苏联在那个地区的长期军事存在,也必定成为促使那儿的“民族独立主义”倾向抬头的充分条件。<sup>①</sup>为了加速“孵化”这些地区与国家“反叛”莫斯科的势头,凯南认为,美国似乎根本无需花大气力便可离间“共产主义阵营”。此时华盛顿所应集中精力做的,就是努力使欧洲“自由国家”以及日本的经济恢复与发展“取得成功”。在他看来,此举可以“一箭三雕”:一是为恢复“势力均衡”奠定基础;二是促使那些国家内的共产主义分子走向消亡;三是为东欧、亚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共产主义国家做出只有“民主、自由、现代化”才是“人类方向”的示范。<sup>②</sup>

凯南“非等称遏制”的第三步,则是改变苏联奉行的对外政策思维并接受通过谈判解决国际分歧与冲突。尽管达到这个阶段并非短时间内可以实现,凯南坚持认为,莫斯科最终“会改变”其对外政策行为,而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只能是美国长期遏制的结果。“当他们[俄国人]最终得出结论,”他解释,“如果他们不和我们坐下来谈判将一无所获,”苏联人会选择以谈判缓和冲突、解决问题。重要的不是他们是否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而是我们要帮助他们得出这样一个唯一的结论”。<sup>③</sup>

为了要帮助莫斯科“转弯”,凯南倡议美国必须立足于构建他称之为“反压力[counter-pressure]”系统,而这个“反压力”系统的内涵只能是“威慑[deterrents]”与“诱导[inducement]”的有机结合。“苏联的势力”,凯南在1947年2月对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说,“就像一棵树,如果在树苗阶段被弯成形,长成材后就难以改变了。苏联这棵树目前仍能按不同形状生长,但是绝不是在外界突然的强力作用下,而只有通过慢慢的、不断的引导,才能朝正确的

<sup>①</sup> 关于此点,参看: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 44。

<sup>②</sup> NSC 20/2, 25 August 1948, FRUS: 1948, I : 619.

<sup>③</sup> Kennan, *Memoirs: 1925 – 1950*, 302. PPS/23, 24 February 1948, FRUS: 1948, I : 522 – 523.

方向成长。”此后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凯南又用了“如何下国际象棋”作比喻，解释他的所谓“反压力”观。对付苏联就像在与俄国人下国际象棋一样，“你必须集中你拥有的所有力量——这里不仅指军事力量，还指政治力量，并将这些力量——诸如所有的兵与将——全部排出，足以让对面的俄国人经过计算后不得不承认只有按你的要求做才是其获利的唯一途径，在这种情况下，他最终会选择按你要求的去做。”<sup>①</sup>作为凯南领导下 PPS 撰写的第一份关于对苏政策检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20/1 号文件，于 1948 年 8 月 18 日出台，其中使用了几乎一样的语言解释凯南的“反压力”思想。“苏联领导人是愿意承认——而不是争论——情势的出现与存在，”NSC 20/1 指出，“假若情势的产生使他们得出倘若一味地坚持用冲突的方式对待外部世界必将使其实力大损的结论，此时他们的行为，甚至他们针对其国内人民的宣传口径，便能够发生变化。”<sup>②</sup>

美国需要如何做才能“营造”这样的情势呢？就凯南而言，美国几乎不需要“刻意”去做什么，便能使这样的情势得以产生。他指出，“美国，仅仅只要明白无误地展示其自信与耐心，特别要表现出代表正直与尊严的榜样作用，并以此说明俄罗斯民族奋斗的真正伟大与光荣之处，只在于与世界各民族和平友好相处，而不在于让这些民族屈服于其暴力统治之下。”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凯南，通过强调“示范与榜样作用”，似乎在表述 18 世纪盛行美国的“传教士”精神。基于同样的逻辑，凯南与那些孜孜不倦的传教士们一样，相信在处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乃至国与国关系时，“一个好的形式”与“一个善良的愿望”同样重要。在 1947 年 2 月对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做演讲时，凯南听上去简直就像一个“国际传教士”。

---

① 参看：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 49.

② NSC 20/1, 18 August 1948, in Etzold and Gaddis, eds., *Contai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and Strategy, 1945–1950*, p. 187.

“假如我们希望我们的对苏关系能够正常且宁静，”他循循善诱地说，“我们能做的最大的善事，就是在我方塑造并展示出什么是正常与宁静的行为示范，因为形式在国际关系中意义甚大。”他解释，“换句话说，美国实际做了什么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怎么去做”。据此，“对外表现出好的形式，已不仅仅只是那些为了目的而使用的方法，也不仅仅是一个处于次要地位的辅助物，其自身已经成为一种价值观，有着自身的理性与效果，同时可能由于人类自身的属性而成为最伟大的一种价值观。”<sup>①</sup>

一向对国际现实采取较为悲观态度的凯南，似乎在放眼美苏的未来时显得信心十足。他显然认为他的“非等称遏制”最终将达到以“非战争”的方式使美国赢得与苏联“共产主义势力”的对抗。

### 小 结

在他 1946 年 2 月抛出“长电”到 1949 年底卸任 PPS 主管期间，凯南实际上主导了美国冷战大战略最初的思考与讨论。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驻苏使馆官员，突然间成为华盛顿赫赫有名的苏联问题大专家，同时是美国对苏“长期政策”的主要研究者与咨询人，这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实属少见。

凯南的“政策咨询”具有明显的大战略思考特色。首先，在认知所谓“苏联威胁”时，凯南并未仅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而是采取“长聚焦”的历史方法，挖掘莫斯科对外行为逻辑深层次上的“历史意识”，并依此得出美苏对抗将处于“长期冷战”——而不是“近期热战”——的状态中。其次，在确定美国全球战略利益时，凯南表现出熟练地掌握哲学思辨方法的能力。他对整个小罗斯福时

<sup>①</sup> 参看：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 50.

期——至少也包括威尔逊时期——极为推崇的“普遍主义”思维的批判，以及对“特殊主义”方法的大力提倡，都表明他要求美国能用“理性”眼光认识自身利益的迫切愿望。再次，在勾画美国的长期战略时，凯南又娴熟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逻辑。他认为，任何战略的实施，都不得不基于“投入与产出”的效益衡量以及如何以最佳比例配置资源。凯南的“非等称遏制”实际上是一个经济考量的结果。最后，在对实施他所设计的对苏战略结果做预测时，凯南又表现出传统的美国传教士的乐观。不同于一般“战略思考”的“最坏情况”假设，他似乎坚信国际社会走向“安全与发展”——而不是理想化的和平与繁荣——尽管“道路会曲折”，但“前途终将光明”。

此外，凯南基于“现实主义”的战略思考，还体现了一个要素：大战略的策划与执行不应受到国内政治的干扰。他这个时期的报告与讲稿，对国际战略应如何适应美国内外政治的需要——诸如协调国会，平衡行政官僚机构的部门利益，满足社会上各种不同利益“板块”的需要，动员公共舆论等——几乎有意加以回避。这实际上反映了他“为国家根本利益服务的大战略必须超脱于其他任何政治利益”的要求，同时也体现了他“在一个泛化了的民主体制与一个复杂的官僚机制的约束下，任何理性的、现实的长期战略是无法得到保证”的判断。

凯南的上述观点有其“理性”一面，但也未能完全剥离“理想”的因素。毕竟任何意义上的大战略思考，最终都必须落实到“实施战略”层面，而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如何也难以避开任何政策所赖以生存的政治现实。那么，要看凯南的“战略思想”又是如何在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层面得以运作的了。



## 第三章

# 杜鲁门与遏制战略实施

如果没有“操作战略”或“实施战略”的支撑，任何再完善的国家安全战略或“大战略”都将失去其根本意义。凯南提出的遏制战略思想也不例外。由于凯南自己以及他领导的“政策计划署”并未提出具体的操作计划，考察杜鲁门时期对遏制战略在国防、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等层面是如何做出配套安排就十分重要了。这里特别要研究的是，哪些政策完全或基本体现了凯南的思想，哪些偏离甚或否定了他的观点。

## 第一节 以支援预防危机

杜鲁门政府从一开始便对凯南的遏制战略思想表现出极大的热情。除了他思想确有现实与新颖方面之外，华盛顿此时的政治气氛也恰巧适合凯南新思想的传播。至 1946 年初，政府内的高层官员早已对如何与苏联打交道感到困惑，甚至苦不堪言。实际上，从杜鲁门与斯大林“高峰”会晤的波斯坦会议后，这位继任小罗斯福的总统，便在寻找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所谓“苏联问题”的办法。

杜鲁门接任总统后，对国际事务不仅不具备应有的经验，也大大地低估了战后国际体系重建的复杂性。此外，杜鲁门上任伊始，

国内外舆论界与华盛顿政治圈内均对他处理美国与苏联关系的能力表示明确的怀疑，担心这位来自密苏里州一个名叫“独立”小镇的、戴着深度眼镜的矮个子总统，根本不可能是“经验老到”，而且“心狠手辣”的斯大林的对手。对于所有这些怀疑与担心，杜鲁门是“心知肚明”，潜意识中一直希望尽快有机会向世界证明“他完全可以对付莫斯科与伦敦”，而不是人们心中的那个“软弱无比”、“任人欺凌”的“软蛋”。有政治心理学家发现，此时的杜鲁门在对苏问题上，完全有可能受到他孩提时代便患上的所谓“弱者非理性反弹 [inferiority complex]”心理情结影响，而急于对国内外表现自己的强悍与“凶相”。<sup>①</sup>

在凯南提出遏制设想之前，杜鲁门政府在对待所谓“苏联威胁”问题上，主要有三种考虑。第一是在二战结束后即刻回归到美国传统上所遵循的“孤立主义”原则，即在完成了对“自由世界的解救”后，仍保持与欧洲若即若离的状态。经济上继续与欧洲保持并发展对美国有利的经济贸易关系，而在政治与安全上，完全脱离欧洲的外交体系。尽管苏联有可能成为另一个对欧洲“怀有歹意”、“实施霸道”的专制国家，但在其未成气候之前，美国不予介入，充分地让欧洲“西方国家”自行对抗苏联的霸权。这种选择不仅被“理想的孤立主义”者们认为是符合美国对外关系传统，同时也为现实主义者们判定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实际上，杜鲁门执政初期，便使美国的对外关系朝这个方向发展。迅速从欧洲撤军，大幅裁军，以及致力于美国的从战争经济向和平经济转型等政策行为，均具有“孤立主义”的倾向。<sup>②</sup>

第二种选择与第一种完全相反。由于英国二战前实施的对法

---

① Deborah Welch Larson, *Origins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chapters 1 - 4.

② John Spanier, and Steven W. Hook,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pp. 41 - 42.

西斯德国“绥靖主义”的惨重教训，华盛顿部分官员坚持，美国应当“果断地”对苏采取强硬态度，同时不排除在苏联军事重整尚未完成前对苏实施所谓的“预防性打击”。实际上，这种观点在 1946 年拥有相当的市场。比如，杜鲁门的特别助理克拉克·克利福德 (Clark M. Clifford) 经过“广泛咨询与研究”，曾于该年 9 月向总统提交了一份“绝密报告”，报告中列举了苏联近期内“对外扩张”的种种迹象与可能，建议杜鲁门考虑暂缓从欧洲或亚洲撤兵，并且强化与美国盟国——特别是英国与法国——的军事合作，准备“寻找机会”对苏联在东德或东欧的驻军实施“预防性打击”，同时也不排除在必要时攻击苏联本土。<sup>①</sup>

第三种选择则是第一、第二种之间的妥协，即通过所谓的“大国外交”以及“国际建制”与莫斯科达成“谅解”，“诱导”苏联接受战后国际社会“现状”。这种思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凯南所批评的罗斯福时代延续下来的“普遍主义”、“理想主义”影响，同时也是杜鲁门政府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实际上杜鲁门的执政重心从一开始便放在国内的政治稳定与经济转型上，国际问题并非他的重点。按杜鲁门与国务卿波恩司的设想，华盛顿应该尽快通过“外交谈判”、国际斡旋让战后国际局势稳定下来，以便美国集中注意力于内政上。对这样的设想，杜鲁门、波恩司不仅认为是必要的，而且坚信十分可行。由于两人曾长期在国会工作，深谙“讨价还价”、“礼尚往来”、“互相利用”等美国国会政治中长期盛行的一套“游戏规则”，自然也认为国际政治的运作与国内政治的游戏大同小异。当然除此一套，他们对其他“套路”也不甚了了。如波恩司在私下的一次评论斯大林“贪婪”时说，克里姆林宫的主子和美国地方上的“政治老板”们的政治伎俩完全一样，他们在提出要求时决不会

<sup>①</sup> Arthur Krock, *Memoirs: Sixty Years on the Firing Line* (New York, 1968), pp. 476 – 479. 《克利福德报告》的原件已经解秘，目前展于杜鲁门总统图书馆。

那么的“优雅”、“含蓄”且“谦让”，他们所遵循的只有一个原则，即“一物换一物[*quid pro quo*]”。“你同意为他们所控制的州内建一所邮局，他们便会支持在你控制的州内同样也建一所邮局”。<sup>①</sup>很长一段时间内，杜鲁门政府的对苏政策是在积极地实行着这一假设。

应该说，上述三种选择都是在没有国家安全战略思维指导下应急式的短期行为。凯南的遏制逻辑与设想恰恰弥补了华盛顿至此的所有对外政策思考与设计的重大缺陷。有研究表明，杜鲁门在了解了凯南的基本思想后，便表现出明显的“赞赏”。特别是在接到克利福德“对苏实施预防性打击”的密报后，总统即刻表态，要求他的特别助理“立即将报告锁起来”不得有丁点的外传。<sup>②</sup>国务卿波恩司对凯南的建议似乎也并未极力抵制。此后接替他担任国务卿的马歇尔更是对凯南“大胆”的战略建议“倍加推崇”。

遏制思想深得白宫赞赏，但具体如何操作？首先从何处切入？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杜鲁门、马歇尔似乎选择以实施美国“经济武器[economic weapon]”为落实遏制大战略的开端，而实施这一武器的公开政策则是所谓的杜鲁门主义与马歇尔计划。前者的背景并不复杂。1947年7月初，原来由英国“经营”的地中海国家希腊、土耳其突然间“共产主义势力膨胀”，使得亲西方的“皇家派”直落下风，伦敦数次告急华盛顿，称如果美国不施与援手，这两个具有重要地缘政治意义的国家将倒落入苏联控制之中，后果不堪设想。此时的杜鲁门政府恰恰为构建遏制寻找突破口，所谓“希腊危机”正好是“天赐良机”。在新任国务卿马歇尔的建议下，杜鲁门于3月12日出现在国会的“两院联合会议”上，阐述他的“杜鲁门主

---

① 参看 Patricia D. Ward, *The Threat of Peace: James F. Byrnes and the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 1945–1946*, p. 22.

② Daniel Yergin, *Shattered Peace: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Boston, 1977), p. 245.

义[Truman Doctrine]”。总统向议员们解释，战后国际政治纷争已经“关系到两种不同生活方式之争”，而出现在希腊、土耳其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是全球性的“反自由”、“反民主”势力的冰山一角。美国作为西方“自由世界”的代表，必须对这些国家“抵抗共产主义”势力给予援助。如果今天对希腊坐视不顾，明天土耳其就会倒向苏俄，后天也可能周边地区的伊朗或其他国家“不得不”离开“自由世界的大家庭”。鉴于这种可能的“多米诺骨牌”现象，杜鲁门要求国会立即批准“无偿”给予希腊反共政府 3 亿美元、给予土耳其政府 1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用以“抵抗共产主义扩张”。<sup>①</sup>

鉴于“希土危机”，华盛顿开始考虑通过对欧洲——主要是西欧——经济援助，以防微杜渐。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并得到杜鲁门的批准，国务卿马歇尔利用在 6 月 5 日哈佛大学毕业典礼讲演的机会，宣布美国政府正在考虑给欧洲 1948—1952 年间提供总数达 170 亿美元的经济资助。美国对欧洲接受美援国家的唯一要求，马歇尔解释道，就是这些国家必须“主动提出请求”并“自主管理援助资金的使用”。由于少数“孤立主义”议员的反对，国会最终达成一个妥协的方案：批准援助欧洲 130 亿美元。这就是所谓的“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实际上到 1951 年底，该计划总共安排了 120 亿美元的援助项目，除了无息或低息贷款外，援助大都为工业与生活物资，同时还有大量的军事物资。尽管马歇尔计划理论上针对所有的欧洲国家(包括东欧)，但在具体实施中，援助主体集中为英国、法国与联邦德国，这三个国家获取了援助的一半以上，特别是后期的军事物资，几乎全部由这三国享有。<sup>②</sup>

<sup>①</sup> Ronald E. Powaski, *The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1917 – 199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72.

<sup>②</sup> Michael F. Hogan, *The Marshall Plan: America, Britai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47 – 195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chapter 1 – 2.

冷战国际关系学者认为，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公开宣布冷战的正式开始”。尽管这样的观点尚难成定论，但有一点十分清楚：这两个“公开”政策的逻辑，完全符合凯南所提倡的遏制思维，应该认为是杜鲁门政府对凯南所勾画的冷战大战略的具体实施。其深远的战略意义远比确定美国冷战政策的分水岭要重要得多。对此，主要可从如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美国政府对战后应担负“全球责任”取得共识。作为北美的新兴国家，美国自建国以来长期主张集中精力经营其在美洲大陆的利益和势力范围。这里除了有美国式的意识形态——即笃信美国是上帝建在“群山上的一幢大厦”，是为欧洲这一“旧世界”创立“示范”的“全新世界”，是代表着人文社会发展方向的“现代文明”典范——的影响外，<sup>①</sup>主要还有“现实主义”的理性考虑：美国安全受到天然地理环境的保护，美国作为一个“大国俱乐部”中的后起之秀仍无法在世界范围内与传统的大国争夺。无论是在 20 世纪初老罗斯福时代对“美国走向世界”的鼓吹，还是一战时威尔逊所期望的美国成为国际“新秩序”、“新制度”的领袖，甚至是二战时期小罗斯福对美国作为大国参与的国际政治安排的策划，其中所表现的“国际主义”倾向，都或多或少在美国“孤立主义”的传统思维与行为惯性的制约下，不是受到“遏止”，就是遭到挫败，即便是小罗斯福的设想在杜鲁门接任后的最初时期也未能避免“孤立主义”者的批评与“改良”要求。杜鲁内外政策的“左右摇摆”，正是由于凯南遏制战略的提出，而走向美国“承诺”致力于“确保”其对“自由世界主导地位”的不归路。因此，凯南的大战略思维是现代美国对外关系的一个“冠石〔Key-stone〕”，而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等充其量只是这个冠石上的“梁柱”。

第二，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所反映的华盛顿对美国国家

---

① Michael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chapters 2~4.

利益与外来威胁的认知，偏离了传统的“普遍主义”轨迹，明显地转向“特殊主义”的逻辑方向。二战后的最初几年，对美国国家安全有着“至关紧要”关系的地区，除了欧洲、地中海外，亚洲与拉美几乎具有同样重要的位置。若按“普遍主义”的要求，美国应对这些地区给予同等程度的关注与投入。然而，正是按照凯南倡导的“特殊主义”标准，华盛顿对关系到美国“全球安全利益”进行了重新排序，确定重点为欧洲与地中海，即便对这两个地区，也将重点放在英国、法国与重建中的德国以及似乎直接受到苏联“战略威胁”的希腊与土耳其。这种重新排序，不仅反映了杜鲁门政府对地缘政治所决定的“核心利益”定位以及应对威胁的轻重缓急的考量，也体现了对美国“战略资源有限”的承认。因此，将这三个因素综合考虑，构成华盛顿此时的战略利益排序选择的主体，这恰恰与凯南强调的“区别对待”、“有轻有重”的“理性”要求不谋而合。实际上，凯南不仅在“思想方法”上影响了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的构成，有研究表明，他还直接参与了该项政策的具体制订。<sup>①</sup>

第三，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的实质是美国使用经济武器以达到对外政策目的。这里有三个要点值得着重说明。其一，对欧洲与地中海地区的重点国家予以主要以物资为主的援助，不仅是美国此时公共财政力所能及的，还对促进美国自身的经济恢复有着积极的作用。二战结束后，联邦政府立即实施大量军事裁员、经济转型。此间，虽然经济有“衰退”的迹象，联邦财政却积累了大量“军需物资”，而将这些“剩余物资”用于对外援助，并未增加公共财政的压力。同时，由于政府战争订单锐减，工业制造一时开工严重不足，再加上复员的大批“二战英雄们”需要就业，联邦政府便可以通过增加支出刺激工业制造业的扩张，进而增加就业机会，提升消费水平，最终促进经济复苏。其二，美国经援尽管有需要援助国家准许美国对“需要”进行评估与审核的要求外，其主要的先决条件

<sup>①</sup> Hogan, *The Marshall Plan*.

是“受援国主动提出申请”并“能不完全依赖美援而自救”。特别是对马歇尔计划的履行,华盛顿要求能对“需要援助的欧洲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并要这些国家公布公共财政与经济数据。这里除了有排除东欧甚或苏联利用美援的可能,同时对“受援国”自主、自立、自救的强调则反映了凯南的通过“援助”测试到底哪些国家可以成为美国在当地的“自然抵抗力量”思想。其三,美国直接对欧洲、地中海国家的战后经济、社会重建实施援助项目,实际上是对原先设想的通过“国际经济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 IMF)、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援建欧洲思想的修正。实质上表现了杜鲁门政府基本接受凯南的对“普遍主义”、“理想主义”的批判,准备放弃通过这些国际经济建制设立美国对欧洲经济援助管道的努力。比如在马歇尔计划开始生效前的1947年5月,华盛顿就曾通过世界银行为法国提供两亿五千万美元的低息贷款,但在马歇尔计划开始后,这样的援助便停止了。<sup>①</sup>

第四,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所追求的目标,既包含了凯南所界定的遏制战略目标,同时也有不同于 PPS 主任的设想。通过对欧洲的主要“工业、军事中心”援助,美国试图实现的目的多达数种,其中包括:(1)帮助欧洲重建以确保海外对美国工业制造产品的购买力;(2)强化这些“自由、民主”政府的恢复经济、稳定社会的能力以防止“极左势力”甚至“共产党势力”在“民选”中赢得民心而取得政权;(3)通过设立“接受援助”的先决条件为现时执政的党派在政府内部“清洗共党分子”提供合法借口;(4)以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重点援助将柏林政府首先纳入西欧的经济体系,同时为融合联邦德国于美国为主导的西欧政治、军事体系做准备;(5)加强这些战前的老牌殖民国家的中央财力而避免它们为了敛

---

<sup>①</sup> Thomas G. Paterson, *On Every Fro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Cold War*, 2nd e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2), p. 77.

财残酷搜刮“殖民地”而使日益恶化的宗主国与殖民地关系走向突变；(6) 以援助为“杠杆”紧紧拉住西欧主要国家(特别是法国)从而使其影响正在上升的所谓“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即在苏美板块之外寻找另一条国际关系通道——倾向得以遏制。显而易见，这些既设的目标与凯南所提出的尽快构建欧洲均势意图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杜鲁门在表述他的援助希腊与土耳其计划时，却强调了另一个意图，即通过经济援助遏止希腊倒向共产主义，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土耳其以及其周边国家也“倒向共产主义”。杜鲁门这里所描述的是所谓可能的“多米诺骨牌”现象：一国倒向共产主义，其他国家也有可能受到影响而纷纷效尤，以至倒向共产主义成为难以阻挡的潮流。因此，杜鲁门赋予美援以遏制可能的“多米诺骨牌”后果的使命，这点在杜鲁门主义出台时，并未引起广泛注意。然而，值得强调的是，“防止多米诺效应”从此成为美国整个冷战时期战略考虑的一个重要坐标系。<sup>①</sup>

美国对欧洲以及地中海国家“有重点”的实施所谓经济武器的效果如何？西欧、地中海以及中近东此后的政治发展，似乎表明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所追求的目标得到相当程度的实现。首先，西欧主要国家的经济状况得到迅速改善。在马歇尔计划的刺激下，英、法、德三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恢复的速度惊人：从 1948 到 1950 年间，三国的 GDP 比二战前增长了 25%；而 1950 至 1952 年间，便达到了战前的 200%，特别是联邦德国更是达到了德国工业制造在 1936 年创造的最高水平。美国的经济援助，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评论说，使欧洲“度过了最艰难、最暗淡的岁月”。<sup>②</sup>其次，英、法、德的经济复苏，促进了西欧的“经济合作”与“一体化[Integration]”。

<sup>①</sup> Robert Jervis, and Jack Snyder, eds. *Dominoes and Bandwagoning: Strategic Beliefs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Eurasian Rim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sup>②</sup> Spanier, and Hook,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pp. 59 – 60.

凯南认为，美国对欧洲的援助，不应过于“长期”，也无须美国主导，重要的是要欧洲国家最终能够自己“互助”，而“经济融合”与“一体化”则是互助的保障机制。这点不仅为杜鲁门接受，也受到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的支持。如 1948 年国会通过的“经济合作法案”，便明确强调了促使欧洲经济合作走向融合。正是在华盛顿的“敦促”与支持下，法国领头推动欧洲经济一体化。法外长罗伯特·舒曼 1950 年 5 月提出的舒曼计划，便为此后成立的“欧洲煤炭、钢铁联盟”设立了框架。<sup>①</sup>再次，美援在西欧的政治运作中直接发挥了作用。一方面，华盛顿通过“威胁取消援助”以影响诸如英、法、意等国的大选有利于“自由派”、“保守派”或对美国“友善”的政治势力，另一方面，那些“亲美政权”也充分利用华盛顿的经济援助——特别是美元现金——去进行政治“暗箱”操作，行贿、收买、恐吓、蒙骗等行径一时在欧洲的政治舞台上甚嚣尘上。有证据表明，美国国务院的所谓“外交官”以及 1947 年成立的“中央情报局”人员，都直接参与了这些“肮脏政治”。<sup>②</sup>最后，由于杜鲁门主义所表明的对“反共产主义势力”的支持态度，希腊、土耳其的“政治危机”很快得到控制。尽管苏联也曾在该地区增兵以“玩弄”所谓“神经战”，但倾向西方的“皇室派”在美国经济援助与军事援助的支持下，得以“安身”。

## 第二步 从“堡垒防御”重建均势

如果说杜鲁门政府在凯南的遏制战略提出后即刻所实施的经

① Spanier, and Hook,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pp. 61 - 62.

② Paterson, *On Every Fro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Cold War*, pp. 77 - 81.

济武器,有其对当时似乎十分紧迫的地中海及西欧的“危机”进行“管理”的一面,更为重要的是,遏制要求美国必须尽快恢复欧洲的均势,以填补由于英、法“薄弱”以及德、意、日战败而造成的所谓地缘政治的“空白”,最终达到使“苏联扩张”的实际成本加大的目的。对此,华盛顿的战略决策者们认为,经济武器仍无法完全取代在“重点地区”必要的“军事安排”。

对于美国在哪些地区、做何种军事安排,杜鲁门以及他的高级幕僚们并没有心理及政策上的准备。特别是要按照凯南的“特别主义”逻辑去界定美国的全球安全利益,困难仍十分大。尽管白宫对如何更有效地与克里姆林宫打交道已伤透脑筋,同时也承认传统的“普遍主义”完全失效,但要毫无保留地抛弃美国对外关系中的“理想主义”成分,怀疑者有之,反对者更有之。即便是杜鲁门本人也觉得这样做与他所追求的“政治理想”格格不入。据《纽约人》(*New Yorker*)杂志1951年4月5日所透露,总统一直随身带着英国诗人丁尼生的一首“憧憬未来大同世界”的诗。当被记者问到为何特别喜欢这首诗时,杜鲁门回答:“我想,实现世界联邦[the Federation of the World]是我自将此诗带在身边后所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sup>①</sup>诚然,杜鲁门的解释有自我标榜之嫌,但恐怕多少也反映了他的真实意愿。因此,放弃通过诸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并按照美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模式去改造国际社会,接受欧洲“旧世界”的传统“军事平衡”法,去维持世界的“多样性”,以达到维持国际稳定的目的,对杜鲁门以及他的追随者委实不是件容易的事。

然而随着马歇尔取代波恩司担任国务卿,华盛顿的对外政策思维从“普遍主义”转向“特殊主义”,似乎变得容易了。军衔高达陆军五星上将的马歇尔,曾经在二战期间担任过美国陆军参谋长。

<sup>①</sup> John Hersey, “Mr. President,” *New Yorker*, No. 27 (7 April 1951): 49–50.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 56.

虽在 1945—1946 年间作为总统“特使”赴中国“调停”国共争端失败，但并未影响他在华盛顿决策——特别就国防战略决策——层内的显赫地位。主政国务院后，马歇尔将在对苏政策中必须加入“军事安排”作为他的一个重要使命。因此，他完全同意凯南关于“尽快恢复国际均势”的主张。1947 年 11 月，当看到凯南代表 PPS 就如何构建欧洲新的“军事平衡”报告后，马歇尔立即将报告送达白宫，并亲自游说杜鲁门接受该建议。“从现在开始，”他对总统解释说，“我们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在欧洲和亚洲重新建立均势。”因此，美国所有的对外与国防政策行动都必须按照这个目标行事。<sup>①</sup>

马歇尔对重建国际均势如此坚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刚刚建立的代表军方的“参谋长联席会议 [Joint Chiefs of Staff]，简称 JCS”与白宫内的苏联问题专家都支持凯南的“特殊主义”观。如 JCS 当年 4 月的一份文件中指出，“那些对联合国在现在和将来保卫美国安全能力的信赖，只能意味着这些信仰者们完全忽略了美国的核心安全利益，因而只能会对这些核心利益造成致命的损害。”军方因此而坚持，美国必须将精力与资源从对“国际建制”投入转向对国际“军事安排”的关注。<sup>②</sup>此时在白宫担任总统资政的杜鲁门政府的另一名苏联问题专家（凯南的好朋友），查尔斯·波伦 [Charles Bohlen] 也多次向杜鲁门说明，战后的国际社会“已经分成了两个世界”——西方“自由世界”与苏联“共产主义阵营”。那种认为通过国际合作能使当今的国际社会“一体化”的想法，已经证明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因此，波伦认为，以“现实”的态度对待“现实”的国际政治应是“最大的理性”。<sup>③</sup>

---

① PPS/13, “Resume of World Situation,” 6 November 1947, FRUS, 1947, I: 770n - 771n.

② JCS 1769/1, “United States Assistance to Other Countrie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National Security,” 29 April 1947, FRUS, 1947, I: 748.

③ Charles Bohlen's 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 30 August 1947, FRUS, 1947, I: 763.

此后不久，华盛顿对以“军事安排”对待国际政治现实逐步形成共识。对重点地区的选择似乎完全遵循了英国传统的地缘政治学家海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关于“中心地带[Heartland]”与“边缘地带[Rimland]”的描述。麦金德在1904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任何一国对世界的主导，必须要建立在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两个区域的控制：第一为东欧为核心的“中心地带”，第二是围绕这一中心地带的“欧亚[Eurasia]”边缘地带，其中包括德国、土耳其、印度与中国。据此，他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谁能控制东欧，谁就控制整个中心地带；谁控制了中心地带，谁就控制了欧亚世界环岛，而谁能控制欧亚世界环岛，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sup>①</sup>杜鲁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48年3月草拟的第一份战略报告“NSC-7”，就有截然当地指出，“介于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欧洲、亚洲，存在着一片广阔的地区，由于这片地区的巨大潜力，如果被苏联控制，将极大地增加苏联的实力，从而使苏联在获取人力资源、工业资源、与控制领土方面优越于美国，以致美国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生存希望变得十分渺茫。”<sup>②</sup>1948年11月定稿并得到杜鲁门批准执行的“国安会”第20/4号文件，也明白无误地指出：“苏联对欧亚潜在力量的控制，无论是通过武装侵略行径，还是通过政治颠覆手段，对美国而言，从战略上、政治上都是不能容忍的。”<sup>③</sup>这些报告里明显包含着麦金德的地缘政治观与凯南对美

① Halford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Geographical Journal*, No. 13 (April 1904): 434;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New York: Norton, 1962), pp. 35–39. 关于对麦金德的研究，主要参考，W. H. Parker, *Mackinder: Geography as an Aid to Statecraft* (Oxford, England: Clarendon Press, 1982), chapters 5–8.

② NSC 7, “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Soviet-Directed World Communism,” 30 March 1948, *FRUS*, 1948, I : 546.

③ NSC 20/4, “U. S. Objectives with Respect to the U. S. S. R. to Counter Soviet Threats to U. S. Security,” 23 November 1948, *FRUS*, 1948, I : 667.

国应运作国际均势的要求。

显然,美国对东欧这个“中心地带”已经无法在近期内从苏联手中夺取,那么,美国将如何最有效地“控制”所谓的欧亚“边缘地带”?若按传统的安全战略考虑,无怪乎有两种思路。第一是所谓的“环形防御[Perimeter Defense]”,第二种为“堡垒防御[Strong-Point Defense]”。前者要求对发生以及有可能发生在环绕着“中心地带”欧亚边缘区内所有有利于苏联的“破坏现状”行径都必须予以抵制与防御。实际上,在波恩司担任国务卿时期的“耐心但坚定”政策即有意识与无意识地反映了“环形防御”理念,在凯南看来,杜鲁门主义中防止“多米诺效应”要求也具有该理念的逻辑。<sup>①</sup>尽管这样的思想有其积极的一面——至少比起一味地依赖“国际建制”要现实得多,但仍未完全摆脱“普遍主义”的束缚,仍未能就能力与意图、利益的广泛性与资源的有限性如何有机结合,提出理性的答案。否定了“环形防御”思想,就使得“据点防御”——将有限的资源有选择地投人在对美国国家利益最重要、外在威胁最严重的地方——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凯南所提倡的“堡垒防御”自有其内在的引人之处。首先,它与“战略决策要以充分认识到可动用的资源有限为前提”的原则相符合。杜鲁门时期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特别对此原则的贯彻表现出极大的执著。由于其要求“平衡公共财政”的传统,共和党人极不情愿在“非战时期”划拨过多的军费,而造成联邦财政赤字,税率增高,政府对市场控制过大,结果延缓战后经济转型。即便是国会内力主对抗苏联的强硬派们,也担心苏联在“未准备好全面对西方出击”之前,刻意逼迫美国加大全球战略投资,以此大幅消耗美国资源,最终从财政与经济上拖垮美国,为其未来的“扩张”创造有利条件。国会内共和党人对实施对苏全面遏制的犹豫与担心,对政治上较为保守的马歇尔影响甚大,也是他极力推崇凯南的“堡垒

<sup>①</sup>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p. 57 – 58.

“防御”思想的原因之一。对于美国安全利益至关紧要的重点地区实行“据点式防御”——而不是构建“带状防御圈”，马歇尔认为，“是考虑到我们目前的[战略]局限性以及如何集中使用兵力情况下，能够避免将力量过于分散”的唯一办法。<sup>①</sup>副国务卿罗伯特·拉维特(Robert A. Lovett)1948年夏更加明确地提出“重点防御”是美国相当一个时期内的“不得不的选择”。“我们必须对防御做出明白无误的抉择，”他强调，“否则美国将陷入为世界安全担负全部保险的境地。……[因此，]我们必须对防止我们的[防卫]责任过于伸展而小心谨慎。对同时要资助欧洲的经济恢复、对单个[自由世界]国家或[区域]集团提供武器装备，以及加强我们自身的军事力量，我们的经济与财政资源是远远不够的。”<sup>②</sup>由于凯南提出的“堡垒防御”能够解决美国防卫资源有限的问题，杜鲁门政府似乎很快便取得共识：为了利用美国有限的、基本固定的战略资源，以便更有效、更持久地对付一个长期的、全球性的但又不断变化的“共产主义威胁”，美国必须避免“全面出击”，这不仅是出于“理性考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凯南的“堡垒防御”第二个“理性”之处，是当美国“不得不”与苏联进行“军事摊牌”时，得以选择在对其最有利的地区或战场环境与苏联作战。美国军方自二战结束后就一直为美国在两次大战中“被动”地参战伤透脑筋，因而在较长时间内寻找有效的解决办法。而传统的“环形防御”尽管防线清晰，但却意味着美国要对整个防线几乎是“平均”地投入，并时刻准备应对防线中任何一段出现敌方挑战。其结果仍然令美国军事力量处于被动地位。“堡垒防御”设想则不同：由于美国只是在其认为最为“至关重要”、同时

<sup>①</sup> U. S. Congres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Assistance to Greece and Turkey* (Washington, 1947): 14 – 15; Marshall to Robert Lovett, 23 April 1948, *FRUS*, 1948, III: 103.

<sup>②</sup> Comments, Robert Lovett, at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Washington Exploratory Talks on Security, 6 July 1948, *FRUS*, 1948, III: 150.

又便于战略与“战役防守”的要塞地区进行“集中防卫”，美国便无须担心其他地区出现“险情”；同时美国军事力量也得以在首先保证“核心利益”不受丝毫损伤的前提下，决定是否对其他受到威胁的“重要利益”或“边缘利益”地区做出反应，以及何时做何种反应。因此，凯南“堡垒防御”思想的提出，立即受到美国当时“国防建制”的主要推动者国务卿马歇尔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首肯。<sup>①</sup>应当指出的是，从目前已经解密的美国 1947—1949 年期间的安全、外交档案中，仍没有发现任何确切的证据说明，杜鲁门政府正式按照凯南的设想安排军事部署，但众多的文件表明凯南对通过“堡垒防御”以求“由战略被动转向战略主动”的要求在政策层面上得到重复体现。例如美国此时的“应变战争计划”就基本参照了凯南的思想去确定相对美国全球安全的“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与“边缘利益”。显然，西欧、地中海，以及中东成为美国“准备战争”的最为重要的地区。对于这些地区的任何一个国家受到苏联军事威胁时，美国便准备不仅投入军力加强那里的防卫，也计划在“危机”地区当“敌方首轮进攻受到控制后”便组织“军事反击[counter-offensive]”。在这样优先排序之下，世界的其他地区，尽管“受到共产主义挑战”以至部分国家倒向苏联也是值得遗憾的，但只要对美国的“核心安全利益”无大碍，美国便原则上不做战争准备，即：“以军事上不介入为基点”。从这个时期不少的解密文件看，亚洲大陆——西起阿富汗，穿越中国大陆，东抵朝鲜半岛——被认为“隶属”这样的“边缘”——最多是“重要”——利益地区。<sup>②</sup>

华盛顿对亚洲大陆的“利益定性”主要参照了三个坐标。第一，苏联与“亚洲大陆”的联系。尽管苏联在这个地区的渗透已经

① JCS 1769/1, 29 April 1947, *FRUS*, 1947, I, 738–746; JCS 1844/13.

② “Brief of Short Range Emergency war Plan (HALFMOON),” in Etzold and Gaddis, eds. *Containment*, pp. 315–323; Forrestal to Truman, 6 January 1948, *Truman Papers*, PSF Box 156 “Subject File: Cabinet; Defense, Secy. Of Report”.

有相当长的时间,然而,华盛顿判断,即便莫斯科能主导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但在短时间内完成对整个地区控制的可能性不大。第二,亚洲大陆的“军事工业制造能力”。由于中国的连年战祸以及该地区所有国家的现代工业发展水平的低下,苏联要在这个地区形成对美甚至于对日的“军事威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仅不可能,也将不可避免地对苏联自身造成沉重的压力。国务院(包括凯南本人)实际上认为,如果莫斯科有意投入资源“经营”亚洲大陆,对美国不失为相当有利的举措:苏联一旦陷入“资助”中国与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负之中,其为了在欧洲、地中海以及中东扩张而可动员的资源将受到分解,从而造成难以自拔的境地,而使得美国可以从容地配置资源、安排防御。第三,形成的威胁的要素,即能力(Capability)与“敌意[Hostility]”的有机、必然结合。就这一点,华盛顿不少的战略家接受了凯南关于界定威胁的公式:潜在对手单单拥有“军事战略能力”,尚不足以说明其具有威胁的意图,而“威胁能力”转化为“威胁企图[Aggressive Intention]”时,其中关键的因素是要通过“敌意”的产生、发酵,乃至膨胀到不得不“使用武力”的地步;依据同样的逻辑,单单具有“敌意”也无法说明“威胁企图”已经出现,因为“敌意”也同样需要在具有“能力”支撑的条件下方可使“威胁企图”增长。具体就亚洲大陆而言,“能力”与“敌意”的结合,仍需要“漫长的时间”。根据上述三个坐标,凯南与他的同僚们确信:一个毫无“现代工业”可言的中国,甚至整个“亚洲大陆”,不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可能形成对美国(包括美国作为全球“堡垒防御”的一个重点日本)产生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威胁,同时如果美国计划将该地区纳入美国“抵抗苏联扩张”的“环形防御”区内,所带给美国只有“负担”与“无效损耗”,此外,如果美国放手让莫斯科去发展在“亚洲大陆”的势力,便是将一个潜在的“战略累赘”丢给了苏联。<sup>①</sup>

<sup>①</sup>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 60.

凯南的“堡垒防御”比“环形防御”更具“理性”的第三方面，是其保证了美国在追求“全球安全”目标时应采取何种方式、使用何种“武器”的选择自由。有趣的是，凯南强调对“堡垒”或美国“核心利益”地区的防御以经济、科学技术武器为主的思想，与传统的美国现实主义一脉相传。从 20 世纪初的老罗斯福到 30 年代后期的小罗斯福，均倡导美国在确保其全球安全利益时，应以其之长克敌之短。由于美国的优越地理条件以及 19 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制造技术的飞速发展，这两个时期产生的一个共识便是美国完全可以依赖其经济实力与科技影响力——而不是它的人力——影响并制约国际冲突的解决方式与结果。这种理念显然对美国在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的政策起到了相当大的主导作用。尽管实践证明仅仅依靠经济、科技武器美国最终未能避免参加战争，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物资与人员消耗，但对美国经济、科技实力的信赖并未因此而减弱。而凯南从他的“特殊主义”出发所倡导的“以重建欧洲与日本经济”来遏制苏联“共产主义集团”的扩展，便与华盛顿的战略决策者以及美国的“舆论领导者”似乎可以一拍即合。于是，当苏联“共产主义集团”尚未完成对属于美国的战略“核心利益”地区或国家的“扩张”准备之时，美国对苏全面遏制的第一步即可将重点放在帮助这些地区与国家尽快实现经济恢复与起飞上，而不是放在构建实实在在的军事防线或军事据点方面。

对不以构建军事据点为中心的“堡垒防御”是否会减弱美国针对苏联的军事准备态势的担心，凯南以及华盛顿的战略思考者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对此，他们基于三个判断。第一，苏联目前仍未显示出立即准备对美或对美国安全的核心地区开战的战略企图。美国的军事情报部门以及 1947 年成立的中央情报局(CIA)一直对“苏联的战略企图”监测甚紧，但 1947—1949 年间大量的分析报告均确定了这个判断。同时，对外情报界还一致认为，苏联目前仍未找到对付美国核威慑的办法。尽管有证据说明苏联核武器计划

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但从其试爆原子弹成功到发展能够携带原子武器的战略轰炸机,仍需走过相当长的一段路。在无法抵消美国核威胁的情况下,苏联冒险一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此外,情报官们认为,克里姆林宫已经在东欧获得了其目前所希望得到的利益,如果斯大林为了巩固与发展在那个地区已经到手的利益而不惜与美国一战,无论如何也是“不可思议”。“只要我们的工业生产力能够超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时任国防部长的詹姆斯·福来斯特(James V. Forrestal)推测,“只要我们控制着海上主要通道,只要我们保持着从陆地对苏联实施核打击的能力,我们就完全有可能、有能力承担在上述条件不存在之下的风险。”<sup>①</sup>第二,以经济援助的方式恢复“要害”地区的均势,每一块美元所产生的效益,要比“构建军事堡垒”产生的要大得多。后者要想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均势,杜鲁门的顾问们曾计算过,就财政预算增加而言要比仅投入经济、物资援助要大四到五倍。具体地说,在欧洲、地中海、中东、日本建立军事堡垒,不仅要在这些地区与国家建立陆海空军事基地,还要在这些地区长期派驻“精锐部队”,还要训练与该地区的本地武装部队联合作战的能力。除此之外,美国必须通过全面战争动员以保证在本土拥有强大而足够的后备武装力量,随时准备投入战场,否则不足以达到有效威慑苏联“共产主义集团”对外侵略的目的。第三,在冷战初期,美国力求恢复的是均势,而不是所谓的“势力范围”,而经济武器对实现这样的目标比军事手段,对美国的盟国或“准盟国”要“容易被接受得多”。二战结束后的最初,欧洲兴起所谓“中立主义”思想,其中最主要的担心是“苏联共产主义的统治”与“美国资本主义的控制”,而欧洲倒向任何一方,都难免遭受或者是战火的洗劫,或者是政治上的压迫。鉴于欧洲的这种担心,美国的“无偿援助”能帮助欧洲工业中心“自强自立”以抵抗苏联,又能消除欧洲“同伴们”的疑惧。

① Walter Mills, ed. *The Forrestal Diaries* (New York, 1952), p. 350 – 351.

就是基于这样的“理性”判断，杜鲁门政府在加强美国自身国防力量的同时，决定选择以经济援助的方式力图恢复并加强美国“核心利益”地区的均势。大幅增加对西欧、地中海国家以及日本的经济、物资、技术的援助的主要战略目标，国防部长福来斯特在1948年12月的一份致杜鲁门的“绝密”报告中说明，完全是为了确保那些国家的“经济恢复、政治稳定与军事巩固，而这两方面的先后顺序也是我们[地缘战略]目标的先后顺序”。对这样的优先排序，福来斯特进一步解释说，“目前，我们已经将我们的军事预算保持在军事指挥官们以最现实的眼光评估能够确保我们国家安全的限度。由于我们这样的选择，而使得我们得以增加为了帮助欧洲重建所需的花费。”换言之，美国“在为一个未来能够保证我长期国家安全并最终实现世界稳定的战略要求冒适当的风险”。因此，尽管美国的军事“重建”可能会因为分割资源去实现欧洲、地中海国家以及日本的经济重建而“严重滞后”，这位国防部长坚信，此种选择仍是“利大于弊”。<sup>①</sup>杜鲁门显然对此也深信不疑。次年年初，他在国会宣称，“我们正在为了实现世界最终和平不懈努力，但是目前我们所做出的努力中最为重要的则是帮助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重建。”<sup>②</sup>

尽管杜鲁门的“话语”中不乏“宣传动员”的目的，但其内涵则是对“堡垒防御”的公开肯定。同时也应该明确指出，华盛顿实施“堡垒防御”的最初两年，目标是有限的，即旨在通过经济外交以恢复与美国安全利益至关重要地区的均势，实质并非要完全控制这些地区，而是要保证这些地区不被“敌对势力”所控制。其中，凯南的“特殊主义”逻辑与传统的“现实主义”理念占据了上风。

① Walter Mills, ed. *The Forrestal Diaries* (New York, 1952), p. 350.

② Truman state of the union statement, 7 January 1948, *Truman Public Papers: 1948*, p. 8.

### 第三节 以“楔子外交”分化苏东阵营

根据凯南遏制战略的构想，美国在恢复欧洲、地中海、中东以及以日本为中心的远东地区的均势的同时，也要致力于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朝“多极化”方向发展，以此削弱苏联的影响力，从而迫使莫斯科收敛“侵略”行径，以至最终放弃以“扩张”保证安全。值得注意的是，凯南对美国应该致力于，而且也可以做到“分化”苏联、东欧“共产主义集团”的设想，在白宫和“五角大楼”并未受到明显的支持。然而，凯南本人以及他在国务院的同僚对这样的可能极其肯定，并在具体政策制订中，不断“劝说”总统以及军方，同时也不断提出具体实施办法。

关于“共产主义集团”是否是“铁板一块”，西方对其有无“离间的可能”，杜鲁门以及他的高参们明确地对第一个问题持肯定态度，而对第二个问题给予否定的答案。对此持这样的立场，主要受当时主导美国政治文化的深层次的意识形态思维的影响。杜鲁门政府在二战后初期之所以强烈感到来自苏联的威胁与挑战，除了对“斯大林政权”的所谓“贪婪”、“霸道”与“得寸进尺”难以接受外，更主要的是对苏联共产主义信仰与体制心存疑惧。杜鲁门在宣布其所谓杜鲁门主义时，虽然并未明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可接受，但在阐述处于希腊、土耳其的危险时，却明确指出危险的根子是由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在较量。长期以来，每当论及冷战意识形态之争时，人们常常认为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经济模式与社会形态之争，往往忽略了二战结束初期美国执政者们所考虑的“独裁”与“民主”之争。实际上，那时的决策者很难完全摆脱刚刚结束的“反独裁”战争氛围。“正是由于独裁者们妄想并试图将独裁体制强加在自由的人民头上，”他们分析，“才

是造成世界性战争的最根本的原因。”据此。他们很容易便得出这样的类比：无论是希特勒还是斯大林，无论是纳粹“法西斯”还是苏联“共产主义”，其本质只有一个，即“独裁”。杜鲁门在宣布对希腊、土耳其予以“援助”的第二天私下里表示，斯大林与希特勒、墨索里尼一样，都是“百分之百的独裁者”，他们在发动侵略战争之前，总是一面不断扩张，一面“试图愚弄”美国的诸如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这样的“疯子”。<sup>①</sup>如果“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完全等同于独裁，依照杜鲁门的逻辑，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都是以实现独裁为最终目的，因此只能是“铁板一块”。

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杜鲁门主义含有通过美援构建全球“反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政治目标。根据杜鲁门自己的诠释，只要在一个国家内存在着“民主”与“独裁”的斗争——前者基于“大多数人的意愿”，后者“则是基于少数人的意愿”，美国作为“自由民主世界”的代表就必须为那儿的“民主斗士”提供政治“声援”与经济资助。尽管当时杜鲁门主义的实际政策内容只是为希腊与土耳其提供经济与军事物资援助，但其表述的内涵却十分广泛，即美国将对世界上——而不是对美国安全利益至关重要地区——任何一个——而并不一定是崇尚“民主”的——“反共产主义势力”予以援助。这一广泛的政策内涵实际上延续了传统的“普遍主义”做法，与凯南倡导的“特殊主义”思想相悖。于是在争得国会支持与批准的过程中便引起相当程度上的抵制。国会中，特别是“财政保守主义”的共和党议员，尽管对一次为希腊提供 4 亿美元的援助并未表示异议，但对这次对希援助所造成的“先例”极为担心：这次能给希腊 4 个亿，那么下次应给土耳其几个亿？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国家都在“为民主与自由而斗争”，美国是否对所有这些国家或其中的“反共产主义势力”也都要按此例“一视同仁”、“不折不扣”

<sup>①</sup> Truman to his daughter Margret Truman, 13 March 1947, in Margret Truman, *Harry S. Truman* (New York, 1973), p. 343.

予以援助?①

对杜鲁门主义的这一“普遍”的政策含义,凯南极为担忧。“杜鲁门主义”宣布后不久,刚刚担任国务院“政策计划署”主任不久的凯南便立即对英国驻美使馆做“解释”,指出:第一,“杜鲁门主义只是针对希腊与土耳其的具体政策”,不能“做宽泛的理解”;第二,如果对杜鲁门主义过分“渲染”,实际上对西方国家是“十分危险的”;第三,克里姆林宫的对外“扩张”是不会“期待其领土范围以外的共产主义政党或政权为其实现的”,因此苏联对那些地方“共产主义分子”或“极左势力”的支持,充其量旨在“造成政治不稳定”。②凯南的诠释实际上表现出他对白宫将共产主义国家看成“铁板一块”不符合美国遏制战略的基本要求。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领导的 PPS 在杜鲁门主义出台后不久,便上书杜鲁门,建议“立即部署”在全球范围内消除“杜鲁门主义是为世界反共势力颁发的一张空白支票的印象”。否则,美国将会给世界留下另一个“错觉”,即美国是在“全力以赴反共产主义”,而不仅仅是“抵抗苏联扩张”;其后果必然将所有与莫斯科有分歧或对克里姆林宫抱有疑惧的“地方共党”或“左派分子”推向苏联。③

尽管华盛顿对杜鲁门主义并未做公开更正,但在国务院内“凯南派”的运作下,杜鲁门政府逐渐从全球范围内“反共产主义”转向“反苏联主义”。华盛顿的另一名苏联专家波伦认为这种转变“势在必行”。美国“扛起反共产主义大旗”,不仅将“地方共产主义势力”必然地变成美国的“夙敌”,也会失去特别是欧洲国家内“非共产主义”的“左派”支持。“如果我们为所有使用马克思、列宁语言的人都贴上共产主义分子的标签”,波伦在 1947 年 5 月 29 日的一

① Gaddis, *The Long Peace*, p. 153.

② John Balfour to Ernest Bevin, 14 May 1947, Foreign Office Records, FO 371/61047/AN1795, Public Records Office, London, UK.

③ Kennan to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Dean Acheson, 23 May 1947, *FRUS*, 1947, III: 229.

份报告中提出,那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众多思想或学说对[不同的政客]有不同的利用价值,……因此,那些善用[马列语言]的人并非是马列主义的忠实信仰者,或已经介入了现代共产主义的组织了”。<sup>①</sup>几个月后,当阿根廷政府向华盛顿提议“在西半球[北美与拉美国家]成立反共产主义同盟组织”时,波伦则明确表示反对,并建议杜鲁门“不予采纳”。“尽管我们完全清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造成的问题,”在他看来,“与其他政府签订任何形式的反共产主义条约,无论如何都具有强烈的法西斯分子[所惯用手法]的味道。”<sup>②</sup>其结果必然是将美国“反共产主义”全球性活动沦为法西斯的国际化“运动”。

避免强化美国“反共产主义”态度的一个主要目的,“凯南派”们策划,是为了有效地分化苏联所控制的“共产主义集团”,从而使苏联对外“扩张”失去“内应”与“地方依托”。然而,仅仅避免大肆渲染美国全球性的“反共产主义”态势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美国要“运作政治”与外交在“貌似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阵营”内打入离间的“楔子”。对于“从何处打开切入口”、“以何种方式才能打入楔子”以及“抓住何种机会造成离间”等具体操作问题,似乎众说纷纭,在相当长时间内并未达成共识。

凯南对楔子战略的第一次尝试,是期望利用马歇尔计划的推出与实施。当该计划在国务院内酝酿时,凯南坚持美国对欧洲的援助应该明确表明:东欧国家,甚至苏联都是可以接受“援助”的对象。这样做,他分析,至少可以达到两个目的。首先,如果苏联与东欧国家拒绝接受美援——实际上几乎国务院的所有高级官员

---

① Bohlen to Marshall S. Carter, 29 May 1947, Bohlen Papers, Box 4, “Memos 1947,” Modern Diplomatic Branch,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 C.

② J. C. Drier memorandum, 11 August 1947, Bohlen Papers, Box 4, “Memos (CEB) 1947,” Modern Diplomatic Branch,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 C.

都认为莫斯科肯定会由于“计划”中所附加的“政治条件”而拒绝接受,同时也会压所有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不接受美援,那么由此而造成的“欧洲分裂”责任将“毫无疑问地”完全由苏联人承担。同时,苏联所承受的对其东欧“卫星国家”的经济援助压力将随之加大,一旦出现东欧国家对苏援助不满或所提出的要求没有满足,这些国家的人民必将对他们的“共产党政权”产生怨言,久而久之,相对莫斯科的“离心力”也将增长。即便这些国家通过“高压手段”能短暂地控制局势,但其对克里姆林宫的“指挥棒”也将会显出一定的排斥。其次,即便苏联不接受马歇尔计划但部分东欧国家接受或“有限地”接受,美国便能取得利用“援助”影响这些国家——起码是经济政策——的“可乘之机”。特别是“项目”与“技术”援助,更能迫使这些东欧国家的经济组合形态与操作方式,“改变目前的完全按照苏联经济模式运行的状态”。<sup>①</sup>

凯南尤其强调了为实现第二种可能的政治运作。就他而言,这种可能隐含了他的遏制战略中“以援助一些共产党国家达到遏制另外一些共产党国家的目的”设想。有趣的是,杜鲁门与马歇尔接受了凯南的建议,但有充分证据表明,总统与国务卿实际上并不相信凯南所描述的第二种可能的存在。尽管如此,在马歇尔计划实施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华盛顿内部认为,无论俄国人对美援做何反应,东欧国家对莫斯科的“离心倾向”都已经成为马歇尔计划的一个效果。英国的外相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对马歇尔计划的离间效果大加赞赏。自认有多年与欧洲共产党打交道的经验,贝文在1947年6月下旬对美国国务院官员解释说,“我认为这是能够击垮铁幕最为快捷的办法。”无论俄国人如何“努力”,他分析,苏联都“无法紧紧控制住它的卫星国不受欧洲经济复兴的诱惑”。<sup>②</sup>当确

<sup>①</sup> Kennan, *Memoirs: 1925 – 1950*, pp. 341 – 342.

<sup>②</sup> Maurice Peterson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Bevin and William Clayton, 24 June 1947, FRUS, 1947, III, 268.

认苏联正式拒绝接受同时也迫使所有的东欧卫星国拒绝接受美援时，凯南不仅没有感到“沮丧”，反而“异常兴奋”。他为参加国务院对苏联反应做判断的会议做准备时“匆匆”写下笔记，在此笔记中，凯南断定，“[美国]通过为欧洲经济复兴所制订的计划已经造成了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紧张：西欧的共产党不得不完全现形；俄国人也在其与卫星国的关系上被浓烟熏出。”对此，凯南备受鼓舞，因为“自战争结束后对欧洲共产主义势力打击最大的，不过是过去几个星期内发生的事”。<sup>①</sup>

当南斯拉夫的铁托政府在 1948 年春公开表示与苏联“分裂”之时，华盛顿的“凯南派”们更加坚信，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的“楔子战略”在进一步“发酵”。在此之前，美国以及西欧国家的情报分析一致认为贝尔格莱德是苏联在东欧最紧密的卫星国之一。<sup>②</sup> 1948 年 6 月 18 日，美国驻南使馆首次报告，由于在关于多瑙河开发问题上的分歧，苏南关系发生“裂变”。报告同时判断，铁托与斯大林的“反目”，是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卫星国“对克里姆林宫的太上皇们至高无上权威的第一例直接而不可挽回的挑战”。<sup>③</sup> 凯南对此深信不疑，在 PPS 6 月底主要由他撰写的关于苏南“分裂”意义的报告中，他指出：“我们现在面对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第一个独立于莫斯科的共产党国家。”正是由于苏南的“背道而驰”，凯南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重要因素：克里姆林宫的一个附庸却能够成功地反叛于它。”其“战略意义”十分“深远”。正是“由于[铁托的]行动，使得长期环绕在克里姆林宫权威上的所有关于它的神力无比、不可战胜的一切神话不攻自破。”尽管公开反叛莫斯科对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至今仍是不可思议，

---

① Kennan notes for conversation with Marshall, 21 July 1947, *FRUS*, 1947, III: 335.

② Charles Peak to Foreign Office, 18 June 1948, FO 371/72630/R7301, 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

③ Robert R. Reams to Marshall, 18 June 1948, *FRUS*, 1948, IV: 1073.

但是，“这将从现在起成为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萦绕在这些国家领导人心中的一个可能。”据此，他建议杜鲁门政府立即考虑如何使这一矛盾不断扩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计划采取那些步骤使得苏东“阵营”的裂变产生“链状效应”——使链子的一环断裂而导致其他各环的相继断裂。<sup>①</sup>

至于美国到底应该如何做，才能扩大苏南裂变的“链状效应”，凯南以及他领导 PPS 似乎也没有“锦囊妙计”。在 PPS 6 月的报告中，凯南列举了两种美国应该“不为”的方法。首先，他明确反对华盛顿即刻对贝尔格莱德“挥舞橄榄枝”。过于着急地“拥抱铁托”，他分析，将会出现反作用：铁托的追随者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都有可能对美国产生“反感”甚至“厌恶”，进而有可能迫使铁托“改变立场”甚至“重新回到原位”。其次，华盛顿如果对铁托“过于冷淡”甚至“予以讽刺”，那将会成为克里姆林宫向南斯拉夫人民以及其他卫星国做宣传的“一个借口”：“这些国家的唯一出路只能是追随莫斯科，而反叛莫斯科只会使他们自己陷入祈求资本主义豺狼怜悯、施舍的境地。”<sup>②</sup>

在左右为难之中，华盛顿最终采纳一种折中的办法：在公开场合内，美国对南斯拉夫“反叛苏联”行动表示“沉默”。按此原则，美国官员既不对铁托表示“赞赏”，也不表示“讥讽”。这样做可以一箭多雕：不仅可以避免在铁托“主动”向美国靠拢时出现国内外“舆论”上的被动，也能减少“激怒”铁托的可能。此外，这样的选择还有一个国内政治考虑：对南斯拉夫“不冷不热”，也可以避免为国会内的共和党人提供批评民主党政府“对独裁政权过于仁慈”的“藉口”。同时，刚刚接任马歇尔担任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仍然希望对铁托继续观察，测试他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

<sup>①</sup> PPS/35, "The Attitude of This Government Toward Events in Yugoslavia," 30 June 1948, FRUS, 1948, IV: 1079.

<sup>②</sup> 同上，第 1080 页。

离开莫斯科的控制。南斯拉夫的“独裁者”非常可能只“是个狗娘养的”，艾奇逊在 1949 年 9 月对一批急于去南斯拉夫“开拓市场”的大公司总裁们说，“所有我们想看到的，无疑是将这个狗娘养的变成我们的狗娘养的。”<sup>①</sup>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华盛顿对苏南分裂很少公开地进行评论。然而暗地里，杜鲁门政府在通过“私人渠道”为铁托提供包括经济、物资甚至军事上的援助。

与此同时，华盛顿的“凯南派”们在东欧发生“共产主义阵营裂变”的鼓舞下，开始考虑这个裂变效应能否蔓延到亚洲，特别是中国。自“马歇尔使华”“调解”国共冲突失败后，中国全面爆发内战。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节节败退”，杜鲁门政府开始考虑是否有必要“从全面援助蒋介石”转向“初步脱离蒋介石”。当然对美国而言，即便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但如果这个“红色中国”能够独立于莫斯科，也不失为一种对美国遏制战略的有利结果。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有无可能成为“亚洲的南斯拉夫”，毛泽东能否成为“东方的铁托”，凯南自觉“可能性极大”。在他 1948 年 10 月对国家战争学院学员的一次讲话中，他指出：“我对铁托主义是否会必然在欧洲蔓延并无十分的把握，但是，我几乎能够肯定地说，铁托主义将会在亚洲传播开来。”<sup>②</sup> 凯南以及同意他观点的国务院同僚们能持如此“肯定的判断”，是基于几个“假设”。第一，他们认为，不管内战后的中国采取何种对外政策，但有一点十分清楚，即世界上没有一个“强权”可以完全控制中国。尽管中国目前仍处于“落后的农业国家”阶段，其众多的人口、广阔的疆土、深远的传统文化，足以令任何对其“想入非非”的人与民族“怯而止步”。由于美国与苏联均无将中国完全纳入自己“势力范围”之中的可能，最符合美国安全利益的则是促使中国独立于苏联。第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土生土长的”，并非像东欧绝大多数“社会主义

① Gaddis, *The Long Peace*, pp. 158 – 159.

② 同上，第 161 页。

国家”那样是“外部强加的”。众多对中共有所研究或有所接触的美国官员们——特别是国务院内的“中国通”们——坚持，毛的“民族解放运动”，从一开始便在“基本独立于莫斯科”甚至“独立于共产国际”的情况下进行的。尽管“中共”不可能必然成为美国的“朋友”，但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或理由断定其一定会成为苏联的“盟国”。第三，即便共产党人能够很快夺取政权，但由于他们的“执政经验有限”，中国的战争创伤严重，莫斯科全面援助中国的可能性极小，毛的政权必将在对外政策上“小心谨慎”，难以“死心塌地”地“倒向”苏联。正是在对中国施予“经济、技术援助”上，美国有机会“运作”中国的对外行为朝“不损害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据此，凯南 1947 年 11 月向马歇尔保证，“尽管国民政府近期内会垮台，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共产党人可以在短期内完全巩固在中国大陆的政权，同时又对苏联对其内政的控制行径忍气吞声。”<sup>①</sup>

一方面可能出于美国对中国内政前途感到“无能为力”的考虑，另一方面大概受到苏南“分裂”的鼓舞，杜鲁门以及他的新任国务卿艾奇逊对“凯南派”提出的关于“中国可能出现铁托”的判断显出较大兴趣。1949 年 3 月初，总统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美国对华政策”的 NSC 32/4 号文件，特别准许国务院协调各部采取针对“中共”的“楔子”政策。“在保证不留下任何公开干涉[中国内政]的印象的前提下，”杜鲁门指示，“[美国政府]可以利用政治的、经济的办法去挑拨并扩大中共党人与苏联、中共政权内外的其他势力与中共内部的斯大林派分子之间存在的矛盾与分歧。”<sup>②</sup>

值得注意的是，杜鲁门政府在对华实施“楔子”战略的过程中，强调了“经济的方法”，而对所谓“政治运作”显得不十分积极。国

<sup>①</sup> Kenna to Marshall, “The Situation in China and U. S. Policy,” 3 November 1947, 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 Box 13 “China 1947 - 1948,” Diplomatic Branch, National Archives.

<sup>②</sup> NSC 34/2, “U. S. Policy Toward China,” 28 February 1949, FRUS, 1949, IX : 494 - 495.

安会 1949 年 2 月 28 日完成的题为“美国关于对华贸易政策”的 NSC 41 号文件，就对如何利用“中共”在取得政权后急于取得外来经济援助并扩大对外贸易以尽快巩固政权的“迫切心理”，运用美国的经济武器，设法形成能够制约或“调控”“中共”政权对外行为的所谓“经济杠杆[Economic leverage]”。具体的做法包括：准许美国长期经营对华贸易的商家“接触”新政权并试探继续与拓展贸易的可能；默许日本甚至西欧已经与“中共”有贸易关系的公司继续经营并“适当”增加；通过“地下管道”透露华盛顿“有可能”——仅仅是“有可能”——考虑为“新政权”提供其急需的经济援助。<sup>①</sup>华盛顿这样做，尽管有其需要满足国内企业界以及日本发展对华——即便是“共产党政权”——贸易的要求，但主要的考虑则是“促动”新政权对苏保持“独立”。如果“中共”按美国的“希望”做了，美援以及与西方的贸易机会都会增加；反之，美国则会将所有这些“经济利益机会”取消或阻断。这就是所谓“经济杠杆”的逻辑。

诚然，美国对华的“经济上诱惑”与其“政治上冷淡”互相矛盾。尽管能够按凯南所要求的运用“经济杠杆”，但在政治层面却背上“沉重的包袱”。其中包括：华盛顿继续保持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外交关系；拒绝在“情势尚未明朗前”予“中共政权”以外交承认；杜鲁门政府仍“承诺”当中国大量的“反共产主义势力”强大到“能够推翻共产政权”并需要美国“援助”时，为其提供“军事与政治”的支持；与此同时，美国也在“秘密策划”取得对中国台湾的完全控制权——既不让“中共”占领，也不让“蒋军”盘踞。<sup>②</sup>

① NSC 41, “United States Policy Regarding Trade with China,” 28 February 1949, *FRUS, 1949*, IX: 826 – 834. Shu 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apter 2.

② Shu Guang Zhang,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 1949 – 1958*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chapter 2.

## 小 结

凯南提出的遏制战略思想，在杜鲁门时期的 1947—1949 年间，受到了决策高层的认可，同时在国防政策、外交运作与经济武器的使用等政策层面上得到了具体贯彻。凯南自己在退役多年后，仍津津乐道地声称，这个时期是他对华盛顿战略与外交政策影响最大的时期。应该说，除了“凯南战略思想”有其极大吸引力的一面，美国此时的政治与战略文化也是该思想得到政策支撑的另一重要因素。

首先，此时主导杜鲁门政府冷战政策决策的重要人物为时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将军。由于他长期的军旅生涯，特别是他经历了美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的高层指挥，使得马歇尔对美国的“全球安全利益”十分关切，同时他对美国应付“重大外在威胁”的战略资源“有限性”也十分明了。因此，马歇尔对凯南基于“特殊主义”的战略考虑可谓“情投意合”。马歇尔的“全球观”以及他的“美国民族英雄”身份，都要比他的前任波恩司在影响高层对外与国防决策和动员国内舆论与各种政治力量的支持方面要有效得多。符合于凯南“特殊主义”的遏制大战略要求的马歇尔计划，铭刻了他个人的“记号”便显得顺理成章了。

其次，由于凯南的显赫地位，美国国务院内形成所谓“凯南派”，对这个时期华盛顿战略考虑与决策起到直接的影响。由凯南直接领导的政策计划署，实际上变成他推行遏制战略的操作平台。从目前已解密的 PPS 档案看，凯南担任主任期间的数十份政策建议报告几乎无一不体现了他的思想（实际上大多数文件均由凯南自己起草）。特别是 1947 年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最初几年中，NSC 本身并未设立专门的战略和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其所依赖的只能是国务院的政策计划署。正是由于其特殊的作用，

PPS一度成为杜鲁门政府的“小国安会”。

再次,美国国会中的保守派当道,也为“现实主义”的对外战略思想转换成具体政策起到了推动作用。应该说,战后初期的美国国会对华盛顿对外政策的制定,尚未担当起一个重要的参与决策角色。<sup>①</sup>然而由于国会对联邦预算的审核批准权力,使得其就应对什么样的对外行为予以何种财政支持、多大支持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凯南在杜鲁门政府中推销他的“特殊主义”战略思想时,正逢共和党控制国会。基于其传统的“财政保守主义”价值取向,共和党人的国会则对凯南“对外政策必须符合资源有限性”的要求表示赞赏。在“花大钱”重整美国军事力量以全面对抗苏联与“花小钱”资助“核心地区”的经济重建以扶持当地的“反共产主义”的“自然抵抗势力”之间,国会自然会选择后者。

尽管这个时期的杜鲁门政府对凯南的战略哲学产生了共识,但所有体现凯南遏制思想的政策都基于一个主要判断,即苏联仍未准备好通过“军事手段”推行“对外扩张”。此外,实际上实施的政策仍难免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与“普遍主义”的色彩。因此,一旦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一旦对莫斯科的“对外扩张”的能力、“敌意”以及“企图”的认知发生变化,只是被暂时压抑的“普遍主义”影响便会迅速复苏,从而使凯南的遏制战略变味,乃至变质。

<sup>①</sup> 关于对美国国会的研究,参考孙哲,《左右未来:美国国会的制度创新与决策行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James T. Patterson, *Mr. Republican: A Biography of Robert A. Taft* (Boston, 1972); Thomas M. Franck, and Edward Weisband, *Foreign Policy by Cong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遏制战略的转折

由凯南设计的美国冷战时期遏制战略在 1949 年出现重大转折。这不仅体现在遏制所基于的哲学逻辑、战略思考发生变化，更重要的反映在国防政策、军事组织、外交运作等操作战略层面上。对于这一转变，冷战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通常只是注重所谓政策转折的“界标”，如某个政策文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 1949 年这个时间坐标，即此时间相度内发生的事件。<sup>①</sup>正是由于这个时期的美苏对抗的态势，引发华盛顿的一系列战略调整，而杜鲁门政府战略调整的急促步伐，又推动遏制朝全面化方向发展。

### 第一节 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欧洲无疑是美国所谓“全球战略利益”的核心地区。若按“凯南派”的设计，华盛顿只要通过对西欧主要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便可扶持那里对苏、对“共产主义势力”的“自然抵抗力量”，同时也能够遏止欧洲“民主国家”走“第三条道路”的势头，以保证欧洲这一“军

<sup>①</sup> Ernest R. May, ed., *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 Interpreting NSC 68* (Boston: Bedford Books, 1993), pp. 14–17.

事工业中心”不至于落入苏联的控制之下。马歇尔计划实际上已在为此目标运作之中。然而，1949年4月宣布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简称 NATO]”，实质是由美国领头并承担主要“防御责任”的欧洲军事同盟。NATO 的建立不仅是美国有史以来首次在“和平”时期参与国际军事同盟，也标志着杜鲁门政府在军事战略取向上偏离了凯南提倡的遏制战略方向。

西方关于 NATO 的研究在解释其渊源时，“传统学派[traditionalists]”与“修正学派[revisionists]”意见相左。持“传统态度”的学者基于其“苏联对外扩张是冷战的主要根源”的基本观认为，NATO 是美国以及西欧国家对斯大林制造的所谓“捷克政变[Czech coup d'etat]”(1948年2月)与“柏林封锁[Berlin blockade]”(1948年6月)的“不得已”回应。如果由苏联“操纵”的布拉格政变是莫斯科“以政治渗透”方式在东欧的“公然扩张”行为，苏军宣布对柏林城的封锁以逼迫美英法“联合占领军”撤出东柏林则是克里姆林宫对西方的一次“公开的军事挑衅”行为。因此，“西欧国家对这些表明苏联敌意与侵略意图的迹象表示担心是不奇怪的。于是[美国]忽然间清醒地认识到：欧洲经济复苏的前提是军事安全，”而只有建立“区域军事同盟”尚可“保全欧洲不受侵略”。<sup>①</sup>

与此观点相反的“修正主义”学者则坚持，苏联对捷克加强控制以及“逼迫”西方大国撤出西柏林完全出于“自身防御”，是对咄咄逼人的杜鲁门主义以及马歇尔计划的“正当反应”。然而杜鲁门政府内的“冷战斗士[cold warriors]”们，为了追求美国的“经济扩张”，实际运作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从而将美国对欧洲

---

<sup>①</sup> Spanier and Hook,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pp. 62–63. Lawrence Kapl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NATO: The Formative Years*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84).

的经济援助体系“军事化”和“政治化”。这些学者认为，虽然凯南的“特殊主义”原则在一定的时间内“压抑”了“冷战斗士”们对美国在欧洲“军事扩张”的热情，但一旦所谓“由莫斯科挑起的国际危机”爆发，这些人便乘机而动，“迫不及待”地将美国对欧洲的“政治、经济支持”转变为“军事与安全承诺[military and security commitment]”。同时为了阻止这种“转变”半途而废，他们力图以NATO的形式将美国与欧洲的“防卫联系”制度化。究其深层原因，“修正”学派分析，主要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祟与“美国国防工业利益”的“暗中推动”。因此，“理性”的外交便成了这些“非理性”因素的“牺牲品”。<sup>①</sup>

实际上，上述两种解释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由于受到其“主观意识先行”的约束，故带有明显的偏见。这些学者均或多或少忽略了其他一些重要“动力”因素，而且很少将NATO的出现放在杜鲁门政府大战略考虑的背景下进行分析。

NATO的产生，与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领导人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与“安全考虑”而“运作美国”密切相关。战后的欧洲大国急于政治经济重建，但同时又不甘心对美苏“超级大国”俯首称臣。特别是英国，面临着一个维持其全球利益的战略难题：一方面在世界众多地区——特别是传统的伦敦“势力范围”——与美国存在着政治、经济影响力的竞争关系，另一方面由于自身实力的大减弱又不得不借助甚至依靠美国以恢复经济，维持安全，保证其大国的国际影响地位。如何在这两者间寻求平衡一直是二战结束后英国“保守”与“工党”政府对外政策的核心。因此在最初时期，伦敦一面积极参与对德占领，一面加强对地中海、中近东地区的“独家经营”，然而，很快发现其所面临的经济、政治问题远远超出

<sup>①</sup> Thomas G. Paterson, *On Every Fro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2), pp. 83–87.

其能力所及,而不得不在对外政策上紧急收缩。主动要求华盛顿主导“解决”希腊、土耳其危机便是例证。在获得马歇尔计划下的大量美援时,英国领导人不久后便得出结论:即便在经济上完全依靠美国,仍无法保证欧洲“自由国家”的政治稳定以及保障欧洲地区的安全。特别是对后一点,英国与法国不仅担心苏联在取得对东欧控制后的进一步“西进”,同时也担心德国再次“崛起”以填补由于“纳粹德国”战败所遗留的所谓均势空白。据此,设法将美国长期纳入欧洲政治、经济、防卫体系便凸显为解决这些“难题”的最佳选择。

马歇尔计划实施后的半年间,英国政府判断华盛顿已经在为了实现“欧洲政治、战略一体化”迈出了第一步。然而到了1948年初,杜鲁门政府并未对西欧的防卫作出任何军事上的“承诺”,这令伦敦感到意外并失望。“令人不解的是,”英国外交部高级官员兰得尔(F. B. A. Rundall)2月指出,“[华盛顿]几乎没有对欧洲融合的战略意义做过任何探讨。”自马歇尔计划之后,兰得尔分析,美国“关心欧洲防务的人起码会对由于经济融合而必然导致战略考虑与共同防务方面的融合……对此美国实际上也并未比经济方面的参与要少——提出意见”,但时至今日,不仅美国官员对此“缄口不言”,公开的评论也寥寥无几。据此,他认为英国必须主动做“工作”,而最佳时机则是等1948年的总统大选尘埃落定之后。<sup>①</sup>英国外交部肯定了兰得尔的推测。在其1948年6月26日的一份关于美国对西欧军事援助的“绝密”政策报告中,外交部要求将“促动美国尽快加入一个欧洲军事同盟”列为1949年对美“外交工作”的重点。如果不“努力”实现这一目标,报告指出,英国以后的“区域”乃至全球战略态势将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美国人目前“一味只是将其拥有的枪炮塞入任何一个与苏联自然为敌的人的手中”,这便是马歇尔计划的用意之一。作为“只占世界人口7%、却拥有着占

<sup>①</sup> Minutes of conversation, Rundall, 23 February, 1948, Public Record Office, Foreign Office Records, FO 371/68018/AN1702, London, UK.

世界工业能力 50% 的美国人这样做,任何一个玩世不恭的人都会将这样的行径比作[美国人]是在培养雇佣军”。因而,报告判断,美国人在给予英国“援助”的同时,寄希望于英国士兵去为美国与苏联人打仗。如果英国不立即试图改变这样的态势,一旦苏美间发生军事冲突,英国必将“首当其冲”以致最终代美国人受过。<sup>①</sup>有趣的是,传统的英国对美政策一向是试图让美国人“代其受过”,而伦敦此时却明显地在担心华盛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如何摆布华盛顿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是伦敦的惯用伎俩。有研究表明,英国抓住苏军宣布对柏林实施“军事封锁”的时机,为改变美国政府内外对“苏联对西方的威胁只是政治的、而不是军事的”的认知开展了隐秘的“政治攻势”。于是,在英国人的运作下,美国的舆论界突然间大谈苏联在欧洲“军事侵略”的紧迫性,华盛顿“圈内”关于斯大林要用武力“赶走”驻西柏林美国军队的谣言四起,似乎美国已经“面临着英国、法国在 1938—1939 年间面对希特勒时一模一样的情形”。与此同时,美国驻西德军事最高长官鲁西斯·克雷(Lucius Clay)的关于苏联“红军极有可能与盟军一战”的判断报告也“不慎泄露”,经过新闻媒体的渲染,更使“人心惶惶”。<sup>②</sup>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美对苏情报机构的分析,同样表明了欧洲“武装冲突”近在咫尺的结论。其中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欧洲前沿严重的“军事不平衡”:苏联已经在东欧、中欧部署了 30 个正规步兵师,而美、英、法在西欧兵力总数则不满 10 个陆战师。情报部门对“军事力量不平衡”的强调,隐含着“克里姆林宫会利用兵力数量上的压倒多数发起攻击”。美国“联合情报委员会”4 月初的一份分析报告甚至直接引用伦敦军情通报,指出“一旦战争爆发,苏军在几周之内便有可能突破比利牛斯山脉[The Pyrenees]甚至英吉利海峡”。

<sup>①</sup> Confidential Political Report, No. 8, “Military Aid for Western Europe,” 26 June 1948, Public Record Office, Foreign Office Records, FO 371/68019, London, UK.

<sup>②</sup> Paterson, *On Every Front*, pp. 83–84.

利海峡[English Channel]。”<sup>①</sup>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的欧洲驻军与对苏情报的判断具有较显著的英国人“影响”的痕迹。更为重要的是，伦敦为了造成西欧军事同盟的“既成事实”，在未经与华盛顿仔细磋商的情况下，与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于1948年3月宣布成立区域“军事同盟”——“西方联盟”，同时公开“邀请”美国参与并“督促”杜鲁门政府尽快就“参盟”事宜开始谈判。

“西方联盟”产生的政治时机对取得美国的支持十分有利。一方面美国公众舆论对“苏联威胁”从“政治”转向“军事”的认知有明显的认同，另一方面华盛顿内部对美国加入“西方同盟”最有可能持反对意见的凯南此时恰巧“受命”考察远东时局以及美国的“亚太地区防务”。因此，国务院对伦敦要求的“第一时间反应”，起码是“极为同情的”。即便是“凯南派”们也认为英、法、比、荷、卢的军事同盟反映了西欧国家“自强自立”的信心在增强，一个对抗苏联的“自然抵抗力量”——凯南后来称作为“第三种力量”——正在形成。美国对此应该持“欢迎”态度。<sup>②</sup>

然而就美国是否也应参与这一军事同盟，华盛顿内部意见并非一致。犹豫者们主要担心的问题包括：美国是否能够主导“同盟”，是否需要在欧洲增加驻军，是否意味着要加大对西欧的军事援助，国会是否会反对由于对外军援的增加而无限追加国防预算，西欧是否会由于构建军事同盟而延缓经济重建，此外，如果“同盟”扩大，哪些国家应予接纳，其中是否也应包含联邦德国。

凯南从亚洲回到华盛顿后，立即对美国是否应该加入西方联盟做出强烈反应。1948年4月到11月间，他通过“专项报告”、约谈以及公开讲演的形式，列举了三个反对的理由。首先，西欧国家

---

① Joint Intelligence Committee report, 1 April 1948, *FRUS*, 1948, I : 552. Thomas W. Wolfe, *Soviet Power and Europe, 1945 - 1970*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11.

② “Washington Explanatory Conversations on Security,” 9 September 1948, *FRUS*, 1948, III : 237 - 248.

对苏联威胁的认知出现严重偏差。尽管斯大林在柏林制造“紧张气氛”，凯南判断，苏联只是在对美、英、法三国将对联邦德国的占领区融为一体表示“抗议”，充其量也不过在试探美国对欧洲防务“承诺”的真实性。因此，“苏联威胁”仍是“政治的”，并非“军事的”。如果西欧国家基于错误的判断而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军事构建，必将对它们目前最重要的经济恢复造成“不可挽回的危害”。其次，美国介入北大西洋的“单一区域军事同盟”必将削弱其他地区的防务。诚然，凯南指出，北大西洋由于其“地理位置以及[与美国的]传统联系”的确是美国全球安全利益的重中之重，倘若华盛顿仅重视这样一个局部“军事同盟”，其他地区——如远东、地中海、中近东等地区——的“自由国家”便会产生“被美国遗弃或出卖”的疑惧，进而它们将重新考虑在美苏两大“政治板块”间做选择；如果美国构建一个包括了所有这些国家的“国际同盟”，不仅不“现实”，同时也会因为“盟国过多”而使“同盟”机制变成一个带有“普遍主义”色彩因此名存实亡的国际组织。这两种结果均对美国的利益无益。再次，美国对欧洲实施长期影响力的“载体”是经济援助，而不是——也不应是——军事援助。如果这些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的欧洲国家组织一个有美国参加的军事同盟，凯南分析，那将意味着马歇尔计划被“军事化”。他特别指出，尽管欧洲完全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重整军备”，但若从美国的长远利益出发，欧洲任何形式的“重新武装”都应以“美国与苏联均从欧洲的核心地区完全撤军”为条件，从而形成欧洲的“第三支力量”以填补苏美之间的“空挡”。<sup>①</sup>

① Kennan to Walter Lippman, 6 April 1948, Kannan Papers, Box 17, Mudd Library, Princeton University; Kennan to Robert Lovett, 29 April 1948, FRUS, 1948, III: 108 – 109; Kennan's comments at the fifth meeting of the Washington Explanatory Talks on security, 9 July 1948, FRUS, 1948, III: 177; PPS 43, "Considerations Affecting the Conclusion of a North Atlantic Security Pact," 23 November 1948, FRUS, 1948, III: 285 – 287.

凯南的理由有其现实主义的“理性”，但此时的华盛顿似乎已沉浸在对苏联“军事遏制”跃跃欲试的氛围中。甚至部分“凯南派”也对凯南反对美国加入西欧军事同盟的立场不以为然，其中最为积极者是凯南的“老朋友”、国务院的另一苏俄专家波伦。“他[凯南]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条约所提出的疑问与批评，”波伦 1949 年 2 月具函给刚刚从副国务卿升任国务卿的艾奇逊，“有其一定的理由。但是，他的大部分观点则显得十分陈旧了；此外，他仍像以前一样，对任何一个动议只是批评，从不提出其他切实可行的办法。”对凯南关于“苏联威胁”性质的问题，波伦承认莫斯科的对外“扩张”仍是以“政治”为主，然而他对艾奇逊抱怨：“我不认为他[凯南]对经济恢复与政治稳定以及对外来威胁的安全感之间的紧密关系是那么完全且深刻地理解。”据此，波伦坚持美国应该“全力”支持西欧的军事联盟，至少可以提高英、法以及西欧其他国家“抗拒共产主义势力”的信心。<sup>①</sup> 波伦的观点深得艾奇逊的首肯。

新任国务卿艾奇逊与凯南的战略观存在重大分歧。首先，他认为欧洲对美国重于一切，因此美国对外的“有限资源”应该按“欧洲第一”的原则进行配置。其次，由于曾代表美国参加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他坚信通过“国际建制”保障经济恢复与政治稳定的“合理性”，而英法倡议的“西方联盟”与他的一贯思想不谋而合。再次，他对马歇尔计划只是通过对欧经济援助而培植“地方自然抵抗力量”的要求不甚满意，按他的设想，对欧经济援助在帮助欧洲重建的过程中也要为美国拓展欧洲资本与工业制造品市场起到推进作用，而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欧“政治一体化”，便具备这样的功用了。因此，就艾奇逊而言，通过控制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华盛顿便可 在欧洲形成“让苏联人出

---

<sup>①</sup> Bohlen to Acheson, 8 February 1949, cited in Gaddis, *The Long Peace*, p. 64.

去、让美国人进来、使德国人被压住[the Soviets out, the Americans in, and the Germans down]”的态势。<sup>①</sup>

对艾奇逊的这些思想，在国务院内除了波伦外，哈里门、约翰·希克森(John Hickerson)、沃尔特·比得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等“重量级”人物也予“坚定”的支持。特别是史密斯，如果他在“西方联盟”成立初期对其存有担心，但到了 1949 年夏天则对美国应该加入 NATO 已毫无保留了。倘若西欧“抵抗”苏联的重要环节是“自信”，而这种“自信”只有在美国的“军事承诺”的条件下尚可得以保证。史密斯在国务院的一次“政策计划”会上指出，“我完全理解军事同盟并非有何实质的意义，然而[欧洲的]那些人却对这样一纸承诺如此看重，”那么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了那份“并无实质意义”的条约了。<sup>②</sup>毋庸置疑，尽管其主导思想仍未被完全否定，凯南到了 1949 年便显得势单力薄了。

在国务院内“抵制”凯南的同时，艾奇逊等也在力争政府内其他机构对建立一个“北大西洋”军事同盟的支持。令艾奇逊感到欣慰的是，以新任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Louis Johnson)为代表的“军事国防社会[Defense Community]”对美国参与欧洲的军事条约组织相当积极。尽管部分军方首领对美国陷入欧洲防务而会耽搁本土国防重整的可能表示担忧，约翰逊却认为美国参与 NATO 反倒使美国减少国防投入成为可能。军方最终取得“共识”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与国务院达成的妥协：美国即便成为 NATO 的成员，也只是为其提供以武器装备、军需物资为主的军援，并非增加在欧洲的驻军人数。<sup>③</sup>

军政的“一致”使得余下的工作便是如何说服国会内的“财政保守派”了。按美国的法律，行政部门签订的任何对外条约均需国

<sup>①</sup> Paterson, *On Every Front*, pp. 86–87.

<sup>②</sup> Minutes, Policy Planning Staff, 14 June 1949, Box 32, PPS Records, Diplomatic Branch, National Archives.

<sup>③</sup> Gaddis, *The Long Peace*, p. 65.

会的听政与批准。此外,根据艾奇逊的设想,美国参加 NATO 是虚,而为 NATO 成员国提供军事援助是实,因此也需要国会批准一个新的《对外军事援助法》。为了说服国会,艾奇逊与国防部长约翰逊亲自出席了国会“专门委员会”的听证会。“除非欧洲人增强安全感,”艾氏 1949 年 7 月 8 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解释,美国所有为了欧洲经济复苏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华盛顿只有加入 NATO 以此提升西欧国家的“自信心”,才能保证那儿的经济尽快恢复进而使美国所承担的援助负担减轻。<sup>①</sup>约翰逊的“劝说”则集中在美国加入 NATO 是否使联邦军费增加。他向参院“对外关系委员会[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的议员们保证,美国成为 NATO 的一员,不仅不会增加军费,也有可能减少军费。有美国主导的“欧洲军事同盟的建立”,他解释,将构建出一个对苏“明白无误的威慑”系统。在这样“明确”的“战略划线”面前,莫斯科必将有所顾忌而不敢妄动;如果欧洲能够“稳定”,美国则无须为提升国防而增加军费。<sup>②</sup>对艾奇逊、约翰逊的解释,参议员们似乎感到满意。“这样的[北]大西洋条约,”康乃利参议员(Senator Thomas Connally)评论,“只能是门罗主义原则最具有逻辑性的延伸。”<sup>③</sup>

由于国会的支持,杜鲁门政府对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最后障碍得以清除。1949 年 4 月,NATO“公约”正式签订。除了“西方联盟”的英、法、比、荷、卢外,美国、加拿大、丹麦、冰岛、意大利、挪威、葡萄牙六国成为 NATO 成员国。“公约”要求所有签约

① House, hearings, 28 July 1949,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XXI (8 August 1949), p. 193.

② Senate hearings, 21 April 1949,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North Atlantic Treaty*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9), pp. 213 - 214.

③ Cited in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 - 1990*, 6th ed. (New York, 1966), p. 94.

国“彼此间继续致力于有效的自救与互助”，同时明确规定：任何对某一成员国的“侵略”“都将被认作是对所有成员国的侵略”。 “和平”时期的政治、经济合作与“战时”的军事“同盟”关系成为 NATO 的“两大支柱”。当美国国会几个月后批准该条约而使美国正式成为 NATO 一员时，有华盛顿“最大的孤立主义者”之称，时任参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公开宣称，加入 NATO“是美国对外关系自宣布门罗主义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步”。<sup>①</sup>

当年 10 月国会又批准了白宫提交的《共同防御援助法案》(Mutual Defense Assistance Act, 简称 MSAA)，第一次在“和平”时期明确授权政府为美国的“友邦”提供军事援助。很快，总数为近 20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分别给予 NATO 成员国。此外，希腊、土耳其、伊朗、韩国与国民党控制下的中国台湾也隶属美国对外军事援助之列。<sup>②</sup>

## 第二步 宣布亚洲“环形防御圈”

按照凯南“特殊主义”的遏制框架，亚洲——特别是东北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并不重要。尤其是根据他的“堡垒防御”的设计，美国在整个西太平洋不应投入过多。然而到 1949 年末，凯南的思想受到“修正”，华盛顿决定加强对亚太地区

<sup>①</sup> Martin H. Folly, "Breaking the vicious Circle: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enesis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Diplomatic History*, 3 (Winter 1988): 59–77.

<sup>②</sup> Lawrence S. Kaplan, *A Community of Interests: NATO and the 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 1948–1951* (Washington DC, 1980).

的军事介入，同时通过杜鲁门与艾奇逊在 1950 年 1 月公开宣布了美国在该地区的“环形防御圈”。

尽管他的战略考虑重点是欧洲、地中海与中近东，凯南也研究了美国对亚洲的安全安排。在他于 1948 年 2 月下旬撰写的编为 PPS-23 号的一份政策报告中，凯南特别指出，在对东亚地区设计战略与政策时，“我们必须停止空谈诸如人权、提高那里人民生活水平及民主化程度等（不切实际的）目标，因为我们不得不面对‘实力’挑战的时候已不远了。因此，我们受意识形态口号限制得越少越好”。在这一前提下，凯南建议考虑建立一个“太平洋安全系统 [A Pacific Security System]”。并认为日本和菲律宾应作为这一系统的“柱石”，因为“如果我们能有效地控制这两个国家及其周边地区，起码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的太平洋安全系统将不可能遇到任何严重的威胁”。<sup>①</sup> 这实际上是他“堡垒防御”思想对亚洲的延伸。

为了考察建立这一亚洲的“堡垒防御”系统的可行性，凯南 1948 年 3 月初实地考察了东亚。回到华盛顿不久，凯南便给国务卿马歇尔正式提交了建立太平洋“堡垒防御”的建议书。关系到这一系统的“最为关键的政治、战略观念”，他提出以下几个准则：

1. 尽管我们应努力影响亚洲政情、社情朝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方面发展，但我们不应把亚洲大陆的任何地区认作为对我们有核心战略意义的区域来做战略设计。朝鲜[半岛]的战略地位则应该按此原则，尽快得到确定。

2. 冲绳应成为我们在西太平洋地区运用打击力量的中心。它应是我们在该区域建立 U 形美国安全区的最中间、最前沿的部分。这条防线还包括阿留申岛，琉球群岛，以及西太平洋原属日本托管的岛屿及关岛。我们即可依托冲绳的空军基地与现代海军力

<sup>①</sup> PPS 23, "Review of Current Trends: U. S. Foreign Policy", 24 February 1948, *FRUS, 1948*, I : 525.

量,以击退任何来自东亚或东北亚的军事威胁。

3. 日本与菲律宾不应被包括在此防线之内。只要使该国保持完全的非军事化,只要没有其他大国试图利用日、菲的战略设置,我们应努力不在日、菲建军事基地或驻军。以保证该两国能军事上完全保持中立,政治上完全独立,以此作为我们安全的侧翼屏障。

假如白宫能够接受这样的“防御概念”,凯南在信中指出,美国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政策便“确立了短期内几个牢固的定位”,否则“寸步难行”。<sup>①</sup>

凯南对尽快确立美国针对西太平洋地区防卫理念的要求,得到了马歇尔以及军方的响应。特别是美远东武装部队司令暨盟军总指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更是迫不及待地表示支持。实际上,他自1948年春开始便不断地对华盛顿施压,要求重视保护美在西太平洋及东亚的安全利益,并尽快制定美对这一地区能够体现“积极与务实精神”的战略与政策。麦氏在陆军高级将官中,资格甚老,特别是他指挥了二战期间美在太平洋战场与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军事行动,曾自喻为美国军界的“亚洲通”,故而他认为自己的建议应受到重视。3月初,麦氏电告新组建的国防部,明确地反对政府在对华政策考虑中,只重视国民党政府“政治及经济政策”实施的可能性,而忽视中国对美在东亚及西太平洋的安全影响。若从安全角度出发,美国更应“密切关注”中国内战的战事进展。即便在中国内战前途不明的情况下,美国也应——而且必须——立即制定关于东亚及西太平洋的最低程度的防卫战略与政策。<sup>②</sup>

尽管凯南与麦克阿瑟就考虑西太平洋防御的迫切性显得一拍

<sup>①</sup> Kennan to Marshall, 14 March 1948, *FRUS*, 1948, I : 531 - 538.

<sup>②</sup> MacArthur to Charles A. Eaton, 3 March 1948, *MacArthur Papers*, RG 6, BOX 2 “FEC”, MacArthur Museum, Norfolk, Virginia.

即合，但两人战略思想的差异却非常大。凯南设想的西太平洋“安全系统”是基于一个“最低限度”的战略资源投入原则，即准备用最“恰如其分”的战略投入去防卫“重要”或“边缘”战略区域，以保证美国在欧洲、地中海、中近东等“核心”战略区域的最大限度投入。这样的设想是他的“堡垒防御”思想在西太平洋的具体体现。麦克阿瑟则希望建立一个亚太“防御带”，认为仅仅守住几个战略要点远远不够。3月在东京与前来考察的凯南会面时，麦克阿瑟便明确要求将凯南划定的“安全系统”作“适当延伸”，至少应把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及西南太平洋英属、荷属岛屿纳入其内。另外，麦氏虽同意美不在日本四岛长期驻军，却认为控制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对美战略利益至关重要。根据他对远东地缘政治的理解，该岛军事重要性完全不在冲绳之下，故而也应当作美在亚太“前沿防线”的另一战略中心加以经营。<sup>①</sup>

值得强调的是，无论是凯南的“最低限度”西太平洋“堡垒防御”还是麦克阿瑟的亚太“延伸防卫线”都没有包括台湾。然而到1948年底，中国内战已决定了蒋政权向东南沿海及西南山区节节败退的趋势之时，美国军方突然开始考虑台湾岛对美太平洋战略利益的重要性。这一考虑所围绕着的核心命题是：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最终控制台湾，将会在何种程度上威胁美在太平洋区域的安全；而考虑这一命题的潜台词则是：美国是否应考虑将台湾也当作一个“战略中心”做“安全安排”。

根据已解密的美国军事档案，最早开始研究这一问题并初步得出结论的文件，是1948年12月1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威廉·里海海军上将(Admiral William D. Leahy)给国防部长福来斯特的备忘录。此件称：倘若台湾被中共控制，这对美的战略利

---

① MacArthur to Albert C. Wedemeyer, 20 November 1948, Records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FILE 9, (China - 48), Modern Military Branch, National Archives.

益将“非常不利[seriously unfavorable]”。特别是在美苏未来发生战争的状态下,台湾的军事价值将凸显。如果美国无法控制台湾,里海指出,也就意味着战时无法利用台湾岛上的空军基地、海军港口乃至中国东南沿海的铁路枢纽,进而失去依托该岛以集聚兵力、实施空中打击及控制与该岛相毗邻的海上通道。另外,里海认为,由于台湾所产的粮食及能提供的工业及人力资源,对日本的工业重建十分重要,进而失去了台湾,必将延缓日本的经济复苏,必然使日本变成战时美国的“包袱[liability]”,而不是美国从自己利益出发所希望的日本成为美在亚洲“战略资本[strategic asset]”。相对苏联而言,里海判断,中共控制台湾无疑将为莫斯科提供非常大的战略便利。苏俄不仅可轻而易举地得以控制日本与马来西亚之间的海上通道,还为其向琉球群岛乃至菲律宾的军事扩张提供了“难得有利”的条件。<sup>①</sup>

美军远东军事总指挥麦克阿瑟与里海遥相呼应。1948年底至1949年初间,麦氏曾多次对前去东京视察的华盛顿高级官员表示,他对“台湾未来”特别地“关切”。在他看来,美国“若任由受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中共政权”占领台湾,实际上是在“邀请潜在的、未来敌手把我们在远东的整个防卫线搅乱并截断”。如要有效地保证西太平洋“无大恙”,麦氏认为,美国就不得不立即建一堵以“环亚洲大陆沿海岛屿”为基线的“防卫墙”。这堵墙的三个“支撑点”应为日本、中国台湾以及菲律宾。反之,麦克阿瑟强调,一旦美国失去对台湾的有效控制,美在西太平洋的“防卫墙”也就难以维持。特别是冲绳岛的左翼将洞门大开。现存在麦氏纪念馆的“麦克阿瑟文献”反映,美当时的远东军事总指挥的这些“担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的政治事务顾问威廉·西波尔得(William J. Sebald)及副参谋长查里·威勒比中将(Major General Charles A. Wil-

<sup>①</sup> Leahy to Forrestal, December 1948, 附于 NSC 37,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Taiwan,” *FRUS*, 1948, XI: 262.

loughby) 的影响。<sup>①</sup>

美远东防区指挥部的这些观点,很受华盛顿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视。1949年2月11日,国安会正式将里海给福来斯特的备忘录,编入其国际安全政策研究报告系列,并编为NSC 37号文件,还加上“福摩萨[台湾]的战略重要性”的标题。此后出台NSC 37号系列文件,均强调: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依托,是环亚洲大陆沿海各岛,而战略目标则是在对苏联、“中共”作战时,美首先要保证在环绕这些岛屿的海上通道的控制权,其次要考虑利用这些岛屿作为美对苏战略空中打击的前进基地。在这一前提下,台湾的军事价值就显得“非常重要”了。<sup>②</sup>基于这一共识,“联合战略计划委员会[Joint Strategic Planning Committee]”,在其于9月14日提交的JSPC 877/22号报告中,明确地提出,台湾的“归属前途”对美的未来太平洋“战略板块”的“平衡与稳定”将“无疑”是个关键因素。因为,报告分析,如果此岛被“对美充满敌意的[中]共党势力”所控制,如果北京与莫斯科的军事战略关系发展到苏“企图”在该岛建空军基地以便其在该区域的扩张,这种“前景”对美的战略挑战“将会十分严重”。据此,“联合战略计划委员会”要求华盛顿战略计划各部门立即着手“修改”既定的对苏作战的有关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所有预案。<sup>③</sup>

然而,就美国是否应立即采取军事或其他“非常”手段以防止台湾不为“中共”、苏联所占,华盛顿战略决策层考虑到凯南早先提出的“资源有限性”。“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9年2月间指出,台

① Minutes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Fayelte J. Flexer and MacArthur, 1 December 1948, *FRUS, 1948*, XI: 263 – 264; Sebald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29 August 1949, *FRUS, 1948*, VII: 835.

② NCS37/3, *FRUS, 1949*, XI: 284 – 286; NSC 37/5, 1 March 1949, *FRUS, 1949*, XI: 290 – 291, NCS 37/7, 22 August 1949, *FRUS, 1949*, XI: 376 – 378.

③ JSPC 877/72, 14 September 1949, Records of the Chief of Army, P § 01949 – 50, 381 TS, SEC. 3, National Archives.

湾的军事战略价值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美苏冷战对抗的态势仍未达到要求美直接投入军事力量以保全该岛的程度。若根据“利弊分析法[cost-benefit analysis]”，参谋长们认为，美对军事力量的使用时机及规模应有全局观，起码现时位于大西洋战区冰岛的战略位置要比中国台湾更需关注，更加“值得”作军事投入。此外，即便美对台有用兵的需要，但用兵后的局势发展恐难以控制。根据 JCS 的判断，美的军事介入很可能引发一场区域内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因此，参谋长们认为，对一个尚未具备“核心利益”的台湾过度消耗美国有限的战略资源与军事力量实在不是“最理性的选择”。如果在美国贸然军事介入台湾时其他地区发生“危机”，“我们必将应接不暇，顾此失彼”，而有可能“因小失大”。因此，美国针对台湾目前最“合适”的选择，则是有效运用威慑，以“阻遏中共”武装攻台。对此，JCS 建议：美国“充其量”只能“摆出个(在台海地区)武力存在的姿态[a show of force]”；为此目的，美海军可动用少量的舰艇停靠台湾“相关的港口”或作“沿岛巡逻”；少量武装人员可“登岛”协助、“指导”国民党军对台湾的空中交通的“防卫”或在岛上作“消遣性的活动[recreational activity]”。<sup>①</sup>有趣的是，竭力要求“不丢掉台湾”的麦克阿瑟似乎也同意 JCS 的建议，明确表示反对美在台建立长期军事基地。他的考虑是要“坚定不移地”将远东防卫的诸如建军事基地的长期战略投入，“优先”保证日本的冲绳与菲律宾，因为在这两处建永久军事基地，军事与政治上的“冒险性(risk)”要远比在中国台湾小得多。<sup>②</sup>

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对军方提出的“美至少应在台作武装力量存在的部署”的“政治上的可行性”与“战略上的合理性”却提出质疑。在国安会 1949 年 3 月间一次就台湾问题的专门讨论会上，

<sup>①</sup> JCS to Forrestal, 10 February 1949, *FRUS, 1949*, XI: 285.

<sup>②</sup> Minutes of conversation with MacArthur, 6 December 1948, *FRUS, 1949*, XI: 265.

艾奇逊就激烈反对这种对台的“有限的军事行动”选择。他认为，美在台湾海峡任何形式的军事动作，都必将影响国务院以“外交”及“经济”手段“破坏中共与苏联”的战略关系，以遏制苏联在华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势力的扩张。艾奇逊解释，华盛顿正试图让“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中国共产党人及“饱受”沙俄“侵害”的中国人民了解，莫斯科并未放弃俄国人“割占满洲及新疆的传统企图”，故共产党新政权与莫斯科结交，后患无穷。在此情况下，倘若美国显示“占领”台湾的意愿，不仅将使华盛顿的“阻止中苏结盟”的外交努力流产，还将令一般中国大众对美产生“疑惧”。艾奇逊还认为军方首脑们在台海保持“有限武装存在”的建议近乎“异想天开”，因为不实施美军对台湾岛进行全面占领，不实施对台湾海峡及大陆东南沿海的全面封锁，是根本达不到“阻遏”中共攻打并占领台岛的战略目的。即便未来台海形势的发展需要美国武装干涉，艾奇逊强调，美国也必须联合其他盟国一起行动，同时还必须公开表示是为了求得台湾人在联合国托管下的实行“自决”或完全“独立”的“政治目标”。<sup>①</sup>

艾奇逊的观点，明确地反映了他将欧洲作为美国全球战略选择第一优先的一贯立场。此时，他反对增加对台海、东亚的军事投入，正是出于担心弱化美在欧洲、地中海地区的军事存在。艾奇逊“美国应合理配置战略资源”的理念，得到了 NSC 大多数成员的赞成。因此，NSC 37/5 号文件明白无误地确认：任何对台的“有限军事行动”均不能阻止中共的“武装攻台”或“政治渗透”，也无法防止国共通过秘密谈判并避开美国以决定台湾的命运；倘若美国贸然出兵台海，将“难以避免”地会对现实的、未来的美国对华政策与战略产生“一系列的[不良]政治后果”，特别会引发中国人民对美“强占[中国]领土”的“帝国主义”意向出现长期担忧。然而值得注

<sup>①</sup> Acheson's statement is enclosed in NSC executive secretary to NSC, 3 March 1949, *FRUS, 1949, XI*: 295 - 296.

意的是,NSC 文件并未完全放弃未来美国对台实施军事行动的可能。对此,文件中埋下了伏笔:“如若福摩萨将来的情势发展要求美国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届时我们将会[就美国对台武装干涉]再作考虑”。但对形势发展什么样的程度会要求美考虑军事行动,文件并未予以确定,留出了政策变化的空间。<sup>①</sup>

中国内战形势在 1949 年间发展甚快。蒋介石政府在 4 月失去首都南京后,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的势头已不可阻挡。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蒋介石与其残余人马,被迫退守台湾,但解放军同时也逼近福建、浙江沿海。在这种形势下,美军方再次提出实施对台“有限军事行动”的动议。JCS 参谋长们于 12 月 23 日联名具函给国防部长约翰逊,要求允许采取“适当的军事行动——但不是大规模军事行动——以配合美对华正在进行的”政治、心理及经济工作。这种军事行动的目的,JCS 解释,“旨在提供给台湾的反共党政府,规模不大,但目标明确的,且完全在[美军]控制之下的军事援助”。作为行动的第一步,JCS 建议国防部下令美驻远东部队总指挥麦克阿瑟,在美第七舰队司令部的配合下,立即着手对台湾的防务现状及近期需要进行调查、评估,以便确定“如果要保全台湾的不受攻击,到底需要美军如何支援”。<sup>②</sup>几天后,JCS 主席奥马·布莱德雷(Omar N. Bradley)将军又专门致函于艾奇逊,进一步解释 JCS 的主张,并提醒艾奇逊,国会 10 月 6 日通过的《军事援助法》的第 307 条,为美军事援助台湾提供了法律依据及财政保障。<sup>③</sup>

此时,身在美军远东总部东京的麦克阿瑟也感到台海“形势紧迫”,有促使华盛顿迅即改变现行美对台战略的必要。在致国防

<sup>①</sup> NSC37/5, 1 March 1949, *FRUS*, 1949, XI: 290 - 291.

<sup>②</sup> JCS to Defense Secretary Johnson, 23 December 1949, enclosed in NCS 37/9, “Possible U. S. Military Actions Toward Taiwan Not Involving Major Military Force,” 27 December 1949, *FRUS*, 1949, XI: 460 - 461.

<sup>③</sup> Memorandum of Acheson, 29 December 1949, *FRUS*, 1949, XI: 464.

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数份电文中，他明确声称台湾对美在远东防卫上的战略价值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因为失去了台湾，将意味着美的太平洋防线“最终必定会被迫退到中国大陆的西海岸”。同时，在没有得到华盛顿批准的情况下，麦氏自作主张允许日本退役空军驾驶员赴台帮助蒋军，还允许“亲和国民党”的日本企业对台出售军火、武器装备，并派遣他的一名亲随去台，向蒋探风是否有可能接纳美远东总部的高级参谋人员担任“国军”的军事顾问。<sup>①</sup>

军方对台军事介入升级的要求，却与 NSC 正在制定的“美军在亚洲战略与政策”的中长期计划明显相悖。编为“NSC - 48”号系列的研究报告于 1949 年 12 月 23 日正式出台。尽管预测苏联会利用亚洲共产主义运动在该地区扩大影响力与控制度以对抗美国，此报告还十分确切地指出，美国的对策，只能也必须是以经济、政治手段为核心，辅之以“最低限度的军事存在”。由于美国“既无足够资源，也无必要”在亚洲大陆与苏争斗，故而最现实的选择就是在平时建立由大陆沿海岛屿组成的“防卫链”，以便战时为美用作军事基地，并不让对手利用这些岛屿制约美国。这一“防卫链”的中心点是冲绳、琉球与菲律宾，并不包括台湾。国安会强调，只要保住了此链，也就保住了美在太平洋的“第一条攻防线”。考虑到西欧、地中海及中近东的战略地位更为重要，NSC - 48 号报告确定，“一旦对苏战争爆发，美战略防御的中心不会、也不应放在远东”。因此，美国“目前最基本的战略观决定了[美国]在‘西线’作战略攻击，而在‘东线’作战略防御”。这一战略安排，也就要求美国在亚洲，要以最少的人力、物力的投入，争取最大限度的价值创造。<sup>②</sup>

---

① Michael Shaller, *Douglas MacArthur: The Far Eastern Gener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70 - 171.

② NSC 48/1, 23 December 1949, The Pentagon Papers, Vol. 8, 256 - 712; NCS 48/2, 30 December 1949, *FRUS, 1949*, VII: 1215 - 1217.

NSC - 48 号文件虽然阻止了军方将美国在太平洋的防御系统扩展至包含台湾,但同时也完全改变了凯南在西太平洋只建立以冲绳为中心的“堡垒防御”设想。1950 年 1 月 12 日艾奇逊在位于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National Press Club]”公开宣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环形防御圈”将“起于阿留申,穿过日本,到琉球群岛,再至菲律宾”。<sup>①</sup>

### 第三步 考虑对苏核威慑

1949 年杜鲁门政府修正凯南遏制战略思想的另一方面表现为对核武器的态度上。二战结束前的 1945 年 8 月初,当美国对日本广岛、长崎各投放一颗原子弹时,冲天的蘑菇云标志着国际政治与安全的一个新时代——“核时代”——的到来。尽管美国对日本的核打击似乎对迫使东京尽早投降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核武器在“和平时期”到底有何作用?更具体的,就对苏与“共产主义阵营”的冷战而言,美国是否可以利用其核优势遏制莫斯科?在这两个问题上,凯南从“特殊主义”逻辑出发的“论断”在华盛顿经过了从被接受到被抛弃的过程。

从他担任 PPS 主任的最初,凯南便没有将美国发展核武器以及核战略纳入他的国家安全战略考虑范畴之中。基于他对核武器的“粗浅”的认识,凯南认为原子弹根本不具备任何“军事价值”。具有如此“大规模杀伤力”的武器,其最根本的弱点在于“无法”将攻击对象的平民目标与军事目标分离开来,这种对战场杀伤“毫无分别”的武器,完全无法服务于任何现代“军事战略”。同时,凯南

<sup>①</sup> Speech, Acheson, at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12 January 1950,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23 January 1950), p. 116.

相信,美国的核优势只是短暂的,苏联终究不会甘于落后——特别是对外部威胁十分敏感的斯大林根本不会接受生活在美国核威胁的阴影之中——而必定大力研发苏联的原子弹。其结果,不仅将导致美苏间的“核军备竞赛”,将冷战对抗关系“核化”,而令美国对苏的长期“转化”努力泡汤之外,还将美国与西方“自由世界”的安全系数降至最低。故而,凯南一直支持华盛顿“放弃核垄断”,将对“核能源”的和平利用纳入“国际管制”机制,以打消克里姆林宫的疑惧。<sup>①</sup>

对凯南关于核武器价值的基本判断,杜鲁门一开始就表现出有限的接受。一方面,他认为原子弹是种“极端武器[an absolute weapon]”,因此决不可将其与一般常规武器“混为一谈”。1947年8月,杜鲁门曾公开向美国公众承诺,“不到万不得已”,他是“决不会再再次下令使用原子弹的”。<sup>②</sup>另一方面,杜鲁门坚信原子弹具有“政治价值”。尽管在担任小罗斯福副总统时对美国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知之甚少,但恰恰是担任总统不久后的他曾在“波斯坦会议”用“新武器”恐吓过斯大林,此外也是他“授权”军方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由于广岛、长崎的“核爆炸”给国际社会留下“石破天惊”的印象,杜鲁门坚持“拥有核武器”起码对任何企图对美国发动战争的战略对手产生“威慑作用”。<sup>③</sup>

杜鲁门早期的“核政策”基本沿着这种逻辑发展。1945年10月——距美国对日本投放原子弹尚不足两个月时间,杜鲁门便在1946年的联邦预算中编入总数为20亿美元的支出计划,用于对

---

① Gaddis, *The Long Peace*, p. 111.

② Truman's press conference, 14 August 1947,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 Harry S. Truman: 1947*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3), p. 381.

③ Truman to Mary Truman, 12 April 1948, quoted in Margaret Truman, *Harry S. Truman* (New York: 1973), pp. 5–6.

核武器的进一步研发与制造,以便巩固美国的“核垄断”、核优势地位。<sup>①</sup>与此同时,杜鲁门力主只有总统拥有对核武器使用的最后决定权,并据此构建了由“文官”——而不是军方——控制核武器研发、生产与装备的“中央”机制:“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简称 AEC]”。<sup>②</sup>

军方对斥巨资发展“不具备任何军事使用价值”的武器——特别是军方失去对核武器的控制——自然难以理解。那么要跳出这个“怪圈”,就必须使核武器的国防价值重新体现出来。当苏联在1948年6月突然宣布对柏林的“封锁”时,军方抓住机会要试试“核外交”。如果表示美国有可能对苏联实施核打击,这种核威胁理论上可以起到两个作用:一是威慑苏联不要让“危机”升级,因为任何“升级”都将对苏联带来“失”大于“得”的“严重后果”;二是“胁迫”,即通过“核压力”,迫使莫斯科取消“柏林封锁”,甚至完全撤出柏林与东德。军方对后一种“核功用”的索求,与英国前首相丘吉尔4月的建议有关。丘吉尔在一次与美驻伦敦大使路易斯·道格拉斯(Lewis Douglas)的谈话中建议,华盛顿对莫斯科发出“最后通牒”:苏联要么撤出东柏林以及东德,要么就准备“承受主要城市被夷为平地”的核打击。<sup>③</sup>

那么,如何才能使莫斯科相信美国的核威胁?对此,军方感到困难甚多。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国核打击力量并不完全可以信赖。虽然经过“不间断”的研发与制造,美国此时的核武库仍处于“脆弱”阶段:到1948年中总共拥有50枚原子弹,而这些“核弹”的设

<sup>①</sup> Gaddis, *The Long Peace*, p. 106.

<sup>②</sup> Richard G. Hewlett and Oscar E. Anderson, Jr.,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Vol. I: The New World, 1939/1946*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408–530.

<sup>③</sup> Lewis Douglas to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Robert Lovett, 17 April 1948, *FRUS*, 1948, III: 90.

计仍为“低级水平”，专家至少要花两天的时间才能完成一枚的装配。此外，专门用做投掷的 B-29 型战略轰炸机只有 30 架勉强可以使用。同时由于美国关于苏联战略目标的“情报”十分缺乏，空军根本无法保证“投中目标”。<sup>①</sup>即便如此，军方仍跃跃欲试，提出以“唱空城计”的方法威慑与“胁迫”苏联。军方的计划是“悄悄地”——但并非完全“隐秘”地——将一个 B-29 战略轰炸机中队由美国本土转场进驻英国的空军基地，摆出“准备”对苏联实施核打击的姿态。这样的建议对时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将军极有吸引力。由于他的军方背景，马歇尔对军方要求利用核武器的要求十分同情，但他对杜鲁门那种使用核武器可能造成政治、道德压力的担忧也完全理解。而军方设计的“空城计”让他觉得两全其美。在说服了杜鲁门之后，马歇尔支持了空军在 1948 年仲夏——“柏林危机”最为激烈之时——将一个 B-29 中队派至英国。为了保险起见，所有派出的战略轰炸机均未经过可以投放原子弹的设置改装，更不用说携带原子弹了。<sup>②</sup>

杜鲁门政府在处理“柏林危机”时运用的“核外交”似乎产生效果，起码华盛顿的高级官员们认为斯大林没有使“危机”升级是出于对美国核打击的惧怕。<sup>③</sup>尽管“空城计”解决了杜鲁门所顾及的“激发国内外舆论批评”的政治问题，但却暴露出对实际使用核武器指挥、控制的“不健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安全委员会于 1948 年 9 月 10 日完成的第一份关于“美国核武器政策”的

① Gaddis, *The Long Peace*, 109; David Alan Rosenberg, “U. S. Nuclear Stockpile, 1945 to 1950,”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38 (May 1982): 25–30.

② Marshall memorandum, 28 November 1948, FRUS, 1948, III, 281.

③ Testimony, General Omar Bradley, U. 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10 August 1948, *Historical Series: Militant Assistance Act of 1949*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4), p. 92.

NSC 30 号文件,加以明确地规定:“当战争爆发时,国家军事建制必须做好迅速、有效使用包括原子弹在内的所有武器”,NSC - 30 还指出,然而由于“实际使用”核武器涉及众多政治与“伦理”方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只有总统有权处理,因此对于“是否使用”或“在何种情况使用以及不使用”核武器,任何部门“不得事先予以决定”。<sup>①</sup>

尽管对国安会这样的规定表示赞赏,凯南仍对军方坚持在未来对苏战争中考虑使用核武器十分担忧。由他领导的 PPS 在 11 月完成的“美国对苏[战略]目标”的两份报告,均确切地表明美国不应将“迫使苏联无条件投降”当作未来对苏战争的目的。凯南指出,“我们必须明白,未来对苏[冲突]的最终解决只能是政治的,只能是通过谈判解决。”而任何企图“全面摧毁”苏联,不仅对“政治结局”于事无补,还将造成俄罗斯人对美国的“世代仇恨”。<sup>②</sup>

五角大楼对此并不以为然。军方在 1948 年末—1949 年初做出的所有对苏“战争预案”,都将以核武器打击苏联本土列入“攻击计划”之内。根据这些计划,如果美苏间在 1949 年开战,军方要求美国具有在 30 天内对苏联境内 70 个“城市目标[urban targets]”取得“完全摧毁”的核打击能力,而达到这个战略目的则总共需要 133 枚原子弹。<sup>③</sup>按国防部长福来斯特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要求,空军中将郝伯特·哈门(U. S. Air Force Lieutenant General

<sup>①</sup> NSC 30, “United States Policy on Atomic Weapons,” 10 September 1948, *FRUS*, 1948, I : 626.

<sup>②</sup> NSC 20/4, “U. S. Objectives with Respect to the USSR to Counter Soviet Threat to U. S. Security,” 23 November 1948, *FRUS*, 1948, I : 667.

<sup>③</sup> JCS 1952/1, “Evaluation of Current Strategic Air Offensive Plans,” 21 December 1948, in Etzold and Gaddis, eds. *Containment*, 357 - 360. Also see David Alan Rosenberg, “American Atomic Strategy and the Hydrogen Bomb Decisio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LXVI (June 1979): 70 - 71.

Herbert R. Harmon) 于 1949 年 5 月完成了对苏实施核打击“可能效果”的预测报告——即所谓的“哈门委员会报告。”该报告按照 JCS 的“对苏战争目标”的要求，“模拟”出用 33 枚原子弹在 30 天内袭击苏联 70 个战略目标的效果：苏联的主要工业城市、交通枢纽以及军事基地将会“荡然无存”，造成苏联的工业制造能力削减 30%—40%，同时预计核打击将会导致 270 万人死亡、400 万人伤残。尽管这种规模的核打击尚不足以“迫使[莫斯科]投降，铲除共产主义的根子，或严重打击苏联政权对苏联人民的控制力”，报告认为，“遭受如此打击后”的苏联军事力量至少将无力依托本土做任何战略反击。最后，“哈门报告”表露了一个担忧：如果一旦苏联的核武器发展成功，美国对苏的核打击将使战争复杂化——“苏联必定全力以赴地利用其一切可以利用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对美进行最大限度的报复”。由于报告的预测喜忧参半，国防部长福来斯特接到此件后立即下令“封存”，并特别交代不准将报告提交给白宫。<sup>①</sup>

因此，当苏联 1949 年 8 月宣布原子弹爆炸实验成功时，华盛顿一片哗然，特别是五角大楼更是迫不及待地重新审视美国对苏的“核战略”。美国至此仍保持着对苏的核优势，而且根据情报分析，苏联虽然已“试爆”原子弹成功，但要完成对美本土核打击的力量构建，仍需经过发展运载工具——至少相当于美国 B-29 的长程战略轰炸机——以及训练专门的操作人员。应该说，苏联对美的核威胁在相当时期内仍旧无法形成。苏拥有核武器对华盛顿的影响实际上只是“政治震撼”，而非“军事威胁”。基于这些考虑，美国的应对可有三种选择：第一，置之不理——只是在“政治”与“舆论”上说明苏联核威胁的“未来性”；第二，放弃在对苏遏制中完全

<sup>①</sup> Hannon report, “Evaluation of Effect on Soviet War Effort Resulting from Strategic Air Offensive,” 11 May 1949, in Etzold and Gaddis, eds. *Containment*, pp. 362–363.

依赖核武器,甚至不再运作“核外交”以威慑或胁迫莫斯科,转而加强对经济武器的运用,同时发展“常规军事力量”;第三,加快研发“更高级”、“更先进”的核武器,同时增加核武库的储存量,以保证美国对苏的绝对核优势。若出于凯南式的理性思考,第一、第二选择应为“优先”。然而美国军方却抓住苏联拥有核武器的机会,极力要求采取第三选择,并具体地提出:美国应该立即着手研发所谓“超级炸弹”——氢弹,以确保对苏的“无限期的核优势[indefinite nuclear superiority over the Russians]”。<sup>①</sup>

五角大楼对研制氢弹的要求显然不符合凯南基于现实主义、“特殊主义”逻辑的遏制战略思维。对此,凯南极为着急。在1949年8月2日约见国务卿艾奇逊、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时,他便试图说服国务院的两位主管,并要求艾奇逊直接向杜鲁门建议,可在政府“对外与国防决策圈”内先就氢弹以及美国的“核战略”进行“辩论”。<sup>②</sup>不久后,凯南又专门致函于腊斯克,阐述他反对研制氢弹的理由。在他看来,美国立即研发比原子弹更具杀伤力的氢弹,必然导致“已经对西方深有猜忌、疑惧”的克里姆林宫更加坚定与美国以及“自由世界”对抗的决心,同时也为“苏联政权”控制苏联与东欧民众提供了“更为有利的藉口”。毫无疑问,苏联也必将进一步发展核武器,而这种苏美间“核竞赛”的结果必定是遏制核化。凯南的另一个担心则是美国“核化”冷战对美在欧洲、地中海、中近东的“盟友”们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由于短期内苏联无法发展对美国本土直接核打击的能力,他分析,莫斯科最有可能的“安全安排”是将西欧、希腊、土耳其、伊朗作为苏联“抵御”美国核优势的“人质”,即与其发展打击美国本土的核力量(这样做耗费大、时间长、操作难),不如准备在美苏爆发战争时首先用核

<sup>①</sup> Gaddis, *The Long Peace*, p. 112.

<sup>②</sup> R. Gordon Arneson notes, conversation between Kennan, Acheson, and Rusk, 2 August 1949, FRUS, 1949, I : 507.

武器摧毁这些国家的工业设施、军事基地以及潜在的战略资源(这是苏联短期内可以实现的)。凯南相信,这种可能,必然造成这些国家政府的担忧和人民的恐慌,倡导走“第三条道路”势头的上升,从而使美国力图培植当地的对苏“自然抵抗力量”的期望与努力难以实现。反之,为了使这种可能降至最小,美国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支持英国甚至法国发展核武器,同时将 NATO 变成“核化”的军事同盟。<sup>①</sup>

凯南的立场得到了“原子能委员会”与国务院文官们的呼应。1949 年 10 月,AEC 的“一般顾问委员会”——其中包括研制核武器的科学家 J·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对军方要求研发氢弹的动议提出“警告”。报告断言,“发展那个超级炸弹,将意味着生产大屠杀的武器。”根据委员们的测算,美国现有的核武库“足以威慑”苏联对美发动——即便是用氢弹——的核打击。<sup>②</sup>一个月后,“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大卫·利连撒尔(David E. Lilienthal)与其他几位委员联名给杜鲁门写信,进一步表达反对研制氢弹的立场。他们指出:“[发展氢弹]不仅于我们国家致力于世界和平的目的不相符,同时对我们自身的长期安全也未必有利。”<sup>③</sup>艾奇逊似乎也认为立即研发氢弹不是“明智之举”。在 11 月 3 日国务院的一次“政策计划”会议上,国务卿对 PPS 提出要求:

“解决是否研制氢弹问题,大概最好的办法可能是达成一个 18 到 24 个月的冻结[moratorium]协议。对此,如果可能,双边协议最好,然而如果需要,单边也可接受。在这个冻结期内,你们应尽最大努力使国际局势缓和,努

---

① Kennan to Rusk, 7 September 1949, *FRUS*, 1949, I : 382–383.

② General Advisory Committee's statement is enclosed in J. Robert Oppenheimer to David E. Lilienthal, 30 October 1949, *FRUS*, 1949, I : 571.

③ Lilienthal to Truman, 9 November 1949, *FRUS*, 1949, I : 580.

力与俄国人达成协议,将你们的经济措施准备好,同时集中你们所有的智慧与注意力去做你们认为必要的事。但是,如果你们在冻结期结束时仍无法看到与俄国人达成协议的任何迹象,我们只能支持研制原子弹与氢弹,但决不支持任何如另外一派所建议的去轰炸苏联的举动。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只能去尽最大努力做好经济与舆论准备工作。”<sup>①</sup>

在要求国务院在“核军控”议题上力争与苏联达成“国际协议”的同时,艾奇逊 12 月 20 日致函杜鲁门,强调美国不应同时也不可能一面争取国际合作以“控制并最终销毁原子武器”,一面“加大对核武器的[战略]依赖”。显然,他的后一点暗指军方的立场。<sup>②</sup>

杜鲁门在面对国务院与“原子能委员会”暂缓研制氢弹的同时,也承受着国会内支持军方立场的议员们的压力。在 1949 年 11 月 21 日给杜鲁门的一份信中,参众院“原子能联合委员会 [Joint Committee on Atomic Energy]”主席布莱恩·麦克马洪参议员 (Senator Brien MacMahon) 指出,美国单方面“放弃核军备”以“唤起世界[对和平]的希望并赢得世界对我的尊重”的想法,“实际上产生的只能是对绥靖心理 [an appeasement psychology] 的表述”。美国试图以“放弃核武器的表率 [disarmament by example]”感化俄罗斯人,只能说明美国并未从“最近两次世界大战所得出的惨痛经验”取得教训。对此,麦克马洪暗示,不仅国会不会接受白宫这样的选择,美国“民众”也必将对其“嗤之以鼻”。<sup>③</sup>对杜鲁门政府而言,国会的态度举足轻重。如果政府决定研发氢弹,则需要国会在财政预算审核时予以支持;倘若政府否决研发氢弹的动议,国

<sup>①</sup> Minutes, Policy Planning Staff meeting of 3 November 1949, *FRUS*, 1949, I : 576.

<sup>②</sup> Acheson to Truman, 20 December 1949, *FRUS*, 1949, I : 613.

<sup>③</sup> MacMahon to Truman, 21 November 1949, *FRUS*, 1949, I : 593.

会内的氢弹制造支持者也可能阻碍政府预算中其他项目的批准。此外,如果按国务卿艾奇逊的设想,华盛顿与莫斯科签署“核军控”协议,而这一协议的最终批准权却操纵在国会手中。更令杜鲁门担心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 1949 年 10 月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和党中“亲蒋派”与所谓“中国院外活动”势力加剧了对民主党政府“丢失中国”的抨击,白宫任何对“共产主义势力”的“绥靖”态度必将遭至反对派更为激烈的攻击。<sup>①</sup>

与此同时,政府内的氢弹研制支持者大力宣扬这种“超级炸弹”的战略价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在他 11 月 23 日给国防部长约翰逊的专函中,详细陈述了氢弹对美国“遏制共产主义集团”全球扩张的“军事作用”。布莱德雷解释,氢弹的军事优势,不仅可作为在“非战争”状况下的威慑武器,更重要的是氢弹“无以想象的攻击杀伤力”而可用做未来战争的战略“进攻武器”。考虑到氢弹的“平战”时期均具有的“巨大军事价值”,布莱德雷“郑重”告知约翰逊,他与“参联会”的各军兵种参谋长们已得出结论:“[对研制氢弹的军事战略考虑]使得任何基于社会、政治、道德原因而反对[氢弹研制]的理由显得是那么的不足为道。”据此,布莱德雷“敦促”国防部长要求总统尽快做出研制氢弹的决定。<sup>②</sup>“原子能委员会”内的少数派代表路易斯·施特劳斯(Lewis L. Strauss)也“全力”支持 JCS 的立场。他 11 月 25 日直接给杜鲁门写信,特别强调国务院与 AEC 的关于通过与苏联谈判以实现“核军控”的想法“过于幼稚”。他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自愿放弃敌方完全有可能拥有的武器”实在是“不明智的”。<sup>③</sup>

---

① 参考: Nancy Bernkopf Tucker, *Patterns in the Dust: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1949 – 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② Bradley to Johnson, 23 November 1949, *FRUS, 1949*, I : 595 – 596; Bradley to Johnson, 13 January 1950, *FRUS, 1950*, I : 508 – 511.

③ Strauss to Truman, 25 November 1949, *FRUS, 1949*, I : 597.

面对各方压力,杜鲁门做出了一个似乎“左右逢源”的决定。1950年1月31日,总统致函国务卿艾奇逊与国防部长约翰逊,授权他们实施“对制造热核武器[thermonuclear weapon][氢弹]的技术可行性[technical feasibility]”的“确定[determination]”工作。几天后,杜鲁门向他的白宫助手们解释,他仍未就是否研制氢弹做出最后决定。<sup>①</sup>实际上,杜鲁门只是在自欺欺人。由于氢弹的“技术可行性”只能经过试爆才能“确定”,他的1月31日“总统备忘录”,是在玩文字游戏:既满足了国会“保守派”及军方的要求,又不大张旗鼓地宣布研制氢弹而激怒莫斯科。对杜鲁门的这种“政治小把戏”,凯南感到“异常痛心”。在他1月20日致杜鲁门长达79页的“备忘录”中,凯南断言:在俄国拥有原子弹之际,美国决定研发更高一级的核武器,结果必然将美国与苏联的冷战拉上了“核军备竞赛”的不归路,进而“根本改变”美国遏制大战略赖以生存的基本原则。<sup>②</sup>

### 小 结

1949年标志着美国冷战大战略的重大转折。杜鲁门政府虽然仍旧崇尚对苏全面的、长期的遏制,但在“如何实施”上逐步偏离了凯南的“现实主义”以及“特殊主义”的基本要求。通过在欧洲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一实质上是“地区军事同盟”的举措,在西太平洋确立了美国最基本的“环形防御圈”,以及无限扩大核武

<sup>①</sup> Truman to Acheson and Johnson, 31 January 1950, *FRUS*, 1950, I : 141 – 142; Report by the Special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o the President, “Development of Thermonuclear Weapons,” 31 January 1950, *FRUS*, 1950, I : 515.

<sup>②</sup> Kennan memorandum, “The International Control of Atomic Energy,” 20 January 1950, *FRUS*, 1950, I : 39.

库、研发比原子弹更具杀伤力的氢弹以追求美国对苏联的“极限核优势”，华盛顿实际上将遏制战略“板块化”、“军事化”、“原子化”。似乎遏制的操作性强了，美国对潜在危机的“控制力”大了，但实施遏制的最终目的却“模糊”了，“灵活性”也在慢慢失去。

造成这种凯南认为是“非理性”战略转变的原因不一而足，但其中主要者至少包括四点。

第一，华盛顿表现出对遏制“共产主义扩张”要尽快“划出底线”的迫切心理。遏制作为长期目标对决策者属“软性”政策，而“处理”——特别是“管理”——危机则属“硬性”任务。连续发生的所谓“捷克危机”、“柏林封锁”、“苏联拥有原子弹”以及“中共夺取政权”，使得杜鲁门和他的幕僚应接不暇。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划出“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集团”对抗的“基准线”，便成为华盛顿防止“下一个”危机出现的战略安排。至于此举对“软性目标”的反面作用将会如何也就无暇顾及了。

第二，美国政府内部对“有限资源”占有支配权的争夺加剧。在对外资源的分配与控制上，国务院处于传统的主导地位。然而，战后美国国家安全建制的调整，特别是 1947—1949 年间完成设置的国防部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令军方的决策重要性大大提升。而对欧的由经济援助转军事援助，参与“非战时期军事同盟”，承诺“最低防线”，发展战略武器等，无疑将使军方更显“举足轻重”。官僚机构争权夺利，必将“部门利益”优先于“整体利益”。

第三，反映在国会政治的两党之争使得“对共产主义强硬”成为政治取向标签。自民主党 1933 年主政白宫以来，共和党从未停止过“收回”行政权的索求，尽管在 1948 年的“大选”中再次败北，但共和党攻击民主党政府“同情共产主义”、“出卖美国利益”的政治话语，造成此后衡量两党对外政策“强硬度”的坐标。

第四，作为“日落西山”的老牌帝国英国为了自身利益对美国的运作。为了战后经济得以尽快恢复并保护对其传统“利益范围”的控制，伦敦无法将有限的资源用于遏制苏联在欧洲可能的“扩

张”以及德国的“东山再起”，而最经济的选择则是将美国“套牢”在欧洲。1948年的“捷克”与“柏林”危机刚好为英国运作华盛顿从对欧的经济援助转为军事援助提供了契机。

由于NATO使欧洲的冷战板块化、氢弹使美苏战略对抗“核子化”、“环形防御圈”将冷战正式延伸到亚洲，以至凯南设想的以经援培植“核心利益区域”内的“自然抵抗力量”，以“堡垒防御”保证美国的有限战略资源得到最佳配置，以“打入楔子”分化“共产主义集团”，最终以长期、灵活的遏制迫使苏联放弃“扩张”、接受合作的一系列“大战略”思想，被事实上否定、抛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凯南于1949年底正式辞去国务院“政策计划署”主任一职，并且挂冠而去。接替凯南的保罗·尼兹(Paul Nitze)的到任很快揭开了美国冷战战略制订的新的篇章。



## 重新界定美国安全利益与苏联威胁

在凯南主导美国冷战战略思考的三年中，他的基本思想主要以国务院政策计划署(PPS)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战略与政策问题的众多研究报告形式体现。凯南自己并未试图——甚至计划过——用一个“综合报告”全面阐述国家安全战略。对此，凯南曾在离开政坛后就此作过解释：“人是否具有能够用完整而又权威的语言，对基于假定或者是根本难以想象的未来局势，界定出有用的[战略]方略的能力，对此我毫无信心。”<sup>①</sup>然而，在1949年12月接替凯南担任PPS主任的保罗·尼兹，却似乎对完成这样的工作信心百倍。由尼兹主持于1950年4月成稿的NSC-68号文件，便成为美国战略制定前所未有的“创举”。当然，当时在制定这一“战略文件”时，“尼兹们”并未预想到文件的“巨大”的历史意义。<sup>②</sup>

无论文件出笼的操作背景如何<sup>③</sup>，NSC-68号文件文本的形成，实际上体现的是华盛顿一个新的战略思考和设计体系的建构过程。解析这一文件，显然应从其对冷战中美国战略利益与威胁的界定内容、方法和顺序开始。

① Kennan, *Memoir, 1925-1950*, p. 408.

② 关于对文件的历史评估，本书将辟一章专门论述。

③ 有研究表明，NSC-68号文件的形成程序，似乎与美国宪法的撰写有相像之处：完全由一个独立的特别小组完成初稿，操作上超脱了原有的官僚机制的约束。例如尽管文件冠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系列，但国安会从头至尾并未参与。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 90, note.

## 第一节

### 以美国战略目标重审冷战态势

制定一个冷战战略综合性文件的主意,似乎源于总统杜鲁门与国务卿艾奇逊。至于出自何种目的,学术界的解释不一而足。有学者从当时美国国内政治的生态分析文件出台的原因,认为杜鲁门企图以此举回应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的压力,试图向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表示民主党的政府对“共产主义”的威胁同样的强硬。<sup>①</sup>有的以美国联邦政府的“官僚政治”为分析基点,指出国防部长约翰逊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企图通过一个战略文件以表明支持“财政保守者”对长期减少联邦支出的诉求的态度。另一些学者从决策者“个人取向”出发,发现国务卿艾奇逊希望以制定长期战略蓝本的方式确定他“欧洲第一”的对外政策选择。<sup>②</sup>无疑,这些学者的观点体现的是美国学术界对 NSC - 68 号文件出台的“怀疑”态度,甚至是其传统的政治“阴谋[Conspiracy]”情结。

然而,根据美国解密的外交档案,杜鲁门要求军政机构组成一个独立的联合小组研究长期战略计划的一个直接初衷,却是出于对苏联“核试验”成功的担心,以及他确定美国在核对抗条件下的国家战略的迫切心情。为此,杜鲁门 1950 年 1 月 31 日发布总统令。“考虑到苏联[已经取得]的裂变炸弹能力和潜在的热核炸弹能力”,总统令指示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协调两部“对我们在和平和战争时期的目标,以及对我们的战略计划中实现这些目标的有效

<sup>①</sup> 参考: Alonzo L. Hamby, *Man of the People: The Life of Harry S. Trum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sup>②</sup> Ernest R. May, *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 Interpreting NSC 68* (Boston: Bedford Books of St. Martin's Press, 1993), pp. 8 - 9.

性进行重新审查。”对此，命令明确指出：

必须考虑到，当一个方案旨在确定现实可行性时，继续执行该方案的决定，是否对一些更为基本的问题提前做出判断：（1）如果热核武器测试成功，那么，是否应该储备这种武器；（2）如果储备了这种武器，那么，在战争中能够使用这些武器的条件为何。如果对热核武器的试验是成功的，那么，生产和储备这种武器的压力将极大地增加，裂变武器也是如此。

同时，杜鲁门也提出了具有战略设计的要求。他指出，“在我们从总体上检测这个国家的战略计划和它在和平以及战争时期设定的目标时，我们只有把政策的使用当成是这种检测的一部分，才能够对它进行充分评估。这类重新检测在考虑国家政策时，不仅需要重视可能的热核武器，也需重视裂变武器——这是因为考虑到苏联所具有的这两种武器潜在的能力”。此外，由于“道义上、心理上和政治上的问题都包含在这个问题当中”，总统要求战略决策部门“需要对它们加以考虑并给予一定重视。”杜鲁门在其总统令中明确地指出，他要求的战略“重新检测”的结果，必须“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sup>①</sup>由总统直接向国务卿与国防部长下达对外与国防政策评估任务，其本身便具有战略决策的深刻含义。

落实杜鲁门的“总统令”便成了尼兹担纲“政策计划署”后的第一个战略政策研究任务。为了体现“军政共议”，尼兹在以 PPS 成员为主体的前提下，邀请了四位军方官员：一位是国防部长约翰逊的心腹、作为该部与国务院“联系人”的陆军退休中将詹姆斯·波恩司 (James H. Burns)，另一位是曾做过波恩司助手的纳基泊·哈拉比 (Najeeb Halaby)。而空军中将杜鲁门·兰顿 (Tru-

<sup>①</sup> S. Nelso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7 – 38.

man H. Landon)是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代表参加了研究小组,来自国防部的文官罗伯特·拉巴伦(Robert LeBaron)则由于他作为军方与“核能委员会”联系人的身份受到邀请。<sup>①</sup>由于这个小组承担的是直接来自总统的研究任务,故而每位成员均享有“Q”级通行证(Q Clearance),即具有接触所有与核武器有关的“最高机密”资料。当时只有非常少的高级官员得此“便利”。<sup>②</sup>这个界定的本身说明,小组所制定的文件从一开始便定性为最高层的决策依据。

尼兹小组的工作效率似乎出奇的高。NSC-68号文件的初稿实际上在小组成立后的几周内便完成了。在整整三个月中,尼兹采取单独邀请的形式向其他享有“Q”级通行证”的官员专家进行咨询,其中包括JCS主席布莱德雷、前副国务卿罗博特·拉维特(马歇尔时期的战略专家)、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以及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化学家詹莫斯·寇兰特。根据解密的谈话记录,所有受咨询者都对文本的立意、分析逻辑、战略判断、选择建议表示赞同,所提出的只是些“无关紧要”的改进意见。<sup>③</sup>1950年4月7日,小组正式以NSC-68号文件(草案)的形式提呈杜鲁门。

这份仅经过三个月便完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并未局限于杜鲁门所要求的“对苏联核力量发展”做出对策建议,而是在对冷战以来美国政策“重审”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长期战略的思路与界定。据此,文件的开篇便概述了“目前[世界]危机的背景”。对此,文件的撰写者透过一个历史的长聚焦指出,战后的国际秩序与结构发生“史无前例”的变化。“在过去的35年当中,”文件解释,“世界已经经历了两次具有极大破坏性的全球战争,也见证了两次波及范围之广、强度之大——在俄罗斯和中国发生——的革

<sup>①</sup> NSC-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TOP SECRET [WASHINGTON] April 7, 1950, in May, *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 p. 11.

<sup>②</sup> 同上,第12页。

<sup>③</sup> 同上,第15页。

命”；与此同时，五个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奥匈帝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消亡；还有两个主要的帝国主义体系——英国和法国——彻底衰败。由此“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文件指出，“国际实力的分配有了本质的改变。而在若干个世纪当中，实力分配曾表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获得如此巨大的力量，以至于所有其他国家的联盟都无法聚积更大的力量来及时应对”；因此，尽管暴力和战争循环往复成为国际舞台的特征，但是“主权和独立国家体制得以保留了下来，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凌驾于其之上取得霸权”。

文件随后强调，这种战后国际“结构”的实质性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大国间的权力分配状况。首先，德国和日本的战败，英国和法国的衰落，“它们同美国和苏联的发展相互作用，以至力量不断被吸引到这两个中心上”；其次，“苏联与以前那些谋求霸权者有所不同，它被一种新的、与我们正好相反的宗教狂热者般的忠诚所激励，寻求把它的绝对权威扩展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因此，文件认为，战后国际“矛盾冲突[已经]成为区域性”。根据对苏联的战略意图的判断，文件认为，莫斯科将“依据相机而动的原则，使用暴力或者非暴力的手段进行这种[区域性的]冲突”；然而“随着令人恐惧的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的不断增长”，文件同时也强调，“每个人都经常面临着可能存在的毁灭，以及担心这种冲突是否会展成全面战争”。<sup>①</sup>

在这个大背景下，文件将战后国际危机的根源聚焦于“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镇压”实力对比的不均衡状态。一方面，“世界上的人们热切期望能从源自核战争危险的忧虑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处于克里姆林宫控制之下的地区，“其任何实质性的扩张都将

<sup>①</sup>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38.

增加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没有一个联盟能够聚积起更大的力量来对抗克里姆林宫”。作为在 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反侵略”、“反霸权”主要国家的美国,此时“尽管处于力量的优势,但同时也面临着最深刻的危险”。由于“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极为严重的,它们包括了对这个共和国和它自身文明的维护或是破坏”,NSC-68 号文件明确地提出,“[日趋恶劣的世界局势]再也无法坐等我们深思熟虑;本着良知和决心,这个政府和它所代表的人民必须现在就做出新的重大决定。”<sup>①</sup>

为了进一步说明美国所面临“挑战”的严重性与长期性,文件将美国国家的“基本目标”与苏联对外“企图”的“基本构想”做出比较。关于“美国的基本目标”,文件摘录了美国《宪法》序言中的一段:“为了建立更为完备的联邦,树立公正,维护国内治安,建立共同防卫,增进公共福利,并且保证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的自由幸福。”简言之,美国的基本目标就是确保在国际间“建立在尊严和个人价值基础上的自由社会的完整和活力”。为此,文件强调:“我们有决心获得个人自由的基本要素,正如《宪法》和《人权法案》所宣布的那样;我们有决心建立起自由和民主体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我们有决心,在必要时以战斗来保卫我们的生活方式,正如《独立宣言》所说,‘怀着深信神祉护佑之信心,我们仅以我们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荣誉相互共同保证。’”<sup>②</sup>

然而,文件指出,苏联领导人对外政策的基本企图却与美国的“国家基本构想”存在着根本的冲突。在文件的撰写者看来,克里姆林宫“领导者”的基本构想十分明确:他们将长期致力于首先是在苏联其次在那些处于苏联控制之下的区域“维持和巩固”苏联的

<sup>①</sup> NSC-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39.

<sup>②</sup> 同上。

“绝对力量”。更有甚者，文件认为，“在苏联领导人的心目中，这一构想的实现要求急剧扩展它们的权威，最终消除对它们权威的任何有效反抗。”因此，文件分析，苏俄“政权”这种基本构想企望的实质，是为了“彻底推翻或是破坏非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府机构和社会结构；并代之以从属且受控于克里姆林宫的政党组织和结构。”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NSC - 68 号文件的制定者们断言：苏联对外政策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为了“控制欧亚大陆大多数的国家与人民”。<sup>①</sup>

由于美国是“非共产主义世界中主要实力国家的中心和反对苏联扩张的堡垒”，那么就不得不首当其冲地面对苏联长期、全面的威胁，承受莫斯科主导下的全球性“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压力。据此逻辑，文件轻而易举地得出结论：“如果苏联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推翻或破坏自由世界的完整和活力，那么，美国就必然成为它最主要的敌人。”<sup>②</sup>

NSC - 68 号文件开篇这一段分析与此后的阐述相比，显得篇幅短，但简明扼要，类似一般性的引言。但若仔细究其立意，便不难看出撰写者们用心良苦。通过比较美国与苏联所崇尚的“国家基本构想与目标”之间“本质性”的差异，文件试图引导读者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由于两种政治制度本质上的不同而导致国家间“核心利益”的冲突，具有不可调和性；正是由于这种“国家利益”的冲突，而使得两国间的“敌对关系”具有“你死我活”的属性。此外，尽管对核武器扩散所可能造成的危害表示担忧，文件似乎对苏联向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利益进行不间断的区域性挑战的威胁更加忧心忡忡。

---

①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39.

② 同上。

## 第二节

### 以意识形态描述“苏联威胁”

显然，“尼兹小组”并未按国家战略思考的“常理”对美国“国家利益”做任何更加详细的诠释，<sup>①</sup>却用大量篇幅阐述战后苏联对美国“国家利益”的严重威胁。当描述这一威胁时，其分析逻辑立足于“存在于美国目标和克里姆林宫企图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观念中的潜在冲突”。

首先，NSC - 68 号文件界定了这种潜在冲突的性质，即“在处于法制政府管理之下的自由观念和在克里姆林宫的残酷集权统治之下的集权制观念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根据文件，以美国民主制度为代表的西方“自由思想”体现了“共产主义集权”制度与理念所无法接受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表现在：“自由社会将个人价值作为个人本身的目的，只是要求个人进行适度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克制；自律和克己使每一个个体的权利与其他个体的权利相一致。”根据这一“个人价值”原则，“个人自由”将与“个人责任”相对应：首先为所谓“个人否定责任”，即“在运用自己自由时，若采用的方式与其他人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冲突，那就放弃这种方式”；第二是“积极责任”，即“创造性地使用自己的自由，并将其用于建设一个公正的社会”。正是由于这个具有“责任感”的自由思想，文件认为，“自由社会”可以获得“更深切的宽容”和“社会的合法性”，并“构成了完整和充满活力的自由民主体制”。

那么反映在国际社会运作上，任何崇尚“自由”民族国家也是

<sup>①</sup> 参看：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p. 90 – 91. Gaddis 指出，NSC - 68 号文件尽管也涉及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但只是“一般性”地描述，并未做出更细致的分析。

按这种“人文精神”行事。“自由社会尽力建立和获得这样一个环境，”文件解释，“即在其中的每个个体都有机会实现它的创造力”；这种社会属性也同样解释了“为什么自由社会能容忍那些在这个社会内部运用它们的权利来破坏它的人”。由此引申开来，文件进一步说明，“在国家关系中，力量和诉诸力量的思想支撑起了自由社会的主要信心；它认为无需强迫，终究能使所有社会与它协同一致”；因此，“自由社会不仅不害怕变化，还欢迎变化；它对素不相容的思想保持善意，并从中获得力量；它是一个思想能够自由交换的市场，而且忠诚可靠，自由人类能在其中拿到最好的货物，在运用它们的选择时更充分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据此，文件断言，自由思想是历史上源远流长的思想，因此远远优越于屈从于权威的思想。<sup>①</sup>

在对“自由社会”的所谓自由思想一番美化之后，NSC-68号文件指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的“集权专制”思想与“自由社会”的“人文精神”绝对“水火不相容”。这是因为，“在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带着获得绝对实力的意愿进行统治的社会当中，很难具有容忍自由的宽宏气度”；而“独裁者掌握绝对权力的基础，是其强有力的[个人]意志的绝对力量——其他意志必须屈从于该意志，在扭曲了的信仰的强迫之下，个人不得不使自己让步”。由于“集权”与“独裁”信仰权势“存在的意义在于服务于这个体制的目的”，于是“这种体制几乎成了上帝，那么，服从于上帝的旨意就变成服从于这个体制的意志”。甚至“仅在表面上服从于这个体制还不够——甚至就是甘地的非暴力政策也不被接受——因为反抗的精神和对更高一级权威的虔诚仍可能会保留下，个体还是不会完全屈服的”。<sup>②</sup>

---

① NSC-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p. 40–41.

② 同上，第41页。

文件认为，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实施“独裁”的行径不仅体现在对苏联内部“专制”上，也表现在对苏联“卫星国”的控制中。文件指出，“[独裁者们]强行要求获得居于所有人之上的绝对权力，这对所有的共产党和处于苏联控制之下的国家同样适用。”如此一来，“斯大林就宣称，正如布尔什维克党详细说明的那样，列宁主义的理论和策略对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都是具有强制性，而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是会毫不犹豫地维护苏联的立场”。文件指出，根据这样的“政治原则”，“在卫星国中，真正的爱国主义就是热爱苏联”。据此也就不难对苏联所公开宣扬的“和平政策”做出“准确的判断”：如同“在其党代会上被说成是‘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更为有利的形式’”，克里姆林宫的“和平”政策，实际上是“分化和使非共产主义世界停滞的策略”；由于“苏联寻求的和平是同苏联政策绝对一致的和平”，世界任何形式的“多样化”对莫斯科都是难以容忍的。<sup>①</sup>

正是出于对西方“自由思想与制度”的“反感”与“仇视”，NSC - 68号文件认为，苏联在对外政策层面极力推行了“铁幕、孤立和社会专制政治等政策”，其目的无怪乎是为了在苏联以外的地区也“获得绝对的权利”。由于认为“自由思想的存在和延续是对专制社会根基永恒的威胁”，莫斯科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自由在世界上的长期存在是令专制者无法接受的”。文件认为由此而产生的国际力量的“两极分化”，是当代国家面临的一个“新现象”，而这个“新现象”正在繁衍“持续的危机，并不可避免地引起专制社会与自由社会的尖锐对立”。<sup>②</sup>

依此类推，文件指出，以苏联为代表的“专制制度”对自由制度

<sup>①</sup>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41.

<sup>②</sup> 同上。

的“挑战”必将“遍及全球”。按照这样的判断,NSC - 68 号文件提出一个重要的论断,即“在目前力量两极分化的情况下,任何一处自由制度的失败便会遍及其他地区,因而意味着自由制度在任何其他地区的失败[a defeat of free institutions anywhere is a defeat everywhere]”。<sup>①</sup>

作为对此论断的说明,文件列举了捷克斯洛伐克“倒向共产主义的”例子。在捷克,“[自由制度]受到破坏对我们造成的打击,不是用捷克斯洛伐克对我们的物质重要性来衡量的,[因为]从物质意义上讲,它的能力早在苏联操控之下;但是当捷克斯洛伐克制度的完整性遭到破坏时,我们在不可估量的价值观念范畴内受到的破坏,远大于我们所遭受的物质损失”。因此,美国以及“自由社会”不得不承认:“苏联体制在道德上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正是由于这种挑战,使得“从未有过其他任何一种价值体系与我们本身固有的价值体系是如此之对立,其破坏我们价值体系的目的是如此之难以消除,其如此之擅长利用在我们社会中出现的各种最为危险、不和的趋势;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如此有力地在世界各地唤起人类本性中的非理性成分;没有任何别的国家能够如此全力支持不断增长的巨大的军事实力”。<sup>②</sup>

依此逻辑,NSC - 68 号文件进一步强调,克里姆林宫对美国的挑战不仅是针对“自由社会”的价值观念,同时也是针对“民主国家”用于保护这些价值观存在环境的物质能力,因而,“这是一个同时包含了战争与和平的挑战”。此外,由于核战争威胁使得国际社

---

① NSC - 68 号文件的撰写者的这个论断,Gaddis 指出,完全“修正”了凯南关于苏联威胁的有限性和重点性,本质上改变了此前遏制战略的基本逻辑。参看: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 91。(斜体为本书作者加注。)

②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42.

会正在不断分化,文件认为,领导“自由社会”抗御威胁的责任便加在了美国人的身上,同时担负这一责任也是符合美国的自身利益的。这个现实“要求我们竭尽全力,承受必然的风险,并通过采取与自由、民主原则相符的手段建立起秩序和公正”。<sup>①</sup>

据此,文件点出其“主题”,即“所有为了增强我们基本价值观和国家安全的考虑,都要求我们通过冷战战略来实现”。这是因为:“只有通过发展自由世界的道德和物质力量,才能使苏联政权信服其基本构想的错误,才能建立与苏制定具有可操作性协议的前提条件;只有通过实际展示我们制度的完整和活力,自由世界才能拓宽可行性协议涵盖的范围,才能指望逐渐使苏联承认那种将在总体上最终挫败苏联企图的现实。”即便这种假设不成立,文件指出,美国“也有可能制造一种使苏联进行自我调整,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放弃它的企图,在可以容忍的限度内与非共产主义世界共处的态势”。由于任何这种进展都将“是自由民主思想的一个胜利”,文件强调,迫使苏联放弃其基本企图“必须是美国政策当前的[总体]目标”;即便因此而发生战争,“我们也没有理由去改变我们的总体目标”。考虑到苏联具有的潜在的核武器能力以及“日趋激烈的斗争”,文件指出,美国“不能期待冲突程度会降低,除非或直到苏联体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sup>②</sup>

更值得注意的是,NSC - 68 号文件指出,由于美苏间意识形态与基本价值观的不同,也使得美国在达到目的所使用的手段上受到较大的限制,以至所面临的威胁格外严重。“强制即意味着否认自由”,文件解释,“除非它被用于加强所有人的权利,而求助于内部或外部的武力,对自由社会来说,是万不得已的最后一招”。其

---

<sup>①</sup>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p. 42 - 43.

<sup>②</sup> 同上。

原因在于，“只有当一个人或其中一群人威胁到其他个体的基本权利时，或是当别的社会企图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他人时，这种强制才是可允许的。自由社会珍视和保护少数人反对多数人意愿的权利，把它当成一种基本权利看待。这是因为这些权利对于每个个体来说都是不可剥夺的”。<sup>①</sup>

文件认为，与西方“自由社会”相反，为了实现其基本企图，克里姆林宫能够不择手段。由此苏联“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可能的领域，并选择在它认为有利可图的时候发起攻击；同时在其没有做好斗争准备的时候，它却可享受‘虚假和平’带来的好处”。因此，文件强调，首先在意识形态或心理学的层面上，“为人类思想而斗争的矛盾冲突是世界性的”；其次从政治和经济层面上看，“在国家内部和国际关系层面上，为了实力之争已异常激烈”；再次从军事方面看，克里姆林宫利用其庞大军队威胁邻国，支持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并且在有利情况下，“通过其代理人毫不犹豫的诉诸武力”；尽管在和平问题上仍很小心，但它还是在加紧行动，努力实施其基本企图。如此一来，“我们就不可避免的被苏联拖进了由于我们的目标和它们企图之间的[根本]差别而产生的冲突之中了”。所以，NSC - 68 号文件指出，从“[国际]现实和意识形态上考虑”，美国别无选择，“唯有通过创造性地使用自由思想，展示它的优越性，同时尽力采用除战争之外的手段来改变世界局势，以此挫败克里姆林宫的企图，加速苏联体制的衰退”。在使用武力的问题上，“自由社会更是没有选择的自由”，因为“使用武力不仅是自由世界的最后一步，它同时也不能最终解决思想领域的根本冲突”。文件分析，“仅有军事胜利，只会部分的或许是暂时的缓和根本冲突；因为我们虽然在一段时期内破坏了克里姆林宫威胁我们安全的能力

---

<sup>①</sup>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44.

力,但是集权主义者势力的复起,苏联体制或其他专制体制的重建,都不会是遥遥无期,除非我们在这个根本性的[意识形态]冲突中取得了巨大的进展”。<sup>①</sup> NSC-68号文件断言,只有通过适时的、长期的表明“自由思想”的优势所在,美国与“自由世界”才有可能最终“制服专制理念”、遏制苏联的全球性扩张。

当然,文件强调,当“自由社会”的基本价值观面临威胁时,美国必须——也能够——采取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所有手段来保护这些价值观。所有“隐秘的或公开的、暴力的或非暴力的手段”,只要“不会使我们制度的完整性遭受危险,只要这些手段是用来挫败克里姆林宫的企图的”,都应该列入美国的冷战政策策划之中。为了使这些冷战手段具有“合法”的属性,文件指出,“只有经过专门评估并被认为确实适用于某个目的时,这些手段才能够被使用;即便如此,也不能过分使用或是使其受到误导,否则会使我们取代那些奴役人民的人,而成为人民的敌人。”<sup>②</sup>

### 第三步 以能力界定“苏联威胁”

NCS-68号文件在判断苏联对美国的“战略威胁”时,除了以意识形态为界定坐标外,还以苏联的“对外威胁能力”分析其“对外威胁的意图”。这种威胁界定视角体现在如下几个分析方面。

第一方面,文件的撰写者认为克里姆林宫的“当权者”具有对

<sup>①</sup> NSC-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p. 44–45.

<sup>②</sup> 同上,第45页。

内实行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压制力与控制力,因此,苏联政权“谋求世界统治权的计划始于其国内”。首先,由于“独裁统治者首先关心的是保障它的力量和权威在国内的基础”,NSC-68号文件的撰写者推理,苏联政权必定套拉下“铁幕”将苏联人民与世隔绝,同时“在国内不断进行着政治大清洗,国家内务部实行着制度化、组织化的犯罪”。这些都是说明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感到国内不安全的证据”,而正因为这样的嫉妒和不安全感,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对内实行的“完全高压控制,在经济、生活方式和人们的意识上强加其绝对的权威这些做法,较从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次,莫斯科将这种同样的高压控制政策不可避免地推至其所控制的“卫星国”。“尽管尚处在初级阶段”,NSC-68号文件发现“有证据表明”,苏联“帝国”的殖民统治已经在“克里姆林宫所控制的苏联以外的殖民地国家”里初见端倪。例如,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苏联在东欧的“卫星国”中,执政者所实行的政治社会统治手段几乎与苏联的如出一辙。

再次,“作为集权主义者的独裁政府”,NSC-68号文件的撰写者认为,克里姆林宫实施这些政策的目的“是让人民从现在起在意志上完全服从于它的控制。”对此,文件指出,与“纳粹”德国所实行的一样,苏联的“集中营就是这样一个社会的典范”。通过对阶级异己分子和“不同政见者”的监禁和类似的社会政策,苏联的统治者们企图塑造这样一种社会:“[迫使]人的人格是如此支离破碎和反复无常,以至于他用自我贬抑的方式义无反顾地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文件甚至认为,对在其控制以外地区,克里姆林宫实行的是同样的政策,即“坚决清除一切对它扩张意志、影响和控制的反抗。”莫斯科之所以遵循这样的政策,是由于“它无法容忍自由社会存在,即便是最为温和或无害的自由社会对它来说也是一个冒犯、一个挑战,并意味着具有破坏性的影响”。

最后,文件指出,在追求这个政策的过程中,唯一能限制克里姆林宫使用何种手段是其对利弊的分析。文件认为,意识形态的

信条已不成其为苏联对外行为的制约因素,因为“它的作用只是指导其对暴力、颠覆、欺诈和拒绝道义考虑等手段的使用”。此外,由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坚信自己不可战胜”,以至于其过去的或现在的宣言、条约都不可能具备对判断其将来的行动有任何可靠的指导意义。因此,在是否会诉诸战争以解决国际冲突问题上,影响莫斯科决策唯一明显的制约因素就是其对现实利弊的算计。<sup>①</sup>

NSC-68号文件认为美国是最能影响莫斯科的利弊分析的筹码。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是基于其对美国战略和策略层面上对其产生影响的判断,即“我们不仅是摆在它和世界领导权之间的最大的障碍,还是唯一能从自由世界和苏联世界中释放出对它具有破坏性力量的国家”。因而,克里姆林宫的对美政策是被“一种奇特的对美仇视和害怕的混合情感所驱动”。在这种状态下,它的战略是:“在我们这个国家和自由世界其他国家里(这些国家是我们实力基础所在),竭力破坏我们的综合力量;在这当中,它既坚持条约文本,又遵循一条对其有利的原则——冒最小的风险、受最少的约束,力求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尽管苏联目前使用这一战略是俄罗斯传统的“谨小慎微心理的新的表现形式”,但根据苏联的理论或实践,文件无法确定:“一旦克里姆林宫确信它可以通过最后的突然一击而促使我们败亡,它还仍不会去实施那样的一击。”<sup>②</sup>

第二方面,NSC-68号文件指出,苏联特有的“集权”制度保证了克里姆林宫能最大限度地动员其有限的战略资源,从而形成超出常规的“巨大的潜能”。在考虑苏联集团的潜在能力时,文件强调,首先要记住的一点是:“与我们相对比,它们正将自己的水平发

<sup>①</sup> NSC-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p. 46–47.

<sup>②</sup> 同上,第47页。NSC-68号文件的这个论断,实际上明确地挑战了凯南四年前的“苏联相当一个时期内不会挑起战争”的判断。(斜体为本书作者加注。)

挥到几近可能的最大限度；同样较之于我们，苏�能用较少的消耗办更多的事——它的生活水平比较低，所需不多就能令经济保持运作，它的军事及企业能有效运转，即使装备不太精巧，但〔官僚〕机构却不复杂。”文件还强调，克里姆林宫庞大的力量之源是两个庞大的机构——共产党组织和秘密警察。“在党内，克里姆林宫拥有一个专门强化意识形态统一性的机制，在国外则作为宣传、颠覆和进行谍报活动的工具；其警察组织，是为了保证在目前情况下克里姆林宫长期安全的一个国内的镇压工具。这两个基础组织的行动不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大规模的或是通过单独的代理人进行，它们所表现出的潜力都是空前的。”共产党、警察和苏联军事力量，这三者的结合便给苏联以外的世界造成这样一个总体印象，即“自由世界的众多国家是无法与苏联的实力相抗衡”。<sup>①</sup>

其次，NSC-68号文件的撰写者指出，苏联的“集权”制度，赋予了克里姆林宫在意识形态方面特殊的对外影响力。对此，文件阐述道，“苏联集团中的独裁者们”在推动苏联体制和共产主义的同时，却大肆宣称自己是“和平运动”和“殖民地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领袖。因此，文件认为“自由世界中比较脆弱的国家与地区却有可能被〔克里姆林宫〕的这些‘主义’所吸引、所迷惑；[比如]这些‘主义’在亚洲就找到了一个极能接受它们的听众[这里指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者注]。尤其是当这些亚洲国家看到苏联是如何从一个落后的社会变为世界大国之一所取得的飞速进步时，便会对这些‘主义’留下深刻的印象”。由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苏联“吹嘘”要成为“新的普遍信仰的源泉”和“模范‘科学’社会”的同时，克里姆林宫“却玩世不恭地利用广大人民[渴望进步]的真诚愿望，当起国际运动的领头人并据此攫取一切好处”。文件

<sup>①</sup> NSC-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p. 47 - 48.

分析,苏联意识形态的特殊影响力之所以变成“可怕”的力量,主要由于苏联政治体制决定了克里姆林宫在执行政策时可以“胡作非为或投机取巧”。而将这种“完全无道德限制的机会主义行径与其秘密行事、暗箱操作的特色相结合,克里姆林宫就具有让人难以应对的能力,它可以在最广阔的战略空间内,用秘密行动的方式,快速开展行动”。<sup>①</sup>

第三方面,NSC-68号文件指出,苏联的经济能力已为其对外扩张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证。文件认为克里姆林宫任何经济上的政策意图都是与其对外总体政策紧密相连的。于是,在苏联的制度里,“[发展]经济本身并不是一个目的”;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即使是和经济有关,也只是意在将经济发展用于增强整体实力,尤其是增强苏联体制的战争制造能力”。由于任何“独裁者的物质财富都要严格服从于制度利益”,文件推断,苏联“专制制度”下也毫不例外。

文件指出,当然,就“物质能力”的大小而言,苏联的经济能力有其根本脆弱性。即便对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做“最乐观的估计”,根据 NSC-68 号文件的计算,苏联总体经济实力与美国相比仍大致为 1 比 4。这种存量上的差距不仅反映在国民生产总值——如 1950 年,苏联计划为 650 亿美元,美国 1948—1949 年已经达到 2 500 亿美元,即便加上苏联的东欧“卫星国”的产量,“苏东集团”仍无法望美国之项背。但是,文件预测,假如美国维持目前的产业政策并满足于现有对苏的优势,克里姆林宫将会抓住机会通过对某些产业持续增加大大超过美国的投资,结果将有可能使苏联与美国经济整体实力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sup>②</sup>文件隐含道,这种不利于美国的发展情势,着实令人担忧。

<sup>①</sup> NSC-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48.

<sup>②</sup> 同上,第 49—50 页。

NSC - 68 号文件撰写者认为,倘若美国全力以赴与苏联在经济领域竞赛,则将能够迅速扭转这种趋势。这是因为今天苏联的经济实力,是建立在把生产几乎发展到极限的基础之上;因而,“不论莫斯科做出怎样的努力,也只能对其总体生产水平带来几乎微不足道的增加;然而在美国,一种绝对的快速[经济]增长则完全可能实现。”文件强调,然而,目前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当苏联已经真正地全体动员起来了,而美国至今为止尚未开始积蓄力量,那么在双方力量之争中,美国实力的强大与优势从某种程度上看作用甚微。”苏联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核能力这一事实足以证明,“至少在和平时期,这个专制国家能比其他民主国家都更容易将其力量集中投入到任何指定的[力量发展]计划中去。”<sup>①</sup>除此之外,文件中还认为,苏美之间在其他领域(包括总体技术实用能力,熟练劳动力资源,劳动生产率等)的差距与在生产力方面的差距完全一样。但是,文件指出,在科学研究领域,尤其是当苏聟能利用欧洲技术与人才的条件下,美国所具有优势的大小尚难以界定。

第四方面,NSC - 68 号文件强调,苏联战后迅速发展的常规军事力量正在使克里姆林宫对外扩张的信心倍增。“苏联为实现其统治全球的构想,正在全力发展军事力量。”对此,NSC - 68 号文件的判断依据是:“苏联[目前]拥有的武装力量远远超过其保护本国领土所需的力量。”虽然苏联目前所维持的武装力量水平“仍不足以发动一场将迫使美国卷入其中的战争”,但文件认为在和平时期,克里姆林宫拥有“过多的”武装力量再加上刚刚发展的核武器,一方面给苏联为了实现其目标“提供了强大的[对外]施压力量”,另一方面也可被克里姆林宫“用以威慑它的侵略对象不得采取任何抵抗苏联和可能导致战争的行动”。

---

<sup>①</sup>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50.

那么,到底在何时、何处、有多大可能爆发一场由苏联发动的大战?与其提出自己的预测,NSC-68号文件援引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个所谓“最新判断”,即苏联和它的卫星国现已准备充分,能够于1950年对下列地区突然发动下列攻击行动:(1)“侵占西欧,但可能不包括伊比利亚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2)“向原油产地近东和中东开进”; (3)“巩固共产主义在远东的利益”; (4)“对大不列颠岛发动空袭,对在大西洋和太平洋西方国家的交通线实施空中和海上打击”; (5)“对经过选择的目标实施核打击,现在这种打击可能包括对在阿拉斯加、加拿大、美国等地的目标。另一方面,这种核打击在苏联可能采取的其他行动的配合下,将会剥夺英国作为有效的联盟军事力量行动基地的功用。对苏联而言,它还应有能力阻止任何类似‘诺曼底’的、意在强行重新进入欧洲大陆的两栖联合行动。”

在苏联完成战争发起阶段,并巩固了对西欧的控制之后,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判断,文件指出,它能同时进行以下军事行动:

- a. 对大不列颠岛实施全方位空袭和有限的海上攻击;
- b. 入侵伊比利亚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 c. 在近东和远东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继续对北美大陆的空中打击,继续对大西洋、太平洋交通线的空中和海上攻击;
- d. 在其他地区进行牵制性的军事进攻。

NSC-68号文件指出,除了具备对上述地区实施进攻行动的能力之外,苏联同时具有对自身和其卫星国大片领土的防空能力,至少“这一能力足以抵抗——虽无法阻止——盟军对它们的空中打击”。目前唯一尚不能确定的是,“在供应其卫星国军队或是自己的军队进行长期作战方面,苏联是否拥有足够的军力储备和军需后勤供应能力”。文件分析,当然,考虑到还存在着“卫星国”反叛的可能性,“苏联可能不会全面装备卫星国的军队,因为这样做

对其自身不利。”<sup>①</sup>

第五方面，苏联成功地发展了核武器，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减弱了美国对苏的战略威慑力，从而使得莫斯科更易挑起针对美国的武装冲突。文件强调，尽管“我们无法确知苏联具体的核能力，”“但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人员判断（其意见与政府、陆军、海军、空军以及核能委员会均一致）”，苏联已经具备不断生产和储备原子弹的能力。根据 NSC - 68 号文件的撰写者们估计，苏联到 1950 年中期，可能生产与储备 10—20 枚原子武器，到 1951 年中期，达到 25—45 枚，到 1952 年中期，达到 45—90 枚，到 1953 年中期，达到 70—135 枚，进而到 1954 年中期，拥有 200 枚。文件强调，当然，目前的这个判断是建立在对苏联核武器研发活动尚不全面的观察之上的，“仅代表了众所周知的或可以推断的苏联[核]工厂[目前]的生产能力”；言下之意，苏联完全有可能将其试验和生产核武器其他的能力隐藏起来。文件警告，如果美国仅仅参照已知的苏联核生产能力作出评估，“那么这种估计将误导我们，使我们对自己的核储备量产生优越感，尤其对苏联可能发动攻击的时机估计错误”。<sup>②</sup>

与其核武器相匹配是苏联“现已拥有能投送核武器的飞机”。据美国的情报人员估计，“苏联现有的核弹投送能力，已远远超过运送其现有核弹[储备]所需的能力”。尽管目前对苏联打击目标的精确度上，“尼兹小组”承认还无法作出确切的估计，但“一个正在计划中的评估很可能得出[苏联]击中目标与投放弹数相比约为 40%—60% 命中率的结论”。NSC - 68 号文件警告，根据这种“命中率”评估，“苏联拥有的核弹储备何时能够达到 200 枚，便成为美

---

①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p. 51 – 52.

② 同上，第 52—53 页。

国战略计划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这是因为，文件解释，“如果苏联对美国的目标投放 100 枚核弹”，只要 50 枚成功地命中目标，“就足以对美国本土造成严重破坏”。

此外，假如苏联决定对美或西欧“自由国家”突然实施核打击，再假如对苏联的核打击“除了美国及其盟国目前制定的防御计划外，没有任何更为有效的抵抗”，文件认为，苏联的核打击将造成“严重”后果。这些预计中的后果包括：(1) 大量核废料堆放在大不列颠岛上，以至于西方诸国无法再将它当成基地来使用；(2) 对西欧重要的中心地区和交通线的破坏，妨碍了西方对防御力量的有效运用；(3) 对美国和加拿大的至关重要区域造成破坏性打击。此外，如果苏联再在其可观的核储备基础上发展热核武器——如氢弹，那么苏联的“核力量”所预示的对美国与主要盟国的“破坏度”将无法估量。<sup>①</sup>

最后，NSC - 68 号文件预测在此后的十年中，“苏联的防御能力将有可能增强”。尤其“是通过发展和使用现代航空技术，空中预警和联络装置，以及防御制导武器等”，苏联将取得更加有效的防御本土的多种手段和选择，确保在遭受对手报复打击时尽最大可能地减少损失。<sup>②</sup>这一预测的隐含意义便在于：苏联不仅在发展战略上的“第一次打击力量”，同时也在通过对战略防御力量的加强，提高“第二次打击力量”，<sup>③</sup>由此衍生的战略优势则会令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过于乐观而无所顾忌，结果令美国和西方所构建的战略威慑变成战略“恐吓”。在这种情况下，NSC - 68 号文件的撰写者们得

<sup>①</sup>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53.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关于威慑理论中构建“第一次打击力量”和“第二次打击力量”的重要性，参看：Dietrich Fischer, *Preventing War in the nuclear Age* (Totowa, NJ: Rowman & Allanheld), pp. 84 - 86。

出的结论是：莫斯科主动挑起战争的可能性无疑将急剧提高。

## 小 结

NSC - 68 号文件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描述以及对所谓“苏联威胁”的界定，在次序上出现了本末倒置。如果按凯南“特殊主义”的逻辑，任何形式与任何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思考，都必须以确定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同时对这些利益要按照“孰轻孰重”原则进行排序，即肯定什么是“核心利益”，什么是重大利益，什么是“边缘利益”。其目的是在承认“战略资源有限”的原则下，对不同程度的“利益”做出不同程度的“保障安排”。而 NSC - 68 号文件的撰写者在界定“利益”时，却采取了“模糊”策略。

关于美国在冷战中的安全利益，NSC - 68 号文件仅“原则性”地接纳凯南的“自由”与“多元”的标准，<sup>①</sup>并指出，美国《宪法》所制定的国家“根本目的”——即确保“我们自由社会的完整与充满活力”——是美国的国家“根本利益”。至于“自由社会”的外延，仅仅是指美国或北美大陆的“自由社会”还是包括了欧洲的所有“自由社会”，这个“自由社会”是否还泛指所有的“非共产主义社会”，对这些特别关键的概念，文件并未做出明确的界定。同时关于“完整与充满活力”的具体内涵，到底是指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的不受侵害，还是指“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与思想”在国际范围内传播不受挑战，文件避而不谈。在这样一个模糊框架下，“根本利益”的内涵与外延均可做任意的解释，从而产生美国国家利益泛化的可能。

NSC - 68 号文件编制者战略考虑的一个重点显然是对所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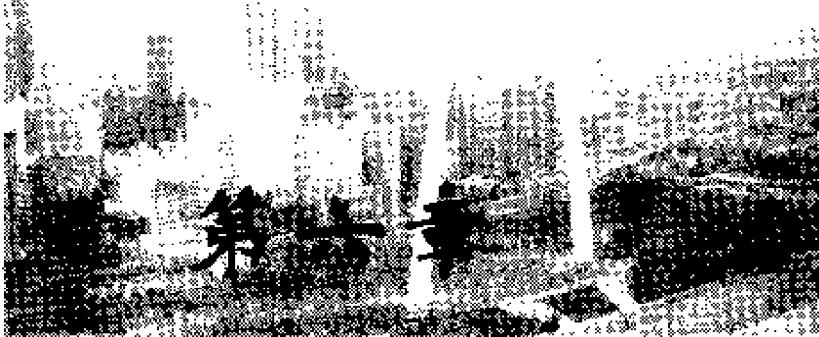
<sup>①</sup>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 91.

“苏联威胁”的认知。他们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承继了凯南的思辨框架。首先,尽管“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明确的判断坐标系,但作为文件更为具体的参照系数却是苏联“专制”制度对“扩张”的无限追求。“专制”统治者最“不容置疑”的心态是取得“绝对控制”,因而容不得一丁点的“多样化”,导致对所有不同的“政治制度”与理念的破坏与消灭。其次,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孕育出的对“革命者不可战胜”的信念,文件强调,苏联领导人的对外目标并非只是确保对“共产党已经夺取政权国家”的控制,而是千方百计地扩大“共产主义阵营”,直至使共产主义运动全球化。再次,尼兹及他的同僚们与凯南一样,认为苏联对外“扩张”的另一个“动因”是苏俄特有的“历史意识”所造就的“不安全观”。由于俄国近代屡受外敌侵略的经历,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已经没有接受“相对安全”的愿望与能力,故而对“绝对安全”的索求,已成为必然。依据以意识形态为指标审视外来威胁的产生,NSC - 68 号文件断定苏联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自由社会”的“敌意”与企图,将长期存在,除非苏联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否则这种“敌意”将愈演愈烈。

在确定“苏联威胁”上,NSC - 68 号文件的编写者们又表现出与凯南相异的判断结果。尽管两者均将审视的触角放在依照对手“现实的”、“潜在的”对外扩张能力来透视对手的“扩张意愿”上,但结论却相距甚远。以他对苏联的长期研究与观察,凯南认为克里姆林宫的“外张能力”已经超过了其自身所能的极限。苏联不仅要解决国内经济恢复的重重困难,同时为了确保在“共产主义阵营”内的“绝对领导地位”,不得不花费精力与资源以拉紧对“卫星国”的控制链,特别是在南斯拉夫与中国,莫斯科所面临的挑战严峻而且长期。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领导人将会小心行事。依照凯南的判断,苏联近期内没有能力构成对美国以及主要盟国直接的军事威胁。然而,NSC - 68号文件却认为凯南“近期无战事”的判断过于乐观。克里姆林宫之所以尚未对美国或美国的盟国实施军事威

胁，主要是因为它尚未取得“必胜”的保障。一旦苏联的战争能力发展到克里姆林宫自认可以“必胜”时，对美国而言，苏联的军事威胁将迫在眉睫。随着苏联“核力量”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随着苏联进一步增强它的常规力量，NSC - 68 号文件判断，苏联将在不远的将来有足够的军事能力以发动针对美国或西欧的“侵略”战争，而这个不远的将来则是“1954 年”。假如美国“拒绝”尽快发展相应的——特别是常规——武装力量，美国将不得不冒——而且很可能是以“突然袭击”为开始——的大规模战争威胁。

显然，NSC - 68 号文件在界定外在威胁时，呈现出至少三个思维“误区”：其一，将威胁与“利益”的考量顺序颠倒，以至留出以威胁确定“利益”的空间；其二，将对手的意识形态作为它对外政策的目的而不是手段，以至使威胁的内涵与外延充满不确定性；其三，将对手的“制造战争能力”作为其“发动侵略意愿”的充分条件，以至忽略了“能力”与“意愿”常常并非具有“因果”关系的可能。这些威胁认知的“误区”，必然连带影响了战略思考的下线：资源配置和战略选择。



## 选择全面和无差别遏制

在界定了美国冷战条件下的国家根本利益，描述了来自苏联与“共产主义阵营”对这些利益现实的、潜在的威胁，NSC - 68 号文件提出了“全面、无差别遏制”作为美国长期的战略选择。这一选择强调是在世界范围对任何源自苏联的现时与潜在地威胁美国安全利益的地区进行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遏制，因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偏离了凯南所提倡的“有选择”、“突出重点”地保卫美国的安全利益的遏制思维框架。<sup>①</sup>“全面、无差别遏制”在操作层面上还包括了政治的、外交的、经济的以及军事的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值得强调的是，在这一层面的战略考虑中，NSC - 68 号文件的撰写者采取了比较与筛选的方法。

### 第一章 谈判不作为战略这样

面对难以避免的“苏联威胁”，美国到底有何战略选择？按照常理和美国的外交传统，和平时期威慑侵略和解决冲突的国家安全战略的首选应该是实行多渠道、多层次的政治谈判。然而，

<sup>①</sup>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 91.

NSC - 68 号文件的撰写者为了突出全面遏制的军事成分,明确地指出:在对苏的冷战状态下,美国决不能寄希望于政治或外交谈判。

NSC - 68 号文件认为,自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思考一直受到“阴魂不散”的所谓“和平主义”幻想的毒化。相当数量的美国民众和舆论领袖们坚持:西方社会可以、也应该通过单边的、多边的或国际建制框架内的谈判,缓和以至最终解决与苏联以及“共产主义集团”的矛盾与冲突。文件认为,这一论调,不仅影响了美国公众舆论的导向以及美国盟友的政治选择,同时制约了华盛顿冷战战略决策的自由。尽管任何一个理性的对外战略都“必须把谈判和这些行动方案联系起来考虑,因为一个谈判者总是试图达成一个更为有利的协议,从中得到的好处要胜过作为谈判起点的现实情况”;但是,文件强调,“无论如何,[任何通过达成]协议[所要创造的国际环境]至少不能比现实情况更糟。不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国家间的关系亦复如是。”<sup>①</sup>

由于能否通过政治谈判遏制“苏联威胁”仍取决于谈判双方的优劣势对比,文件认为,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华盛顿相对于莫斯科并不占有任何优势。例如,在政治谈判方面,苏联至少拥有以下几个相对于美国与“自由国家”的优势:(1)苏联对涉及其国内情况的一些重要事件能够实行保密;“因此比起自由世界对苏联的了解来,苏联能更多的洞悉自由世界的现状”; (2)专制体系下的克里姆林宫“用不着对公众意见做出必要而认真的回应”; (3)崇尚权力的莫斯科“不需要与其他国家就它将提出和接受的条件进行磋商”; (4)苏联政权在国内施行舆论封锁的同时“还能影响其他国家的公共舆论”。在文件撰写者们看来,这些都是决定着谈判结果将有利于苏联的重要因素。文件解释,“随着我们实力地位日显

---

<sup>①</sup>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76.

势微”，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不仅“可[任意]反对就整体解决方案进行富有成效的谈判”，并对可能达成的国际协议“予以破坏”；虽然美国“现在主要在核武器方面可能拥有充足的力量对苏联施行有力进攻，并有把握在一场长期战争中取得胜利，但是这个力量仍不足以使美国在冷战较量中取得成效。”<sup>①</sup>

在文件撰写者们看来，现在美国所必须解决的最为重要的政策取向问题，并非考虑如何谈判，而是设计如何在“自由世界”构建适当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迅速加强能够威慑苏联进攻的力量，以期迫使苏联调整自己的对外行为，并逐渐撤退，最终彻底放弃它的政策“基本构想”。为此，国际通行的外交谈判不仅根本无法达到这个目的，反而使得美国和盟国在遏制苏联全面扩张方面失去先机。比如，文件解释，“对核能的有效控制将要求苏联开放其领土，并用其他方式来证明它的诚意与和平共处的愿望，以便反映出——或至少是开始产生——苏联体制内部的变化。”显然在目前的情况下，文件认为，“我们无法通过谈判制定出一个解决办法，从而使苏联体制内部发生变化。”<sup>②</sup>

文件指出，尽管政治谈判不应作为美国的战略选择，华盛顿可以——也应该——将对苏谈判视作一种冷战的策略。因为，外交谈判作为“策略”起码可以发挥如下几方面的作用：

首先，美国可通过“不拒绝谈判”以争取国内外的舆论支持，以期占有道德高地。文件解释，“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的公众要求，即使只是将谈判作为一个条件，也要使其成为本国政策和计划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以挫败克里姆林宫的构想，[因此要求]自由世界

<sup>①</sup>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76.

<sup>②</sup> 同上，第 76—77 页。有趣的是，NSC - 68 号文件关于谈判无法影响苏联政权内部发生本质变化的观点与凯南早先提出的基本一致。不同的是，文件以此作为迅速提升军事力量的前提。参看：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1900 - 1950*, pp. 136 - 147。

应准备同苏联在公平条件的基础上不间断地进行谈判”。由于美国国内以及其他国家的一些人“坚信”有可能同苏联达成平等协议，所以“如果苏联发出和解的信号，即使是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也将给我们造成[政治与道义的]压力。”文件建议，作为一种化解美国由于拒绝谈判所将承受的“道德谴责”的压力的办法，“自由国家必须随时准备谈判，并力求主动提出对苏谈判”。但是，文件同时也指出，这种谈判必须首先提出谈判条件以及接受这些条件的“阶段性与时间表”；此外，“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自由世界舆论较为广泛的应允，这就意味着，它们必须与积极的和平计划相一致并符合联合国宪章，至少，也要有利于联合国或其后继组织实施有效军控。”倘若苏联不愿意接受这些条件，或根本没有诚意来遵守这些条件，那么将向国际与国内舆论证明：“除非苏联政策发生根本改变，从而导致其体制的改变，否则苏联根本就不会[按谈判要求去]做。”更为重要的是，文件强调，西方国家在对苏谈判中必须认识到，“确定有力而坚定的谈判立场，是意识形态冲突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对这一点的提出，文件解释，是“按照国务卿[艾奇逊]在[加州]伯克利[大学]演说中提到的路线，[即]任何提出对整体解决方案进行谈判的要求和企图，在我们力量未及构成之前，充其量都只是一个策略”。因此，在决定并开始建构自由世界力量的同时，它“起码可以用来赢得人民对计划的支持，减少目前面临的战争的危险。在谈判的目标和条件上，美国必须尽快确定其立场，并同主要盟国达成一致”。<sup>①</sup>

其次，文件认为未来冷战的发展，也有通过“可控”的谈判部分地达到美国冷战战略目标的可能。“假设美国同其他自由国家进

---

①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p. 76 - 77. 此外参看：Acheson's remarks at a meeting of the Advertising Council at the White House, 16 February 1950,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XXII (March 20, 1950), pp. 427 - 429.

行合作，并决定开始增强自由世界的力量，假设克里姆林宫也选择了和解的道路，那么，“可能达成协议的空间便扩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就各种具体事宜与克里姆林宫进行谈判磋商。”<sup>①</sup>文件预测，如果类似这样的谈判能够启动，克里姆林宫将通过谈判追求三个主要目标：一是消除美国的核打击能力；二是阻止“自由世界”有效动员其庞大的潜在人力、物力资源以“抵抗”苏联；三是迫使美国做出正式承诺从欧洲和日本撤军。至于苏联是否愿意就上述目标做出重大让步，将取决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对西方的能力和弱点，尤其是西方坚持抵抗的意志和能力以及对自身的能力和弱点所做出的评估。但是，文件确认，“至少在目前情况下，苏联是不可能做出会使它重大让步的判断的。”<sup>②</sup>

据此，文件指出，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同苏联的谈判中，不仅应该确立明确的目标，也必须观察和“正式记载”苏联在国际间“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新的政治、心理和经济环境的过程”。简单地讲，文件阐述，“就是我们将在必要之处记录下苏联逐步妥协的过程，并通过谈判促成这一过程，因为一旦这种可能成为现实，[以谈判解决冲突]总比诉诸战争要合算得多。”当然，如果谈判真的能取得如此的效果则是最为理想的，但是文件指出，华盛顿的决策者必须充分地认识到“当苏联确信不管何时何地，它都可以通过存心欺诈的行为（并且它总是有机会这么做）而不用承受任何损失，并能从这个协议里它能得到比自由世界更多的好处时，那么它是有可能接受[它并不存心执行的]谈判协议。”因此，文件警告，在任何情况下美国必须谨慎地对待谈判，“因为任何协议都是要予以实施

<sup>①</sup> 这一观点与杜鲁门在二战结束时所遵循的“强势谈判”原则相吻合。参看：Carol Bell, *Negotiating from Strength: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Power* (New York, 1963), pp. 3 - 33.

<sup>②</sup>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p. 77 - 78.

的,若没有监控机制并采取有效[预防违约的]对策,这些协议对于破坏它们的行为将无能为力”。<sup>①</sup>

这一原则进一步要求美国必须仔细考虑协议订立的顺序。比如,由于“核能控制协议将导致美国会比苏联裁减更多的军备,”那么,任何优先谈判“核军控”的安排都将损害美国利益。<sup>②</sup>因为一旦这种情况出现,文件预测,“战争爆发后,美国由于先前已经将自己的‘杀手锏’武器裁减,便不得不匆忙再行发展核武器。”于是,文件建议,“目前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将不得不既要坚持缔结控制非核武器和军备的协议,同时在对苏谈判[核军控]综合协议时,也要考虑其他要素,特别是在同德国、奥地利、日本缔结和平条约时,力求逐渐减弱苏联对其卫星国的影响。”假如,“与我们期望的正好相反,苏联接受了协议,保证对核能和常规军备进行有效控制,而其政策的本质却未有丝毫转变,我们将不得不极其审慎地考虑,是否能够接受这样的协议。”但是,文件重申,如果美国和“自由世界”能成功地建立并加强它们的常规武器装备,以至足以反抗或阻止苏联此类力量的进攻,那么,“我们将有更大的回旋余地,能按照任何顺序,同苏联就任何可以谈判的事宜进行协商寻求达成协议。”<sup>③</sup>

再次,文件承认,在建立美国和“自由世界”力量的过程中,有效地运作双边或多边谈判具有一定的“压制”作用。这一点在就德国、奥地利和日本“和约”的国际谈判中已经得到证实:如在构建遏制力量的过程中,“自由国家”能够将苏联排除在外,分别同德

①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78.

② 这一观点与杜鲁门在二战结束时所遵循的“反核扩散”原则相悖。参看: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06 - 115。

③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78.

国、奥地利和日本单独订立和约，以保证这些国家的战略资源用于对“自由世界”冷战政策的支持。同时，这样的协约“能使上述国家获得自由，受到充分的保障，并成为联合国或区域性国家联合组织一员”。当然，除非苏联在先期谈判中已表明自己决不会接受这样的条约，文件指出，否则将苏联完全排除在外而订立这样的条约将会非常困难。从谈判以及它与构建“自由世界力量”的关系这一角度看，文件明确地认为，“在地区范围内或更广泛的基础上，由自由国家建立起更紧密的国家联合[力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sup>①</sup>

文件断言，综上所述，尽管政治谈判“不是一个孤立的[外交]行为，而是可以赢得[国际]支持的手段，”但是必须认识到谈判的有限作用，即：“用它来支持建构力量的计划，在必要并可行的时候记录下冷战的进程；并可在帮助减少战争风险的同时，促进取得更大的成就。”文件标榜美国冷战的最终目标是“同苏联（或继其之后的国家）通过谈判来解决争端，并将[这一争端解决机制]作为实现和平的工具而赢得全世界的信赖”；然而，文件强调，“任何[通过谈判以]解决[国际争端]只能记载自由世界为了在世界上建立起一种成功的政治经济体制，最终完全挫败克里姆林宫统治全球的构想而做出的努力与成果，”仅此而已。<sup>②</sup>

## 第二节

### 在维持现状、回归孤立与实施战争之间

在确立了美国应该对谈判采取的基本立场后，NSC - 68 号文

<sup>①</sup>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79.

<sup>②</sup> 同上，第 80 页。

件转而对美国可能的其他战略选择进行对比分析。从其分析的排序,不难看出文件撰写者们与凯南所不同的价值取向。

NSC-68号文件的撰写者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美国有以下四种方案备选。它们是:(1)继续实行目前的有选择和重点遏制政策,并“执行为当前政策而制定好的或正在实施的所有计划”; (2)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样回归孤立;(3)立即准备实施战争;(4)尽快在实行目前的遏制政策的基础上“增强自由世界的政  
治、经济与军事力量,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以期实现在国家间确立可以接受的没有战争的有序状态,以及在自由世界遭到进攻时,为保卫我们自己而做好准备”。<sup>①</sup>

关于第一种选择(延续现行政策并实施为执行这些政策所制定的行动计划),NSC-68文件在“重温”了这些政策出台的国内与国际背景后,明确提出:美国应立即改变现行政策。文件之所以“反对延续现行政策”,是因为美国为了现行政策所做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外交诸方面的计划安排表现出明显的战略脆弱性。

第一,在军事方面,文件认为,现行的美国军事与国防战略“安排”,弱势非常明显。其主要表现两个方面。首先,尽管美国具有巨大的军事潜力,尽管它的实际力量在战后有所提高,但“在目前[战略]计划的制约下”美国现实的军事实力“较之苏联却处于下风”。同时,若将“自由世界”与“苏联集团”做整体实力比较,前者所处的劣势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战争将于1950年或未来几年发生,文件预测,“美国与其他盟国除了拥有强大的核打击力量之外,只能一面尽量拖延战争的进展,一面[匆忙地]准备实施反攻的力量”。此外,文件认为,若对保卫美国和它的重大利益及维持冷

<sup>①</sup> NSC-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76.

战主动权等一系列的要求与目前的力量进行对比评估，“便不难发现在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悬殊，并且这种悬殊正在不断扩大”。

其次，美国和“自由世界”其他国家现实的和潜在的军事实力，以及“自由世界”反对苏联进一步扩张的政治决心与意愿，“都未能迫使苏联从总体上减少对我们的压力，或使它放弃对冷战的主动权”。恰恰相反，文件指出，“苏联长期追求一种大胆的外交政策，只是当它通过试探行动发现自由世界反抗其侵犯的决心和能力时，才会调整其外交政策。”因此，“自由世界相关的军事能力正在走下坡路，同时将导致对抗苏联的决心衰退，结果美国和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由世界安全必将遭受威胁。”由于上述致命弱点，文件断言，在美国现行的和制定出的计划不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其现实和潜在的力量作为制止战争的威慑效果“将会越来越趋衰微。”<sup>①</sup>

据此分析，迅速提升美国国家战备的程度就日显重要。这不仅仅是为了军事上威慑苏联发动战争，也是为了支持美国其他方面的冷战政策，以扭转“自由世界”在国际关系中现存的危险趋势。文件强调，为了实现文件提出的长期战略目标，并使美国“免遭灾难”，美国军事与国防战略安排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增强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军事力量。文件认为，实际上，美国为增强自身以及其他“自由世界”国家军事力量的政治与机制基础已经存在。文件解释，“幸运的是，由于国会制定了政策，政府在组织和经济领域内也积极执行这些政策，美国军事机构已经得以发展成为一个统一且有效的力量。”这里文件所指的，是美国国会应杜鲁门政府的要求，分别于1947年与1949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案》以及《国家安全法的修正案》。正是根据这两个法案，美国重新整合了国防与军事建制。<sup>②</sup>因

<sup>①</sup>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80.

<sup>②</sup> 关于此点，参看：张曙光《美国对华战略思考与决策，1949—1979》（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9页。

此,文件认为,美国得以“最高的效率,用最为经济的方式”,迅速加强实力,并使之得以不断增强。<sup>①</sup>

第二,在政治方面,NSC-68号文件判断,美国为了构建“自由世界”统一战线的现行“国际政治运作”,也显得力不从心。依据从结果看措施的思维方式,文件认为苏联政治影响力的不断膨胀,是对美国现行的冷战政治运作失败的佐证。文件指出,“苏联在与自由世界的斗争中,一直都在争取主动权:它[成功]拥有的核能力,并取得在远东的胜利,使其[对外扩张的]信心不断加强,同时也不断增加西欧和自由世界其他国家的紧张与忧虑。”尽管无法确定苏联将如何更为积极地寻求冷战中的主动权,尽管无法确定其他“自由国家”对此做出反应的优势和弱点,然而,远东已经发出“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危险信号”,也有迹象表明西欧抗拒苏联的士气和信心可能衰退,如果任由“自由世界现已无法阻止苏联采取军事行动”所产生的疑惧扩散开来,那么,“自由国家抵抗的决心必将减少,以至它们将更急于寻求一种中立地位”,届时美国将成为对抗苏联与“共产主义集团”的孤家寡人。<sup>②</sup>

文件进一步认为,美国在国际政治运作上所处的劣势,倘若不及时予以纠正与弥补,其所包含的对军事和国防战略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将十分严重。文件断言,如果任由苏联与“共产主义集团”一味地发展壮大,那就必然“意味着美国——尤其是其他国家——将在总体上转为防御,或充其量在执行一种危险的、虚张声势的政策。”因此,NSC-68号文件指出,美国能否夺回冷战所需要的“强有力的政治主动权”,与“如何[尽快]集中目前存在的和马上可以投入使用的力量息息相关。”<sup>③</sup>

① NSC-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p. 80–81.

② 同上,第81页。

③ 同上。

文件分析,美国冷战政治运作的不容乐观,主要由于“自由世界”的现实力量与它所面临的威胁之间所表现出严重的不对称性。尽管“自由世界”拥有的经济、军事潜力仍远远优于苏联和它的卫星国,但“苏联实力及其通过政治运作所推行的扩张政策的阴影[却]沉重地笼罩在西欧和亚洲”,而“自由世界缺乏足够的手段——以现存实力的形式——制止[共产主义的]局部扩张”。由此,美国将不得不面临一个两难境地:面对苏联控制力的无限扩张,要么只能对一个局部危机作出全面战争的反应,要么只能选择无所作为。因此,文件推测,按目前的趋势继续发展很可能导致美国在苏联直接或间接的压力下逐渐撤退,“直至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已完全丧失了对我们具有核心利益地区的控制,结果必然是由于缺少必要的决定和行动迫使美国选择退回仅限于西半球的孤立主义政策之中。”即便美国退回西半球,文件指出,“即使持最乐观的看法,这个行动也只会带来短暂的休战,”最终,美国“或是投降,或是在处于最不利的地位,在最不利的条件下打一场防御战,以反对苏联帝国危及所有或大部分欧亚国家的安全”。<sup>①</sup>

第三,关于美国现行的对外经济援助政策,文件指出,尚不足以支持美国与“自由世界”的整体冷战政策。对此,文件断言,美国目前执行的对外经济政策和计划,将无法解决国际经济均衡问题,尤其是美元与其他国际货币存在巨大差别的问题,结果就是“无法在很多重要的自由国家中,建立起有助于[它们取得]政治稳定的经济基础。”文件认为,美国在这两方面的“无能为力”,具体表现在两个对外经济政策的实施上。首先,“欧洲经济复兴计划”,虽然成功地帮助了西欧恢复和扩大生产,成为“防止共产主义在西欧进行腐蚀、渗透的主要因素”,然而,在帮助西欧重新获得在世界事务中

<sup>①</sup>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p. 81 - 82.

发挥影响力的地位,使其影响与其潜力相对称这方面,几无建树。文件指出,若要在这个方面取得进展,就必然要求实施旨在实现西欧政治、经济和军事一体化的政策计划,而这样的政策计划均须得到美国和西欧国家的一致支持,并要求美国比预期的需要更深入地参与其中。<sup>①</sup>其次,针对拉美国家的“第四点计划”和其他援助项目,如果按照现在制定的内容,是不足以帮助受援国建立有效的政治、经济机制,也难以改善它们对自身事务的管理,同时无法使其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很多属于“中性国家”的现政权,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菲律宾,“将无法重拾或维持它们的权威,难以得到广泛的支持——除非它们能得到比起现在实施的计划更多的援助,否则根本无法更加快速地发展经济、改善社会结构。”<sup>②</sup>

NSC - 68 号文件认为,杜鲁门政府现在正在研究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以及美国可用来建立国际经济均衡的措施。从冷战的经济运作看,无疑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应该在政策考虑上予以最大优先”。然而,文件强调,“除非有一个同样富有远见和活力的政治、军事计划能与之匹配,对其进行补充,否则我们就无法成功地制止克里姆林宫的扩张,更不能迫使其退缩。”<sup>③</sup>

第四,至于外交,文件认为,美国所有为了通过谈判以缓和与苏冲突的努力,都由于缺乏实力的支撑而流于形式。简言之,文件

---

- ① 关于美国对欧洲的经援,参看: Michael Hogan, *The Marshall Plan: American, Britai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Europe, 1947 – 195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② 关于美国对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援政策,参看: Robert J. McMahon, *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ruggle for Indonesian Independence, 1945 – 1949*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The Cold War on the Periphery: The United States, India, and Pakist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③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82.

毫不讳言地指出,如果华盛顿继续执行目前侧重谈判的外交政策,“自由世界”就不能成功地利用其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潜力方面的优势,在各个国家间建立起可以接受的国际秩序;更进一步说,如果美国不能扭转目前冷战发展的被动局面,那么“自由世界”如今已经无法令人满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将使美国陷于“愈加不利”的境地。文件认为,这样的国际现实,妨碍了美国同苏联进行成功的谈判,因为“所有有关重要未决事务协议中条件的提出,将反映[实力对比]现状,这样对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其他国家来说,如果不是灾难性的,至少也是绝对无法接受的。”除非立即做出决定,采取行动以期在最广泛的程度上大力加强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力量;否则,“要想通过谈判,制定一个能为我们接受的解决方案,这不仅不会有多少成效,也可能会造成拖延以至极大地耽误我们采取必要措施以增强自身力量的时机。”<sup>①</sup>

基于上述四方面的分析,NSC-68号文件确定,继续“现行政策”的选择不可取。文件综述分析道,尽管美国现已具备在战争中对苏联实施强烈打击的能力,但目前的现实是,美国并未打算使用核优势,威胁和迫使苏联接受解决冲突的协议。如果没有这样的压力,苏联是不会自行撤退的。在这种前提下,对于任何“一揽子”解决方案唯一可以想象的基础就是,“建立并力图维持所谓势力范围和非势力范围”,而苏联对这种企望维持现状的所谓“解决”方法,无疑会竭尽全力使其利益最大化。鉴于苏联的构想就是要“统治全球”,因此,认为德国、日本或其他国家能通过保持中立从而在这个分裂的世界上得以立足的想法也是“不现实的”。<sup>②</sup>

NSC-68号文件对第二种选择——即“回归孤立”——明确地提出否定。文件指出,由于目前的冷战态势有利于苏联,美国国内

<sup>①</sup> NSC-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p. 82-83.

<sup>②</sup> 同上,第83页。

外有“声音”倡议，“美国从目前在欧亚的绝大部分军事[防务]义务中脱身出来，在西半球实行[传统的]孤立”。发出这种声音的，一方面是那些受到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势力影响的美国人。文件指出，在美国，“的确也存在这样一些人，他们主张对外小心谨慎，以便使我们不与外部干系过深”。虽然从表面上看，“把孤立作为一种行动方案还有其吸引人之处——因为它通过减少我们的义务，来使我们承担的义务与自身能力相一致，同时便于我们集中目前或者甚至是减少了的国防军费开支，用于美国自身的防卫。”另一方面，要求美国回归孤立的压力也来自美国的盟国。特别是美国的欧洲盟友，文件分析，他们提出这样的建议“并非源自理智而冷静的决定，而是由于美国没能采取必要的行动以使我们的能力与承担的义务相一致，而致我们被迫在压力下撤退。”除非这些国家的政府与人民“对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相信我们有决心在自由世界加速建立一个能够成功运行的政治经济体制，他们必将试图寻找别的‘解决方法’。”<sup>①</sup>

然而，NSC - 68 号文件认为，回归孤立的观点完全忽视了冷战状态下美苏间“战略能力”此消彼长的相互依存性。文件分析，倘若美国回归传统的孤立地位，极有可能要面对的是：“苏联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军事抵抗，就能迅速地占领大部分欧亚国家。”结果，“它将获得远远胜过我们的潜力，并进而迅速的发展这种潜力，以消灭我们的实力；因为它若想全力把自己的秩序强加到国际社会中，即使我们保持孤立，也依然对它的挑战和阻碍。”文件警告，到了那个时候，除了美国完全向它俯首称臣以外，再没有别的什么办法能使克里姆林宫消除对美国敌意。最终，回归孤立的选择“将令我们要么举手投降，要么孤军奋战，要么苟延残喘，只有招架之

---

<sup>①</sup>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84.

能,而无还手之力”。因为,彼时与苏联的力量相比,美国反击与报复能力都将不足为道,“除非我们将侥幸的指望苏联偶然犯了错误——过度扩张或其他原因,从而导致它从内部开始出现自发性的破坏”。<sup>①</sup>

文件进一步分析,主动选择孤立忽略了其将给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所带来的“难以估量的严重影响”。对这一严重影响,文件的描述是:首先,在苏联统治“自由国家”后,美国会因为放弃了以前的朋友和盟国而“深感愧疚并负有责任”;其次,当苏联动用欧亚诸国的资源,增强其军事实力,加大对自由世界安全的威胁时,一些美国人可能会要求政府接受克里姆林宫提出的条件以求“和平”,但更多人“会热衷于建立一个军事管理机制,以求允许我们把绝大部分资源仅用于防卫美国”;最后,如果此种情况发生,“我们国家的士气将会被泻尽,我们体制的完整性和活力也将遭到彻底破坏。”文件断言,其结果,必将是美国“不得不丧失一切重要的东西”。

文件认为,倘若美国回归孤立,也存在着美国大众要求对苏联实施“预防性”核打击的一种可能。在近乎绝望的条件下,很多美国人可能会支持对苏联及其控制的区域,通过使用大规模破坏性的现代武器,进行令苏联无法抵抗的突然打击,以此来彻底改变双方力量均势。然而,这种“可能”所带来的战略后果之严重,也是不堪设想的。文件分析,即便美国对苏实施所谓“预防性打击”的设想得到国内外的支持,苏联在我们发动这种进攻之前,似乎“不太可能就此坐以待毙”;即使苏联束手就擒,而且美国的核打击也取得了成功,在这样一场战争之后,美国为了重建国际社会可接受的秩序以及复兴那些曾多年受到苏联统治的国家与民族,也将面临

---

<sup>①</sup>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84.

着“十分可怕的任务”。正是由于“这些任务是如此艰巨，成功的希望是如此的渺茫，以至于理智告诉我们，必须用别的手段来达到我们的目标。”<sup>①</sup>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将选择战争——即第三种选择？对此，文件十分明了地予以否定。文件解释，所谓选择战争，也就是“一些美国人所中意的，在不久的将来使用战争方式来对抗苏联。”其目的，无外乎有三：(1) “以主动进攻谋求整体安全”的“预防性打击”；(2) 以军事打击惩罚苏联政权的对外扩张；(3) 以军事行动“抗击侵略与扩张”而警告其他“集权者”不得轻举妄动。

毫无疑义，倘若实行“预防性打击”，即意味着美国在美国或美国的盟友并未遭到苏联或苏联的卫星国攻击的情况下，对苏联采取主动的军事进攻。文件断言，对此，美国大众和国际舆论“显然不会轻易接受”。对战争选择的支持者，文件剖析，实际上“错误”地认为：既然现在苏联和自由国家事实上已处于战争状态，那么，“我们也就按战争状态行事”，特别当苏联在使用其全部军事力量方面仍存在着不足之时，美国就更应该采取果断的行动。另一些战争的支持者们则可能进一步认为，由于“自由世界”存在着除非处于战时的危机当中，否则无法动员资源用于战争的先天不足，只有果断地对苏实施预防性打击，才能“阻止苏联为了控制世界的扩张行动，最终迫其退缩”。尽管“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个强有力论述，”但是文件指出，凡持这种立场的人都“忘记”了一个现实，即“由于目前反对战争的呼声如此之强，自由世界则不得不表明这种[选择战争的]论调是错误的。”<sup>②</sup>

此外，文件认为崇尚战争的论调还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

---

①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84.

② 同上，第 85 页。

美国具备对苏进行一场全面战争，并能“为自由世界赢得决定性的优势”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文件明确地认为这个假设的前提“是荒谬的”，因为即便美国得以对苏使用武力，然而在目前，美国发动有效进攻行动的能力仍仅限于使用核武器；同时，即便美国对苏实施突然核打击，苏联也不至于被迫投降，“因为克里姆林宫依然能够使用手中的力量来控制大多数的欧亚国家。”其结果必然意味着美国陷入一场长期而又艰巨的斗争，而这场斗争“将破坏西欧的自由制度，使热爱自由的人民遭殃，而西欧的再生能力也将遭到致命的打击。”<sup>①</sup>

文件强调，从国际道义上看，不管苏联对外行为多么具有挑衅性，对它实施突然打击无论如何“都是令美国人民反感的”。虽然，“美国人民最终会统一起来支持这场战争，但是由于实施突袭造成道义上的负担和冲击，对我们的社会与制度都将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文件解释，因为，崇尚公正的“人们可能会对这是一场‘公平的战争’的说法表示怀疑，同时还会质疑我们是否曾诚挚地致力于制定和平解决方案的各种公平的可能性。”如果美国发动战争只是因为苏联是美国公开的敌人，这不仅在美国，而且在西欧，也会为这种战争的正当性和正义性产生质疑，而这种质疑将会在它们遭到苏联的占领之后演绎成对美国憎恨。其结果，即便获得“这样一场战争的胜利”，美国“很难在战后建立起令人满意的国际秩序”，而最终“我们将会一无所获”。<sup>②</sup>

通过对上述三种可能的选择做比较分析，NSC - 68 号文件的结论是：对冷战没有“轻而易举”的解决办法，唯有“通过稳定发展自由世界的精神和物质力量，以及将此种发展的影响力扩散到苏

---

<sup>①</sup>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86.

<sup>②</sup> 同上。

联世界,从而引起苏联体制内部的变化,以此来挫败克里姆林宫的构想,这才是确定胜利的唯一保证”。因此,第四种选择,即“增强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力量,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以期实现在国家间确立可以接受的没有战争的有序状态,以及在自由世界遭到进攻时,为保卫我们自己而做好准备”的遏制政策,成为 NSC - 68 号文件撰写者们的唯一选择。

### 第三步 “全面遏制”成为唯一的选择

在确定否定继续现行政策、回归孤立与实施战争的选择之后,NSC - 68 号文件提出了它认为最为“理性”,同时也是唯一的选择,既在“自由世界”迅速加强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以实现对苏联及“共产主义阵营”长期、全面的遏制。对此,文件明确提出,“在自由世界迅速加强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建立起比目前政策计划更大的信心,是唯一与实现我们目标相一致的一个行动选择。”

为了挫败克里姆林宫的“扩张”企图,NSC - 68 号文件在确立的“全面遏制”的前提下,提出美国政治、经济、军事的政策目标。其中包括:(1)要求美国在欧洲“自由国家内部建立起成功运作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以及反对苏联的强有力的政治攻势”; (2) 在予以政治、经济援助的同时,美国必须为这些国家提供“充分的军事保护,以便它们能够顺利[与安全地]发展”; (3) 美国应致力于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遏制苏联扩张的军事威慑”; (4) 此外,美国必须即刻“构建能够击败苏联或苏联指挥下有限或全面侵略的[联合]武装力量。”对如此庞大的对外安全“安排”,文件撰写者似乎并不担心美国是否有足够的能力与资源去实施,他们认为,“自由世界的潜力是极大的,其用来解决自身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智慧和意

志,将决定其发展军事力量的能力和反抗苏联扩张的意愿。”<sup>①</sup>

至于具体将如何实现上述政策目标,文件集中在军事与政治、经济两个层面做出较为详细的论述。

首先在军事层面,文件再次强调美国具备迅速提升常规军备水平的能力与可能,同时详细地描述了美国与盟国应该——也必须——承担的新形势下的军事使命,并提出如何尽快将两者有机结合的建议。文件指出,就美国的军事能力而言,“战略上是防御性大于进攻性,潜力大于实际力量。”诚然,根据对过去以及目前武器装备发展趋势的分析,美国与“自由世界”现在和将来都不会仅通过维持防御以取得“绝对安全”。文件强调,现代战争史表明,只有构建出“勇于进攻”的战略态势,美国才有可能接近对“绝对安全”的谋取。文件解释,“只有通过进攻才能做出[对全局]有利的决定,”“即使是[立足于]防御战略,并假设它是成功的,那么在军事动员和准备进攻之时,[美国]不仅需要防御力量以保住核心位置,同时要求拥有攻击力量以实现对敌人的反击,以求将其打乱。”因此,确立“防御”与“进攻”军事力量并重发展的原则,是美国“全面遏制”战略的基本要求。<sup>②</sup>

根据这一基本要求,NSC - 68 号文件提出,美国目前所必须具备的并即刻可投入使用的军事力量要满足两个最低限度需要:第一,支持美国对外政策的实行;第二,防止由于苏联突然袭击所造成的灾难性损害的出现。为了满足第二点要求,文件认为美国“现行与准备动员的武装力量”至少要能执行五项具体的“军事使命”: (1) 保护西半球和重要的盟国区域,同时确保它们自身的战争能力得以发展;(2) 在提供并保护军事动员基地得以生存、巩固之

<sup>①</sup>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p. 87 - 88.

<sup>②</sup> 同上,第 88 页。

时,动员与增强取得战争最后胜利所要求的进攻力量;(3)在执行进攻行动时,有足够的能力破坏苏联战争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打乱克里姆林宫的部署,直到美国和其盟国建立充分的进攻力量得以投入战场;(4)保护和维持交通枢纽与重要通道不受苏联破坏与控制,同时守卫对执行上述[进攻]任务来说必不可少的[前进与后方]基地;(5)向盟国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以便它们在实现上述进攻任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sup>①</sup>

文件进一步阐述,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上述军事使命要求美国及其盟国将“联合”军事力量增强到“在战争初期和在整个战争过程当中,至少对于完成这些任务来说应该是绰绰有余的,同时还要超过苏联及其卫星国所能动用的力量”的程度。从更为具体的方面看,美国与盟国重要的并不是发展与苏联具有一一对应的各种力量,而是要能在至少两个战略方向提供充分的军事保障:第一,在美国、加拿大遭到空袭时提供保护;第二,在英国、西欧、阿拉斯加、西太平洋、非洲、近东和中东,以及到达这些地区的交通枢纽与重要通道遭到空中或地面打击时,能提供有效保障。文件还要求,在增强实力的过程中,美国“必须要加速开发利用我国和盟国的科技潜力,以加大我们的技术优势。”<sup>②</sup>

无疑,对苏联的全面遏制,要求美国非常有必要拥有“大规模的”、“现行与时刻准备着的”军事力量。NSC - 68 号文件强调,如果仅仅只是“构建能够提供力量和实施军事动员的基地”,美国与“自由世界”根本不足以全面“威慑未来侵略者”。对此,美国应该从参加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中得出教训。因为,“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一战]最后的胜利者虽[证实]有能力赢得战争,但

---

①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88.

② 同上,第 88—89 页。

是却没能保持一支时刻准备着的战争力量以阻止[第二次世界]战争的爆发”。<sup>①</sup>美国与“自由国家”由于没有维持一支雄厚的、常备不懈的军事力量，而使得所有为了阻止“独裁者”的外交与政治行动都在没有战略威慑力量在支撑下，归于失败。重温张伯伦“绥靖主义”的教训，文件提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为了支持一个有力的政策，以制止克里姆林宫——并迫其放弃——对世界统治权的追求，[美国都应]脚踏实地快速增强自由世界的力量。”这种战略考虑，对避免可能更为惨烈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显得极为重要了。<sup>②</sup>

NSC - 68 号文件指出，这种战略考虑，就美国与盟国如何更有效地运作冷战而言，还显得万分紧迫。这是因为，美国和盟国目前不仅不具备“防御世界大战爆发”的军事能力，同时还没有为建立“一支现行的、常备不懈的、可用于抗击苏联局部行动的军力”做好任何心理上、物质上的准备。正是由于美国对立即着手建立一支能够全面威慑苏联的军事力量犹豫不决，美国的“盟国——尤其是在西欧各国——已经产生不安和焦虑”。文件分析，对西欧国家来说，全面战争首先就意味着苏联对西欧的全面侵占。因此，“除非我们的联合力量得到迅速增强，否则我们的盟国将越来越不愿支持我们强硬的外交政策，而渐渐渴望寻找别的出路——即使它们明白绥靖即意味着失败。”据此，文件强调，美国选择立即、全面、快速提升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优势就在于它的“心理冲击力”，即通过展示全面备战的决心与具体措施“有望恢复[西欧国家]对[自由

---

- ① 正是基于这个考虑，美国战争不在二战尚未结束前便秘密地开始设计战后如何保持军事力量，参看：Michael L. Sherry, *Preparing for the Next War: American Plans for Postwar Defense, 1941 - 1947*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②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89.

世界]将来的信心和希望”。当然,文件承认,美国任何一个提升力量行动方案的宣布,“都会被苏联在其和平运动中加以利用,并且对自由世界的一些区域产生不利心理影响”,但是,“也只有在我们的力量得到必要增强之后,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因此,文件建议,不管在宣布增强军事实力的政策之时,还是在采取必要措施当中,美国政府在对外宣传时“都必须强调[这些政策或措施]主体的防御性质,并竭尽全力以减少国内外不利的反应。”<sup>①</sup>

其次在政治和经济层面,文件建议美国也应立即动员所有可以动员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为有效实施对苏的“全面遏制”战略服务。

NSC-68号文件认为,在冷战中使美国重新取得主导权是杜鲁门政府“当前刻不容缓的目标”。这一目标实现的具体坐标,便是迫使苏联“进行自我调整”,如:主动“缓解紧张状况”,减少对“自由世界”的压力,并能做到“逐步撤军”。为了这些目标的实现,除了加强军事实力之外,美国必须通过政治、经济的手段构筑一堵针对苏联与“共产主义阵营”的政治防火墙。文件分析,这种防火墙的成功构造与长期存在,是美国实施“全面遏制”战略的一个“充分条件”。这是因为,美国独自提供增强实力所需的资源以及建立反抗的手段对美国是不利的,其他“自由国家”对长期实施冷战战略也必须担负起部分的责任,但这些国家承担负担的能力与决心却取决于美国自身力量的增强以及我们对外政治、经济政策的“充分性”。据此,文件提出,“我们非常有必要致力于对自由世界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改善。”<sup>②</sup>

文件指出,为了改善“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环境,美国的对

---

① NSC-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90.

② 同上,第90—91页。

外经济与政治运作起码应遵循两项原则。第一，美国应采取积极的措施，以减少克里姆林宫在苏联及其控制地区范围内外的影响和实力。目标就是在全球范围内致力于不受克里姆林宫控制的“友好政权”的建立。这个行动对于限制克里姆林宫的意图、打乱它的行动、迫使苏联相应提高资源消耗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换句话说，文件解释，就是以苏联冷战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第二，美国政府与人民应具备“勇于承担牺牲与风险”的精神。“一个旨在迅速增强〔盟国〕实力和改善政治、经济环境计划的实施，将对我们的勇气和才智提出极高的要求；这个计划将代价高昂，且充满了风险。然而任何三心二意的应付，或是半途而废的努力，都将使代价更加昂贵，并致危险更加恶劣。”因此，文件建议，政府在财政预算时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我们国家的独立正处于危险之中”，因此对为了国家安全目标的对外政治、经济投入再大、再多，都不为过。

为了挫败克里姆林宫的“扩张”企图，文件建议，美国在必要时应该设计一个全面的、具有决定性的，并能长期实施的对外政治、经济运作计划。对此，NSC - 68 号文件提出的政治经济计划包含如下十一项具体实施内容：(1) 为了实现美国的长远目标，建立一个完备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2) 用于军事目的开支出现实质性地增长。(3) 实际增加军事援助项目，旨在促成合作，并将以充分并有效地满足美国盟国的需要为标准。(4) 经济援助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长，同时确认有必要继续这些计划，直到实现它们的目的为止。(5) 在美国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上与盟国通力合作。(6) 通过实施经援计划，旨在令其他国家人民建立起对美国力量和决心的信心，并将这种信心持续下去；同时，从事公开的心理战，瓦解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忠诚；用其他方式挫败克里姆林宫构想。(7) 为了在经过选择的重要卫星国内煽动和支持动荡和叛乱，通过秘密手段，在经济战和政治、心理战领域内，加大准确和及时的措施及行动。(8) 增进国内安全，发展民防工程。(9) 提高

和加强情报活动。(10) 减少联邦用于国防和对外援助以外的其他(包括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开支,或将一部分这类计划推迟。(11) 提高联邦政府的税收。文件指出,作为这一计划得以成功的先决条件,首要的不仅是向国会领导人进行咨询,使该计划得到国会两党一致的立法支持,同时也要“向公众全面陈述目前国际趋势的实情和其中内涵。”<sup>①</sup>

文件承认,毋庸置疑,实施这样一个“庞大”的计划将要求付出很大代价,但若从长远的“利弊”角度看,此时付出的代价与将要避免的潜在风险相比,无论如何也是“利大于弊”。为了说明其“合理性”,NSC-68号文件撰写者认为“有必要”回顾一下它与消除苏联与非苏联世界之间潜在能力的不平衡状态。目前苏联将其可以利用资源的40%用于国防建设。出现紧急状况时,苏联能将这一资源配置额提高到约50%。美国目前只把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用于军事开支,而用于军工企业的资金几乎为零。此外,由于苏联的军事和民用生活水平极低,苏联在每美元开支上所获得的“战斗值”大大超过美国所得。但就如在二战中所做的那样,美国在紧急时刻能将国民生产总值50%以上的资源用于战争目的。<sup>②</sup>

此外,文件分析,若从经济总体角度来看,这个计划应该不会导致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下降,因为该计划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要比目前通过军事和对外援助投入来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效果更好。文件举例说,在美国的二战经历中,美国经济在开足马力运行时,做到了“既能为军用、民用消耗提供巨大能源,同时又能不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即便考虑到价格变动因素,从1939年到1944年间,美国的个人消费开支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与此同

---

① NSC-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91.

② 同上,第91—92页。

时联邦政府得以使用的资源总量也以每年 600—650 亿美元的速度(按 1939 年价格)增加。对苏联和美国经济实力比较的这种结果,同样也适用于苏联的“共产主义阵营”和自由世界之间的比较。<sup>①</sup>

文件认为这种比较再次佐证了这样一个事实:“自由世界”是否能成功地建立运作体制,关键不在美国与“自由世界”是否拥有经济实力,而在政治上是否有意志、有决心为了这样的目标心无旁骛地不断努力。建立这样的体制,同时也“要求自由国家与联合国的观念相一致,以期在结成更为密切的国家联盟问题上,取得更快的进展”。据此,美国的“奋斗”目标是要求看到“有一个职能增强了的联合国或其后继组织,而由于这样一个基于自由和公正的体制[的产生与完善],使得世界[有望]寻求和平和秩序”。同样,美国追求这种“与联合国一致的目标”,也“能在任何一地唤起自由人类潜在的精神力量,获得它们对这个积极计划的热心支持。”因此,这个旨在“构建和平”的计划,不仅仅只是为了挫败克里姆林宫的构想,还展望了未来美国引领世界发展的远景。为此,短期的牺牲将不足为道。<sup>②</sup>

对此,NSC-68 号文件表现出极大的信心。诚然,苏联在发展核能和其他能力的过程中,造成了对“自由世界”不断地迅速增加的威胁,但是美国与“自由社会”具有遏制“苏联威胁”的巨大优势与潜力。文件认为,目前,美国对苏拥有了令人担忧的核优势,加上美国和“自由国家”在其他武器装备上所具有的潜力,不仅能够阻止苏联的侵略行为,还为美国提供了一个与其他“自由国家”一道增强实力的良机,从而有力地“支持一个以挫败克里姆林宫的构

---

<sup>①</sup> NSC-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92.

<sup>②</sup> 同上。

想为目的的强硬的外交政策”。据此，文件重申，“我们目前努力的目标，就是在自由世界建立起成功运作的政治经济体制，并使这一目标实现得到充分的军事力量支持，足以延迟和防止灾难性事件的发生。”<sup>①</sup>

为了说明即刻实施“全面动员军事、政治、经济资源”以用于冷战的迫切性，文件至此提出一个对“苏联可能对‘自由世界’施以军事打击”时间表的判断：

考虑到苏联可能拥有的裂变武器和热核武器能力，  
尽管我们继续执行目前的各种计划，这种灾难有可能于  
1954年发生。<sup>②</sup>

但是，文件又指出，如果美国立即做出迅速有力的反应，这个灾难发生的日期将会被无限期推迟。因此，文件宣称，美国必须迅速做出决断，因为目前国际局势的发展趋势给与美国的时间很少；此外，在做出加强军事力量的决定前后，“如果我们拖延的时间越久，随之而来的战争风险也就越大。”<sup>③</sup>由此可见，文件撰写者所强调的战略紧迫性十分清楚。

#### 第四节 “全面遏制”的实施要点

经过长达数十页的比较分析后，NSC - 68 号文件的目的是将复杂的分析与论述归纳为“要点”，以便最高决策者对建议能“一目

①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92.

② 同上。

③ 同上。

了然”。从行文方式上,文件的“要点”衍生出此后在华盛顿决策圈内十分盛行的所谓“实施要点[Executive Summary]”。

“实施要点”的第一部分重申总统作为最高决策者对苏联拥有核武器“关切”的必要性。因为,综上所述,苏联拥有的裂变武器和潜在的热核武器能力,极大增加了其对美国安全的威胁;而这种威胁“与在 NSC-20/4(总统于 1948 年 11 月 24 日予以批准)中提到的威胁,具有同样的性质;然而[唯一不同的是]目前的威胁比那时估计的要更加紧迫”、更为严重。特别是美国现在面临着这样一种意外可能:“即在接下来的四五年当中,苏联将会具有发起突然核进攻的军事能力。”考虑到苏联突然发动核打击将产生巨大的震撼力与破坏力,文件断言,美国必须为可能的核战争做全面准备,其具体内容包括:(1) 在整体上不断地增强其空军、陆军和海军力量;(2) 加强发展核能力、军事防空和民用防空体系,以此来提升阻止战争的战略威慑力,并为承受核打击提供有力民防保障;(3) 发展并维持在战端开启之时对苏的第一次打击能力以及将持久实施战争直至战略目标实现的军事能力;(4) 在目前的紧急情况下不断致力于情报和可以用于军事的科技研发工作。<sup>①</sup>

然而,文件认为,苏联的核威胁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而更大的威胁则是来自克里姆林宫对美国以及整个“自由社会”长期、全方位的挑战。据此,NSC-68 号文件的“实施要点”的第二部分,强调 NSC-20/4 对苏联威胁的判断迄今“依然是正确的”。<sup>②</sup>在可预见的将来,对美国安全最重大的威胁来自于:“苏联深怀敌意的构想,已具规模的实力和苏联体制本身的性质”;实际上,苏联正进行

<sup>①</sup> NSC-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93.

<sup>②</sup> NSC-20/4, “U. S. Objectives with Respect to the U. S. S. R. to Counter Soviet Threat to U. S. Security,” 23 November 1948, FRUS, 1948, I : 667.

的政治、经济和心理战，潜在危险极大，它用除战争以外的手段，正在削弱美国在世界上与其相对的地位，破坏“自由社会”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机制。对此，“即便按最普通的常识推理，已足以使美国对此做出及时充分的准备。即使按目前估计苏联领导人可能不会发动直接针对美国的武装进攻，但也不能排除[克里姆林宫]发动[针对其他非共产主义国家]战争的可能性”；在现在和可预见的将来，一直存在着的战争危险会因三种原因出现：（1）苏联对美国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来保障自身安全的决心做出了“错误的判断”；（2）克里姆林宫“曲解”美国的对外政策意图；（3）华盛顿错误地判断了苏联对美国可能采取措施所做出的反应。

不管苏联是通过武装侵略，还是政治颠覆手段以取得对欧亚国家的潜力的控制，对美国来说，不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无法接受的。NSC-68号文件指出，不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目标的实现遭到妨碍时，七种重要内部因素将大大削弱美国应对战争危险的能力：（1）猖獗的谍报活动，颠覆和蓄意破坏；（2）被过度夸大的长期经济不稳定；（3）国家内部政治上和社会的分裂；（4）不充分的或是过度的军备和对外援助开支；（5）战略资源在和平时期的过度消耗或浪费；（6）在执行对外政策时，由于优柔寡断、姑息或缺乏技巧和想像力，或由于对全球责任的推诿，从而使美国的威望和影响降低；（7）苏联虚假的合作姿态使美国产生虚幻的安全感。<sup>①</sup>文件断言，毋庸置疑，来自苏联与“共产主义阵营”对美国与“自由世界”的威胁将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无与伦比，因此无法忽视。

文件肯定，美国和盟国为了应对“苏联威胁”，自1948年以来“已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为了更有效地应对苏联的全面挑战，

---

<sup>①</sup> NSC-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94.

“实施要点”的第三部分重申美国对苏的冷战目标：第一，“将苏联的实力和影响削减到一定程度，使其不再对和平、国家独立和世界大家庭的稳定构成威胁”；第二，“促使苏联当权政府的国际关系行为发生根本转变，使其与联合国宪章的目标和宗旨相一致”。<sup>①</sup>围绕这样的“主要目标”，文件进一步强调，美国“应该使用除战争以外的手段”，追求若干“次要目标”的逐步实现，其中包括：（1）促使苏联从其传统边界的周边地区逐步收缩，鼓励苏联的卫星国与莫斯科分裂；（2）促使苏联人民改变对待共产主义的态度，迫使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修正对外行为；（3）促使世界范围内拒绝相信所谓苏联“神话”，更清楚地了解苏联和苏联控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4）构建出一种能使苏联承认自己在现有理念基础上的所作所为是不受欢迎的国际环境。当然，文件指出，“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必须小心谨慎，以求不会长久地损害我们的经济、基本价值观和我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机构。”<sup>②</sup>

为了确保上述“主要”与“次要”目标的完全实现，NSC - 68 号文件在“实施要点”的第四部分将其所倡导的“全面遏制”战略分解成若干具体对外与国防政策操作的“要求”。它们包括：（1）迅速形成军事战备状态。以此在必要的条件下遏制苏联的侵略，并以此不可替代地支持美国对苏联采取的政治态度，同时也以此鼓励所有抵抗苏联政治侵略的国家坚持下去，以至一旦战争不可避免，它可成为支持美国做出的军事承诺和快速战争动员的坚实的军事基础；（2）保证美国国内安全，反对蓄意破坏、颠覆和谍报活动；（3）最大限度地发挥美国的经济潜力，建立起必要的物资储备，以备战时之需；（4）使“非共产主义”国家更倾向于美国，通过帮助这些国家增强经济、政治稳定性，提高军事力量，促使它们能

①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p. 94 - 95.

② 同上，第 96—97 页。

够并且愿意为美国国家安全做出重大贡献;(5) 对苏联的力量结构施以最大的压力,尤其是针对破坏莫斯科和其卫星国的关系的“楔子”工作不能放松<sup>①</sup>;(6) 使美国公众对我国国家安全所受威胁保持重复的认识与完全的理解,以便我们在采取相应措施时,能得到大家的支持。<sup>②</sup>

文件“实施要点”的第五部分,几乎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美国应该立即加强自身与盟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的必要性与迫切性。考虑到苏联目前和将来所具有的核能力,文件指出,“若按照现在的计划和方案,不管是在时机上,还是在范围上,我们所能采取的行动都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改变现状],我们在实现美国必需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方面,已无法取得快速的进展。”长此以往,对美国与整个“自由世界”的战略后果将不堪设想。“若任由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自由世界的力量较之苏联和其卫星国的力量将会严重衰弱。”之所以出现这个对美国极为不利的战略趋势,文件解释说,“与其说我们的目标中有错误,还不如说是由于我们目前执行的计划方案不够充分;[即便]这种趋势导致孤立倾向的出现,这并非是个出于慎重的决定,而是由于我们缺乏必要的基础以至在与苏联的冲突中难以掌握有力的主动权”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sup>③</sup>

由于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力量中心肩负着领导世界的重大责任,文件宣称,美国必须把“自由世界”的能量和资源组织起来,使它们加入到积极的和平计划当中,并从中获利;同时通过在自由

---

① 关于“楔子”思想,参看: Gaddis, *The Long Peace*, pp. 147 – 194; David Allan Mayers, *Cracking the Monolith: U. S. Policy against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 – 1955*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②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p. 96 – 97.

③ 同上。

世界造成一种态势，迫使苏联进行调整，以此来挫败它谋求世界霸权的构想。如果没有在美国领导之下“自由社会”的通力合作，“我们将不得不在[对手的]压力之下逐步后退，直到有一天，发现自己已经完全丧失对具有重大利益区域的控制。”为了避免这种情势的出现，“我们必须行动一致，迅速加强美国和自由世界其他国家的现实力量，以扭转这种不利趋势。”文件指出，无论以何种方法分析，选择全面提升美国与盟国综合实力都将意味着“付出高昂代价，同时还要牵涉到一系列重要的国内金融和经济方面的调整。”<sup>①</sup>

然而，文件强调，美国政府不仅需要制定“为了还击苏联威胁的纯粹的防御计划”，还要有一个“更为积极的计划”。后者包括：(1) 按《联合国宪章》的要求，“建立一个在自由和公正基础上的[国际]体制，以此实现自由和有序”；同时由“这个体制设计出一系列自由世界得以利用的政治经济措施，在军事盾牌的保护之下，用冷战战略来挫败克里姆林宫的构想”；(2) 由于“每一个有利于保护我们基本价值观和国家安全的因素，都要求我们实施冷战战略”，因此美国必须“增强军事实力以保持[对苏]威慑，最终实现我们避免战争的目标”；(3) 通过稳步发展“自由世界”的精神和物质力量，并将此影响扩展到苏联世界，从而引起苏联体制内在的改变，以致克里姆林宫的构想彻底失败；(4) 随时准备与苏联谈判。对于第四点，文件说明，任何谈判方案的提出，“不仅要与我们的目标一致，同时必须得到我们盟国的认可”。只有在这种前提下，“美国和盟国，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应该随时准备就符合我们目标的条件同苏联谈判”。<sup>②</sup>

---

①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p. 96 – 97.

② 同上，第 97 页。

尽管如此,NSC-68号文件再次强调,美国政府与公众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目前的世界局势是不利于我们同苏联进行谈判的”。由于任何“关于重要未决事务的谈判条件都将反映[实力对比]现状,”如果美国与“自由世界”在处于劣势的条件下与苏联谈判,其结果“对于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其他国家来说,即使不是场灾难,也肯定是无法接受的。”只有在决定开始加强“自由世界”的力量之后,美国才可以主动寻求谈判,以期促进克里姆林宫能在新的局势下愿意接受和解的进程。即便这么做没能成功,“克里姆林宫不愿接受公平的条件,或不信守这些条件”的事实,将“有助于自由世界统一认识,一致支持实施加强力量建设的必要措施。”文件强调,这样一个积极的计划,“是同我国的基本目标相一致的。[因此,]如果我们要夺回并保有主动权,如果我们要争取[冷战的]最终胜利,并在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其他国家中获得必要的支持和合作,那么,这个计划就必不可少。”<sup>①</sup>

总之,文件“实施要点”指出,美国必须通过迅速持久的加强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并采用旨在从苏联手中夺回主动权的积极措施,使苏联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由世界有决心、有能力挫败克里姆林宫谋求世界霸权的构想。”文件再次重申,这个计划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取决于美国政府、美国人民和所有的自由人民能否认识到:“冷战事实上就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自由世界的安危正处在危险的境地。”<sup>②</sup>同时,成功实施这一计划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包括:(1)向国会领导人进行咨询,这种咨询将使该计划得到国会两党一致的立法支持;(2)向公众全面阐释目前国际关系的现状及其含义。更为重要的是,这一

① NSC-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97.

② 斜体为作者加上,以示强调。

计划的具体实施,要求美国政府和人民“富有创造力和牺牲精神,并能由于此项工作的重要性而团结起来,坚持不懈,直至我们国家的目标得以实现。”<sup>①</sup>

文件“实施要点”的最后部分,是向总统杜鲁门提出就如何将此报告成为正式“政策文件”的“程序方面”的三点建议。首先,总统“接受上述结论”;其次,总统不断地监督、指导和督促“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在对实现我们的目标来说必要的基础上,切实实施这一结论提出的各项建议行动”;最后,在操作层面上,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各部门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其代表,以及其他应该参加的部门,组成一个经过调整并得到加强的参谋研究班子,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之下,提出供国安会讨论的具体合作计划。<sup>②</sup>

### 小结

无疑,NSC - 68 号文件所选择的美国冷战战略,实际上是一个全面、无差别遏制的战略。该战略不仅要求对苏联及其“卫星国”实施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诸方面的全方位的遏制,同时也要求美国为了构建与加强对苏的战略与常规威慑力以及政治、经济与军事的胁迫力,在可动员的战略资源上作出多方面、多层次的配置。

“全面遏制”战略的一个核心,是基于对冷战全面对抗“结构性”与“政治心理”的分析。由于美苏两军对垒使得国际政治“板块

<sup>①</sup>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97.

<sup>②</sup> 同上。

化”、“阵营化”，任何一方的“所得”便成为另一方的“所失”，这种“零和游戏”将决定双方不仅要全力守住“阵地”，同时也要力争“失地”。此外，“零和游戏”还将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己方的一国一旦“倒向”他方，如果未予阻止与争斗，必将导致己方的其他国家产生“大势所趋”的心理压力与政治判断，进而逐一或全面“倒戈”，其引发的“连带效应”最终将瓦解己方防线，使之愈发不可收拾。因此，任何一地出现“共产主义”挑战与“侵略”，美国与盟国都必须“全力以赴”地予以抗击。这成为“全面遏制”战略最为重要的“底线”。

显然，这样“不分轻重缓急”的战略思考与凯南基于现实主义、“特殊主义”的所谓“动态遏制”——即政治上“反集权”、经济上施与援助、军事上做“堡垒防御”安排——相去甚远，实际上是回归到了凯南以前的、已被凯南否定的“普遍主义”思维定律。据此，所有的“自由国家”或“非共产主义”国家相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都处于同一水平，已全然没有“至关重要”、“重要”与“次要”之分了。这种思维定律的误区十分明显：“全面遏制”要求全面动员资源，然而，何时、何处为终点？

其次，“全面遏制”战略的目标，并非只是求得国际关系“结构”的稳定与完整，而是对“对抗心理优势”的构建。若按传统的“现实主义”逻辑，只要通过外交运作与“联盟”建制使得“势力均衡”，任何一方“破坏现状”、挑起战争的可能性便可降至最低点。即便按照凯南“特殊主义”的遏制观，只要美国牢牢地控制住世界上主要“工业中心”，就能够保证“两极”下的国际局势稳定。显然，“尼兹们”认为这样的“安全安排”远不足以取得冷战的最终胜利。在他们看来，遏制的全面实现决定于安全上的两大“支柱”：第一为威慑，第二是“胁迫”，而两者能否产生“锁定的效果”，取决于是否拥有相对于对方的“政治心理”优势。进一步说，这样的心理优势主要依赖于两点：受遏制方对遏制方实施惩罚与报复的能力与决心的“可信度”以及遏制方对全力保护内部成员不受侵害的“政治信

誉度”。由于其核心是主观“认知”，而导致如何“认知”、确定“可信度”与“政治信誉度”则成为制约威慑、“胁迫”、进而遏制成效的关键。按此逻辑，对安全的“主观认知”要比安全的“客观存在”要重要得多。然而认知有“理性”与“非理性”之分，“误知”、臆断、错判的可能性根本难以排除。NSC-68号文件对“心理优势”的追求，很难避免“认知”错误的产生。

再次，“全面遏制”战略对美国联邦政府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的要求，也反映了制定者们战略思考的局限性。NSC-68号文件所设定的增幅是从当时军费占GNP总量的6%—7%涨至20%，而对这样大幅的支出增长，NSC-68号文件认为必须同时也可能在“非战条件下”、“丝毫不降低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增加税收负担”与“不导致长期收支不平衡”的前提下取得。若仔细分析，便不难发现NSC-68号文件的撰写者并未凭空想象出这样的“财政安排”设想，实际上是受到了当时十分盛行的“凯恩斯经济学说”的影响。按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论断，中央政府为了解决经济低迷的困难，完全可以通过在不增加税收的前提下增加“财政支出”以拉动消费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不必担心“财政赤字”，因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税收增加”最终必然导致“收支平衡”。要点是：与其考虑如何“分配蛋糕”，不如致力于“做大蛋糕”。<sup>①</sup> NSC-68号文件的一个创举则是提出美国工业制造能力完全有可能像二战期间那样得到“全面动员”。如果美国的经济潜力一旦得到“充分”发挥，区区20%的军费增长实在“不足为虑”。暂且不论“凯恩斯主义”的偏颇之处，只是探讨一下美国在“和平时期”做经济上“战争动员”的可能性，便可发现NSC-68号文件资源配置要求的“非现实性”。实际上，将国家安全战略的成

<sup>①</sup> 关于“凯恩斯经济学说”对杜鲁门政府的影响，参考：Alonzo L. Hamby, *Beyond the New Deal: Harry S. Truman and American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

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压在一个尚不能确定的“经济基础”上，其危险性是可想而知的。那么，文件对一个全面遏制战略实施的资源配置又是如何要求的呢？



## 全面遏制的资源配置要求

除了界定安全利益和所面临的外来威胁之外，国家安全战略考虑的另一要素则是描述自身所拥有的、国家可以动用的战略资源。这种资源既包括了现实的、目前已具备的，同时也涉及潜在的、未来可发展的能力实施既定战略。在设计长期国家战略与对外政策的意义上，后者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在未来可计划的范围内，国家如何对“公共资源”进行有效开发与配置。NSC - 68 号文件的设计者正是沿用了这个思维逻辑和决策程序，梳理了美国在冷战状态下对抗苏联已经动用的能力，分析了可以但尚未动员的资源，并为实施长期的遏制战略所必须配置的资源提出了要求。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分析资源的可动员性和必备性的？他们对资源的认知又是如何制约了全面遏制选择的确定？

### 第一节 美国实施冷战的政治资源

NSC - 68 号文件首先考察了美国自二战结束后为了国际安全总目标已经配置的资源，并将这些资源运用的实际效果，按照美国对外政策目的的具体要求，进行了评估。这一考虑和分析的初衷，是为了对未来资源配置的提出要求做逻辑上的铺垫。

由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卓越贡献”，美国在战后由一个区域性大国一跃成为世界性“超级大国”。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国际地位，NSC - 68号文件认为，美国对外战略资源首先表现在国际社会中政治上的影响力和心理上的号召力。值得强调的是，文件中所特指的这些能力，与冷战结束以后约塞夫·奈(Joseph Nye)所提出的“软力量[Soft Power]”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处。<sup>①</sup>

美国目前对外政策的总体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旨在促成美国制度得以生存和繁荣的世界环境的设计。”这种总体政策目标，NSC - 68 号文件指出，实际上要求美国抛弃孤立于所谓“旧世界”的国际体系的传统，转而积极融入全球社会。在文件的设计者看来，战后美国对外政策总体目标根本的变化，决定了美国政府必须长期致力于两个“辅助性”的政策：一是构建对美国安全利益有利的国际社会，二是遏制苏联“共产主义专制势力”的膨胀与扩张。对前者，文件解释，“即使没有苏联的威胁，我们也仍将执行”。因此，这两个政策“密切联系并相互作用。”<sup>②</sup>

为了这两个政策“目标”的实现，文件指出，美国战后依靠与运用最多的仍是所具备的国际政治影响力。在第一个政策目标的指导下，美国已经在充分地发挥和扩充政治方面的软性影响力，具体的方面包括：作为联合国的发起国，美国对这一国际组织如何在国际安全和经济发展等方面促进国际合作予以了强有力的支持；作为西半球的传统大国，美国继续“尽全力建立并在目前努力发

---

① 关于“软力量”，参考：Joseph S. Nye, Jr., and William A. Owens, “America's Information Age,”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2 (March/April 1996), 25 – 27; Joseph S. Nye, Jr., “Re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s,”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4 (July/August 1999), pp. 23 – 47; and “Soft Pow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9, No. 2, Summer 2004, p. 256。

②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54.

展的‘泛美洲’制度[Inter-American System]”；作为遏制政策的“行动基础”，美国正在努力“复兴西欧”；美国“绝大多数的对外经济活动”也是为了影响着国家社会朝“健康”的方向发展。文件指出，美国政府的这种选择，具有雄厚的国内政治基础，因为大多数美国公众对外部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在这个实力被‘极化’的世界上，旨在发展一个健康国际社会的政策，远比增强我们自身力量的政策更为要紧”。在这一点上，文件强调了如何更加“理性”地平衡国防建设和对外援助两方面的资源配置的必要性。<sup>①</sup>

为了第二个政策目标——遏制苏联——的实现，美国到“目前为止”无疑强调了对政治与心理力量的依赖与运作。做此选择的主要原因，NSC-68号文件指出，是遏制的内涵所决定的。文件解释，这是因为，非战时期的遏制是使用除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1）遏止苏联力量进一步扩张；（2）“揭露苏联推行其‘主义’的欺骗性”；（3）降低克里姆林宫的内外控制力和影响力；（4）“长期致力于在苏联制度内部培育出破坏的种子，至少使克里姆林宫改变政策，并最终接受通行的国际惯例。”文件确切地认为，为了推行这样一个政治遏制政策，“不管是在我们自己内部，还是在由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可靠的联盟当中，我们必须拥有总体优势这一点，过去与将来都应该是[国家战略的]首要位置。”<sup>②</sup>据此，文件指出，有效运用政治影响力对苏联进行政治遏制是美国能否最终成功、全面地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威胁的一个关键。

NSC-68号文件的撰写者明白无误地指出，美国所具有强大的、“综合性的”政治和心理影响力，足以确保政治遏制苏联的成

<sup>①</sup> NSC-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54.

<sup>②</sup> 同上。

功。文件接着论述了作为美国对外战略资源的政治影响力的各种表现形式。

表现形式之一，是美国价值观的“正当性”。文件指出，绝大多数美国人都相信，“激励我们社会的价值体系——自由、宽容、个人重要性以及理智高于意愿等原则——是正当的，较之于推动苏联行动的意识形态更为正当。”倘若要将美国价值体系的优越性转换成国际政治影响力，文件建议，美国应设法将这样的意识形态“转换成与其他民族人民生活相关”的话语体系，使“我们的价值体系或许能成为数以百万计的仍在权威主义里寻找着能够摆脱忧虑、困惑和不安的避难所的人们所追求的目标。”<sup>①</sup>

表现形式之二，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具有“团结人民”的内聚力。文件解释，事实上，美国式民主社会比苏联的“专制”制度更具有凝聚力。如果说“苏联制度下的团结一致是通过强迫、恐怖和恩惠等人为手段造成的”，那么，美国的社会稳定和团结则是基于通过国家所体现出的、由广泛民众所参与的共识，因此具有“稳固而又坚实的基础”。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在美国发生“暴力革命”的可能性远低于苏联和苏联制度控制下的国家和地区。<sup>②</sup>

表现形式之三，是美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强大感召力。对此，文件分析，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发展的能力，本身不仅“有力地支持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价值观”，并能够“向世界其他国家展示我们制度的活力和持久性”。具体地说，“我们世界观本质上的宽容，我们的慷慨大方，我们的积极进取，以及我们在国际关系中的不图私利，都是我们潜在的、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资产。”<sup>③</sup>

---

①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55.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 56 页。

尽管美国具有相对于苏联的强大的国际政治影响力,但是,NSC-68号文件撰写者们感到甚为担忧的是,美国的这些软力量,不仅在实际使用中未能做最大限度的发挥,同时“很多力量尚未具体实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苏联和“共产主义阵营”的国际政治影响力“远逊于我们和盟国的”,但是,莫斯科已经“将这些能力都[充分地]调动了起来,并几乎发挥到极致”。<sup>①</sup>

那么,为了全面遏制苏联的目标,美国在未来将如何充分地动员与发挥这些现存的和潜在的“软能力”呢? NSC-68号文件认为,华盛顿只有在国内外“坚定不移”地高举着“民主”与“自由”这两面意识形态大旗,方能取得政治上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威胁的成功。

NSC-68号文件认为,在国内,美国必须坚持已深入人心的民主制度。为此,文件建议,政府必须做到政务公开和透明。例如,将目前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状况的大量信息公诸于众,并保证它们真实可信,那样才能形成“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明智意见”。只要美国人民能够充分理解他们的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外来挑战后,才有可能与美国政府达成共识,而“共识将促成国家意志与决心的产生,以及对这种意志做出明确表达”。文件解释道,当然,通过“民主”的方法产生共识与国家意志力要比通过“独裁道路”更难,其原因在于:在寻求保护和实现个人权利的过程当中,“民主道路要求个人能理解、判断、积极参与”到日渐复杂的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当中;要求他能够“在通过自由言论来寻求真理时,知道何时应该信守原则,并将必要的容忍和必需的强制区别开来。”

然而,正是由于这些民主与自由的政治属性造成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脆弱性”。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文件强调,“人们的行为

<sup>①</sup> NSC-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56.

就很容易过头，思想就会过度开放，就会一相情愿地期待着罪恶的构想变成高尚的目的；坚持信念过了头就会形成对其他的可能视而不见；过度容忍也就容易滑入纵容阴谋的歧途”。特别在“面对行事秘密却行动迅速的独裁政府时”，美国政府的“脆弱性”不仅影响决策的及时、有效，还极易被对手利用。因此，文件建议，美国政府针对苏联的政治遏制“不应只在较小的优势范围内行动”，而是要扩大范围、全面入手。这是因为，“民主”国家“只有在获得[相对独裁政权]毫无疑问的全面优势力量时，才能够弥补它本身的脆弱性。”<sup>①</sup>

在对外发展与“非共产主义”国家发展“盟友关系”上，文件认为美国也应同样以“民主”和“自由”为原则。文件承认，“在同我们盟国关系的某些方面，”“[民主]制度本身的优点阻碍了我们[发展盟友关系]。”如果说莫斯科可以通过“强制”和“压服”构建“统一战线”，美国只能与盟国在“说服”和“赞同”的基础上发展关系。然而，这样的同盟关系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大有可能出现内部分歧甚至联盟破裂。据此，文件要求美国政府必须与公众达成四点共识。

第一，为了取得政治遏制苏联的最佳效果，美国必须利用国际社会中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一方面，要利用“自由世界内其他国家的整体力量”，因为这些力量是对美国自身能力的潜在补充。另一方面，要尽力利用苏联控制下国家的“潜在能力，特别是那些失去的只是苏联的束缚和压迫的人民的能力”。

第二，为了做到最大可能利用“自由世界内其他国家的整体力量”，美国必须将这些国家力量导向遏制苏联的方面。尽管“正如我们自身的力量超过苏联一样，自由世界其他国家的能力也大于苏联集团内其他国家的力量”，文件指出，但是这些力量“尚未能充分调动起来，以用于反对克里姆林宫构想的斗争中去”。之所以如

---

<sup>①</sup>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57.

此,是因为“自由世界”的这些国家缺乏联合的意识与信心,以及共同的目标。“即使是在自由世界中最有共同性、最为发达的地区——西欧,也存在这种情况。”

第三,为了最大限度地提升对苏联遏制的力度,美国必须动员所有“非共产主义”国家加入对“共产主义阵营”的全面遏制。如果美国能够通过“展示自己的实力、自信、道义感和政治方向”以激活西欧国家的反苏力量和激情,同样的效果完全有可能在拉美、亚洲和非洲等国家出现。起码,通过努力,那些地区的政治生态“将有一个极大的转变和提高”。

第四,为了取得全面遏制苏联的最终胜利,美国必须与“非共产主义”国家发展“盟友关系”,除此别无选择。文件强调,倘若美国犹豫不决,“自由世界的其他国家几乎是肯定要出现意志消沉,直至完全解除武装。”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这些国家“不仅会成为我们的负担,最终会使苏联的力量加大。”

文件最后强调,以美国为领导的“自由世界”的能力消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如何发挥领袖作用,或者如何登高一呼。如果美国最高领导人在动员和使用“政治资源”方面决策果断且得当,“不仅能在我国内部聚集起潜力,也会调动其他国家的内在潜力,并使这些力量为我方利用。”<sup>①</sup>

## 第二步 美国实施冷战的经济资源

NSC - 68 号文件指出,与美国政治、心理影响力相匹配的对外

<sup>①</sup>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58.

战略资源，无疑是美国“强大的”经济资源与工业能力。同样，文件试图说明：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对其“经济力量”<sup>①</sup> 国防与安全方面的运用程度与效率上，与其应该担负的“使命”存在着“巨大差别”。

差别之一为美国和西方国家与苏联“集团”战后经济的目标不同。美国经济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由世界”经济的现时目标，只是为了“提高[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苏联以及苏联控制的卫星国的经济发展目标是提升国家对外战略力量。因此，文件解释，美国军费预算只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6%—7%，而苏联为 13.8%。即便是“我们北大西洋组织成员国”，在 1949 年，只将生产总值的 4.8% 用于军事目的，远低于苏联“集团”用于军事发展的资源配置比例。<sup>②</sup>

差别之二是美国与苏联在经济资源上配置的侧重点不同而造成战备水平和战争动员能力的差异。由于美国二战结束之时便开始了实施经济转型（从“战争经济”转为“和平经济”），“与苏联进行一场战争的能力相比，自由世界战备状况在走下坡路；[如]在军用产品与设备的生产与分配上的直接投资少之又少。”此外，相对于苏联的军事动员力，美国“接受军事训练的人也很少，武器生产率也不高”。再者，相对于苏联的军事能力，美国与西欧的盟国均存在一个直接与战争胜负相关联的重要问题，“即一旦战争发生，我们是否有时间动员我们处于优势的人力、物力资源投入战争。”<sup>③</sup>

文件认为，上述差别的存在，主要由于双方决策者对经济资源配置于国防与对外战略的认知和意识的不同，并非出于资源水平

① 关于杜鲁门调整“经济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方面的设想，参看：Lloyd C. Gardner, “Economic Foreign Policy and the Quest for Security,” in Norman A. Graebner, ed., *The National Securit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1945–196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76–102。

② NSC-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58.

③ 同上。

的差异。实际上,只要美国领导者认识到动员一切可动员的经济资源用于支持对苏联的遏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美国决不会因为增强军事实力、协助盟友的军备重整而导致美国自身经济和工业生产能力的弱化。在文件撰写者看来,对美国经济资源运作的唯一限制在于决定如何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一旦政府能够取得“公众的理解和意愿”,一旦政府能够获得“用于应付财政赤字的援助的能力”,那么,即便是西欧也能将资源的较大部分用于国防与安全。

为了阐明这一观点,NSC-68号文件对“东西方”1949年用于投资总和、国家防务以及消费品的资源总份额进行了统计分析。分析指出:苏联1949年用于工业投资的总额为25.4%、国防为13.8%、消费投资为60.8%;苏联的卫星国1949年用于工业投资的大约22%、国防为4%、消费投资为74%;与其相比较,美国1949年用于工业投资的总额为13.6%、国防为6.5%、消费投资为79.9%;美国的北约成员国1949年用于工业投资的为20.4%、国防为4.8%、消费投资为74.8%。基于以上统计数字,文件得出结论:美国以及主要盟国动员经济资源用于军事、安全目的的空间,较之苏联要广阔得多。这是因为,“现在苏联将可利用全部资源的近40%用于军事目的的投资,其中很大一部分用在了军工企业上;同时据估计,即使出现紧急情况,苏联也无法将这一数字提高到超过50%,也无法以25%的幅度增长”。而另一方面,美国仅把大约20%的资源用于防卫和投资(加上对外援助则为22%),而且投资也极少用在军事工业。在紧急时刻,“美国能动用超过50%的资源用于军事目的和对外援助,或使投入增加到目前数量的5到6倍。”这个事实的本身,便说明了美国在经济资源方面拥有“潜在”的战略优势。<sup>①</sup>

<sup>①</sup> NSC-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59.

为了更进一步说明美国这一优势,NSC-68号文件还试图比较美苏双方对主要战略物资的军事使用率。据其分析,苏联目前把钢锭生产总量的14%、原铝的47%、原油的18.5%用于军事目的;而美国使用的“工业原材料”相应比例分别为1.7%、8.6%和5.6%。对这些材料,除了苏联比美国的产量要小很多之外,其用于军事目的的资源实际消耗量也远远高于美国,比如钢几乎是美国的2倍,铝则要多用8%—26%。<sup>①</sup>

NSC-68号文件关于经济力量的第三方面比较,是对“东西方”整体经济实力,以求“更有说服力地表明,自由世界明显比苏联集团具有更大的经济优势”。第一个指标为人口。根据统计,1948—1949年,西方国家的人口总数为3.22亿,其中美国为1.49亿,欧洲“北约”国家为1.73亿;苏联“集团”为2.73亿,包括苏联的1.98亿和东欧国家的7500万。为了说明不同的工业化程度,文件指出,美国的非农业人口比例为45%,比苏联的31%要高。第二个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西方的GNP总值为3740亿美元,苏联“集团”为860亿美元,而美国的2500亿的总数要比苏联650亿的总数高出3.8倍。此外,就人均国民收入而言,西方的1700美元是苏联330美元的5.15倍。第三个指标为主要工业原材料的产量。1948—1949年间西方国家共生产汽车5853000辆,其中美国生产5273000辆,而苏联只生产525000辆;西方国家共生产水泥5600万吨,其中美国生产350万吨,而苏联只生产100.5万吨;西方国家共生产钢11200万吨,其中美国生产8000万吨,而苏联只生产2500万吨,苏联及其东欧国总和仅为2800万吨,只是美国的29%;西方国家共生产生铁7900万吨,其中美国生产5500万吨,而苏联只生产1900.5万吨;西方国家共生产

---

<sup>①</sup> NSC-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59.

原油 27 800 万吨,其中美国生产 27 700 万吨,而苏联只生产 3 500 万吨,苏联及其东欧国总和仅为 3 890 万吨,只是美国的 14%;西方国家共生产电力 4 800 亿千瓦时,其中美国生产 3 560 亿千瓦时,而苏联只生产 820 亿千瓦时,苏联及其东欧国总和仅为 1 120 亿千瓦时,只是美国的 27%;西方国家共生产煤 88 800 万吨,其中美国的产量为 58 200 万吨,而苏联只生产 25 000 万吨。<sup>①</sup>

为了说明美国相对于苏联的经济优势,文件还试图阐述,美国能够在取得工业产量绝对增长,并由此增强其自身和盟国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同时,而不致使目前的生活水平下降。文件所依据的“事实”是:在 1948 年第一季度和 1949 年第四季度之间,美国国内工业品产量以 10% 的幅度下降;1944 年和 1949 年间大约以 25% 的速度下降;较之于 1943 年、1944 年的 107 万和 67 万失业人员,至 1950 年大约有 475 万失业者。国民生产总值从 1948 年达到顶峰时期(1948 年为 2 620 亿美元,在 1949 年下半年则为 2 560 亿美元),到 1949 年开始缓慢下降。1944 年和 1948 年间,就固定价格而言,则已大约下降了 20%。

正是由于美国“高水平的经济活动”能力,文件预测,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很快就能达到每年 3 000 亿美元。由于美国经济总量与质量的“高速增长”,文件强调,政府完全有能力“致力于美国和自由世界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强”,而军事力量的加强也会对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更进一步讲,只要能实现经济飞速增长,“我们将无需降低国民生活水平以使力量得到增强;因为可以从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加值之中抽出一部分,便可获得所需资源”因此,文件强调,“在考虑美国所能采取的[战略]行动时,这些因素都是极为重要的。”<sup>②</sup>

---

<sup>①</sup>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p. 60 - 61.

<sup>②</sup> 同上,第 61 页。

那么,美国如此明显的经济优势与潜力将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对苏联的全面遏制战略呢? NSC-68号文件指出,首先,对外经济政策——即使用所谓经济武器<sup>①</sup>——是运作美国对外关系一个主要的手段。现代外交实践表明,经济武器能按照有利于本国安全和福利的方式,有力地影响世界环境,当然,“如果对这种手段考虑不周或使用不当,则会危害到[国家]利益。”文件认为,使用经济武器,是一种特别适合于美国能力的手段,是美国实现安全和发展的国家目标所必不可少的;同时,它还是一个极适合于冷战状态的手段。

文件说明,其次,美国对盟国与“非共产主义”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是“反抗颠覆和侵略意志和力量”的最基本、最具“决定意义”的手段之一。正是由于“在挫败克里姆林宫构想的计划中,一个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在自由国度中发展成功运作的[政治经济]体制”,因此,冷战以来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就是为了帮助在“自由世界”中建立这样的制度和条件。这个政策的具体内容包括:(1)通过欧洲经济复兴计划帮助欧洲复兴并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经济;(2)给予日本、菲律宾和朝鲜的援助,以及由进出口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印度尼西亚、南斯拉夫、伊朗等国提供的借贷;(3)通过“第四点计划”为发展落后地区提供借款和信贷;(4)对北约成员国以及希腊、土耳其等国提供军事援助;(5)在东西方贸易中,限制向东方出售具有军事重要意义的物资;(6)购买和储备战略物资;(7)通过关贸总协定国际贸易组织计划、互补贸易协定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与发展银行IBRD等计划,致力于重建一个基于多边贸易、关税壁垒降低和货币可自由兑

---

① 关于经济武器在冷战中的运用,参看: Shu 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 ~ 1963*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apter 1.

换的国际经济。<sup>①</sup>文件指出,从眼前和长远的利益上看,这些政策计划“均意在增强自由世界的[国家]能力”。除了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一致和不协调之外——如美国收支平衡问题,文件认为,“从总体上讲,美国在实施一种有力支持其全部目标的对外经济政策。”但是,作为最高决策者无论如何都需要重视的一个问题是,“在考虑到各种不同需要与突发情况时,现行的和目前正在制定的计划,是否在将来能充分支持这一政策”的继续执行。<sup>②</sup>

文件显然对华盛顿目前与未来就如何重视对经济武器使用所接受挑战的能力不甚乐观。尽管在经济领域去年不是双方力量较量决定性的一年,但是,苏联在将东欧卫星国的经济“整合”到本国经济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相比之下,“自由国家”——特别是西欧各国的——经济恢复仍面临着十分严重的问题。因此,文件认为,在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上,双方在过去的一年中很难宣称比对方拥有更大的优势,然而,“未来发展趋势如何”便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对此,文件列出八种冷战态势可能的发展趋势,以供最高决策者在考虑配置经济资源时予以参考。

再次,文件指出,苏联和其所控制的卫星国的“备战”状态,与自由世界的“非备战”状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如果美国和其主要盟国不迅疾改变政策方向,现存的反差将日益扩大。实际上,关键之处是美国和“自由世界”改变雄厚的经济资源培植的方式,即“自由国家”是否有决心如苏联那样将资源的较大部分用于国防建设,特别是涉及军事力量的部分,否则苏联的军事力量的“绝对”增长率仍将高于美国。文件的这一判断主要源于 5 个分析依据。

依据之一,“共产主义”将继续在“边缘地区”扩张。文件认

---

<sup>①</sup>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p. 62 – 63.

<sup>②</sup> 同上。

为，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加上南亚和东南亚其他区域的政治经济状况，“都为共产主义在这个多事之地的进一步入侵提供了跳板”。尽管苏联可能会由于援助“共产党中国”而给自身的经济增加一些负担，但克里姆林宫决不会对处于边缘地区的非共产主义国家所面临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可能为共产主义扩张提供便利的机会视而不见。美国和“自由世界”与苏联在边缘地区的争夺已经处于劣势，如果不改变现行的“重点遏制”政策，这种劣势将继续下去。

依据之二，“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的发展势头仍然未能得到全面遏制。文件分析，如果任其放任，“自由世界”在“核心地区”的优势也将被打破。苏联在欧洲——主要集中在德国和奥地利——已经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如果它巧妙地利用这种地位”，那就会极大危害西欧经济，使得一些特定的国家很难继续“保持其倒向西方的努力”。结果，莫斯科将加速将其所控制的卫星国的经济与军事资源纳入苏联的体系，使得“共产主义阵营”的一体化将大大超过“自由世界”的同盟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南斯拉夫铁托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行为，莫斯科认识到了加强控制“卫星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据此，文件分析，苏联必将加速将其卫星国经济纳入自身经济与军事体系之中，从而提高受其控制下的地区与苏联的相互依存程度。<sup>①</sup>

依据之三，尽管西欧经济在美国的援助下恢复很快，但是一旦美援减少，西欧仍无法达到满意的发展水平。根据文件撰写者的分析，西欧由于经济一体化进展缓慢，使得大部分生产率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得到提高，以致无法“提供有利于政治稳定的经济环境”。例如，一体化进展不够快，以致无法给联邦德国提供在西方

<sup>①</sup>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p. 62 - 63.

的经济发展机会。文件特别指出,英国的经济困难已经成为制约美国冷战战略的瓶颈口,而解决的办法是,要么要求英国克服政治上的困难而降低其生活水平,要么提供比预期更多的美国援助。美国“全面遏制”苏联的战略不仅要求英国能够继续保持英联邦国家的稳定、在南亚或东南亚成为抵抗共产主义扩张的中心,还要求英国提高国际地位、协助美国构建西欧防卫圈。

依据之四,尽管亚洲目前存在着不少还算温和并认同美国冷战目标的政府与政权,但是,如果美国不加强对这些政府的支持,它们的稳定性也将十分不确定。文件认为,美国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予以援助只是一种手段,其重要目的“是给予亚洲人民在本国政府统治下提高生活水平以极大的希望”。但只是施以经援远远不够,更重要的在于施加政治影响,例如促使它们“加强中央机构,改善经营管理,发展完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以保证在这个结构中,亚洲人民能更有效地利用它们庞大的人力、物力资源”。

依据之五,文件强调,由于美国对外援助的不断扩大,相当数量的受援国对美国由于国内财政压力而将逐渐收缩对外援助的可能表示担忧甚至失望,继而对美国能否在这场对苏的冷战中保持优势产生怀疑,结果有可能重新审视各自的“追随”选择。文件分析,出现这种趋势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从一开始就“过度乐观地估计[我们经济的]总体规模与持续时间”,一旦现实与他们的臆想产生偏差,他们难免不会“对[我们]加强自由世界作为对抗政治激化的冷战的办法的理性与否表示怀疑”。<sup>①</sup>

最后,文件的撰写者强调,他们“有根据预测,在未来几年的时间内,除非政府能出台比目前实施的计划更为积极的方案,美国和

<sup>①</sup>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p. 62 - 63.

其他自由国家将经历经济活动上的严重衰退”。这样的衰退将令美国的全面遏制苏联的战略与政策遭受严重挫败。<sup>①</sup>

NSC-68号文件对上述“趋势”分析，似乎有危言耸听之嫌。的确，如果从字里行间深入探视撰写者的心理，不难发现，他们重墨强调只有一点：美国“目前制定的[政策]计划远不能满足自由国家的需求”。他们指出，造成困难的原因，“不仅在于政策不充分或是存在误导，同时也在于[政府]为了达到目的所制定的政策在出台时间与影响力[把握]上的不充分。”而说明“优势”与“危险”的目的，文件强调，是为了“让我们重整旗鼓”，重新配置美国的对外经济资源，“以扭转目前的趋势和实现我们提到的基本目标”。<sup>②</sup>

### 第三节 美国现实的与潜在的军事能力

显然，国家为了国际安全目的所设计的长期战略，不得不考虑军事方面的资源与能力。对此，NSC-68号文件自然不惜笔墨。值得注意的是，文件尽管用了较大篇幅论述美国对外的政治、心理与经济影响力，但其立意的重点则是：尽管与世界上任何单个国家相比，美国拥有最大的军事潜力，但大规模发展军事力量，仍应成为在冷战状态下实施对苏的全面遏制战略的重中之重。

有趣的是，文件将分析的重点放在美国较之于苏联的四个方面的军事战略劣势。与苏联相比，首先，美国所具有的军事弱点包

① NSC-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p. 63–65.

② 同上，第65页。

括现存力量和总人力方面数量上的劣势。其次，在现存力量处于弱势的同时，美国还缺乏一个在战时可以利用的永久性战略基地，“以便于运用现存的和即刻可以使用的军事力量和武器装备”。再次，尽管美国武装力量确实比以往任何和平时期都强大，然而“我们拥有的军事力量与我们承担的[全球防御]义务是极不相称的”。文件指出，如果将“力量”与“义务”联系起来考虑，并以世界局势的变化权衡美国的军力，“我们的军事力量就变得极不充分了。”最后，如果战争会在 1950 年打响，尽管美国和盟国军事上仍然能够保护在英国、近东和中东的重要军事基地，并“有能力对苏联制造战争能力的若干关键点实施强有力的空中打击”，然而与苏联相比，“我们目前具有的各种有效力量和物质资源限制了[美国]行动规模”。<sup>①</sup>

尽管存在着这些劣势，文件转而强调，如果美国和盟国得以迅速有效地发展潜在的军事力量，那么就能够以展示足够的力量来威慑战争。或者退一步说，即便苏联选择了战争，美国和盟国迅速发展的力量也足以抵抗苏联最初的进攻，对其进攻行动实施牵制，同时准备战略反击，以期对苏联的战争能力造成更大的压制力。文件提出，若从军事角度看，“这将不仅要求[美国]具备必要的军事力量，同时还要开发和储备各类先进武器。”为了满足上述要求，文件分析，在目前冷战的条件下，美国还需要二到三年的时间来提升军事力量当中“硬件”力量；但是一旦出现紧急状态或处于战争边缘的情况下，美国就必须具有在更短的时期内通过实行全国力量总动员增强这种力量。文件认为，任何和平时期军事力量的增强，都应同以下三个方面联系起来考虑：一是在战争中这种力量的军事作用；二是美国推行的对苏联当前和长期外交政策；三是当时事态的实际情况。基于这种考虑，文件的结论是：如果美国迅

<sup>①</sup>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65.

即提高军事力量,那么就有能力消除军事力量和面临的紧急状况两者间的失衡状态,最终获得冷战的主导权;“即便在战争中无法完全阻止苏联进攻,但至少也能极大地延缓其进攻行动。”<sup>①</sup>

为了说明“立即发展军事力量”的迫切性,文件再次不厌其烦地阐述美国目前所面临外来“危险”的严重性。首先是“普遍危险”。其中包括:(1)美国“制度的完整性和活力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即使没有苏联,“自由社会”也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即在这个不断缩小的世界里,国家间的无序状态已经越来越无法让人忍受;[加上]克里姆林宫试图将它的秩序强加到世界各国头上,其结果必然使我们的自由和民主制度遭到破坏”; (2)苏联拥有核武器这一事实,又为克里姆林宫“基本构想与企图注入新的力量,增大了对我们制度的威胁”;这种情况无疑也给目前世界上“存在的令人不安的没有秩序的失衡状态增加了新的压力”,使人们对“这个世界是否能长期忍受紧张状态而不至于只按某些人的意愿建立起某种秩序”产生了新的怀疑;(3)对任何一个“自由社会”来说,从来就不可能取得彻底的胜利,“因为我们还从未完整地获得过自由和民主,只是一直都处于对其追求的过程中”;但是,“如果被集权主义者所打败,那么[我们的]失败将是彻底的。”因此,在这个两极分化的世界上,就如何有效地应付这些危险,“我们面临重重困难”,以至于“最终根本没有选择”。<sup>②</sup>

其次,文件指出,美国与“自由社会”还面临着十分“具体的危险”。这些危险表现为:(1)从苏联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克里姆林宫“很明显地想通过冷战方式来达到统治自由世界的目的”。莫斯科比较擅长的方法,“是通过渗透和威吓来达到破坏的目的”,因而,美国“社会当中的每一个组织机构都是它破坏并使之成为对我

①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p. 65 - 66.

② 同上,第 67 页。

们不利的工具。而那些直接制约着我们物质与精神力量的组织便一定是其实施破坏的主要目标,其中包括工会、市政机构、学校、教堂和所有能影响公众意见的媒体”。共产党“破坏这些机构的目的并非只是迫其为苏联服务,而是导致其停止为我们服务;同时使它们成为我们经济、文化和政治体内部混乱的根源”。(2)由于美国的价值观所决定的、作为自由体制优势一部分的多元性,加上自由体制所特有能使自由人民享有的各种权利和特权的弱点和问题,以及“自由世界”在二战中所受到的破坏,所有这些都为克里姆林宫“进行它邪恶事业”创造了机会。然而“自由社会”由于受到原则、良心和自责的限制却无法对其实施“同样的”报复手段。(3)只要自身不受损失,克里姆林宫决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能使我们国家、制度、目的或是手段遭到耻辱”的机会。比如,苏联曾对美国在二战的初始阶段为了一己私利只为“自由世界”提供军事援助而隔岸观火予以猛烈的抨击,而现在又对美国“充分发展自身和盟国军事力量”予以严厉的斥责,其目的无外乎损害美国的国际形象。(4)苏联却正在试图获得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以便通过对所有“非共产主义”国家进行威吓以达到政治渗透的目的,同时竭力向自由世界表明:“力量和使用这种力量的意愿,是掌握在克里姆林宫手中的;而那些缺乏力量的国家,则命中注定般地无法逃脱失败和衰微。”为此目的,苏联在局部地区既是威胁,又是出兵侵占,极大地“加剧整个自由世界的忧虑和失败情绪”。(5)由于双方都拥有核武器,且互不信任,美国和“自由世界”因此而遭受突然进攻的可能性加大。特别是,当莫斯科“充分意识到了我们未必会发起一场预防性的战争”,苏联通过冷战“用更为凶暴残忍的手段来执行它的计划的可能性也加大了”。此外,由于它断定美国除非遭到直接进攻否则不愿陷入一场核战争,苏联就更有可能以蚕食的手段侵略其他地区。(6)对美国安全的威胁还“由于我们没有致力于阻止[威胁]的努力,对威胁只是长时间拖而不决,无法采取一切必需的措施来维持我们制度的完整性和活力”,以至一旦出现战争的危险,

由于美国的盟国丧失决心和信心所造成的危险性就更大了。<sup>①</sup>

据此,文件强调,一个“由于过迟、过少地采取行动而造成了充满怀疑和相互指责的下降螺旋趋势”,可能给美国政府留下的战略选择和操作余地“更为狭窄、更令人绝望”,而这个潜在危险才是美国面临的所有危险中最大的。因此,文件建议,迅速发展美国和盟国的军事力量,只是向克里姆林宫表明:“对于所有这些我们无法守住的核心地区,如果受到攻击,都只能引发一场全球毁灭性的战争。”文件撰写者这里所建议的,不仅是全面政治遏制,而是全面军事威慑。除此之外,他们认为,美国“没有更好的选择”,因为其他的选择要不就有条件地投降,要不就发动全球战争。文件分析,造成这种“糟糕局面”的原因,是美国的领导人“正处在犹豫不决和绝望的边缘”。美国的国家利益要求“我们必须赢得这场冷战”,美国的基本目标要求政府“将这场冷战放在第一位”。<sup>②</sup>

文件承认,要求美国立即着手发展军事力量“也隐含着风险”。因为这意味着“要求美国人民做出巨大的牺牲和自我克制”,要求“他们将不得不放弃一些与他们的自由密切相关的利益”。此外,即便他们被迫在未能充分地理解和平时期发展军事力量的重要性的情况下放弃自身的利益,文件认为,美国政府将面临的危险会更加严重:为了强迫美国人民做出牺牲,“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些可能危及我们制度完整性的措施”,以至危及美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sup>③</sup>

因此,文件宣称,重要的不是美国是否具有潜在资源去发展军事力量,而是美国领导人与人民是否有意志、有决心在和平时期利用潜在的资源发展军事力量。尽管在美国形成这一意志过程中的任何时刻克里姆林宫都可能会“决定发起一场全面战争或使用过

---

①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p. 67 – 68.

② 同上,第 68 页(斜体重点部分为作者加上)。

③ 同上。

度的手段来考验我们”,“但是比起我们力求避免的那些危险来,这些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这里,文件撰写者所强调的不仅是美国是否具有威慑战争的实力,而是美国的领导人和公众是否明确表达使用实力的意愿。在他们看来,即便拥有实力,但“缺乏使自身强大的意愿”,美国仍然无法达到威慑苏联发动战争的目的,反之,甚至会“鼓励”莫斯科选择战争。至于有人会认为“即使我们还不够强大,但同样能够保护自己”,文件的批驳是:“在历史上,是没有任何人只是以证明无碍于自己的敌人,便能够保护自身自由的。”<sup>①</sup>

为了威慑苏联,文件也强调,不能仅依赖美国发展军事实力和表明使用这个实力的政治意愿,还要整合盟友的力量,彰显“自由世界”的对抗苏联的意愿。因此,将对抗苏联“集团”的所有军事力量都集中于美国只是两个最为重要因素之一,而另一个因素则是使美国盟国或“友邦”也能够发展它们自身的军事力量,建立起共同抗御苏联的信心和决心,以保证“我们的盟国和潜在的盟国,不会在挫折感和苏联的威吓之下走向中立,甚至最后落入苏联的统治之下。”根据文件的分析,联邦德国最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美国对此掉以轻心,一旦柏林偏离西方,那么对整个西欧、最终对美国“都将产生毁灭性的影响”。<sup>②</sup>

#### 第四节 核军备的冷战功能

于 1950 年春撰写的 NSC - 68 号文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核

<sup>①</sup>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p. 68 - 69.

<sup>②</sup> 同上,第 69 页。

力量”。这不仅顾及到杜鲁门对这项美国“长期战略”重新评估的最初要求，同时也由于核武器的出现——特别是苏联拥有核武器的事实——为国际战略资源与力量的平衡提出了一个新课题。<sup>①</sup>

首先，文件对美国和苏联核力量做出军事意义的比较评估，共包括了六个要点。第一，美国现已具备相当的核能力，其数量和投送能力均颇具规模，如果能得到有效利用，足以对苏联的战争制造能力造成严重打击。尽管对核打击是否能对预定目标系统造成彻底破坏、是否会迫使苏联谈判，或者能否阻止苏联占领西欧、打击西欧目前能调动的地面抵抗力量“尚不能确定”，但文件指出，美国的“首次核袭击会削弱苏联对其军事机构和平民的装备、供应的能力，以使美国在持久战中能获得发展总体军事优势的可能。”<sup>②</sup>

第二，随着苏联核力量不断增长，莫斯科也将在不远的将来拥有袭击美国的核军事基地和装备，以此来阻碍美国对其实施第一次核打击的能力。文件分析，苏联极有可能拥有数量众多的核弹和足够的运载能力，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战略问题，即英国以及北约国家目前并不充分的空中防御力量，能否被当作美国对苏发动进攻的前进基地？对此，NSC - 68 号文件的判断是悲观的。文件指出，在未来的 4 年中，苏联将获得能对英国和西欧诸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巨大的打击能力，以及将若干对美国极为重要的中心地区（如近东）足以严重摧毁的军事能力。如果这些地区遭到严重的破坏，美国至少在经济资源动员方面的优势将被大大削弱。文件预测苏联的核能力早晚会增强到能够重创美国“战略中心”地区的程度。据此，“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和我们没有比目前制定的方案更有效的反抗，苏联对我实施决定性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可能

---

① 参考：Martin S. Sherwin, “Scientists, Arms Control,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ed. By Graebner, pp. 105 – 122.

②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69.

是不能排除的”。若要有效反抗苏联的核能力，美国就得强化其他军事措施，其中包括“极大地增强空中预警系统、空中防御体系，以及有力发展和有效使用（已经和军事防御体系完全合而为一了）民防工程。”<sup>①</sup>

第三，尽管苏联核力量难以在短期内取得相对于美国的优势，但莫斯科更易发动突然袭击的变数使得“自由社会”遭受军事——特别是核子——打击的危险加大了。由于核战争的初期采取“主动行动”与出其不意打击的益处很大，“而一个生活在铁幕后面的警察国家，由于其保障安全与决策高度集中的极大优势，更加可能将主动行动与实施突然袭击的益处发挥至顶点，”文件指出，美国与盟国的冷战军事准备必须立足于对苏联可能突然对美国或西欧国家实施核打击的判断。

第四，如果“自由世界”任由苏联继续发展核武器，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虽然美国现时的核报复能力已经足以阻止苏联“发动针对我们和其他自由民族国家直接的军事进攻”，然而，文件指出，“当克里姆林宫认为它有足够的核能力对我们实施突然进攻以消灭我们的核优势，并建立起对它极为有利的军事态势时，可能会跃跃欲试以组织[对我]进行迅速而又极为秘密的打击。”处于这样一种实力非对称关系当中的两个大国同时拥有核武器，文件断言，“其结果，很可能不是遏制战争，而是引发战争。”<sup>②</sup>

第五，针对日益增长的苏联核威胁，文件强调，美国与盟国要紧的不是发展更多更好的核武器，而是全面提升常规军事力量。“我们在进一步增加核武器的数量、增强核武器的威力，这对于保

<sup>①</sup> NSC-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69.

<sup>②</sup> 同上。

证美国任何报复性行动的有效性来说都是必要的，但是，至少仍不能改变上述要点的基本逻辑。”文件建议，如果为了有效防止苏联实施突然核打击，美国就必须“对空军、陆军和海军力量做整体上的极大提高，同时增强空中防御能力和民用防空体系”。这种国防安排，文件解释，起码在以下两个方面是非常必要的：(1)“如果苏联按计划于 1954 年发动进攻，那么上述力量就能有力地保证自由世界承受住苏联第一次突然的核打击”；(2)“保证自由世界能继续实现既定目标”。除此以外，加强美国的常规军事力量，将能保护和增强美国的核反击能力，由此，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迟苏联认为发动进攻最有利的时机”，以至华盛顿能得到额外的准备时间。<sup>①</sup>

第六，美国在着重全面提升常规国防力量的同时，也应优先考虑研发热核武器。文件提出，如果任由苏联在美国之前发展了热核武器，那么整个“自由世界”将遭到苏联实力大大增强的威胁，美国遭受进攻的危险也将大为增加。然而，如果美国在苏联之前发展并拥有热核武器，美国就可能取得对苏联施加更大的压力的政治筹码。<sup>②</sup>

那么，基于上述并不十分乐观甚至自相矛盾的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大力发展核武器并准备对苏实施“报复性”核打击？NSC - 68 号文件对此所持的立场模棱两可。首先关于发展核武器，文件认为：(1)“如果能从国家和平时期的军备中有效消除核武器，那将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2)“如果未能保证实现这种裁减和所附加的目标，那么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像对待其他必须考虑的事一样尽快发展核力量”；(3)“不管从哪方面看，我们都不得不尽快增强空中、地面和海上力量，同时把我们盟国的这些力量也提高到一定

---

①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p. 69 – 70.

② 同上，第 70 页。

的程度,使我们在军事上摆脱对核武器的过分依赖”。<sup>①</sup>

至于美国是否要对苏“使用核武器”,文件提出了一个前提,即“只有当局势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必须使用核武器,并得到了我们绝大多数人民的同意,那么美国才能够动用这种军事力量”。据此,文件设立了“报复性”使用核武器的先决条件:“除非是把动用武力作为对侵略的反应,同时侵略必须是明白无误、迫在眉睫,并要取得绝大多数人对使用武力的支持,否则美国是不能陷入战争的;一旦战争到来,我们若要动武,就必须是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而且我们动用武力的程度,必须与我们所面临的任务范围相一致”。文件更为具体地强调,在与苏联的全面战争中,美国必须预计到:在使用核武器时,双方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都将采用各自认为最合适的方式。“从面对苏联进攻时我们存在的弱点着眼,只有在苏联首先使用核武器之后,我们才应该用自己的核武器实施报复。对此[我们]已经形成了共识”。这实际上确立了美国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但是,文件指出,一旦战争发生,“我们尚不能确定的仍然是:我们能否保证朝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向不断前进。”只有在美国获得了占绝对优势的核力量和制空权后,“苏联才可能受到遏制而无法使用核武器。”<sup>②</sup>

据此,就“发展核武器”与“对苏核打击”两方面,文件提出的仍然只是两个假设。第一,“如果苏联按照我们现在的估计发展核武器,到 1954 年,很难想象,一旦战争爆发,苏联领导人会限制自己不使用核武器。除非他们异常自信,认为用其他手段就能够达到目的”;第二,“如果由于苏联首先使用了核武器,我们不得已实施核报复,或是由于在实现我们的目标方面我们已没有别的选择而

<sup>①</sup>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70.

<sup>②</sup> 同上,第 71--72 页。

使用核武器,这都要求我们用核力量来打击的战略和战术目标,以及使用核力量的方式,都必须与那些[我们所追求的]目标相一致”。至于美国是否仍然要继续发展热核武器,文件认为,“如果热核武器被证明是可靠的,而且会极大增强我们的净实力,那么我们应该生产和储备热核武器。”但文件同时指出,若考虑到“为了我们的目标而将它们用于战争,则由于现在我们还没有充分了解它的潜力,因而还无法保证目前的判断就是正确的。”<sup>①</sup>

美国政府是否应考虑宣布“放弃第一次核打击选择”呢?NSC-68号文件的撰写者们明确地予以否定。文件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有所指的。此时参与美国核发展的科学家,鉴于核武器的“大规模杀伤力”,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敦促杜鲁门政府公开宣布:“除非是侵略者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将其作为报复手段来使用,否则我们是不会使用核武器的。”倡议者们认为,做此宣布,“会降低苏联对美国及其盟国实施核进攻的危险性。”<sup>②</sup>针对这样的思考逻辑,文件明确地加以批驳。“由于我们目前就常规武器的发展状况相对来说是处于无准备状态,因此,这样宣布将会被苏联解释为我们承认自身有极大的弱点。我们的盟国则会把它看成是我们要用掉它们的明显暗示。”此外,文件认为,苏联在决定是否进攻美国时,是否会把美国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作为一个重要的决策依据,都是非常让人怀疑的。应该能估计到:苏联在决策时,它重视的是对对手的军事实力的衡量,并非对手是否宣布过对军事能力的使用方式。因此,文件断言,只有在美国能确信处在“一个不用通过战争就可以实现目标的有利地位”,或即便爆发战争美国也不必依赖于核武器来实现战略目标,美国

① NSC-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72.

② 参考: Martin S. Sherwin, “Scientists, Arms Control,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ed. By Graebner, pp. 105 - 122.

“方可采纳此举。”<sup>①</sup>

那么,美国是否可以通过对核能的国际监控以降低苏联对美国以及“自由世界”的核威胁? NSC - 68 号文件的答案也是否定的。文件提出的第一个理由是,一旦战争形成相持状态,没有一个国际监控体制能阻止参战者生产和利用核武器。即使是最有效的国际控制体制,它充其量也只能提供:(1) 要求核国家在和平时期在军备中消除核武器;(2) 对破坏行为当即发出通报。文件指出,实质上,美国的“核军控”努力充其量“只是——也只能是——希望在发出警告后,一个有效的国际监控体制能在核武器被用于战争之前保证一段[无核打击]时间”。<sup>②</sup>

第二个理由,即使一个有效的国际监控体制能保证美国争取到一段无核打击时间,但这能否做到还有赖于其他一些不定因素。其一,单方面销毁现有的核弹头储备、销毁保护性外罩和发射装置等做法本身几乎无法保证获得无核打击时间,因为“保护性的外罩和发射装置极易生产,甚至可以在私下秘密进行,而武器装配根本就花不了太多时间”。其二,只有在削减现存的核材料贮备,同时有效地控制未来利用核材料生产核武器的条件下,战争才有可能不会以突然核打击的方式开始。尽管通过国际核军控机制有效控制核材料的生产和储备具有进一步延长“无核打击”时间的可能,但是文件强调,由于苏联人现在已经掌握了生产核武器的技术,那么,从破坏国际监控协议到生产核武器这两者之间的时间差距,“会比我们在 1946 年做出的估计要大大缩短,唯有生产热核武器和其他新式武器等领域有可能例外”。<sup>③</sup>

文件反对依赖“国际核军控组织”的第三个理由是,这样的组

<sup>①</sup>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72.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同上,第 73 页。

织对“违约行为”的警告效果无法确定。“警告”是否能有效延长“无核打击”时间同样有赖于若干因素。其最为主要的是：“由于缺乏诚实和信用的机制，人们将怀疑，是否能够设计出任何一个可以确定这一警告的系统来”。只有当国际核查专家有绝对自由进入到苏联任何一个地方进行检查，只有当核原料和裂变材料完全由国际组织所拥有，只有当对危险设备的经营完全属于国际管理范围内时，对苏联秘密违约行动的控制才会成为可能。此外，随着热核技术的发展，有可能使单独的核反应堆的体积变小，能量消耗减少，继而在暗中成功生产运行的可能性也就增大了，“其结果必定是诱发通过秘密行动来获得决定性利益的动机”。<sup>①</sup> 国际组织的“警告”是无法取得预想的效果的。

文件提出的第四个反对理由是，在加入国际监控之后，美国会付出相当的战略代价。因为如果美国一旦参与一个有效的国际监控机制，那么相对于苏联，美国就极有可能丧失更多的核武器储备和生产能力。因此，只有“当建立起一个令人满意的监控机制，包括向国际检查完全开放一国领土，才有可能使对苏联的冲击大于美国”。此外，如果监控机制包括销毁所有的大型核反应堆，并由此中止了核能的某些和平用途，“那么苏联就会为它需要大量的新式能源而叫屈，在这方面苏联做出的牺牲就要比美国更大”。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文件认为，克里姆林宫是不会轻易接受这些“令美国满意”的条件的。<sup>②</sup>

尽管“美国和全世界的人民都渴望缓解核战争的危险”，然而NSC - 68号文件声称，目前最主要的困难就在于：华盛顿单方面根本无法保证“双方都诚实地遵守这个[终止研发]协议，而且防止

---

①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p. 73 - 74.

② 同上，第 74 页。

[对方]对它有较大可能的破坏”。第一,如果苏联按联合国计划的要求开放领土,对于通过有效的联合国计划的国际监控体制保证安全来说,就是最大的贡献。但是,“这种开放,与苏联通通过严厉手段以实施其体制而继续维持现状的做法,却是格格不入的”。文件认为,“这就是苏联拒绝接受联合国方案的主要原因”。第二,联合国迄今为止所有核军控计划的不成功,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光靠对核设施进行检查是无法保证监控的,关键是要能够使“世界范围内的从矿藏资源开发到裂变材料的最终使用都由国际权威组织所拥有并实施操作”。能否实现这个要求暗含了“主权转让”,因此,“苏联必定对此无法接受,而对美国和其他的自由国家来说,这一点又必不可少”。第三,文件认为国际监控权威组织在实施核监控时能否“不受到苏联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与控制”对美国也同等重要。由于苏联“坚信”任何一个不在它统治之下的国家,就一定是受到美国的控制,那么,“美国和非苏联世界所必须坚持的任何立场,苏联都将予以拒绝接受。此点已然十分清楚”。第四,尽管只有消除了大型核反应堆、销毁了储备的裂变材料才能使核突袭无法实施,但文件非常确定地认为,苏联是不会同意消除大型核反应堆的,“除非我们明白无误地证明,为和平目的而生产核能这一行为根本是不现实的”。最后,文件指出,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苏联的政策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否则美国就不得不认为苏联缺乏诚意。但是,如果苏联体制本身的性质没有发生改变,克里姆林宫政策的转变又是难以让人相信的。基于上述考虑,NSC - 68号文件撰写者最后的结论是:“除非克里姆林宫的构想遭到挫败,而导致苏联的政策出现真正、彻底的改变,否则是不可能指望通过协商制定一个有效的国际[核]监控计划的。”<sup>①</sup>

<sup>①</sup> NSC - 68,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7 April 1950,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p. 74 – 75.

尽管“尼兹们”认定核武器——特别是美国相对于苏联的核优势——可以也应该成为冷战的战略资源，然而他们对美国如何为了冷战目标运用核武器不仅不确定，似乎也不那么关心，进而对如何配置有限资源以发展核力量也显出“刻意”的模糊。

### 小 结

---

依照 NSC - 68 号文件的描述，美国“有能力”、“有资源”对抗“苏联威胁”，并“有望”在冷战中通过“全面遏制”取得最后的胜利。美国的“抵抗力量”，不仅包括了军事上的“硬力量”，同时也体现在强大的政治、心理、经济方面的“软力量”。

“尼兹们”强调美国及其“自由社会”在“软力量”方面较之于苏联“共产主义阵营”的明显优势，与凯南的思想并无根本的差异，但他们在对这些“软力量”描述时所使用的语言与逻辑却与凯南完全不同。如果说凯南看重的是美国对盟国——特别是对西欧主要国家——经济援助所产生的“胶合作用”，“尼兹们”却强调美国式“自由”与“民主”思想对世界上所有“向往自由”人民的影响力、“向心力”和“凝聚力”。较之于苏联“专制”主义的“反人性”、“反人文”性质，文件提出美国所代表的政治理念反映了现代人类社会的一致追求。“美国主义”作为人类文明的“方向”，必将最终战胜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专制统治”哲学。文件中对这些“现实的”、“潜在的”美国“软力量”的表述部分，充斥着强烈的基督教教义语言与宗教化了的“美国主义”意识形态，其“感召”与“教化”的语气，似乎使人们在重温“十字军”东征的一份“宣言书”。<sup>①</sup>作为一份表述“国家安全战略”的政策文件，其所使用“话语”的宗教文化色彩，着实

---

<sup>①</sup> 关于此点，参考 Michael Schaller, *The U. S. Crusade in China, 1938 – 194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chapter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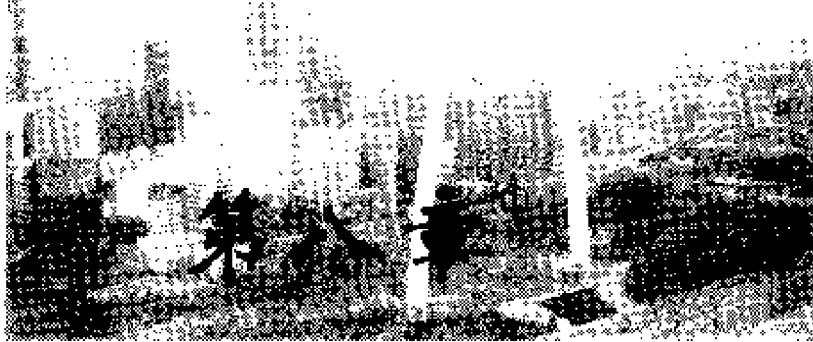
体现了文件撰写者的“一片苦心”。正是由于 NSC - 68 号文件将美苏冷战定性为两种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的对垒与较量,使得美国利用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软力量”优势“全面遏制”苏联“共产主义阵营”不仅显得必要,也预示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

此外,NSC - 68 号文件对美国拥有“硬力量”的分析,也表现出与凯南的不同侧重点。在文件完成之时,美国以及盟国的常规军事力量较之苏联及其“卫星国”似乎处于“相对劣势”,但是美国率先发展的“原子武器”,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投放技术”成熟度上均领先于苏联,因此,美国对苏联拥有“常规威慑力”虽然是相对的,但由于其拥有对苏联本土充足的核打击和核报复力量而处于对莫斯科“战略威慑”的绝对地位。对此,文件却有另一番论证。出于国际政治与“道德”的考虑,NSC - 68 号文件认为,美国由于使用核武器的政治意愿的缺位而根本无法而且也不应单纯依赖对苏的核威慑。尽管美国应该致力于旨在限制直至最终迫使苏联放弃发展并在未来战争中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际“核军控”建制,但“当务之急”却是尽快打消对核武器能够阻止对方发动“侵略”战争的幻想,加强构建美国以及主要盟国的常规武装力量,以期在不远的将来提升对苏的“常规威慑力”。这种与“扬长避短”的现实主义资源配置原则相悖的逻辑,成为文件在此后不断遭到质疑与批评的主要“靶子”之一。<sup>①</sup>

NSC - 68 号文件对资源配置要求的一个中心,是大幅度提高联邦政府有关冷战对苏“全面遏制”的政治、经济、军事所需的投

<sup>①</sup> 例如,1953 年主政白宫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就曾激烈地批评 NSC - 68 号文件所倡导的大规模发展常规武器的军事资源配置政策。通过收支分析,他认为,发展核武器要比发展常规武器“便宜”得多,对威慑苏联的战争企图也有效得多。参看: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p. 127 ~ 163; Charles C. Alexander, *Holding the Line: The Eisenhower Era, 1952 ~ 1961*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5)。

人。为了证明这种投入增加不仅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可能”的，“尼兹们”认为，美国及其盟国的“潜在”战略资源，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范围上，都远远优越于苏联，而欠缺的只是尽快动员这些资源并用于冷战的政治“意志力”与领导人的“决心”。由于苏联及其卫星国将拥有的有限资源的相当部分已经用于军事力量发展上，并处于“强弩之末”的困难境地，因此在与美国以及其他“自由国家”的资源较量上，已处下风。如果顺着这一逻辑考虑，结果必然是：美国只要保证目前的资源投入水平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逐步提高，便平安无事。然而，NSC-68号文件的结论却完全相反：美国只有在“优势”的条件下再通过大投入以求得将“相对优势”提升为“绝对优势”，方可高枕无忧。保持“绝对优势”的目的无外乎是追求“绝对安全”，就此而论，NSC-68号文件撰写者们的“安全观”与他们描述的“苏联安全观”并无本质的不同。



## 全面遏制战略遭遇“朝鲜战争”<sup>①</sup>

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防政策制定者们在 1950 年的春天制定 NSC-68 号文件之时，决不会预测到，美国将大规模介入朝鲜半岛的“内战”，并与刚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北亚的一个半岛上打了场长达三年的“有限战争”。这场战争不仅导致美国“亚洲战略”以及“对华政策”的根本改变，也是对华盛顿针对苏联和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全面、无差别遏制战略的检验。检验的结果对美国冷战遏制战略的再思考产生了重要的意义。

### 第一节 出兵朝鲜与“中立台湾”

朝鲜战争于 1950 年 6 月 25 日爆发。三天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发表声明，表明美国将予以武装干涉。然而声明的内容，要比这一“公开政策”表述的行为本身更为重要。首先，白宫认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半岛南部“韩国”的所谓进攻，“毫无疑义地证明，共产主义对独立国家的控制，已越过使用颠覆的阶段，而进

① 此章的部分内容摘自作者所著的《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策：1949—1972》（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第二章。

入了使用侵略和战争的阶段”。其次，在美国尚未明确将如何对朝鲜半岛使用武力时，其第一个军事反应，是派遣美“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并在美远东武装力量总指挥麦克阿瑟的指挥下，使台湾海峡“中立化(Neutralization)”。与此同时，杜鲁门还宣称，美国将为法国提供其为了控制印度支那所需的军事与经济援助。<sup>①</sup>这一公开文件所包含的美对冷战的新认知及新策略，对此后的中美军事对抗的起源与发展影响甚大。

美国对东亚战略的这个突然变化，并非是华盛顿决策者们的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与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战略“思辨”的逐步变化紧密相连。1950年春，杜鲁门政府的“全球战略”考虑，特别是对苏的战略动向及外交态势的测定，充满了“惊诧”与“相当程度的悲观”。美军事情报预测，苏联将于1957年发展出能够“直接”打击美国本土，并造成“极大的损失”的战略核力量，其包括一定数量的核弹头及长距离运载器。苏联核力量“出乎意料”的“神速”发展，使美一时引以自豪的“核垄断”已成为历史。而更成问题的是，美原先拟以核武器来威慑苏联常规武力扩张的战略设想，也失去其“合理性”。<sup>②</sup>从地缘安全的角度看，“均势”也在朝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莫斯科虽然在地中海受阻，但在东欧却巩固了控制。而最能较大地改变其战略态势的，则是1950年2月斯大林与刚刚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签署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此后，美在亚洲的情报机构不断地报告，苏联空军已经把“米格”战机转飞和备战于中国沿海机场；中国人民解放军则于中国东南沿海“屯兵百万”准备攻打台湾，同时也加强对胡志明领导

---

① Public speech, 28 June 1950, Department of State, U. S. *Policy toward the Korean Crisi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0), p. 18.

② Marc Trachtenberg, “A ‘Wasting Asset’? American Strategy and the Shifting Nuclear Balance, 1949 – 1954,”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3 (Winter 1988/89): 5 – 49.

下的抗击法国重返印度支那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经济、军事援助。东南亚各国似乎也“动荡不安”。在马来西亚的中国人，已经组织了“共产党”或“亲共”力量，并发动了旨在推翻英殖民统治的斗争；菲律宾的客家人也在积极筹划及实行打击菲“腐败、亲美”政府的“暴动”；缅甸与泰国的“反美亲共”力量也在“膨胀”。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美在亚洲的势力范围正在受到苏联“利用中共”发起的“新的、有力的挑战”。<sup>①</sup>

对美国将如何面对在东亚的挑战，1950年4月出台的NSC-68号文件似乎已经定下了政策基调。<sup>②</sup>重温文件的如下要点似乎十分必要。第一，关于美国可能面临的威胁，NSC-68号文件再次肯定，苏联及其控制下的“共产主义集团”，仍是以“在全球范围内强制实行专制、集权”为“终极目标”；而近期内，由于苏联已“最大限度地动员其(战争)资源”，莫斯科已具备“局部使用武力以至引发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军事能力。第二，NSC-68号文件判断，苏联最可能作军事冒险的地方，是所谓美苏对抗线上的“松软地带[Soft Spots]”。当美苏在西欧的对抗已趋稳定时，莫斯科必定“抓住每一个机会试图向势力真空地区扩张，以求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实力急速发展的好势头”。根据尼兹和他的助手的推算，起码“印度支那、柏林、奥地利、朝鲜”在“松软地带”首当其冲，最易受到苏及其“共产主义卫星国”的军事威胁。第三，美国二战后实施的对苏政策与战略，面对苏现时的战略“扩张”态势，不仅显得“无力”，也极有可能让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者们对国际环境产生“错觉”或“误判”，从而极有可能低估美威慑的决心及能力而“铤而走险”。因此，美国必须立即改变凯南所提倡的“重点防守”策略，因为，“自

<sup>①</sup> Rusk to Acheson, 26 April 1950, *FRUS*, 1950, Vol. 6, p. 335; CIA, “Recent Activities of Soviet Military Personnel in China,” 21 April 1950, box 255, Truman Library.

<sup>②</sup> 参见：Ernest R. May, ed. *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 Interpreting NSC-68*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 pp. 7-8。

由阵营的任何一处失守,都将意味着自由阵营的全线受挫 [a defeat of free institutions anywhere is a defeat everywhere]”。第四,尽管美国仍需在中长期内坚持一个“全面遏制”的战略,但近期内必须加强“攻势”,以期达到迫使“苏联在其周边国家及其控制的卫星国”的势力存在以及政治影响得以“收缩[retraction]”。这种“攻势”虽应以不引发“传统的战争”为“下线限制”,但要求美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展“以局部军事行动击败苏局部扩张”的军事力量,否则美国“处心积虑”所建立的对苏军事威慑将受到挑战,以致对“共产主义势力”的全面遏制态势将“不可避免”地产生负面影响。第五,为此目的,NSC-68号文件提出“立即加强美军事硬件建设”的建议。其中包括:增加军费以“大规模”发展“常规军事力量”;增加美对外军事援助的拨款,以强化与盟国的合作;增加对与国防相关联的重工业及军事工业的研究与开发(R&D)的投入与扶持。<sup>①</sup>

华盛顿也正是在这种决策机制与气氛中,做出了与朝鲜战争相关联的一系列战略决策。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杜鲁门正在他的密苏里州的“独立”镇老家度假。接到消息后,他立即取消休假计划,紧急飞回华盛顿,在位于白宫旁的“布莱尔宫”内,连夜召开“国家安全”联席会议。与会的不仅包括了所有内阁成员,JCS主席及各军参谋长也应邀到会。对朝鲜战争爆发的“战略严重性”,杜鲁门与他的高级助手们几乎未经多少讨论即取得共识:苏联已在东亚这块“软地带”动手了,美国必须“以牙还牙”。根据这一结论,此后的讨论自然而然地集中在具体将如何行动。美对朝鲜战争最初的行动决策是按以下顺序做出的:6月25日,杜鲁门首先批准给韩国运送“军事抵抗”急需的军用物资;6月26日,美驻扎在东亚的空军与海军被授权攻击朝鲜的坦克与装甲车“集团”;6月29日,美远东武装力量司令部得令可派遣空军袭击朝鲜位于

---

<sup>①</sup> NSC-68,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14 April 1950, *FRUS, 1950*, Vol. 1, pp. 248–253.

38度分界线以北的军事设施与二线部队，并部署地面部队防守位于韩国的主要机场与港口；6月30日，杜鲁门接受了远东军事总指挥麦克阿瑟将军的请求，将其指挥的四个整装步兵师中的两个派往朝鲜半岛。<sup>①</sup>这些决策的实施，开启了美国及其“盟国”随后的武装介入朝鲜战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然而，就美国在东亚实施遏制的深远战略意义而言，最重要的是杜鲁门政府6月27日派遣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的决定。根据现有的美国档案材料，军方对这一决定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50年初，国防部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就美是否直接或“协助”防御台湾及台湾海峡与国务院争论过，但未占上风。4月后，来自远东司令部要求协防台海的压力不断上升。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现已退役但居住在台湾的美前海军将领库克，不断地向麦克阿瑟及海军作战部部长F·P·谢尔门上将提供“情报”，称苏联空军已经在中国的东北及东南沿海建立“前进”基地，并将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台。而解放军一旦攻台得手，苏必然会把台岛变成其在亚洲进一步“扩张”的“前沿堡垒”。库克在其5月初给麦克阿瑟的一份备忘录中警告说，“如果苏空军的喷气式战斗机能以台湾作基地”，“这就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不可避免”。库克此时的身份不寻常。从远东海军司令的位置上退休后，他一反常理，决定不回美国而留在亚洲生活。对于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库克自己的解释前后矛盾百出。他有时称为“国际新闻服务[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机构作咨询，有时又说是“中国国际商务[Commerce International China]”公司的顾问，但最为可能的是他受雇于龟缩在台湾的蒋介石政府。1950年5月底，海军作战部长谢尔门上将曾正式“警告”过库克，美海军退役将领不得以任

<sup>①</sup> Stueck, *The Korean War*, pp. 43–44; and Burton I. Kaufman, *The Korean War: Challenges in Crisis, Credibility, and Comman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6), pp. 30–32.

何形式接受外国政府的“津贴[emoluments]”。<sup>①</sup> 库克是否确实拿国民党政府的津贴而作蒋介石影响美军方对台政策的说客,至今仍是一桩悬案。

库克提供的“情报”以及做出的“判断”,正对麦克阿瑟的胃口,起码为他要求华盛顿更加重视东亚准备了素材。基于库克的报告,麦克阿瑟于 1950 年 5 月 29 日向 JCS 提交了一份增加西太平洋防务安排项目及军备的清单。否则,“一旦台湾受控于敌方,美的[太平洋]‘防御圈’将不保。”在这份备忘录中,他还强调指出:“美国可以用超然的或纯学术的眼光考察[台海]形势的阶段业已过去了。”麦克阿瑟接着提出他的著名观点:“在美苏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福摩萨对共产党人来说,不亚于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或一座海军潜艇补给基地。其战略位置是如此理想,不仅能直接支持苏联的[针对美国亚洲基地的]战略行动,还会阻碍我于远东前线的中段及南段发动任何攻击实施”。<sup>②</sup>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极为重视这份备忘录,接到后立即送给国防部长约翰逊传阅,并附言称:“此件所议之事事关重大,建议报请总统注意”。约翰逊看完麦克阿瑟报告后,即指示 JCS 研究“美国是否需要不遗余力以保台湾不落入共党之手,尽管这一行动将意味着动用美国武装部队防守该岛”。<sup>③</sup>

为了取得第一手依据,以便更有力地取得总统对“武装防卫台湾”建议的支持,国防部长约翰逊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于 1950 年 6 月中赴远东考察。然而,回到华盛顿的第二天,就得知朝鲜战争已经爆发。在参加 6 月 25 日晚间的“布莱尔宫”会议

① Cooke to MacArthur, 2 Amy 1950, RG10, MacArthur File; Cooke to Sherman, 14 April 1950, RG10, Sherman Files, National Archives.

② MacArthur to the Department of Army, 29 May 1950, G6, MacArthur Files, C - 56410, National Archives.

③ Bradley to Johnson, 31 May 1950, JCS Files, CJCS901, “China”, National Archives.

时,约翰逊与布莱德雷均下定决心要说服杜鲁门改变美对台政策。会议前,当总统与其他内阁成员等待白宫厨师开晚餐时,约翰逊即迫不及待地叫布莱德雷站起身来,并要这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大声朗读麦克阿瑟 6 月 14 日在东京时交给他们两人的一份有关台湾的备忘录,同时提醒在座的各位要员“应该重视”麦氏的提议,即为了保证美在远东的“政治,军事,战略”地位,现已是美国在台湾地区“划出不让共党继续扩张的最后界限的时候了”。<sup>①</sup> 约翰逊与布莱德雷的举动显然引起杜鲁门的“密切关注”,总统似乎还特别注意关于苏联在中国空军动向的分析报告。在晚间的正式会议上,他询问军方能否确定苏空军的“真实动机与意向”,空军参谋长 H·S·范登堡(Gen. Hoyt S. Vandenberg)即刻回答:苏联空军完全有可能参加中共对台湾的攻击。<sup>②</sup>

杜鲁门虽然觉得有必要对台采取一定的行动,但并不完全赞同军方的“武装护台”建议。在 25 日的会议上,他对约翰逊的提议充耳不闻,反而让国务卿艾奇逊谈应如何应对所谓“可能的台湾危机”。实际上,国务院早在 5 月间已就台湾问题做出预案。此案的核心是使台湾及台湾海峡“中立化”。主要负责制定这一方案的,是国务院分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及共和党对外政策发言人,时任处理对日和约的国务院特别参议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有趣的是,这两人的合作,原本是要体现美在对外关系决策的“两党一致 [bipartisanship]”原则。腊斯克与杜勒斯虽“一致”认为美国无论从军事战略还是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看,都应明确地提出确保台湾不落入敌手的措施,但究竟如何实施,几经磋商方达成协议:腊斯克最终放弃他的“联合

<sup>①</sup> Robert Accinelli, *Crisis and Commitment: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Taiwan, 1950 – 1955*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p. 30.

<sup>②</sup> Minutes of the Blair House Meetings, 25 June 1950, *FRUS, 1950*, Vol. 7, pp. 151 – 159.

国托管台湾”的建议，而接受杜勒斯的“动用美国海军使台湾海峡中立化”的方案。根据杜勒斯的设想，在台湾的国际地位“尚未确定”——他坚持台湾的地位应在对日和约中确定——时，美“有义务”、“有必要”派遣海军巡逻台湾海峡，“担负起既不容[大陆]共党[军队]犯台，也不让台湾被用作攻打大陆的基地”的责任。<sup>①</sup>当艾奇逊解释完这一“台湾海峡中立化”预案后，杜鲁门立即表示赞同。在此情形下，除了约翰逊仍保留他“军事防卫台湾”的立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及其他参谋长们则转而支持“使台海中立化”措施。两天后，杜鲁门公开了这一政策，同日，命令海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并在远东总指挥麦克阿瑟将军指挥下行动。<sup>②</sup>

虽然“使台海中立化”的命令发出了，然而军政两方就如何有效地执行这一命令分歧甚大。已从国务院退休的凯南，仍旧十分关心台湾局势。1950年7月中，他两次写信给国务卿艾奇逊，强调第七舰队应尽快在台湾海峡“建立军事威慑力量”。根据他的“感觉”，北京“近期将会攻台”，这是因为台湾海峡已经快要进入台风季节，故而“共军必定要抢先行动”。如何才能最有效地阻止“中共犯台”？凯南认为，美军必须做出“完全不依赖国民党军而单独承担防卫台湾并具有战略反攻能力”的行动计划与军事部署。国民党军虽有数十万之众，但凯南断言，“他们决不可依赖”，因为蒋介石仍把这些部队当作其“私人武装力量”与“政治运作的筹码”。因此，他建议华盛顿应立即与蒋接触，力求做出安排，使美军能“有效地控制蒋的部队”。从他的信函看，凯南显得非常焦急，因为直到7月中，美军第七舰队仍未到位，台海海面“游弋的美海军舰艇仍寥寥无几”，国民党的军队仍“自说自话”。他多次督促艾奇逊把

① Memorandum by Dulles, 18 May 1950, *FRUS, 1950*, Vol. 1, pp. 314 – 316; Rusk to Acheson, 3 May 1950, *ibid.*, Vol. 6, pp. 347 – 351.

② Zhang,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p. 61.

第七舰队的派遣情况及时报告杜鲁门，以引起决策“最高层”的注意。<sup>①</sup>

军方对执行“台湾中立化”的命令确实表现出不积极的态度，主要因为仍对“以政治为目标的军事行动”的“实际操作”心存疑虑。特别是美军应对哪些国民党军的军事行动加以限制，如何限制，“从军事角度看”，都不合常规。7月中旬，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国防部要求国务院能就“如何界定哪些国民党军的军事行动属‘防御性’，哪些属‘攻击性’”作出规定。国防部的备忘录指出，国民党军“对大陆的空中及海上侦察”，及在海域或公海“检查”大陆的船舶，应被认作属“防御性”，故不在美限制之列。国务院基本接受了国防部的界定，但明确表示，国民党海军不得在公海上“检查外国船舶”。<sup>②</sup>稍后，JCS 就国民党空军要求“对大陆军事目标实施先发制人性的攻击[pre-emptive strike]”，提请杜鲁门与艾奇逊准许。各军参谋长坚持认为，鉴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沿海“大张旗鼓”地修建空军基地并大规模地集聚兵力，完全有必要让国民党空军对这些基地、兵营及已设阵地实施“破坏性袭击”，这样的军事行动应属“防御性”。艾奇逊则十分清楚，“先发制人性攻击”行为，实质上违反了美国的“台湾海峡中立化”原则。他建议不仅要使蒋介石认清这一点，还要让远东司令麦克阿瑟“严格遵循”所谓“台海中立化”规定。<sup>③</sup>

麦克阿瑟却站在 JCS 与国防部一边。他不仅没有“严格执行”中立政策，更有甚者，公开地表达“同情”国民党政府的倾向。1950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1 日，麦克阿瑟率十几位高级幕僚造访台湾岛。在两天的访问中，他与蒋介石及国民党军方高级将领多次会

<sup>①</sup> Kennan to Acheson, 17 July 1950, RG59, Department of State Files, Box 4258, National Archives.

<sup>②</sup> JCS to Johnson, 28 July 1950, *FRUS, 1950*, Vol. 6, p. 401.

<sup>③</sup> Johnson to Acheson, 29 July 1950, *ibid.*, p. 401; Acheson to Johnson, 31 July 1950, *ibid.*, p. 423.

晤，“商谈美台军事合作事宜”。而直接造成白宫与国务院深感不安的，则是访问结束后，麦克阿瑟和蒋介石所发表的公开言论。在东京他的司令部，麦克阿瑟对记者大谈蒋介石是如何的“坚决反共”，蒋反攻大陆的“决心”是如何与美国“使所有的太平洋国家的人民都自由的追求相一致”。在台北，蒋介石也遥相呼应，宣称麦克阿瑟的访台，“奠定了中美军事合作的基础”。由于现在“国军又得以与过去的同志与战友并肩战斗”，蒋断言，他的“伟业必将取得最后胜利”。一时间，美国与西方各国的媒体，均大肆渲染麦克阿瑟的对台访问，甚至隐含地指出，麦克阿瑟与蒋介石极有可能签署了“秘密军事协定”。<sup>①</sup>麦克阿瑟的访台，是得到 JCS 的批准的，目的确定为“实地考察台湾需要美军事援助的程度”。五角大楼内的国防部曾表示反对，建议麦克阿瑟派一名高级将领代他去台。但当老资格的远东司令坚持自己亲赴台岛时，国防部长约翰逊也未再行拦阻。<sup>②</sup>

麦克阿瑟的台湾之行，显然让国务院感到尴尬。其原因之一是，麦克阿瑟访台时，恰逢国务院决定将原驻香港的卡尔·兰金（Karl L. Rankin）调任主管美驻台“使馆”。虽然这只是一般人事调动，但由于原驻台主管只有“一秘”头衔而兰金都被任命为“参赞”，这给舆论界留下的印象是：美国国务院也开始改变其对台政策了。由于麦克阿瑟访台时将兰金完全排除在“核心”会谈外，驻台“使馆”十分恼火，麦克阿瑟离台后，便向国务院“误报”，称远东司令已决定“调空军三个 F - 80 强击机联队进驻台湾”。<sup>③</sup>接到此报告后，国务卿艾奇逊立即质询国防部与参谋长联席会议。鉴于 JCS 刚刚在考虑是否有必要“派遣美空军去驱散中共在[福建]沿

① 参看：*New York Times*, 1 August 1950, p. 4; 2 August 1950, *ibid.*, p. 6。

② JCS to MacArthur, 29 July 1950, RG218, Box 318, "Formosa," National Archives.

③ 参看：*New York Times*, 29 July 1950, p. 5.

海的聚集部队”，艾奇逊唯恐麦克阿瑟已得到消息“率先行动”了，要求军方“取消”或至少“暂时搁置”这一在议的空军对华行动。麦克阿瑟的“言行”也让 JCS 觉得“太过火”。<sup>①</sup>8月14日，JCS 给麦克阿瑟一份备忘录，明确地指出：远东司令部不得擅自派空军进驻台湾，也不得对国民党政府任何人承诺当台遭受攻击时美将派空军援助。JCS 提醒麦克阿瑟，军方接受“中立化”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样的做法能达到既保证不丢失台湾，而又避免美国动用武力。<sup>②</sup>杜鲁门总统也开始对麦克阿瑟的“涉台”言行感到不满。他要求 JCS“毫不隐含”地告诫远东司令：“只有作为美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的总统才有权决定对中国大陆的任何军事行动”。为了更有效地限制麦克阿瑟的“冒失”，杜鲁门派他的特别顾问哈里门专程赶赴东京，代表总统向麦克阿瑟解释美对华及对台的政策。<sup>③</sup>

麦克阿瑟似乎并没有打算有所收敛。8月中旬，他应“美国参加对外战争的退伍军人协会[The Veterans for Foreign Wars]”之邀，在该会的年会上作书面发言。麦克阿瑟的发言稿，有很大篇幅论述“台湾对美国的亚太防御的战略重要性”，并反驳国务院“如若美国武装保卫台湾，将使美在整个亚洲不受欢迎”的观点。他解释道：“那些持这种观点的人，根本不了解东方。这些人不承认：东方人的心理模式，决定了他们只尊重并屈从那些崇尚武力、侵略成性且充满活力的统治者，他们一旦受到恐吓及欺压，便会很快地抛弃表现软弱、犹豫不定的领导者而倒向强者。”麦克阿瑟提醒美国公众，“在过去的5年中，没有什么再比美国保卫亚太地区免受未来侵略的决心更能激励远东地区了”。麦克阿瑟的发言，是对

<sup>①</sup> Robert Strong to Acheson, 3 August 1950, FRUS, 1950, Vol. 6, pp. 410–412.

<sup>②</sup> JCS to MacArthur, 4 August 1950, RG218, Box 318, “Formosa,” National Archives.

<sup>③</sup> Stueck, *The Korean War*, p. 68.

国务院乃至白宫的“对台政策”的直接批评。<sup>①</sup>“退伍军人协会”8月25日收到麦克阿瑟发言稿的第二天，总统特别顾问哈里门便得到此件的“复写本”，并立即送交杜鲁门。杜鲁门对麦克阿瑟把“军政冲突”公布于众，并“无视”白宫非常恼火。在8月26日的包括主要军政首脑的研讨朝鲜问题的每日例会上，总统亲自全文朗读了麦克阿瑟的发言稿，然后转向国防部长约翰逊，“一字一句”地说，他“毫无保留地否定”麦克阿瑟的言论，并严厉要求这位远东司令“公开收回”书面发言。同时，杜鲁门重申了美对台政策：第七舰队担负着“使台湾海峡中立化”的“和平使命”；一旦朝鲜战争结束，美武装部队将撤出台湾海峡；另外，美国对“由联合国决定台湾未来归属”的提法“持欢迎态度”。<sup>②</sup>

由于美此时加紧了武装介入朝鲜的准备，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军方与“文官”的摩擦，都不得不暂放一边。作为此间就所谓“协防台湾”军政争斗的尾声，1950年9月12日，杜鲁门出乎大多数人意料之外，宣布解除国防部部长约翰逊的职务，召回已因身体不佳解甲归田的前陆军参谋长、前国务卿马歇尔将军，接掌五角大楼，然而，最“令人担忧”的远东总司令、时任“联合国军”总指挥的麦克阿瑟却在计划着在朝鲜对朝鲜军队施行“大规模反击”。<sup>③</sup>

## 第二章 打过三八线“收复失地”

朝鲜战争局势在1950年9月间发生了重大变化。9月15日，

① John W. Spanier, *The T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and the Korean War* (Cambridge, Mass., 1959), p. 74.

② Stueck, *The Korean War*, p. 69; Kaufman, *The Korean War*, p. 72.

③ Accinelli, *Crisis and Commitment*, p. 50.

“联合国军”(实际上主要由美国武装部队组成)7万余众，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分乘260艘美海军军舰，在朝鲜中部的仁川突然登陆，并于午夜后突破朝鲜的沿岸防线。第二天凌晨，美海军陆战队第十军，含陆战队第一师及陆军第七步兵师，在爱德华·埃尔蒙得(Edward M. Almond)中将的率领下，向东袭击了金浦机场，紧接着向南韩首都汉城挺进，并于28日得手。与此同时，美陆军第八军也由韩国的最南端向北快速进攻，很快和陆战第十军汇合。被美军围困的朝鲜数十万军队，除少数分散躲进山区，大部被俘，很快失去战斗力。至此，“联合国军”已基本控制韩国。

如若按照联合国决议，“联合国军”武装干涉朝鲜的目标业已达到。然而，联合国决议中隐含了另一个极为模糊的出兵朝鲜的目的：“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如果要实现这一目标，“联合国军”就必须越过三八线，以期彻底消灭朝鲜人民军，让朝鲜半岛统一在亲美的李承晚政府之下。而唯一能阻碍美国达到此目的的，华盛顿认定只可能是苏联军事干涉，或中国出兵援朝，或苏中联手武装介入。一旦上述可能变成现实，朝鲜战争将升级，其结果对美国对抗苏联的全球战略以及对华政策必将产生不可预料的影响。

当杜鲁门及其“文官”内阁犹豫不决，尚难做出决定时，军方却力主“继续攻击”，并已开始积极筹划分作战方案了。实际上，此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框架下的军政会议机制，较前已有非常大的改善。特别是政治上圆滑、军政双方均十分信任的马歇尔将军出任国防部长后，JCS的作战室已自然而然地向国务院高级官员开放。马歇尔、艾奇逊、JCS主席布莱德雷及各军部长和参谋长们，每周都要在那里聚集数次，共商战略计划及军事部署等传统上完全属军方控制的议题。这种聚会，已变成名副其实的“准国家安全委员会”议事“例会”。<sup>①</sup>

<sup>①</sup> 关于 DOS-DOD 在 JCS 作战室会议记录，参看：Notes of Daily Meetings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1950, RG59, Administrative File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National Archives.

值得注意的是，从朝鲜战争爆发的最初，参谋长联席会议便提出：如果美国军事介入，就必须把“打过三八线而争取全面胜利”考虑在美军事战略与政治运作之内。已解密的军方档案透露，早在 6 月 29 日，JCS 负责战略计划的副主任理查德·林赛（Richard C. Lindsay）将军，即在当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直言不讳地建议，NSC“授权麦克阿瑟打过三八线，只要他觉得从军事上讲有此必要”。<sup>①</sup> JCS 官员的理由很简单：美国如果决心参战，就要准备把朝鲜打得“不仅无法还手，还要在今后较长的时期内无力再对韩国发动进攻”；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仅迫使朝鲜退回三八线，“无论是从军事上看，还是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都是不可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 7 月 31 日通过国防部提交给 NSC 的一份备忘录，更进一步论证了“联军”应“不受三八线限制”的立场。第一，这份报告认为，“人为划定”的三八线，“破坏了一个极为单一的民族的自然完整”；第二，三八线作为苏联共产主义“铁幕的最东边缘”，“联军”的攻击若在此线停下，必定赋予莫斯科“重整力量以便卷土重来”的良机，而附加给美国的则是“重建南韩防卫所需的巨额支出”；第三，“联军”如果突破三八线，这将是“美国及自由世界首次击破苏联势力圈的一块”领地，而在不与苏全面战争的情况下“捣破苏联[防卫]圈”，将对“苏联在其远东领土及相邻区域间正在建设的军事系统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第四，中国的满洲，也会因朝鲜半岛的“统一”而“脱离”在政治、经济上受苏控制的“困境”，因为，“一个强大而且自由的朝鲜会成为满洲的资源出口地”；最后，JSC 的报告强调，由“联军”去统一朝鲜，还将对东亚各国产生“不可估算的[政治]心理效果”：“日本将看到[西方]遏制苏联扩张的决心与实际行动；中共领导层内也或许会对其完全地依赖克里姆林宫的现行政策产生疑问，进而对其外交取向

---

<sup>①</sup> Minutes of NSC Meetings, 29 June 1950, *FRUS*, 1950, Vol. 1, p. 328.

重作考虑与安排。”<sup>①</sup>

那么,对“联军”挺进朝鲜,苏联及中国到底可能作何反应?是否会武装介入以抗击“联军”?对此,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答复是否定的。在其 7 月 31 日致国防部的备忘录中,JCS 承认莫斯科由于考虑到苏对共产主义“卫星国”的战略保卫的“信誉”而不得不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但却不可能“动作很大”,故而并不足以为虑。JCS 还认为,即使苏军下决心现在开进朝鲜,其部队的运动与聚集都将“困难重重”,因为“联军”可以“轻而易举地破坏朝鲜所有的交通运输线,并使该地的整个交通系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瘫痪状态”。至于如何让苏联选择现在“待机不动”,JCS 则坚信,这种可能“完全可以通过军事及政治上的机智而有效的运作减少到最小的程度”。对各位参谋长来说,美国及西方在朝鲜正面对一个“二战后对抗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集团的最佳时机”,如果不抓住它,“不仅十分可惜,也将影响对大局有利势头的继续发展。”<sup>②</sup>

另外,军方的战略家针对中国出兵朝鲜的可能与后果也做了研判。其结论有两条:第一,中国单独武装介入的可能性极小,最多迫于莫斯科的压力,而不得已为之;第二,即便“中共”军队参战,也无关大局。早在 7 月初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朝鲜战争局势的会议上,国防部及 JCS 就提醒杜鲁门,如果“朝鲜战场发生突变,莫斯科很可能把中共军队派往朝鲜”。到了 8 月下旬,军方再次在 NSC 会上提出,苏联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迫使中共武装介入朝鲜,“以此来保护苏的东线,从而避免使苏陷入两面同时作战的境地”。<sup>③</sup>如果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军方认为,“中共”的

<sup>①</sup> Memorandum by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31 July 1950, *FRUS, 1950*, Vol. 7, pp. 503 – 504, pp. 507 – 508.

<sup>②</sup> *Ibid.*, p. 503; Memorandum by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7 August 1950, *FRUS, 1950*, Vol. 7, p. 529.

<sup>③</sup> NSC - 73, 1 July 1950, *FRUS, 1950*, Vol. 1, p. 334; NSC - 73/4, 25 August 1950, *ibid.*, p. 383.

军事力量无论如何是无法阻挡“联军”越过三八线向朝鲜挺进的。由陆海空军军事情报人员参加的“联合情报委员会[Joint Intelligence Committee]”，在其 7 月的一份“情报分析”中，列举了苏压“中共”参战的种种可能后断言：“中共”尚不具备抵御“联军”进攻的军事实力。其主要依据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仍处于一个“低级的、原始的水平”。根据这些军事情报人员对解放军的了解，“共产党的军队装备低劣，只能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从建军至今，尚未与“训练优良、装备先进、而且士气高涨的现代化部队交过手”。这样的军队，即便“冒险”赴朝作战，焉能是“联军”的对手。<sup>①</sup> 10 月初的另一份“情报分析”，更具体地指出：“鉴于中共军队目前尚不具备必不可少的空中与海上支持力量，其军事介入朝鲜战争，可能对局部有一定影响，但决无制约全局的可能。”<sup>②</sup>

在推动华盛顿决策者最终接受“打过三八线”的选择上，“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联军”仁川登陆成功，以及此后的“势如破竹”般地收复韩国的胜利，使麦克阿瑟一夜之间变成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英雄”。正如美海军高级将领威廉·海尔西(William F. Halsey)上将在他致麦克阿瑟的一份电报中所赞美的，“仁川登陆，是人类历史上最高明的、最冒险的一次战略打击行动”。在这样一片赞誉声中，作为战区指挥官的麦克阿瑟，参与最高级军事战略决策的地位，无形间得以迅速提升，他个人判断与提议的分量也更重了。根据美军方的指挥控制惯例，麦克阿瑟应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并听其命令。然而，在“仁川登陆”的决策中，“联合国军”总司令却和 JCS 在“攻击方向、登陆点及兵力部署”诸方面存在根本分歧。根据 JCS 最初的测算，仁川极不适合现代化部队的大规模登陆作战，成功的概率只有“五千分之一”。另

---

① JIC 情报分析，1950 年 7 月 11 日，摘于 Foot, *The Wrong War*, p. 81。

② CIA, “Intelligence Estimates,” 12 October 1950, FRUS, 1950, Vol. 7, p. 933.

外,JCS 还担心投入“太多兵力”,而使美“本土战略后备力量、日本的防卫均受到严重削弱”。为了说服麦克阿瑟,8 月底,陆军参谋长考林斯(J. Lawton Collins) 将军与海军作战部长谢尔门上将曾亲赴东京,提醒麦克阿瑟指挥作战时“多几分慎重”。然而两位“来自五角大楼”的将军不仅没说服麦克阿瑟,反被“信心十足、极富雄辩的老资格”将军改变了初衷。虽然 JCS 最终勉强同意了麦克阿瑟的作战计划,但一直认为其过于冒险,胜算不大。<sup>①</sup>对“联军”冒险的成功,JCS 的高级将领们一方面感到“欣慰”,但同时也觉得脸上无光。这种复杂心理便产生了军方战略决策上的“困惑”:尽管为了迅速改变其在最高决策层内“信用度”大打折扣的状况,JCS 不得不更“极力”地坚持其立场,但对“联军”司令“专权”不得不作出越来越大的某种让步。

早在 8 月初,麦克阿瑟即开始对华盛顿施加压力,以期“联军”能得令“打过三八线”。在东京他的总部向总统特别顾问哈里门报告朝鲜战局时,麦克阿瑟声称,一旦“联军”反击成功,杜鲁门应授予他“领兵进攻”朝鲜的权力,否则,美国在朝鲜的兴师动众,即使收复韩国,也达不到“一劳永逸”的目的。至于苏联是否会因此而参战,麦克阿瑟则认为“苏军不会有直接干涉韩战或和美国开打全面战争的兴趣”。<sup>②</sup>值得注意的是,麦克阿瑟此时甚至认为,通过联合国、华盛顿批准“联军”的北进,可使杜鲁门政府彻底抛弃其对北京政策中所包含的“幻想成分”。值得注意的是,身为入侵朝鲜的“联军”军事指挥的麦克阿瑟,似乎也企图影响华盛顿的对华政策取向。他“毫无隐讳”地告诉哈里门,他对白宫要他“收集中共支持朝鲜的证据,以反驳联合国内支持北京政府取代蒋介石代表中国席位的国家”十分有兴趣,并会“全力实施之”。9 月中旬,麦克阿

<sup>①</sup> Kuafman, *The Korean War*, pp. 80 ~ 81.

<sup>②</sup> 参看 Memorandum by Harriman, 20 August 1950, FRUS, 1950, Vol. 7, pp. 543。

瑟亲笔致函联合国大会，作证道：“中共已经为朝鲜提供了相当大规模——如果尚未达到决定性的程度——的军事支持。这一支持主要体现在让大批久经战争的朝鲜籍官兵返回并担任朝鲜进攻部队的主力。根据对朝鲜战俘的讯问，相当大比重的战俘曾在[中国]满洲接受过军事训练，或者曾在中共军队里长期服务过。”虽然麦克阿瑟并未直接谴责北京政府，但是他的“书面作证”在9月18日联合国安理会听证会上宣读后即刻产生了效果：该会第二天对印度代表“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提案的投票，造成了16票赞成、33票反对、10票弃权的结果。<sup>①</sup>而当“联军”登陆成功，但尚未拿下汉城时，麦克阿瑟要求越过三八线的愿望，便显得更加迫切。特别是“仁川大捷”鼓动了美国媒体，也激励了国会“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们。一时间，要求麦克阿瑟“乘胜前进”、“解放全朝鲜”的呼声与日俱增。面对这样的政治压力，麦克阿瑟认为，杜鲁门政府已无法挡住“联军”的北进了。<sup>②</sup>

虽然麦克阿瑟越过三八线以“收复失地”的要求与JCS不谋而合，但五角大楼的军事战略家们却试图对“联军”司令施加限制。他们十分清楚，这个“联军”司令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区域军事指挥官”，而是20世纪美国军界的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因此JCS与他的指挥关系必须慎重处理。特别是麦克阿瑟指挥的仁川登陆，经过媒体的渲染，更使富有丰富想像力的美国公众对他顶礼膜拜，捧上了神坛。《纽约时报》曾发表社论，称麦克阿瑟是“上苍赐给”美国的“军事天才”，他是“最出色的战略家，最激动人心的领导，在困境中最沉着、最稳重，却又能做出最果断、最大胆的决定”。<sup>③</sup>在五角大楼内，当时只有两位将军在资历上接近麦克阿瑟

---

① *New York Times*, 19 September 1950, p. 19; Richard Whelan, *Drawing the Line: The Korean War, 1950 – 1953*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0), pp. 223 – 224.

② Haufman, *The Korean War*, pp. 83 – 84.

③ *New York Times*, 29 June 1950, p. 28.

的声望：一位是国防部长马歇尔，另一位则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马歇尔虽与麦克阿瑟同为“五星将军”，但后者要比前者升任将军阶衔要早很多。一战后二战前期间担任陆军参谋长的麦克阿瑟，传闻曾试图阻止授予当时的上校马歇尔将军衔。二战期间，两人在军中的地位换了个位：马歇尔变成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则以“退休将军”的身份被召回指挥亚太战场。此后，两位将军矛盾不断。特别是麦克阿瑟，多次指责马歇尔在二战中受英国摆弄而片面地偏向欧洲战场，在战后使华“调解”国共纷争惨遭失败，而导致“中共”在中国夺取政权，使美在东亚的势力范围“支离破碎”。布莱德雷也是军中老资格了。1915年毕业于西点军校。由于同班同学大多成为将军，那一班变为“将军班”。布莱德雷二战后期声名显赫。盟军诺曼底登陆中，他是美第一军军长，在尔后收复法国的战役中，布莱德雷指挥第十二军团，统领四个军，共130万部队，在美军历史上，是区域指挥官统帅兵数最多的一位。但是，由于布莱德雷与马歇尔长期为上下级（1929—1939年，两人同时任职于步兵学校，1939—1941年，布莱德雷是马歇尔参谋部的助手）个人关系密切，因此自然而然地与麦克阿瑟疏远。<sup>①</sup>很明显，此时主政五角大楼的马歇尔、布莱德雷与麦克阿瑟，不仅政见分歧，而且多年积累的恩怨甚重。故而在“越过三八线”的决策与指挥上，关系甚为微妙。

就如何既满足打击朝鲜的目的又限制麦克阿瑟可能的“冲动”，JCS于1950年9月11日草拟一份命令，并协同国防部一起提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通过，形成“国安会第81号[NSC 81]”文件。此文件就如何“避免战争的扩大”委实下了一番工夫。其要点是：第一，“联军”将被授权越过三八线，以“逼迫北韩军退出韩国”；第二，假如在“联军”越过三八线前，苏联或中国武装介入

<sup>①</sup> Lawrence J. Korb,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First Twenty-five Years*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41—142.

朝鲜战争，“联军”不得在三八线以北“进行任何地面作战行动”；第三，“联军”不得在任何情况下对中国的满洲或苏联边境地区“实施空中、海上或地面军事行动”；第四，在对朝鲜的北部边境地区的军事攻击中不得使用“非韩国部队”，是美国的“基本政策”；第五，麦克阿瑟将被授权制定“占领朝鲜”的“备用计划”，但任何此类计划，“在未得到总统批准前，不得实施”。至于在苏联或中国武装介入的情况下，“联军”将如何对付，JCS 的决定则显得十分奇怪。“如果苏军进入朝鲜或者向三八线以南运动，”NSC - 81 号文件指示，“麦克阿瑟必须命令‘联军’立即转入守势，并尽快向华盛顿请示”，并且在未得到命令前，“不得轻举妄动”；然而，“如果红色中国部队侵略三八线以南地区”（注意：这里“中国部队进入朝鲜”的假设被省略，笔者注），麦克阿瑟得以“继续攻击”朝鲜，“只要他确认‘联军’不会遭中共军队重创”。这个文件最后强调，“上述各项行动计划，目前均不得付诸行动。而何时行动，将取决于苏联及中共的反应，取决于与盟国磋商的结果，以及取决于对触发全面战争的风险的判定。”4 天后，“仁川登陆”战役开始不久，JCS 即将 NSC - 81 号文件的“要点”送达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并附有一简要说明：“正式命令将随后到达，但届时会有新政策。”其意思非常清楚，警告麦克阿瑟不得贸然行事。<sup>①</sup>

在麦克阿瑟护送韩国总统李承晚重归汉城的两天前的 9 月 27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给“联军”司令部下达进攻朝鲜的命令。这份命令基本上是以 NSC - 81 号文件为蓝本，但标明此决定不仅得到“国安会”以及国务卿艾奇逊的支持，杜鲁门总统业已批准，主要盟国也认可了。JCS 命令称，“你的军事目标，是摧毁朝鲜的军事力量，……据此，你被授权指挥越过三八线并向北作战的军事行动。但是，这一行动的实施前提是，在你发起进攻时，苏联或中共尚未派

---

<sup>①</sup> NSC81, “U. S. Courses of Action in Korea,” 11 September 1950, FRUS, 1950, Vol 7, pp. 685 – 693.

大部队入朝，也未公开宣布要派兵入朝，或威胁要抵抗我在朝鲜的军事行动”。除此之外，JCS 的命令强调指出，“在任何情况下”，麦克阿瑟不得让地面部队进入满洲或苏联境内，也不得动用空军或海军袭击满洲及苏联领土以支援“联军”对朝鲜的军事行动。另外，“作为既定的政策，[联军中]非韩国部队最好不参加对紧靠中国或苏联领土的朝鲜北部边境的攻击，然而，联军可以对攻击这些地区的韩国军队提供空中及海上支持”。JCS 对麦克阿瑟的另一限制是，要他不得就“如何统一朝鲜”发表任何公开言论，因为这一问题将要由联合国决定。最后，JCS 要求麦克阿瑟尽快就“进攻朝鲜”拟订作战计划，并上报 JCS、国防部，以便由国安会及总统核准。<sup>①</sup>

实际上，麦克阿瑟的参谋们早就在秘密策划“进攻朝鲜”的作战计划了。JCS 命令到达的第二天，“联军”司令部便立即上报了其作战方案。大致的进攻部署是这样的：第一阶段，陆军第八军与海军陆战第十军将兵分两路。前者从汉城出发，向西北以攻取平壤，后者先在距三八线 100 英里、位于朝鲜东海岸的港口元山发动登陆攻击，得手后向西攻击前进，以期与前者的防卫线连接起来；第二阶段，防线连接后的“联军”主力将齐步向北攻击前进，但抵达朝鲜半岛东西最窄处，西起兴南至东海岸的定州线后，便转入“防御”，而只派韩国部队继续向北攻击。有趣的是，关于这一作战计划的制定，完全局限在麦克阿瑟身边的几位高级幕僚之间。各作战部队的指挥官，直到此时均被蒙在鼓里。例如第八军军长瓦顿·瓦尔克(Walton Walker)将军便公开抱怨“对作战计划不理解”。但是，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却认为此计划“符合 JCS 的命令，也较稳妥”，便于 9 月 29 日由 JCS 正式批准了麦克阿瑟的“北进计划”。<sup>②</sup>

<sup>①</sup> JCS to MacArthur, 25 September 1950, RG218, JCS Files, Box 383, National Archives.

<sup>②</sup> D. Clayton James, *The Years of MacArthur*, Vol. II, *Triumph and Disaster, 1945 – 1964*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5), pp. 488 – 489.

“联军”向北攻击的行动开始前夕,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当瓦尔克将军公开抱怨时,美国媒体报道了他对“联军”指挥系统的批评,并称瓦尔克宣布他的第八军及属他指挥的韩国部队,都会在三八线处休整。这一说法被媒体解释为,“联军”在联合国的“最后指示”未做出前,不会“打过三八线”。五角大楼与“联军”司令部均感到惊诧,因为就“是否打过三八线”一旦交由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必将出现意外,仅“冗长”的听政就要导致“联军”贻误战机,也必定给苏联、中共更多的时间准备。在这种情况下,9月29日,马歇尔决定与布莱德雷联名发了一份“绝密”电报给麦克阿瑟。电报中,二位将军要求麦克阿瑟立即采取行动,力求“杜绝”类似“瓦尔克报道”这类有关“联军”行动意图的任何公开言论。他们解释道,如果一旦由联合国作最后决定,“打过三八线”的计划必将“夭折”。然而,最有争议的是电报中的一句话:“我们希望你在向三八线以北前进时,不要在战略上、战术上感到受到限制。”这句话如果脱离其背景或上下文来解释,极易被理解成“马歇尔与布莱德雷为麦克阿瑟攻击朝鲜大开绿灯”。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二战时马歇尔与麦克阿瑟间,类似这样的“误解、曲解”常常发生。马歇尔似乎并未吸取教训。<sup>①</sup>起码麦克阿瑟是这样理解的。他便立即回复五角大楼。此时的“联军”司令显得“绝对有信心”,他向马歇尔保证,“在他看来,只有后勤供应不足才有可能限制我们前进”。他强调说,“我已经把整个朝鲜认作我们作战的区域,[联军的战斗将]直到敌人放下武器[为止]”。<sup>②</sup>

第二天,麦克阿瑟在东京公开广播,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平壤“无条件投降”,因为“你们的武装部队及战争机器

① Marshall to MacArthur, 29 September 1950, FRUS, 1950, Vol. 7, p. 826. 英文原文为:“We want you to feel unhampered strategically and tactically to proceed north of the 38th Parallel.”

② MacArthur to Marshall, 30 September 1950, RG6, Department of Defense Files, National Archives.

将在近期内不可避免地遭受彻底失败和完全被摧毁”。同一天，麦克阿瑟指示韩国第三师越过三八线向东海岸的高城发动攻击。为了尽早逼迫朝鲜就范，麦克阿瑟计划公开报道韩国部队越过三八线的军事行动。在请示五角大楼时，JCS 立即加以否定，并命令“联军”司令“只管指挥军事行动，不要再作任何公开解释，让行动的本身决定情势的发展”。JCS 强调，美国政府“不愿在我们尚未达到军事目的前，而使三八线变成难缠的[政治]议题”。<sup>①</sup>

此时，北京做出了反应。9月30日，中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抗议美入侵朝鲜”的政府声明；10月2日午夜，周恩来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利枷(K. M. Panikkar)，明确表示“假若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决不会不管”。周恩来的警告，第二天早上刚过5点半就传到国务卿艾奇逊手上，英文稿清楚地标明“中国会干涉[China will intervene]”。同时传到的，还有一份美空军情报部门的报告，“据在朝鲜的空中侦察表明，大批来自满洲的汽车、机动车开往朝鲜”。<sup>②</sup>此时，“联军”打过三八线的行动，仍局限于韩国部队：紧随第三师，韩国首都师等4个师已分别在东部与中部越过了三八线，韩国先头部队最近已深入朝鲜50英里之多。美军与英军均在三八线上未动。

中国的警告与“准备”军事介入的情报，也几乎在同一时间报到麦克阿瑟的办公桌上，对此，“联军”司令根本没当一回事。在当天与英军代表阿维里·盖斯奥金(Alvary Gascoigne)谈话中，他认为北京的警告只是“空洞的恐吓”。倘若中共真有胆量武装介入，麦克阿瑟肯定地说，“他将立即解除对美空军的限制，马上实施对

<sup>①</sup> 参谋长联席会议致麦克阿瑟电报，1950年10月1日，摘于 James, D. Clayton, *The Years of MacArthur: Triumph and Disaster, 1945–1964*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5), Vol. II, p. 489。

<sup>②</sup> 同上，第490页。

满洲、华北各城镇，甚至北京的轰炸”。麦克阿瑟的战争升级打算，已完全超出了 JCS 基于 NSC - 81 号文件的命令所规范的范围。盖斯奥金极为紧张，随即报告了伦敦。10月5日，在伦敦召开的西欧“外长和国防部长联席会议”上，英总参谋部提交并建议讨论了盖斯奥金的“与麦克阿瑟谈话报告”，与会者一致认为，必须限制“联军”在三八线以北的行动，必须让“所有的非韩国部队在三八线以南再停留一到两周，以便给外交官们充裕的时间来说服朝鲜投降，并把中国拉进国际解决朝鲜问题的谈判中”。这一决定从伦敦传到英驻华盛顿的军事代表空军元帅泰德尔手中，并经泰德尔转交给美参谋长会议主席布莱德雷。<sup>①</sup>

有趣的是，英美的外交官们，对此却不以为然。英国外交大臣贝文(Ernest Bevin)认为，作为盟国，伦敦如果过多干涉华盛顿在朝鲜战场上的军事指挥，“政治风险太大”。首先，现在逼麦克阿瑟延缓进攻，倘若造成朝鲜军事形势突变，整个西方集团必定“怪罪英国”，而使英国在朝鲜不得不承担更大的负担；其次，由于西欧的军事安全、经济重整都完全依赖美国，一旦“得罪”华盛顿的军界，至少导致美对英以及其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军事援助减少。基于这种考虑，贝文在征得总理艾德礼(Clement R. Attlee)的同意后，向美国务院非常低调地要求华盛顿保证“把战争仅限于朝鲜”，同时让麦克阿瑟“严格遵守不得轰炸满洲及[苏]西伯利亚的命令”。<sup>②</sup>而国务卿艾奇逊则觉得伦敦过虑了。他根本不相信北京“真敢与联军在朝鲜交战”。在他看来，周恩来的警告，充其量是在“摆政治姿态”：中国领导人大概一方面向莫斯科做样子，另一方面旨在压联合国大会不通过所谓的“授权联军进入北

---

① Stueck, *The Korean War*, p. 95.

② Memorandum by Bevin, “The New York Meeting on the Far Eastern Situation,” 6 October 1950, Prime Minister Records, PREM/81171, Public Records Office, London, England.

韩”的“八国提议”。“如果周恩来真想玩扑克牌”，艾奇逊说，“周应该准备得充分些再上牌桌”；如果中国真的是在警告，警告“就应该直接对美国政府或联军总部发出”，而不是“通过第三者”。据此分析，艾奇逊指示国务院集中精力，力争使“八国提议”在联大顺利通过，而不是努力使朝鲜战争通过外交途径解决。<sup>①</sup>

华盛顿的外交努力富有成效。英美等八国的提案，于 10 月 4 日、7 日分别在联合国“第一委员会”及联大通过，表决结果均为：47 票赞成，5 票反对，7 票弃权。此“联大决议”的主要决定有：第一，“联军应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以创造使整个朝鲜稳定的条件”；第二，授权“联军”在朝鲜“实施包括在联合国监督下民主选举的立宪工作，以期在朝鲜这一主权国家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的政府”。这个“决议”还规定，在上述目标达到后，“联军将不得继续停留朝鲜国土的任何一部分”。<sup>②</sup>至此，美军方的“扫荡朝鲜”的图谋，算是得到了联合国的授权。实际上，在联大决议通过的前十几小时（朝鲜当地时间 10 月 7 日下午 5 点），美骑兵第一师的先头部队已受命在开城越过了三八线，“联军”的主力也准备就绪，并得令向北攻击前进。<sup>③</sup>

### 第三节 “回家过圣诞节”

麦克阿瑟 10 月 2 日制定的“联军”行动计划，体现了对平壤实

<sup>①</sup> Memorandum by John M. Allison, 4 October 1950, *FRUS, 1950*, Vol. 7, pp. 868–869.

<sup>②</sup> Resolution, UN Security Council, 7 October 1950, 参见 *FRUS, 1950*, Vol. 7, pp. 459–461。

<sup>③</sup> Stueck, *The Korean War*, p. 94.

施“钳制”打击的战略意图。按此计划，美第八军拟沿朝鲜半岛的西海岸攻击前进，美海军陆战队第十军将在东海岸的元山登陆，然后向北攻占兴南，得手后再向西直取定州，而韩国军队则在美东西纵队中间行动。对此部署，麦克阿瑟战后解释说，由于主要考虑到朝鲜的地形及美军的特点：机械化程度高的美军能在较平坦海岸线快速行进，而轻装的南韩士兵则更便于在中间地区山地作战。<sup>①</sup>然而其真正的目的是，通过“闪电打击”而一举消灭朝鲜残余武装，尽快结束朝鲜战争。对此，麦克阿瑟似乎志在必得。

然而在 10 月 9 日，当美第八军刚开始越过三八线时，杜鲁门决定面晤麦克阿瑟。从现有档案看，杜鲁门的行政助手乔治·埃尔谢(George M. Elsey)是此次会面的主要策划人。7 日、8 日，埃尔谢数次向总统提议，作为美武装部队统帅与战场指挥麦克阿瑟见面，不仅起到“反击”美国内批评民主党政府“向共产主义妥协”的效应，也可“提醒”麦克阿瑟“慎重”指挥对朝鲜的进攻，特别要“防止引发中共或苏俄的武装介入”。白宫此时正好已经安排杜鲁门 10 月 17 日在旧金山作演讲，因此总统可以提前飞往西海岸“顺便”面见麦克阿瑟。<sup>②</sup>在其 9 日致马歇尔的备忘录中，杜鲁门指示国防部长安排他 14 日或 16 日在珍珠港接见麦克阿瑟以便“商讨朝鲜战事”。<sup>③</sup>对此计划，马歇尔与 JCS 参谋长们颇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在战争的关键时刻，让战场指挥官远离指挥所，有违军事常规。但考虑到确有“限制”麦克阿瑟而不至扩大战争的“必要”，故并未坚持反对白宫的意见。国务院的“高参们”也觉得杜鲁门此行，从美国的对华政策上看，弊多利少。无任所大使菲利浦·杰苏普(Philip Jessup)9 日上午得知此事后，即刻致函国务卿艾奇逊，指出杜鲁门与麦克阿瑟面晤“将会被解释为美国在远东采取新的

---

① Whelan, *Drawing the Line*, pp. 229 – 230.

② 参看 James, *The Years of MacArthur*, Vol. 2, p. 500.

③ Whelan, *Drawing the Line*, 231.

重大行动的预示”。特别是“中共领导人与俄国人已经怀疑我们有在朝鲜长期插一脚的意图，他们必定会认为这一会面是我们意图的佐证”；更具体地说，“中共会担心我们在作战争动员以便从朝鲜袭击中国满洲，或者由我们在满洲缠住中共军队而配合蒋介石在中国大陆南边登陆”的企图，其后果必定是刺激中共尽早、尽快武装介入朝鲜战争。值得注意的是，杰苏普并未建议艾奇逊阻止杜鲁门面晤麦克阿瑟，只是提议总统赴会前与后，均应发表公开声明，表明美国仍试图把战争“限制”在朝鲜。<sup>①</sup>

麦克阿瑟也十分不理解杜鲁门要与他见面的真实意图，但不得不很快做出回应，称“十分乐意与总统会面”，但建议时间放在 15 日上午，地点改在离他的总部东京较近的魁克岛（Wake Islands）。白宫接受了他的建议。12 日，当麦克阿瑟得知将有 35 名报纸、广播及摄影记者乘坐“泛美”包机随总统到魁克岛后，他也要求带些西方驻东京的记者随他同行。对此要求，白宫断然拒绝。至此，麦克阿瑟确定，杜鲁门的“视察安排”完全出于美国国内“政治需要”，与“联军”攻击朝鲜的军事战略毫无关系；他同时对民主党政府利用他的“国家英雄”的“声威”为民主党中期选举“造势”，“极为反感”。<sup>②</sup>

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魁克岛会面，从一开始就矛盾重重。总统的队伍浩浩荡荡，依次分四路抵达这个太平洋小岛。由白宫行政人员组成的“先遣队”10 月 13 日到达，作“安全与后勤准备”；总统座机（道格拉斯 DC-6，名为“独立”号——取名于杜鲁门在密苏里州的家乡小镇）与另外两架分别装载随员、新闻记者的包机，经过长达 18 小时的飞行，于 15 日清晨在小岛降落。杜鲁门的随行大员多达 24 位，包括：总统对外事务特别助理哈里门，参谋长联

<sup>①</sup> Philip C. Jessup to Acheson, 9 October 1950, *FRUS, 1950*, Vol. 7, pp. 915 - 916.

<sup>②</sup> 参看 James, *The Years of MacArthur*, Vol. 2, p. 501.

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陆军参谋长富兰克·佩斯(Frank Pace)，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国务院无任所大使杰苏普，以及美远东舰队司令阿瑟·雷德福(Arthur W. Radford)。而麦克阿瑟只带了3名幕僚，在美驻韩国大使约翰·姆希欧[John Muccio]陪同下，乘专机于14日先行抵达魁克岛。据其随行人员回忆，麦克阿瑟一登机就“坐立不安”，飞机升空平飞后，他“在机上座位间走道中不停地走动”。第二天在机场迎接总统时，杜鲁门注意到，尽管两人是第一次见面，麦克阿瑟对总统似乎并不特别在乎，这位老资格的将军，“军服领口大敞，竟未扎领带，所戴军帽也是油渍斑斑”。<sup>①</sup>当正式会面开始后，会场的气氛也十分不和谐。根据杰苏普的会议记录，在大约90分钟的谈话中，杜鲁门及其高级随员问了麦克阿瑟多达30余个问题，使他感到在“受审”。<sup>②</sup>

会晤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共武装介入朝鲜”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当杜鲁门提出这个问题时，麦克阿瑟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可能性非常小。”即使中共介入，麦克阿瑟假设道，对“联军”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也无大碍。他向杜鲁门解释说，如果中国军队在战争爆发的“第一或第二个月介入”，那么对战争发展的方向可能会有“决定性”的影响，但现在介入，为时已晚。根据他的有关中共军队动向的情报分析，麦克阿瑟很有信心地认为，“中共在整个满洲驻有30万军队，而沿鸭绿江一线充其量部署了10到12万人，最多5到6万人可能已渡过了江”；而这些部队主要是步兵，中国人民解放军压根就没有空军。“联军现在已在朝鲜建立了空军基地，倘若中国人试图南下以保卫平壤，那他们将会遭到最大限度的屠杀[the greatest laughter]”。当被问及苏联空军参战的可能性时，

① Harry S. Truman, *Years of Trial and Hope*, Vol. 2, p. 364.

② Minutes of Wake Island Meetings, 15 October 1950, FRUS, 1950, Vol. 7, pp. 948–960.

麦克阿瑟同样显得信心十足。尽管苏联人“在西伯利亚驻有空军，而且是支不赖的空军部队”，尽管苏联人有能力派遣大约 1 000 架战机参战并能从其第五、第七航空大队再抽调 2 000 到 3 000 架飞机，“但苏联空军不是我们空军的对手”。即便苏联派出空军支援中国地面部队，麦克阿瑟也觉得不足为虑，因为“空军配合地面攻击不是件容易的事，要想配合默契，必须要经过长期合训”，而现在苏空军与中共步兵根本没时间演习协同作战，因此，麦克阿瑟断定，“俄国空军扔在中国人头上的炸弹大概会和扔在我们头上的一样多，我坚信：苏联空军与中国步兵的合作干涉绝不可能奏效”。<sup>①</sup>从现有的档案看，杜鲁门以及他的军政幕僚根本就没有作进一步询问，也没有对麦克阿瑟的判断提出任何疑问。

会晤很快转向战后朝鲜的重建及美对远东的战略设想问题。麦克阿瑟的回答仍然非常肯定和充满自信。朝鲜的军事形势已日趨明朗，他认为，“朝鲜的处境已十分凄凉、绝望，大约到‘感恩节’时，朝鲜在南北的正规抵抗行将全面结束”。他预计“联军”将在 10 月 19 日夺取平壤，并计划“在圣诞节时把美第八军全部撤回日本”而只留下美海军陆战第二、第三师以及“联军”的小部队以维护朝鲜治安，保证“全民选举”在 1951 年初顺利进行。麦克阿瑟特别强调，战争结束后，美对朝鲜不得考虑“武装占领”，因为几乎“所有的[战后]武装占领都将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为了加强美对远东战略利益的保护，麦克阿瑟建议杜鲁门应把朝鲜的重建纳入美如何在远东重建军事威慑的战略框架中考虑。因此，具体的政策应包括：第一，美至少应留下 500 名“援韩军事顾问”以帮助重建韩国军队；同时，美应计划负责对韩军 10 个陆军师的装备，并为其建立、训练出一支“规模小但战斗力强”的海军与空军。麦克阿瑟强调，韩军的武装力量发展要以“能够保卫朝鲜、威慑中共以致迫其

<sup>①</sup> Minutes of Wake Island Meetings, 15 October 1950, FRUS, 1950, Vol. 7, pp. 948 ~ 960.

不敢在将来贸然犯韩”为目标，因为今后中国犯韩的可能性甚大，“决不可对此一笑了之”。第二，美还得认真考虑对韩的长期“经济援助”。对此，麦克阿瑟及美驻韩大使姆西欧均认定，“每年不得少于 1.5 亿美元”。第三，尽管联合国内有反对韩国总统李承晚的呼声，华盛顿应明确表示支持李担任“统一”后的韩国总统。有趣的是，杜鲁门及其随员对麦克阿瑟的局势分析毫无疑义，同时，对其建议也甚为赞同。<sup>①</sup>

此时的麦克阿瑟似乎已胜券在握。他不仅对朝鲜半岛北部志在必得，也企望对美在整个远东的战略态势重作部署。魁克岛会面后，“联军”总司令断然宣布：“将士们将回国欢度圣诞节”，同时又将原定的“联军”警戒线向北推进至少 100 公里。10 月 19 日，捷报传来：第八军在未遇到朝鲜抗击的情况下顺利占领平壤；而美中不足的是，美第一百八十七伞兵团在平壤以北 90 公里处的拦截行动未能奏效，朝鲜领袖金日成及其核心领导得以逃脱。10 月 24 日是“联合国日”。这天，“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又做出另一极有争议的决定。在其当日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中，麦克阿瑟称“业已命令属下所有将领，全速、全力向北攻击”。这一决定意味着“联军”的行动已完全“漠视”五角大楼 9 月底对进攻朝鲜的限制，即“除了韩国军队外，联军不得进入朝鲜与苏联、中国满洲交界的地区”。<sup>②</sup>然而，当 JCS 向麦克阿瑟提出质问时，麦氏解释道：以南韩军队目前的状况，不足以占领鸭绿江以南的边界地区，同时，南韩军只有在“经验丰富”的“联军”领导和支持下，才可能“有效地”作战。另外，麦克阿瑟特别提到国防部长马歇尔 9 月 29 日电令，授权于他“在战略、战术上不受限制”。最后，麦克阿瑟称：他

① Minutes of Wake Island Meetings, 15 October 1950, FRUS, 1950, Vol. 7, pp. 948 ~ 960.

② MacArthur to JSC, 24 October 1950, RG9, Modern Military Records, National Archives.

10月24日命令，与杜鲁门总统在魁克岛对他的授权“毫无冲突”——至于杜鲁门到底给了他什么具体授权，他全然不提。<sup>①</sup>

“联军”向鸭绿江边的攻击，很快遇到“小规模，但十分有力”的抗击。特别是韩国第六师于10月25日至29日在温井所受到的重创，使“联军”情报人员开始怀疑“联军”是否碰上“中共军队”了。然而，麦克阿瑟却根本不相信中国已经大规模地武装介入朝鲜战争了。在其11月2日报JCS的电文中，他坚持认为北京虽在满洲聚集了大批部队，但至今最多派遣了16500人进了朝鲜。<sup>②</sup>此后不久，指挥“联军”西线作战的第八军司令瓦尔克将军报告麦克阿瑟，他旗下的美骑兵第八师也与“中共军队”遭遇，并“已出现伤亡”；鉴于敌情不明，他已命令第八军全线后撤，退守清川江。<sup>③</sup>至此，麦克阿瑟才不得不承认北京“已下决心武装介入了”。然而，他仍坚持没有必要“改变联军的攻击计划”。11月4日，他电报五角大楼，提醒华盛顿不必紧张，因为“中共”的全面武装干涉“尚待由更充足的证据加以确认”，但根据他的“推测”，北京一定会“慎重地”考虑其对朝鲜战争的干涉；“中共领导人”一定会以“有限的军力”以期达到“有限的目的”。引用他的原话，北京最多想“从已遭破坏的残骸里抢救点什么”。具体地说，麦克阿瑟认为中国领导人最多有四个选择：第一，全面介入；第二，为朝鲜暗中提供军事援助；第三，派遣部分“志愿军”以支援朝鲜军队；第四，有限的武装介入但只限于与韩国部队在中朝边境处交战。以他判断，“中共”决策者决不会选择第一个可能，而是否选择第四种可能也需要时间来证实。因此，北京最大的可能是选择第二或第三的方式介入朝鲜战争。

<sup>①</sup> JCS to MacArthur, 24 October 1950, RG9, Modern Military Records, National Archives.

<sup>②</sup> MacArthur to JSC, 2 November 1950, RG9, Modern Military Records, National Archives.

<sup>③</sup> 参看，Whelan, *Drawing the Line*, p. 246.

对此，“联军”又何虑之有？<sup>①</sup>

此后的两天里，麦克阿瑟开始策划如何阻止中国军队大规模介入朝鲜战争。他的第一个决定是，派遣空军炸毁鸭绿江上连接中国丹东与朝鲜新安州的两座大桥。在作出此决定前，麦克阿瑟竟然觉得没必要先取得五角大楼的批准。但是，当美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觉特尔(George Stratemeyer)将军接到此令时，觉得甚为不妥。便于11月6日华盛顿时间的清晨，电话报告了空军参谋长范登堡。范登堡立即转告了国防部副部长拉维特。上午10点，拉维特准时来到国务院，参加国务卿艾奇逊主持的“紧急会议”。当他报告麦克阿瑟业已调动了90架B-29轰炸机准备3小时后从日本出发执行轰炸鸭绿江大桥的任务时，艾奇逊顿时感到问题严重。此前，英国曾很清楚地告诫华盛顿，“联军”的对朝鲜行动，决不得靠近中朝界河，否则英国将自行从“联军”中撤出英军；现在，麦克阿瑟计划中的轰炸，不仅要炸中朝界河，还极可能“误炸”中国境内，那么伦敦的反应将会多么强烈则是可想而知的了。美在朝鲜，乃至在整个远东如果得不到英国的支持与协作，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艾奇逊立即给人在堪萨斯城的杜鲁门挂电话请示，总统的答复是：“只有在必须保护我军不受攻击的情况下，方可采取这一行动。”这就意味着，在其他情况下麦克阿瑟的行动计划必须取消。在与国防部长马歇尔取得一致后，JCS受命在美东部时间11点40分——仅距离麦克阿瑟计划的起飞时间只有1小时零20分钟——电令麦克阿瑟“延缓执行”轰炸计划。<sup>②</sup>

对此命令，麦克阿瑟立即予以反驳，而且言辞强烈。在他给五角大楼的电报中，他认为华盛顿的战略家们对朝鲜战场情况根本不了解。“此时此刻，大队人马、大批物资正在通过鸭绿江大桥从

① MacArthur to JSC, 4 November 1950, RG9, Modern Military Records, National Archives.

② 参看，Whelan, *Drawing the Line*, pp. 246–247。

满洲涌人朝鲜，”麦克阿瑟辩驳道，“这些人马与物资的到达，不仅会使我指挥下的军事行动受阻，还有可能最终使我的部队受到重创；因此，对你们为我军行动设下的限制，我根本无法估量将带来军事上及心理上的灾难性的结果。”鉴于他与五角大楼的分歧，麦克阿瑟要求 JCS“立即”将他的意见“呈报总统”。<sup>①</sup>大概考虑到美军统帅总部必须尊重战区指挥官的传统，杜鲁门接受了麦克阿瑟的意见，批准他实施既定的轰炸鸭绿江大桥计划。JCS 不得不将总统指令传达给“联军”总部，但在其电文中，坚持认为“尽管炸毁鸭绿江大桥会使你所统领的部队更加安全些，但是，倘若你的轰炸行动造成对满洲的袭击而使中共或苏联不得不加快其武装介入的步伐，其结果不仅是对你的部队安全危害更大，还要使美国在那儿的介入陷入最危险的境地”。<sup>②</sup>

在如何看待北京武装介入的问题上，五角大楼与麦克阿瑟的分歧已十分明显。JCS 再度试图限制“联军”的行动。在其 11 月 8 日致“联军”总部的电报中，JCS 指出：如果“中共”确实在以麦克阿瑟认为的规模干涉朝鲜战争，“联军”应该考虑是否有必要修正攻占朝鲜的军事意图，并接受不能占领朝鲜全部的事实。<sup>③</sup>在第二天的“国家安全会议”上，JCS 又提交了内容大致相同的备忘录，并进一步说明，“让‘联军’缠在一场比赛旨在把中共军队赶出朝鲜的战斗，实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从军事角度看，“如果继续把美国武装力量投在朝鲜，美对其他战略要地的军事投入将受损害”。据此，JCS 建议“采取所有可能的紧急措施，以求达到政治解决中共武装干涉朝鲜的问题；最好是通过联合国，让中共真正了解并接受我们在朝鲜[有限]的意图”。然而，JCS 的提议又有着自相矛盾的地方：“在没有真正弄清中共武装干涉的意图与规模时，我们建

<sup>①</sup> MacArthur to JSC, 4 November 1950, FRUS, 1950, Vol. 7, p. 1058.

<sup>②</sup> JCS to MacArthur, 7 November 1950, FRUS, 1950, Vol. 7, p. 1075.

<sup>③</sup> JCS to MacArthur, 8 November 1950, FRUS, 1950, Vol. 7, pp. 1097–1098.

议只对‘联军’原攻击朝鲜的命令作进一步考虑,但不必即刻改变它”。<sup>①</sup>

即便是这样一份含义不确切的电报,也使麦克阿瑟甚为不满。他立刻给 JCS 发电,表示“强烈抗议”。现存在档案里的这份电报,电文长度超过常规,所使用的语言也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其中有几点值得指出:首先,麦克阿瑟指出:“就我看来,对联合国消灭朝鲜所有敢于反抗的武装并使全国统一的基本政策作任何修正,都将是致命性的”。这是因为,“任何期望中共在朝鲜北部站住脚后将不会再向南扩张,都将成为痴心妄想。……同时,出让朝鲜任何一块地盘给中共侵占,都将是自由世界在近期内所遭受的最大的挫败,从而使我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彻底垮台并将使我们的政治与军事的索求变得可望而不可即”。其次,麦克阿瑟认为 JCS 的建议,军事、战略上的“不良”后果也甚严重。倘若“联军”即刻停止旨在攻占朝鲜全境的行动,“我军的士气将一泻千里,盟军也会指责我们为何要在韩无限期地守着一条极其难守的防线,韩国也会毫无疑问地怨恨我们并有使其军队崩溃甚至对我反目的可能”。再次,麦克阿瑟坚信“联军”完全有能力控制战场局面。他说,“受我指挥的空军除了不能炸中朝边境的水力发电站外,在整个朝鲜已无所限制,故而完全可以切断中共从满洲通过鸭绿江对其已渡江的部队的支援,从而保证我军全歼正在与我作战的中共部队”。最后,麦克阿瑟“十万分诚挚地要求:值此关键时刻,不要再有任何泄我气而长他人志的言行,让我们继续前进,夺取全面胜利,只要我们不屈不挠,我坚信,胜利是属于我们的”。<sup>②</sup>

麦克阿瑟对朝鲜战局的判断似乎不容置疑。特别是 11 月 7 日当前线报告中国军队突然脱离接触并向北撤退时,从国防部长

① Minutes of NSC meeting, 9 November 1950, FRUS, 1950, Vol. 7, pp. 1120 - 1121.

② MacArthur to JCS, 10 November 1950, FRUS, 1950, Vol. 7, pp. 1107 - 1110.

马歇尔到三军参谋长们,甚至杜鲁门,均觉得“联军”尚可再冒次险,故而在 21 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决定放手让麦克阿瑟作最后一搏。此决定是由陆军参谋长考林斯将军转达给麦克阿瑟的,但考林斯在转达时告诫“联军”总司令不得擅自攻进中国的满洲或苏联境内。<sup>①</sup>至此,麦克阿瑟对其“攻占朝鲜的最后一战”已扫清了“所有政治障碍”。11月 24 日是“联军”发动攻击日。当日,麦克阿瑟乘机飞临朝鲜距离鸭绿江不远的新安江上空,亲自发令打响攻击的第一枪。他还郑重宣布:中国决不会进一步介入战争,两星期后,“联军”将获全胜。<sup>②</sup>

“联军”发起攻击三天后,东西两线均遭到中国志愿军的有力抵抗。随后,战场情势急转直下,美第八军及海军陆战队第十军在中国军队的强劲反击下,不得不后撤。对此,麦克阿瑟大惊失色。11月 27 日晚,他电报五角大楼,惊呼:“我们正面对着一场全新的战争。”他解释道:“我们联军攻击行动所带来的战场变化已具有全新含义。所有的使朝鲜战争地方化并限于只与朝鲜军队交战的希望,至此已完全化为乌有。中国军队已经大规模地,并且规模越来越大地投入朝鲜。”<sup>③</sup>今天用历史的眼光再读麦克阿瑟有关中国武装介入朝鲜战争的所有电报,恐怕这一份最准确地反映了实情。

### 小 结

西方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尽管不少学者沿用“错误的战争”

<sup>①</sup> Minutes of NSC Meetings, 21 November 1950, FRUS, 1950, Vol. 7, p. 1205; Collins to MacArthur, 21 November 1950, FRUS, 1950, Vol. 7, pp. 1222 – 1224.

<sup>②</sup> 参看, Whelan, *Drawing the Line*, p. 259.

<sup>③</sup> MacArthur to JCS, 27 November 1950, FRUS, 1950, Vol. 7, p. 1237.

分析框架,<sup>①</sup>也有研究指出,作为一场核时代的“有限战争”,美国出兵朝鲜的战略目的是为了“明白无误”地表明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全球性“扩张”的政治意图和战略能力,威慑苏联的进一步军事挑衅,胁迫朝鲜收敛“侵略行为”。<sup>②</sup>但是,若仔细考察杜鲁门政府的战略思考与制定的过程,不难看出,美国贸然在朝鲜发动“有限战争”很大程度上与由 NSC - 68 号文件所既定的全面、无差别的遏制战略框架存在密切的关联。通过朝鲜战争的检验,战略设计与实施层面上的非理性得以显现。

首先,美国武装入侵朝鲜的行为,完全出于杜鲁门政府——特别是 NSC - 68 号文件体系内——对“共产主义威胁”放大化的误判。如果说华盛顿在 1949 年底—1950 年初的冷战战略重点仍固定在欧洲、地中海地区,对东亚——特别是对中国——只是“待尘埃落定”,但到了 1950 年春对亚洲、对中国的战略思考发生了实质性转变。尽管美国战略家们的一只眼睛仍盯住莫斯科,可他们的另一只眼睛已经开始注意北京。于是,在 NSC - 68 号文件中,来自“远东”和亚太地区的对美战略利益的威胁明显上升。特别是在确定苏联对抗美国的主要战略是在所谓“软地带”、以“区域冲突的形式”挑战“现状”之后,中国便自然变成了苏联这一战略在亚洲的主要执行者,而朝鲜战争的爆发恰恰似乎“印证”了“尼兹们”的推测。一旦决策者的危机心态形成,他们试图“管理危机”的迫切心情便会加重。例如,到 1950 年春末,杜鲁门开始“经常性”地与

---

① 参看: Rosemary Foot, *The Wrong War: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1950–1953*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② 如: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Stueck, William Whitney, Jr., *The Korean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Shu Guang Zhang,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 1949–1958*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JCS 主席及各军参谋长们会面,了解美苏的战略对抗态势。由于总统对军事战略的密切关注,使华盛顿的战略决策注入了新的“动力[dynamics]”。表现形式之一是:很快,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马歇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利及其他参谋长们,也定期到 JCS 的“作战指挥室”分析“敌情”,研究对策。<sup>①</sup>

其次,美国在入侵朝鲜初期的军事战略决策上,受制于 NSC - 68 号文件中的一个错误的思维逻辑,即:冷战对抗中“任何一地的丢失都是对全线的一个重创”。而根据这一逻辑产生的威胁认知,便将全局的或是局部的、潜在的或是即刻的、战略的或是战术的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威胁一律看成是同一力度的威胁了;继而由于美国的战略利益不再被分成“核心的”或“重大的”或“边缘的”,美国的全球遏制政策便无重点与非重点之分了,其结果是抛弃了遏制的最初设计者凯南的“非平衡遏制”或“动态遏制”而转向“平衡遏制”与“全面遏制”了。此外,NSC - 68 号文件提出的思维逻辑的一个“潜台词”,常常被忽略,即如果“任何一地的丢失都是对全线的一个重创”,那么“对任何一地的收复也是对全局的一大收益”。了解了这一思维的两层,就不难理解为何杜鲁门政府关于武装入侵朝鲜的第一个决定是将美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以防另一个“软地带”的“现状”遭到“挑衅”;为何在打下韩国后又积极“北进”,以“解放”朝鲜了。

再次,美国武装介入朝鲜战争以至遏制战略的军事化,部分地因为军方为了提升在国家安全战略设计和实施层面影响力的政治运作。NSC - 68 号文件主要由国务院的“文官”撰写,但这样一份“全球安全”战略研究报告,在产生的过程中难免引发华盛顿决策层内的权力争斗,特别是军方,决不肯轻易拱手让出其传统的军事战略与国防政策的“参议权”。例如,为了“渗透”进尼兹的 NSC - 68 号文件研究班子,国防部长约翰逊指派他的“心腹[confidant]”

<sup>①</sup>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pp. 364 ~ 365.

陆军中将詹姆斯·波恩斯 (James H. Burns) 作为他与 PPS 的“联络人”参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则派遣了空军中将杜鲁门·兰顿 (Truman H. Landon) 加入研究小组;另一位来自五角大楼的参研人员是罗博特·勒巴龙 (Robert LeBaron), 他主要负责与“原子能委员会”就核装备研发的战略意义进行协调研究。而最能代表军方核心层的是曾任二战期间战争部长史汀生的副手、马歇尔将军的副国务卿罗博特·拉维特 (Robert A. Lovett)。现已解密的国务院档案表明, 拉维特至少是“松软地带”以及“集中打击苏的脆弱地带”论点的始作俑者, 除此之外, 拉维特利用他的特别背景, 在军政间左右缓冲、多边斡旋, 不愧为 NSC - 68 号文件的主要“设计师”之一。<sup>①</sup>一旦战争爆发, 军方对占领决策制高地的欲望更加膨胀。在这样的心态下, 很难想象五角大楼的军事战略家们能冷静考虑具体军事行动在战略上的得与失。

最后, 美国通过入侵朝鲜以“收复失地”的决定, 反映了即便是理性的战略也会在实施中受到非理性的“军事浪漫主义”的影响。<sup>②</sup>美国式的非理性在“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身上, 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这位自称懂得“东方人心理学”的美军战区指挥官, 对西方传统的“武力是解决任何政治冲突的最佳手段”军事信条推崇备至, 尤其对亚洲人。对中国人, 他曾宣称, “武力是使他们屈服的唯一办法”。因此, 当在考虑到中国可能的武装介入时, 麦克阿瑟对“既无空军又无海军、步兵人数虽众但从未打过现代化战争的中共军队”, 根本不放在眼里, 而他所统帅的拥有现代化装备部队的海陆空立体“闪电战”, 完全有把握在北京未准备好之前便一举拿下朝鲜。战区司令官的“浪漫主义”色彩造成华盛顿军事战略决策

① 参见, May, ed. *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 第 10—11 页; Memo by Lovett [拉维特备忘录], 1950 年 4 月, *FRUS, 1950*, 第一卷, 第 198 页。

② 关于“军事浪漫主义”, 参看: Shu Guang Zhang, *Mao's Military Romanticism: China and the Korean War, 1950–1953* (Lawrence, K: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94), 第 9 章。

上的“错位”：“联军”司令不仅在为战争发展的政治目标的确定上，同时在军事战略决定上越来越“专权”了，以至军事指挥系统中的制约机制失灵，从而使得冷战态势中的军事行动难以得到战略层面的有效指挥、管理和控制。



## 对全面遏制战略的历史评估

自乔治·凯南提出遏制的战略思路后,由保罗·尼兹主持完成的 NSC - 68 号文件,将遏制战略化、权威化,进而政策化,遏制的重点也从动态,有限转变为全面和无差别。作为美国设定战后国家安全“大战略”的一份重要文件,NSC - 68 号文件指导了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对外与国防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对其实施的国防战略影响与对外政策的意义与作用,冷战国际关系学者们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本章摘录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一些观点,以期为进一步研究美国冷战战略的思考、制定与评估提供借鉴。

### 第一章 从“修正”到“后修正”

美国研究冷战国际关系的学者中,无论隶属哪个派别,或是采取何种研究方法,均不可避免地研究美国遏制战略的渊源。因此,研究凯南、尼兹以及 NSC - 68 号文件,已必不可少。有趣的是,最早占据冷战研究高地的传统学者,在他们的研究时期,由于美国 40 年代末、50 年代初国防与外交档案尚未公开,无一例外地无法系统、“真实”地看到杜鲁门时期的“PPS”、“NSC”或“DOD”文献。因此,“传统派”对凯南与 NSC - 68 号文件的直接评价便寥寥无几。

更值得指出的是，“修正派”依赖“解密”文件对凯南与 NSC-68 号文件的“解读”也不直接，且有失全面。尽管在他们做研究时，美国相当数量的外交、国防档案业已公布，但由于“经济利益决定对外政策”的前提影响，“修正派”对战略制定的文件并不关注，即便使用，也表现出选择的“随意性”。例如“修正派”的“鼻祖”威廉·威廉姆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在于 1976 年出版的《*America Confronts A Revolutionary World: 1776 – 1976*》一书中，对美国遏制战略的渊源有一段评述，基本反映了该学派的观点与立场。威廉姆斯的经历十分有趣：1944 年毕业于位于马里兰州安那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此后加入海军并参加了二战中的“太平洋战争”。战争结束后退伍，并开始在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历史专业的博士学位。完成学业后，威廉姆斯留校担任教授，若干年后建立起统领“修正派”的所谓“威斯康辛学派”。<sup>①</sup>在评论美国冷战遏制战略的起源时，威廉姆斯说：

1948 年承认以色列，标志着美国对于民族自决原则本已软弱的支持行将告终的开端。这一过程包含着一连串连锁性的反讽，可被视为试图维持现状的内在矛盾的基本表现。海军部长詹姆斯·福来斯特强烈反对在开放体制下忽视阿拉伯人的自决权，毕竟，他们手上有石油。然而同时，他又成了一个名叫乔治·弗罗斯特·凯南外交官的最有影响力庇护人。此人聪明过人而又野心勃勃。他认为，由于扩张是苏维埃体制的基石，美国必须在每一个前沿地带都以无可辩驳的力量抗击俄国的极权主义。

威廉姆斯认为“凯南的学说并非首创”。在美国历史上，“信奉这一

<sup>①</sup> 威廉姆斯 1960 年出版的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美国外交的悲剧》一书，使他成为美国对外关系研究领域内最具影响的学者之一。

学说的还有麦迪逊和杰斐逊、德拉诺议员 [Congressman Delano] 和林肯,以及弗雷德里克·特纳 [Frederick J. Turner]、布鲁克斯·亚当斯 [Brooks Adams] 和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 等智者,至于耶鲁的艾奇逊就更不必说了。”充其量,威廉姆斯指出,“凯南只是这一学说在官僚机构的代言人”。但是,他指出,“凯南对历史了解不够,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他的论点与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如果美国必然要走扩张之路,那么遏制就是对敌手最致命的打击。林肯依此逻辑,形成了遏制奴隶制的学说。1990 年亚当斯在提出一项类似的对俄政策时也使用了‘遏制’一词,凯南所做的一切就是把这一神圣的定律运用于 20 世纪 40 年代。”<sup>①</sup>

至于凯南的传统“遏制思想”又是如何变成杜鲁门政策的长期冷战政策的,威廉姆斯勾画了一个政策制定的“连接链”:随着凯南参与国务院的政策研究,海军部长、后任国防部长的福来斯特接受了凯南的论点,此后,国务卿艾奇逊也照单全收了,并直接影响了总统杜鲁门对遏制战略的认同。但是,“唯一的麻烦是他们将凯南的主张解读为以色列是防止苏联通过吸引和援助阿拉伯人而控制中东的力量堡垒,简单地说,以色列成了 20 世纪潜在的桑特堡了。”<sup>②</sup>

其中,艾奇逊的作用十分特别,他把凯南的分析看作是支持自己论点的“一条有用的脚注”。威廉姆斯认为凯南的比喻“带有颇浓的资产阶级情调:他用中产阶级的语言将苏联比作上了发条的玩具,只有撞到美国这面墙上才会停下来。尽管如此,凯南又流露出一种对于谈论如文明之类的深邃事物的癖好。”与凯南不同,艾奇逊则言简意赅地将美国的现状称为文明能够“唯一存在的世

① “Williams’ Commentary,” in May, *America’s Cold War Strategy*, pp. 133–134.

② 同上,第 134 页。

界”。于是艾奇逊利用了凯南来反对国务院内“那些同样机智而又喜爱思索的官僚，以击败所有那些声称‘重审我们所有的政策和计划’也许是有用的一——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人。”在他看来，艾奇逊之所以接受凯南的观点，是因为他需要专家佐证以便在国务院内以及国会中赢得关于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走向的一场激烈的争论。其焦点是：凯南根据历史发展对于苏联行为规律的分析是否正确？对苏联实施遏制是否明智或是否实用？但是，威廉姆斯指出，艾奇逊“对于这场严肃的、事关重大的对话并无耐心”，他所关心的是“拯救[西方]文明和个人主义的市场”；于是，就构成了“最后一个反讽：艾奇逊选择了凯南的论点，而凯南此时正开始寻找一条道路，从他那蹩脚的比喻造成的后果中逃离出来。”<sup>①</sup>

威廉姆斯认为，正是在艾奇逊的“控制”与“指导”下，NSC-68号文件成为当时华盛顿的政治运作的必然“产品”了。“[由于艾奇逊的]这个决定，便产生了一份冗长的、煞费苦心的报告，反映出进行一场最新的宗教讨伐运动的思想，因而被称为‘美国的教皇训令’。”尽管多年来该文件一直是绝密的，但威廉姆斯指出，“正如艾奇逊所承认的那样，他常常谈论这份文件，文件的很多内容泄露给了各种持赞同立场的观察家，因而关于该文件的主题已无任何神秘可言。”他所“了解”的要点是：(1)“俄国革命的成功对‘美国的现状’构成了威胁”；(2)“为了维持‘现状’，‘这个国家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和牺牲，坚决维护国内外的生活条件’”；(3)“这意味着美国实际上放弃了试图区分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的政策……因而安全必须成为国家预算的主导因素，其他因素须与之相适应。”<sup>②</sup>

显然，威廉姆斯并未“亲眼”看到这份“绝密”的文件，而且也不清楚NSC-68号文件的主要撰写者已经不是凯南，而是尼兹。至

<sup>①</sup> “Williams' Commentary,” in May, *America's Cold War Strategy*, pp. 134.

<sup>②</sup> 同上，第134—135页。

于凯南与尼兹的遏制观有何不同,威廉姆斯似乎不十分关心,也可能认为两者即便有差异,也并不重要。在他看来,正是由于凯南的“遏制观”,杜鲁门的冷战政策很快使美国遭受了更大的“不幸”。<sup>①</sup>

NSC-68号文件的基本战略观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冷战走向“热战”。威廉姆斯认为,战争“先是在朝鲜,然后在别处”。其核心是为了追求“美国帝国”的利益。在这种帝国理念的支配下,艾奇逊和杜鲁门“会毫不犹豫地动用军队”,即便是在战场上“自取其辱,就像林肯和威尔逊一样,他们也决心篡改历史,使之符合‘美国的现实’。”由于美国的“贸然”出兵朝鲜,使得华盛顿冷战政策完全“走向非理性”。而美国整个冷战期间的对外干涉行为,威廉姆斯认为,都是由于这个“非理性”的遏制政策的制约。于是,他指出,“我的祖国曾使自己对于自决权的高贵承诺蒙受耻辱,这成了我作为一个美国公民的沉重的精神负担”;因此,他号召所有“有良知”的史学家去“揭露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那些血腥恐怖行为的传奇般细节,重述那些关于伊朗和危地马拉、印尼和圣多明哥、意大利和古巴以及越南和水门事件的恐怖真相。”<sup>②</sup>显然,“修正派”对NSC-68号文件的评论表现出明显的反主流文化的时代政治背景,难免偏颇。

作为对“修正派”的修正,“调和派”对凯南与NSC-68号文件的评价,起码在方法上更进了一步:将分析与档案资料的紧密结合。“调和派”的“创始人”约翰·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sup>③</sup>在

① “Williams' Commentary,” in May, *America's Cold War Strategy*, p. 135.

② 同上。

③ 盖迪斯1968年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获得美国对外关系史专业的博士学位,师从美国该专业的“大师级”学者,罗伯特·笛瓦因(Robert Devine)。1972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首部专著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美国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后,盖迪斯声名鹊起。在俄亥俄大学任教多年后,90年代中担任耶鲁大学的讲座教授,与美国对外关系的另一位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搭档,建立起美国“国际安全与军事战略”专业教研的一个重要基地。

1982 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遏制战略》一书中关于 NSC - 68 号文件的评论，确切地反映了“调和派”的立场和方法。

在《遏制战略》一书中，盖迪斯首先用了较多篇幅追溯凯南“遏制观”的形成以及对杜鲁门冷战战略考虑层面的影响。他与威廉姆斯在遏制战略思想的美国文化渊源上基本一致，即认为凯南的遏制观与美国建国以后的国家安全认知是一脉相承的，并指出，罗斯福政府在二战结束之前就已经开始考虑对苏联的遏制了。<sup>①</sup>至于 NSC - 68 号文件，他发现，凯南与该文件中美国利益概念的区别并不是立刻显现的。根据他的研究，文件“宣称这个国家的‘基本目标’是确保‘我们建立在个人尊严与价值基础之上的自由社会的完整与活力’，该文件进而宣布‘我们决心创造各种条件使我们的自由民主体制得以生存和繁荣’。该 68 号文件将美国的利益系于多样性而非单一性……并且似乎将均势作为赖以确保多样性的手段。”<sup>②</sup>尼兹们这些判断与凯南的认知并无根本的分歧。

然而，盖迪斯认为这种相似性也就仅此而已。凯南认为维持均势从而捍卫多样性是必要的，所有这一切是为了防止军工力量中心落入敌手。因此，在凯南看来，“世界各地的不友好政权，尽管非其所愿，只要它们缺乏表达敌意的手段，就几乎构不成对于全球稳定的威胁”。NSC - 68 号文件的观点却与此大相径庭：由于自由制度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攻击，因此在当今力量两极分化的情况下，“自由制度任何一处的失败就意味着全面失败”。言外之意，盖迪斯分析道，“凯南保卫有选择的据点的战略是不够的；必须强调建立环形防御，环形防御带上的任何一点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sup>③</sup>

<sup>①</sup>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p. 3 - 24.

<sup>②</sup> 同上，第 90—91 页。

<sup>③</sup> “Gaddis's Commentary,” in May, *America's Cold War Strategy*, p. 141.

那么,NSC-68号文件对美国战后“大战略”的基本假设有哪些呢?同时在哪些方面偏离了凯南的思维轨迹?对此,盖迪斯是这样解读的:首先,NSC-68号文件赞同建立环形防御,这就大大背离了凯南的基本假设。凯南认为:唯有军事工业实力能使国际政治产生重大变化,只要军工力量保持大体平衡,国际稳定局面(尽管未必所有的暴露地带)就能得到维持。不过到了1949年,凯南自己也被迫承认,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正如西欧要求美国军事保护所表明的那样,”盖迪斯解释,“不安全既能来自外部环境,也能来自心理状态。远处多米诺骨牌倒下的声音与隔壁响尾蛇摆尾的声音同样能轻而易举地使人产生不安全感。这就是凯南的思想中一个重要的尚未解决的两难问题——凯南的战略依赖于自信,而在对边缘利益与核心利益进行区分时,这种自信能否继续存在?对于NSC-68号文件的作者们来说,回答是否定的。”

其次,在NSC-68号文件的撰写者们看来,力量均势的改变并不仅仅是经济调整或军事行动的结果,“亦是恫吓、羞辱,甚或丧失信誉而造成的”。因此,尼兹曾这样提醒他的同僚,苏联不加区别地使用军事和其他侵略手段,其指导思想就是“基于削弱美国的世界大国地位这样简单的考虑”。盖迪斯指出,尼兹的判断,“着实令人惊讶”,因为尼兹坚信“国际秩序以及美国的安全,不光依赖于均势的实质,同样也依赖于均势的观念。这里牵涉到的观念并不只是那些传统上承担决策任务的政治家们的观念;这些观念也反映了大众的意见,无论这些意见是关于外交还是内政,是言之有据还是信口开河,是言之成理还是荒谬可笑。”盖迪斯指出,战略考虑中夹杂了“公共舆论”和大众因素,即使是大国关系表面上的变化也会产生令人烦恼的后果,因为“依据传统标准如地缘状况、经济实力和军事潜力所进行的判断现在不得不受制于形象、声誉和信誉等方面的考虑”。结果就是被认为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利益的数量与种类都大大增加了,其中的区

别也变得模糊了。<sup>①</sup>尼兹们在此点上与凯南分野明显。

再次,除去维护美国安全利益的手段,盖迪斯认为,NSC-68号文件对于凯南遏制战略中提出的另一假设——有限资源的观念,即必须首先区分核心利益与边缘利益——提出了挑战。在这一点上,凯南与杜鲁门政府的基本政策并无分歧,杜鲁门总统仍坚持削减国防开支以避免出现增加税收和预算赤字。但是,盖迪斯强调,“NSC-68号文件指出了一条在没有战争、没有长期预算赤字、没有税收负担加重的情况下增加国防开支的道路。”例如,在提及美国的二战经验中最深刻的教训之一时,NSC-68号文件是这样表述的:“当美国经济以接近完满的效率运转时,在满足大众消费同时提高生活水平之外,还为实现其他目标提供了巨大的资源。”对此,盖迪斯的评判是:完全不可能。此外,他指出,“与早先宣称不应区分边缘利益和核心利益相比,现在NSC-68号文件显示了一种更具诱惑性的逻辑,[因为它提出]不再需要区分”这些利益了。简而言之,所有的利益都是“核心利益”。对于NSC-68号文件的作者们来说,抛开苏联造成的威胁就无法界定美国的利益。正如文件中所常常提到的,“‘挫败克里姆林宫的企图’成了一种自为目的,而不是达到更高目的的手段。”<sup>②</sup>

最后,关于究竟什么是克里姆林宫的企图,NSC-68号文件持有与凯南不同的判断。盖迪斯指出,NSC-68号文件所确定“苏联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统治者的基本企图是保持并巩固他们的绝对实力”的观点,在凯南看来这是无可指责的,因为文件并没有将意识形态看作推动苏联扩张的主导因素,只是认为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将马列主义视为苏联政策的一种工具。更确切地说,文件判断“苏联的敌对态度只不过是由于极权主义体制无法容忍多元化而

<sup>①</sup> “Gaddis's Commentary,” in May, *America's Cold War Strategy*, p. 142.

<sup>②</sup> 同上。

形成的。”这一点与凯南认为苏联制度“无法与多元化共存最终会使克里姆林宫”选择扩张的说法无异。

NSC-68号文件与凯南的分歧在于对苏联对外扩张现状与程度的认知。盖迪斯发现，凯南的判断是：苏联已进行了过度的扩张，因而克里姆林宫要保持对这些通过扩张而控制的地区的难度很大，结果给美国提供了一个可资利用的良机，例如斯大林与南斯拉夫铁托的分裂。NSC-68号文件不接受这样的判断，反而认为，“到目前为止，苏联的扩张增强了其实力，而不是暴露了其弱点；无论铁托主义负面影响有多大，也只是稍稍抵消了以下事实，共产主义在中国赢得了胜利，苏联爆炸了原子弹，莫斯科加紧了军事集结，而此时美国却苛刻地限制自己的[国防军事]支出。”因此，文件认为凯南“苏联帝国由于过度扩张或其他原因而自发地从内部毁灭”的论断“过于轻率了”。<sup>①</sup>

此外，盖迪斯指出，凯南与NSC-68号文件对于“苏联是否会甘冒爆发战争的风险”的判断出现冲突。根据他对苏联意图的估计，凯南认为，苏联领导人谨小慎微，倾向于在没有固定时间表参照的情况下以最小的代价和风险来达到其目标；据此，美国可以满足于做出不对称反应，如只加强美国及其盟国的实力，但不必去重复苏联的军力构建走向军备竞赛。然而，NSC-68号文件却强调苏联的实力，认为：“俄国人尚未发动战争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取胜的把握。一旦他们的实力增长到某一程度，使他们有理由相信能够取胜如果在此期间美国在增强自身实力方面一事无成，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大有可能会冒发动战争的风险，可能会采取突然进攻的方式。”NSC-68号文件甚至预计苏联将会在1954年发动战争，因为到那时候俄国人的核武库将拥有足以摧毁美国的原子武器。<sup>②</sup>

---

① “Gaddis's Commentary,” in May, *America's Cold War Strategy*, p. 142.

② 同上。

那么，“苏联威胁”是否会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对此，盖迪斯指出，凯南与尼兹也存在分歧。“在此以前，”他解释，“最大的危险来自于代理人战争。凯南自己也承认存在这种可能性，苏联会授权其卫星国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但是，凯南的判断是，苏联的这种举动主要是为了在不引发一场全面战争的前提下实现自己有限的政治目的。既然并非所有的利益都是同等重要，美国仍可以在是否做出反应和如何做出反应的问题上进行选择。但是，NSC-68号文件将“逐步入侵”看作是苏联所选择的一种战争手段，意在对美国在未受到直接进攻的情况下不愿动用核武器这一点加以利用。基于利益是不可分割的假设，NSC-68号文件警告说任何失败的反应都会导致“‘一种螺旋形下降的恶果，疑虑和反斥都会显得迟缓而微不足道，选择余地将愈来愈小，愈来愈令人绝望’。结果就将是一连串‘压力之下的逐渐后撤，直到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已牺牲了核心利益地带’”。那么，即便没有战争，苏联也能运用其武装力量侵蚀美国及其盟国的阵地，以实现“以恫吓支持渗透”的目的。盖迪斯指出，毋庸置疑，美国拥有比以往任何和平时期都更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检验这个力量的有效性应是与现在的对手相比，而不是与过去的实力相比较。对照苏联军力的增长和美国为遏制对手所采取的行动，很明显美国的军事力量“严重不足，正陷入危险的境地”。但是，他认为，凯南的应对思路是现实的和理性的，即“在这个时代，增强和平时期军力应限于发展机动性强、组织严密、有能力对有限入侵作出快速有效反应的精锐部队，但这支部队绝不是用来反击他确信不可能动用的苏联军力。”<sup>①</sup>

在对比分析了凯南与尼兹的对“苏联威胁”的认知之差异后，盖迪斯对这种差异的政策意义与实际影响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凯南与NSC-68号文件作者分歧的核心“只是一种简单的

<sup>①</sup> “Gaddis's Commentary,” in May, *America's Cold War Strategy*, pp. 134–135.

思考过程的倒置：凯南倾向于以其独创的利益不可约概念来看待苏联的威胁，NSC-68号文件关于美国利益的观点则是来自对于苏联威胁的理解，[但]关于基本利益 NSC-68 号文件并没有进行类似的总体性的陈述”。此外，NSC-68 号文件表达了对于均势、多样性和自由的尊崇，但却没有提出哪些是为了确保这些利益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条件，而只是简单地把苏联威胁的存在视为利益受到致命威胁的充足理由。盖迪斯强调，这种思维方式的后果，“完全是把美国在任意特定一点的利益拱手相让于俄国人的掌控之中，因为用威胁来界定利益终究只是把利益看作威胁的作用——这样利益就会像威胁一样延展和收缩。”如果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足够狡猾的话，他们可以通过对某些特定地区施加压力的方式迫使美国及其盟国将资源耗尽在那些远离凯南最初的核心利益清单上所列举的地方。更有甚者，他指出，NSC-68 号文件通篇所表达的主旨就是为维护美国的现有利益而另辟一条蹊径。然而，由于忽略了利益与威胁定义之间的区别，实际上该文件将利益本身变成了一种手段，从而断送了其预期实现的可能；例如，与凯南不同，NSC-68号文件“排除了将外交手段作为改造苏联前景的一种方式”，因为它认为“在苏联的体制发生自我改变之前，谈判解决是不可能发生的”。再者，正如 NSC-68 号文件所言，“如果所有的利益均为核心利益，那么将来的谈判只能建立在苏联完全投降的基础上。没有这一基础，不管莫斯科是否具有谈判的意愿都已无关紧要了。”<sup>①</sup>

据此，盖迪斯提出，NSC-68 号文件将政策的手段和目的相混淆，以至建议采取的措施必定削弱了试图达到的目的，由此看来，“这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文件”。如果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保持恒定不变，和平时期大规模地加强军备或许会增强美国的安全；但

---

<sup>①</sup> “Gaddis's Commentary,” in May, *America's Cold War Strategy*, p. 135.

是,NSC - 68 号文件却认为国家安全利益是不断变化的,随着威胁的增大而扩展,这样带来的无限制的军备增长,无论用怎样的理性衡量,都是说不通的。比如,盖迪斯分析,“共产主义世界的分裂确实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目标,但将任何地方的共产主义危险均一视同仁却并非良策。苏联对外部世界采取更为温和的态度当然是值得欢迎的,但要求苏联彻底投降的谈判立场却几乎不可能加速其实现。”<sup>①</sup>

盖迪斯认为,从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理性”角度看,NSC - 68 号文件所代表的观点,实际上“脱离了”美国与冷战的实际。他的结论是:“所有这些反常现象都反映出战略观念上的失误:未能使近期与长远考虑相结合,使行动与利益相协调。”<sup>②</sup>正是这样一种理念与现实脱节、手段与目的混淆的思维模式,使得美国的遏制战略并未得到最有效的实施,从而部分地导致了冷战进程的如此漫长。

## 第二节 “新冷战学者”的评判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美国之外的学者加入了对美国冷战时期对外关系的研究。无论从研究方法上,还是从对“史料”的利用上,都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果。毫不夸张地说,国际学者对以美国学者为主的冷战国际关系研究已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就国际学者对美国冷战遏制战略起源的重新探讨而言,其中最为重要的学者之一当属挪威的美国问题专家杰尔·伦德斯塔德

<sup>①</sup> “Gaddis's Commentary,” in May, *America's Cold War Strategy*, pp. 144 – 145.

<sup>②</sup> 同上,第 146 页。

(Geir Lundestad)。现任挪威诺贝尔和平研究所所长、“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秘书长的伦德斯塔德博士，著述甚多。特别是他对美国冷战初期对欧政策制定的研究，使他成为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乃至欧洲最著名的冷战国际关系学家之一。他的专著——包括 *America's Non-Policy toward Eastern Europe, 1943 - 1947*《美国对东欧的无为政策，1943—1947》、*America, Scandinavia, and the Cold War. 1945 - 1949*《美国，斯堪的纳维亚，与冷战，1945—1949》，以及 *East, West, North, South: Major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45 - 1986*《东南西北：国际政治的重要发展，1945—1986》——几乎是所有国际关系专业学者的必读书。伦德斯塔德于 1990 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The American "Empire" and Other Studies of U. S. Foreign Policy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美国“帝国”论与其他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比较研究》一书，开创了对冷战起源进行比较研究的先河。

伦德斯塔德对美国全面遏制战略分析的一个基点是：大国的对外政策的改变受制于国际环境的改变。他认为，二战结束后的世界政治与战略地图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如果某一政策却仍保持原样，那无疑将成了一项奇怪的政策。”然而在考察美国的冷战政策时，伦德斯塔德发现：“美国的钟摆摇动得比其他国家更为剧烈。”在他看来，NSC-68 号文件“修正”了凯南所提出的“长期、有耐心”但“有限”的遏制，提倡对“共产主义阵营”实施“全面遏制”，就是反映华盛顿冷战政策“不断摇摆”的最重要的明证。

美国冷战初期政策的摇摆不定和大起大落，伦德斯塔德认为，首先是由美国的“孤立主义”传统所决定的。传统上，美国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崇尚行动自由：由于“地处西半球——再加上有英国海军——使得美国有可能在二战选择孤立主义。”但是，二战以后处于世界超级强国的地位使美国“可利用其物质背景构成一个非正式的美利坚‘帝国’”。在这样的环境中，欧洲国家只不过是“被迫才互相卷入了[冷战]的事务”。“美利坚帝国”的建立，使得

欧洲各国大都“第一次”对美国处于“从属”的地位,以至“美国的一举一动欧洲人都会做出反应”。如果美国政策摇摆不定,所谓欧洲的依赖性相应也会出现摇摆不定。当东西方关系处于紧张时期,欧洲人乐于看到美国表现出极度的强硬和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当华盛顿与莫斯科合作时,欧洲人立刻就会忧心忡忡,担心超级大国的“双重奏”是否会以牺牲欧洲的利益为代价。因此,“戴高乐[对美国]的抨击总是追溯到 1945 年 2 月雅尔塔会议,断言欧洲的分裂即源于此,在法国以外,此类反应也有更为温和的形式。”根据他的分析,美国政府类似的依赖性的摇摆也同样存在于其他政策领域。当然,由于美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由世界”的领袖而投入了某些有争议的战事(如朝鲜、越南),“既然美国人做了,欧洲人就可以少做一些,要不然也许他们不得不做的事。”这有助于解释美国和其欧洲同盟国家在防务经费上出现的“高峰”与“低谷”现象。此外,伦德斯塔德指出,还有其他因素对于美国政策的剧烈摇摆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党派政治“对于形成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毋庸置疑地受到存在于两党之间的由于不同的地理、阶级和种族基础而形成的相互争斗的影响”。<sup>①</sup>

冷战初期美国的政策之所以要比其欧洲盟友显得更不稳定,伦德斯塔德认为,可以通过比较两者“制度的细微差别”找到多种原因。第一是所谓“前任总统”情节。在美国,任何“继任政府往往倾向于根据一种避免犯其前任所犯错误的决心来界定其地缘政治准则,而不是根据对外部世界变化所做的客观而不带偏见的评价”。每一位新总统都有他自己的外交政策,并坚持认为这一政策完全符合美国人民最深切的愿望。然而,他指出,“多数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在他们成为总统或总理之前都曾在几个国家部门中任过职。他们的以往经验可能会减少摇摆。”此外,多数欧洲国家的领

<sup>①</sup> “Lundestad's Commentary,” in May, *America's Cold War Strategy*, p. 184.

领导人继任的变化，即便会导致某些对外政策的不同，但这“主要是为了装点门面，其表面意义大于实质。”<sup>①</sup>

第二是“权力分享”范式。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意味着总统与国会之间权力斗争的常态性。伦德斯塔德发现，任何“一位强有力的总统早晚会激起国会的反应；相反，国会至上也会导致总统权威的复兴。”例如，正是由于老罗斯福和威尔逊的干预主义激起了20和30年代国会中的孤立主义。此外，权力分享原则与其他的宪法措施造成这样一个事实：阻挠立法与拨款相对较为容易。为了克服一切国内障碍，美国的政治领导人非得采取强硬举动，或者起码发表强硬言辞，以至“为了缩短达成共识的时间，政治领袖必须夸大外部威胁的程度。”因此，冷战初期美国对外政策的极度不稳定是由于“发生在总统与国会之间的剧烈摇摆”。毫无疑问，杜鲁门政府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在描绘国际图景时要比分析国内形势时使用一支更粗的画笔”，其结果便是1947年杜鲁门主义的公开发布和1950年NSC-68号文件的正式出台。<sup>②</sup>

第三为制度因素。冷战初期，美国对外政策摇摆不定，与其行政机构中“要害”部门的政治化特点存在关联关系。根据伦德斯塔德的比较研究，在西欧国家，在涉及对外和安全的部门工作的都是终身公务员。例如在英国，这类终身公务员所造成的政策稳定性是“非凡的”。然而，美国的外交机构“总是轮流充斥着一帮临时的业余人员”。在欧洲，国家公务员在政客与公众之间发挥了一种稳定器的作用；而在美国，“后两者往往是相互依存的……一大堆关于政治领袖及其任命的官员处事无能的例子使得众多美国外交政策专家（和国务院专业人员）主张‘专家们’应被授予更多的权力，而国会的影响应该降低。”难怪凯南从美国政坛退出后指出，自己

---

① “Lundestad's Commentary,” in May, *America's Cold War Strategy*, p. 184.

② 同上。

的遏制思想未能完全成为美国的冷战战略的结果是美国的政治制度使然,据此主张美国应实行类似于英国式的议会制度。<sup>①</sup>

第四是所谓“律动原理[the Principle of Rhythm]”。借用弗兰克·克林博格(Frank Klingberg)关于人类行为的周期性摇摆的理论,伦德斯塔德指出,美国冷战初期对外政策的不稳定,与美国的“内向—外向性格”的周期性行为有关,如:主要政党的力量交替,战争的周期,商业的浮沉,甚至还有主流文化的兴衰。他用黑格尔式的风格宣称,“律动原理”或许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因此,作为诸如美国这样年轻但又“迅速崛起”的大国,其“内向—外向的性格取向决定其每隔一代人——大约 25 年——就会波动摇摆一次”。如果这样的假设成立,美国对苏联的政策频频发生了摇摆,也就不足为怪了。<sup>②</sup>

第五是文化视角。伦德斯塔德提出,如果要探究美国冷战初期外交政策摇摆的某些深层次原因,还应该考虑美国的某些文化因素,这是因为美国社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附于一个总的意识形态,美国人对他们政治制度的基本结构是相当满意的。”更确切地说,美国“这个国家是建立在互相冲突的亚文化价值的基础之上的。这些价值的具体混合因人而异,但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在更大的程度上,这种基本冲突在多数美国公民的身上都会表现。他们通常一段时间较强调某种价值,另一段时间某种相反的价值又会占据统治地位。”<sup>③</sup>

据此,伦德斯塔德提出一种新的解释角度,即“文化道德价值判断”。他的分析框架基于一种多元的“二分法”。首先,从文化价值层面分析,美国的政治操作存在着“道德主义”与“实用主义”的

<sup>①</sup> “Lundestad's Commentary,” in May, *America's Cold War Strategy*, p. 184.

<sup>②</sup> 同上,第 184—185 页。

<sup>③</sup> 同上,第 185—187 页。

矛盾。站在道德主义的立场上，美国人认识到，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家无法维持“自由人”与奴隶各占一半的状态，所以发生了 1862 年南北战争；继而华盛顿在 1917 年和 1941 年得出几乎是同样的结论，一个世界也不能维持一半自由、一半奴隶的状态，于是就“为了民主和自由”跨洋参战了。冷战初期，杜鲁门政府对于共产主义的威胁认知也是基于这种类似的两分法。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上，美国人以前总是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务实”的民族：只要一种方法行不通，那就试试别的。美国人大多很没有耐心，不愿为结果期待太久。正是这种急于求成的性格为美国的政策摇摆提供了又一种解释。正因为如此，伦德斯塔德解释，美国雄心勃勃的政客总在不断迎合这种情绪：“如果你选了我，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种态度在处理美国与西欧关系时比之处理美苏关系时表现得更为显著。

其次，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存在着“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的矛盾。多数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上帝选择”的公民，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不但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而且必定会长盛不衰。“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的口号已经成了国民信念的一部分。当然，美国地理、自然和历史条件的得天独厚，使得美国自建国后从未被外国占领，也未曾经历传统意义的外敌入侵和战败，因此，伦德斯塔德指出，华盛顿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所体现的乐观主义“尚未经受过锤炼”和检验。正是因为历史短、发展快，美国人也常常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易受攻击感，即担忧外来威胁的悲观主义。更确切地说，“美国是一个脆弱的实验场，易受威胁，既有来自内部的渗透（麦卡锡所谓国务院里的共产主义分子），又有来自外部的攻击——1941 年的珍珠港，或是苏联出其不意的第一次打击，就像里根早先用极端的言辞所称的‘易受攻击的窗口[Window of Vulnerability]’。”

再次，关于战争与和平这对相悖的价值观，伦德斯塔德强调，美国文化中也存在着强烈的对立。对此，他解释，美国的一种根深

蒂固、看似幼稚的信念是，和平是一种常态，而战争只是例外。尽管反感“战争与冲突会打乱这种正常的、理想的状态，但是不知为什么人们依然抱有期望，一旦敌人被打败——他们应该无条件投降——‘常态’就会重现。”因此，正如基辛格所批判过的，美国人由于坚信和平是“正常的”，所能够接受的对外与国防行为的目标只能是“克服干预障碍，恢复正常状态”。伦德斯塔德认为在战后世界中只有苏联处在美国与这个“甜蜜的理性与和平”世界之间。对此，他引用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 1980 年的一段“过于简单化的语言”以说明这一信念：“我们不要再自欺欺人了。所有这些骚动的背后都有苏联人的影子，只要他们不再玩这种多米诺骨牌游戏，世界上也就不存在什么热点了。”<sup>①</sup>

根据伦德斯塔德的研究，美国文化价值观中还存在着其他类似的矛盾的组合，例如：“实力（指你有多少军队）与理念（常表现为多种利益的世界共同体的形式）、变化（美国是世界上最具革命性的国家）与稳定（美国是现状的主要维护者）、善良与邪恶等。”正是在这种由这些矛盾组合的“文化心态”制约下，他指出，美国冷战遏制政策便出现了一个“误区”：“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或至少是激烈的冲突），如果苏联是一个‘邪恶’的国家，那么美国不得不作出相应的反应；如果苏联是一个‘善良’的国家，许多人在二战与缓和的全盛时期曾这样认为，那么冲突也会消散得无影无踪。世界非黑即白，极少呈现灰色。显然美国人对于合作与冲突并存的理念感到极不自在，从这种隐隐约约、非黑即白的两分法看来，也应该是美国情绪剧烈波动的一种重要解释。”<sup>②</sup>

如果说伦德斯塔德在深层次探讨美国对冷战所应承担的责任方面具有代表性，由苏联科学院著名的“美加研究所”培养出的伏

<sup>①</sup> “Lundestad's Commentary,” in May, *America's Cold War Strategy*, p. 188.

<sup>②</sup> 同上，第 189 页。

拉第·祖波克博士(Vladislav Zubok)则在莫斯科冷战决策的研究领域独领风骚。得益于莫斯科对苏联外交部与总统府档案的开放,祖波克常年穿梭于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成为推动所谓“新”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国际化”的重量级年轻学者之一。他与另一名“苏联学者”康斯坦丁·普拉西考夫(Constantine Pleshakov),1996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克里姆林宫内的冷战: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一书,从苏联冷战初期的对外战略考虑与决策,对照美国遏制战略形成的理性,提出了十分有意义的观点。<sup>①</sup>

有趣的是,祖波克采用了“结果看过程”的方法对 NSC - 68 号文件进行“绩效”评估。回顾苏联的“猝然解体”,他提出,苏联的瓦解是否证明了美国以及西方世界在整个冷战期间所宣扬的苏联威胁完全是夸大其词?如果是这样,他认为,“NSC - 68 号文件不过是助长了反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甚至有助于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继续掌权并动员全国进行一场毫无节制的军备竞赛,因为他们可以喋喋不休地抱怨‘帝国主义威胁’来为其行为辩解。”另外,苏联的解体是否归因于美国坚持遏制的“强硬”路线?如果美国在其巨大的代价、高昂的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坚定反对苏联的扩张,才是苏联帝国崩溃的原因的话,他指出,“对于 NSC - 68 号文件及其里根执政初期文件精神的重生应予以适当的、实事求是的评判。”<sup>②</sup>

无疑,苏联是一个“集权国家”,而“极权主义帝国要么会在一场‘无条件投降’的战争中而崩溃,要么会由于精疲力竭地过度扩张而消耗殆尽,沦为一个经济上更为强大的敌手的战利品。”祖波克认为,NSC - 68 号文件既没有采纳第一种方式——因为与苏联

---

① 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② “Zubok's Commentary,” in May, *America's Cold War Strategy*, p. 190.

交战将是一场全球浩劫,也并未采取第二条路线——因为“不作为主义”不能为西方民众接受。文件的起草者却“呼吁西方世界动员起来,以先发制人的措施阻止苏联假想中的全球攻势”。对于美国和它的主要盟国来说,从表面上看,NSC-68号文件所支撑的美国的冷战,在1950—1952年间成效卓著——例如,美国加强了全球性的军力部署,尤其是核力量的部署,大为缓解了国内对于苏联可能通过公开的军事入侵而进一步扩张的担忧;首次在“和平时期”建立了北约这样的军事同盟,使得西欧国家“对于苏联威胁的恐惧也烟消云散”,西方世界的团结得到了巩固,繁荣得到了保障。<sup>①</sup>但是,对于NSC-68号文件所倡导的遏制战略的“真实效果”,祖波克认为必须参照受遏制方的反应,做出“对比分析”,才能有一个“较确切”的判断。尽管“历史”并未记录“苏联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受到NSC-68号文件政策的影响,[甚至]斯大林未必知道这份文件,”根据他对苏联冷战初期对外政策的研究,祖波克提出西方的遏制战略对克里姆林宫的内政和外交有着“十分微妙”的互动影响。

在苏美的战略互动中,祖波克十分确定,双方从一开始就“过高估计”了对方的扩张意愿。NSC-68号文件的作者们认为,苏联“核试验的成功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使斯大林的信心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刺激他发动一场政治上的,或许是军事上的攻势,希望其余的欧亚大陆像熟透的果子一样落入其手中。”然而,祖波克依据苏联总统档案发现,“50年代初期,斯大林根本就没有表现出信心大增的迹象。1946至1949年间,苏联对欧洲的刺探遭到了顽强的抵抗。斯大林所预言的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并没有发生。赫鲁晓夫曾回忆,政治局对于‘强大的美国经济阻止了欧洲国家灾难性的经济滑向爆炸性的革命临界点’大失所望。”

<sup>①</sup> “Zubok's Commentary,” in May, *America's Cold War Strategy*, p. 191.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共产主义在中国赢得了胜利恰恰与斯大林的预期相反。祖波克认为，斯大林与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是竞争对手。“任何一位《真理报》的热心读者都会发现，中国领导人从未被称作‘亲爱的同志’，而宁可称其为‘毛先生’和‘周先生’，斯大林也并不热切期望与他们进行面对面的会见。”他从斯大林的谈判记录以及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通信中，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只是当斯大林意识到不管有没有他，中国的共产主义者都将支持金时，他才勉强点头同意进攻韩国。因为，他不愿使自己显得比毛泽东‘缺乏革命精神’。”<sup>①</sup>据此，他指出，苏联对朝鲜战争的支持，并非NSC-68号文件作者们所预测的那样，是苏联全球扩张“大阴谋”的一步棋子。

那么，斯大林是否真的如美国战略决策者所判断的那样，试图通过朝鲜战争将美国的常规力量拖在远东以便苏联对西欧发动进攻？祖波克在布拉格档案馆中查到一份1951年斯大林会晤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记录，其中表明“斯大林警告他们一场战争即将开始”。可是，重读斯大林的讲话，“他似乎有理由担心美国可能会‘出其不意地摁动核按钮’。”对此，祖波克的诠释是：“尽管斯大林不是一个热爱和平的防御者，……但西方扩张军力促使斯大林具有更强烈的动机修正其‘力量关联[correlation of forces]’政策。”为了对抗西方的军事压力，斯大林只能采取对应的措施，其中包括：“加速生产核子武器、热核武器和远程炸弹的进程，部署防空体系制止美国的空中打击，发起一场世界范围的‘和平与裁军’运动，1952年还提出一项非凡的建议要求建立一个中立的、统一的德国。”<sup>②</sup>

---

① 关于此点，可参看：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② “Zubok’s Commentary,” in May, *America’s Cold War Strategy*, p. 190.

无疑，苏联的这些军事和外交上的“具有攻击性”的动作更进一步证明了克里姆林宫的“扩张意图”，使得白宫对 NSC - 68 号文件制定的遏制战略的必要性深信不疑。至此，苏美双方滑入了不可救药的安全困境：基于“最坏打算”的逻辑，对方任何一个即便是出于“自卫”的行为自然被认作是个“阴谋”，旨在挑战现状。由于这个难以自拔的困境，美国的遏制对克里姆林宫并未产生所预设的影响。“NSC - 68 号文件所体现的军事遏制战略没有能够阻止苏联在 50 年代中期扩大对中东，以及后来对古巴共产党政权的影响；”祖波克进一步分析到，“也未能让苏联当局表现出更令美国接受的‘行为方式’；更未能阻拦苏联 1953 年在柏林的镇压和 1956 年在匈牙利的屠杀。[反之，]一种充满危险的激烈对抗气氛加强了共产党统治精英中的反动成分，而削弱了具有改革思想的成分。”此外，祖波克指出，尽管 NSC - 68 号文件“谨慎地反对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但对众多的苏联“党的分析家、克格勃将军和高级军事官员来说，NSC - 68 号文件证明了美国长久以来就制定了一项破坏苏维埃国家与社会并推翻其生机勃勃的制度的总阴谋。他们认为美国从未接受苏联作为一个合法的超级大国的地位及其两国间核均势的现状。”即便是那些对美国采取“柔性立场”的苏联高层人士也认为，正是由于 NSC - 68 号文件，美国才“发动一轮新的军备竞赛，意在拖垮相对较弱的苏联经济，使得苏联把宝贵的资金都投入无用的国防建设；最终，通过一场没有战争的全球竞赛战胜苏联。”<sup>①</sup>

正是由于 NSC - 68 号文件所倡导的遏制，导致大国关系——特别是苏美关系——在 50 年代走向“军事对抗化”，使得“国际信任”空前下降。有趣的是，祖波克指出，克里姆林宫在 60 年代末针对昔日的盟友“共产党中国”的安全与外交选择与美国在 50 年代的选择如出一辙。中苏关系自 60 年代初破裂后，莫斯科一直在关

<sup>①</sup> “Zubok's Commentary,” in May, *America's Cold War Strategy*, p. 192.

注着“中国威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核爆炸成功，令“苏联领导人被数百万中国军队将涌入苏联远东地区的景象吓得惊慌失措。”为了遏制这一可能的威胁，苏联领导人不仅选择通过在远东集结庞大的军事机器以强化威慑，甚至决定对华发动一场核战争。直至多年以后，他认为，苏联领导人才发现高估了“中国威胁”，但为时已晚“我们已经浪费了开支”，正如美国在冷战初期“高估了苏联威胁，也徒然浪费了他们的资源。”<sup>①</sup>

从这个意义上讲，NSC - 68 号文件“可能使初期的冷战拖长了”。在祖波克看来，1950 年美国国内与国际力量的交互作用，“使得 NSC - 68 号文件的逻辑变得令人无法抵御，任何较少军事色彩的选择都会显得大有问题；[如]宣称朝鲜战争开始后产生了另一种选择是误读了那一时代历史的决定力量。”但是，他强调，“如果认为 NSC - 68 号文件比实际上更富创见、影响更为深远的话，无异于误读了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历史的决定力量。”<sup>②</sup>

中国学者对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国际化，也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特别是中国 80 年代的改革开放，使得国际关系学者得以“走出国门”，充分利用西方的研究成果，并深入实地研究国外——特别是美国——已经公开的档案材料，对美国冷战的遏制政策的渊源提出了学术性的论述，并且在论述的过程中，特别地分析了 NSC - 68 号文件对美国冷战战略界定性的作用。

首先，由刘同舜、高文凡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的《战后世界历史长编》多卷本，应当属中国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里程碑”性的成果。其中涉及 1950—1951 年间的第六册，提出“[NSC]68 号文件决定[美国]扩大对外军事援助”从而使冷战从政治和经济领域迅速扩至军事领域的观点。“在杜鲁门 1949 年 7

<sup>①</sup> “Zubok's Commentary,” in May, *America's Cold War Strategy*, pp. 192 - 193.

<sup>②</sup> 同上，第 193 页。

月提出军援咨文时”，该卷指出，“美国政府原先设想‘军事援助计划本身被看做是一项短期计划，也许持续 4—5 年，所给予的援助大多是美国的库存剩余武器’。这就时说，希望在经过最初阶段以后，欧洲国家能依靠自己的努力，维持他们的防务。”部分地出于这一考虑，杜鲁门政府的《共同防御援助法》“把经济复兴的目标显著优先于重整军备”。然而，随着美苏冷战的加剧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的这一设想很快为 1950 年 4 月出台的 NSC - 68 号文件中扩大对外军援的新思路所替代。<sup>①</sup>

这个变化，《长编》认为，与 NSC - 68 号文件的撰写者对所谓“苏联威胁”——特别是潜在的核威胁——的判断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文件宣称，“自 1948 年以来，苏联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大大加剧了’，‘比以前估计的更为直接了’。‘苏联实际上拥有远远超过保卫其国家领土所必需的武装部队’。”文件还估计，到 1954 年中期，苏联将有 200 枚原子弹的储备。而“苏联一旦拥有 200 枚原子弹之日，将是美国危急之时，因为在本国本土的目标上投下 100 枚原子弹，将对这个国家造成严重损害。”依据这样的威胁判断，《长编》指出，美国做出了“迅速地建立起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决定。<sup>②</sup>

正是在这种对苏联军事威胁的焦虑的心态的影响下，《长编》指出，美国以扩大对外援助——主要是军援——作为冷战初期遏制战略的政策核心。对此，该书重点解读了 NSC - 68 号文件关于对外援助的论述：“文件说，‘美国目前的对外经济政策和计划不可能解决国际经济的平衡问题，特别是美元差额’。欧洲复兴计划虽在帮助恢复和发展西欧生产方面是‘成功的’，‘但（西欧）面临的前景是美援迅速减少，靠它自己的力量，还不可能在美元区取得令人

<sup>①</sup> 刘同舜，高文凡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0—1951，第六册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430 页。

<sup>②</sup> 同上，第 431 页。

满意的平衡。西欧在经济一体化方面也进展甚微'。”文件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很可能需要美国更深的介入’。”这个更深的介入，《长编》强调，就是提升对亚洲“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军事援助水平。因为，NSC-68号文件认为“1949年共同防御援助法虽‘对苏联产生有限的不利影响’，‘使受援国的国内安全状况有所改善’，但按目前的援助计划增加军备，在1952年之前，多半不会有重大结果。”因此，《长编》明确指出，NSC-68号文件所提出的扩大对外军事援助的目标是要促进西欧国家以比现行计划既大且快的步伐增长军事力量，“使它增强到足以有可能遏制苏联打一场大战；再不然，‘起码也要具备能够大大延长苏联蚕食西欧时间的能力，[例如，]如果可行的话，在大陆上保持个桥头堡，以抵抗苏联的攻势。’”<sup>①</sup>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对NSC-68号文件作为美国冷战时期对外军事援助的政策基础作用的分析，应该说，突破了中国学界传统的“帝国主义经济掠夺”的分析框架。如，《长编》明确指出，NSC-68号文件对经援和军援赋予了明确的政治和安全目的，即：以“‘大量增加军事援助计划，促进共同合作，使我们的盟国能充分有效地完成(文件中)所提的各项任务’。‘美国必须按照总的战略计划，在不严重损害本国作战需要的前提下，在持续不断的基础上，为盟国提供尽可能多的军事援助’。‘适当增加经济援助计划，确认有必要继续执行(现在正在执行的)这类计划，直至达到目的’。”<sup>②</sup>略有遗憾的是，《长编》对NSC-68号文件远远超出“提升对外军援”的安全战略设想未能深入分析。这不能不是一个视野上的缺陷。

中国国际关系著名学者时殷弘，依据于杜鲁门时期的大量档案文件所撰写的《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

---

① 刘同舜，高文凡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431页。

② 同上，第432页。

美关系(1949—1950)》一书,对 NSC - 68 号文件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首先,他认为 NSC - 68 号文件“标志着美国开始走上全球干涉主义和黩武主义的道路。”而这种转变与“68 号文件[所]惊恐地描述了[的]世界局势”有关。据时殷弘的解读,文件所认为的国际局势险恶主要出于对美国战后所处的“两难境地”的无奈。“几个世纪以来国际多极均势得以维持的局面已经改变,”他解释,“一方面,国际权势越来越集中在美苏这两个对立的大国手里。另一方面,苏联‘由一种同我们自己的信念相反的狂热信仰激励,企图把自己的绝对权威强加于世界其余国家’。苏联势力已发展到十分可怕的地步,以致‘克里姆林宫统治地区的任何进一步的重大扩展都将造成这么一种可能性:无法组合能以更大的实力与之对抗的联盟。’此种局面加上核战争风险,使美国在处于力量发展巅峰的同时,陷于最深重的危险之中。”<sup>①</sup>

正是由于危险的国际结构而造成了华盛顿决策者们的“危机心态”。于是,时殷弘提出,NSC - 68 号文件“疾呼,美国必须做出‘新的、命运攸关的决定’。”然而,在他看来,文件所表现的除了“国际权势的两极化”之外,也深受“国际冲突的意识形态”的制约。他解释,文件的撰写者判断“当前世界政治的本质是‘自由思想’和‘奴隶思想’、‘自由制度’和‘奴隶制度’的对抗,这种对抗使得世界各地的斗争成为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因此,美国的领导人轻易地断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命运对世界政治具有的意义,不仅仅由其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经济和军事力量等物质因素决定,也由它造成的心灵影响决定。同样,美国在冷战中的行动不仅关系到世界物质力量的对比,也关系到世界心理力量的对比。在任何地方表现得软弱都会损害美国的威望和可信性,‘加剧整个自由世界的焦虑和失败主义’,鼓励苏联及其盟友进行‘零敲碎打的侵略’,造

<sup>①</sup> 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1949—1950》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

成一系列‘逐渐的后撤，直至我们在某一天发觉已经丧失了至关紧要的阵地’。”<sup>①</sup>

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时殷弘注意到了 NSC - 68 号文件的一个重要判断，即：“当今对自由制度的攻击是世界性的，在目前权势极化的环境中，自由制度在任何一处的失败就是它在所有地方的失败。”他认为这个判断的政策意义十分深远，因为：“这是全球干涉主义的经典性表述。它无异于确认，任何非共或反共政府的生存对美国都是至关紧要的，在受到致命威胁时都应得到美国的全力维护。”由于 NSC - 68 号文件证明了“全面干涉”的理性，时殷弘指出，也就论述了美国大规模扩充军备的需要，实质上是在“为遏制政策的军事化鸣锣开道”。文件的论述采用的是对比手法：尽管苏联的军事实力“尚未被苏联认为足以发动美苏战争”，但确实“提供了可用于和平时期的巨大强制力，使苏联可得以‘威胁其邻国，支持侵略性的对外政策，毫不犹豫地在有利条件下通过代理人诉诸武力’”，因此，无疑“已经对‘自由世界’构成了严重威胁”；另一方面，同苏联相比，“美国的军事力量严重不足，这已经造成了苏联越发大胆、美国束手无策的局面。因此，必须大大扩充军备，才能掌握冷战的主动权，也才能阻止苏联发动和打赢热战。文件强调，确立对苏军事优势是保证遏制政策成功的根本条件，否则遏制政策不过是虚声恫吓政策。”

为了在和平时期扩充军备，美国就“需要否定美国可用资源有限的旧观念”。时殷弘认为这正是国安委会 68 号文件所要做的。文件提醒决策者说，“同苏联相比，美国防务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小得多，而整个经济能力却大得多。问题不在于生产力不足，而在于思想和政策保守，未能调集足够的资源用于国家安全”。因此，文件确信：“以高水平的经济活动，美国很快能达到

<sup>①</sup> 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1949—1950》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

3 000 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这方面的进展将允许(它本身也可能得益于)美国和自由世界增强经济军事实力;而且,倘若取得经济的有力扩展,就能实现必要的增强而不降低生活水平因为可以依靠抽取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的一部分来得到所需要的资源。”简而言之,时殷弘强调,文件的撰写者就是希望决策者确信“美国完全可能在和平时期拥有非常庞大的军事机器,并且有能力像新的遏制观念所要求的那样,在任何需要的地方用所需要的方式进行干涉。”<sup>①</sup>

据此,时殷弘的结论是: NSC - 68 号文件“展示了美国全球战略演变的一个新阶段,虽然杜鲁门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才向国会提出大幅度增强军事拨款,但他对这场战争所作的迅速反应表明,他在战前就接受了国安委会 68 号文件的基本精神。”这个文件所代表的战略观念转变,他进一步分析,“对美国的东亚政策来说意义重大,它使先前在这个地区的一些边缘利益成为至关紧要的,从而要求为之付出更高的代价,包括必要时大规模动用美国武装部队。同时,它向决策者证明可能消除,或至少根本地缩小美国军事力量与美国利益需要之间的差距,使他们有可能较少顾虑地使用武力。”据此,他认为,对于理解美国此后在东亚的行动,NSC - 68 号文件是个“必不可少的注解”。<sup>②</sup>

时殷弘的分析紧紧抓住了 NSC - 68 号文件的本质,即:国家安全战略思考和设计。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将美国冷战时期的东亚政策放在了华盛顿的“全球战略”框架中评判,并将 NSC - 68 号文件作为这个框架的“认识”与“思辨”基础。应该说,时殷弘的研究体现了“解读细致、分析不深”的特点。特别略显不足之处在于他对意识形态对文件的“苏联威胁”观所形成的制约作用,描述

<sup>①</sup> 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1949—1950》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

<sup>②</sup> 同上。

显得浅显、“话语”化，未能如伦德斯塔德那样深入到“政治文化”的层面。

在评判 NSC - 68 号文件的历史作用上，由中国著名美国对外关系史专家陶文钊著的《中美关系史，1949—1972》，也称得上是一本力作。这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出版的专著，一开始就抓住了 NSC - 68 号文件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在这一片冷战的白色恐怖中，NSC - 68 号文件出笼。”此外，陶文钊对文件的实质明确地定性为“这是一个从各方面对美国的冷战战略进行重新评价，勾画今后 20 年美国进行冷战的战略蓝图的文件。”<sup>①</sup>

在论及 NSC - 68 号文件对“苏联威胁”的认知上，陶文钊沿用了时殷弘的思路，但刻意强调了“美国式的意识形态”对文件撰写者的影响。他指出：“文件宣称，自由世界面临着苏联扩张的严重威胁，当前世界政治的本质是‘自由思想’和‘奴隶思想’、‘自由制度’和‘奴隶制度’的对立，这种对立使世界各地的斗争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正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制约下，他指出，文件虽然仍然主张欧洲第一的战略，但同时强调了“自由制度在任何地方的失败就是它在所有地方的失败”的逻辑判断，因此美国“‘必须带头在自由世界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领导世界的责任要求我们进行尝试，承担风险，以与自由和民主相一致的原则建立起秩序和正义’。”此外，基于“文件特别强调用军事手段来遏制苏联，建议大量增税，增加军费，扩建常规部队，发展氢弹；对美国实现动员，使美国人对‘做出牺牲’和‘团结’的必要性取得一致看法；在美国领导下建立一个强大的联盟体系；从内部破坏‘苏联集权制度’”，陶文钊基本接受了时殷弘的“美国的遏制政策进一步发展成全球干涉主义和黩武主义”的观点。与时殷弘不同的是，

---

<sup>①</sup>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1 页。

他提出“NSC - 68 号文件对于理解美国当时和此后 20 年的外交政策都是至关重要的”的观点。<sup>①</sup>尽管未能展开阐述，陶文钊的这一提法与他对 NSC - 68 号文件“战略策划”的特质的判断是相呼应的。

“新冷战学者”——特别是非美国学者——对 NSC - 68 号文件及其对美国冷战战略渊源的分析，共同点甚多。值得强调的是，他们均能或多或少地依据已经公开的外交和安全档案文献，对文件的诸多方面进行较为细致、深入且独到的分析，实际上从方法论角度，开启了研究冷战国际关系的一个新阶段。<sup>②</sup>

### 第三节 全面遏制战略制定者的反思

国际关系或战争史学家对一场正在进行中的“战争”进行评估，总难免引起战争的设计者或参与者的不屑。特别受到批评和质疑时，设计或参与者们的反映大都会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个中滋味。冷战的旷日持久，为史学家们“对冲”决策者提供了一个充分条件。

美国冷战遏制战略思路的始作俑者是凯南<sup>③</sup>，但有趣的是，史学家们对他的抨击少之又少。首要的原因是，凯南 1949 年底据说“无法认同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对他的遏制设想的歪曲”，便退出了华盛顿的决策甚至咨询圈子，转至普林斯顿大学的威尔逊中

<sup>①</sup>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1 页。

<sup>②</sup> 参看：Gaddis, *We Now Know*, Chapter 1.

<sup>③</sup> 盖迪斯将凯南的作用界定为遏制战略的“思辨者”（他使用的英文为“intellectual source of containment”）。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 55。

心担任研究员。此外，“学者”凯南不断著书立说，对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主要是国务卿杜勒斯）对自己的遏制战略的“理性”思路在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的频频偏离进行抨击。他于 1951 年出版的《美国外交，1925—1950》、1954 年出版的《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和 1967 年出版的《回忆录，1925—1950》，不仅将他在担任杜鲁门政府国务院政策计划署署长期间与“最高决策者”之间的分歧公布于众，也更为系统地批评了“现行冷战政策”设计、制定和执行方面的种种弊病，从而“捍卫”了他遏制战略的原生思想。<sup>①</sup>

然而，作为 NSC - 68 号文件的主要撰写人，继而作为全面遏制战略的政策设计者，保罗·尼兹首当其冲地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研究。无论是“修正派”还是“调和派”，对尼兹表现在 NSC - 68 号文件中的遏制——特别是他所推崇的“全面遏制<sup>②</sup>”，即不分利益的核心与边缘、威胁的主次以及不考虑资源的有限性——思维逻辑，批评甚多。<sup>③</sup>

由于长期服务于美国国务院，尼兹在职期间虽然十分希望能够对学术与舆论界对他的“误解”予以反驳，但碍于国家对公职人员对外言论的限制，一直“保持缄默”。直到他退休从华盛顿政治圈“淡出”，才于 1993 年 9 月 20 日在美国国防大学的国家战争学院的演说中，对他参与撰写的 NSC - 68 号文件做出自己的解释，并以此提出其对美国冷战后战略的延续有效性。这实际上是尼兹第一次系统地“解释”NSC - 68 号文件和美国冷战中所实行的遏制战略。

---

① George F.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1925 – 1950* (Chicago, 1951); *The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1954); *Memoirs, 1925 – 1950* (Boston, 1967).

② 这个界定是由盖迪斯所归纳的，英文为“symmetrical containment”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p. 352 – 357.

③ Samuel Wells, “Wells's Commentary,” in May, *America's Cold War Strategy*, pp. 136 – 140.

演说的开头,他便宣称:“‘NSC - 68’[所描述的]大战略指出了美国和西方世界所面对的威胁,这些威胁已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烟消云散,然而,‘NSC - 68’所体现的理念——美国的安全政策需要进行条理清晰的探讨——今天与战后或其他任何时刻一样依然有效。”即使美国要制定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他认为,NSC - 68 号文件所表述的战略“仍有助于[美国]迎接冷战后世界的挑战。”因此,有必要重新回顾美国的冷战战略,因为“这番探讨将使新战略的目标尤为明晰,以适应这个全新的、改变了的世界。”<sup>①</sup>

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尼兹强调,需要了解外交和安全政策目标。根据他对美国政治文化的了解,他认为,“如今的美国人对于外交与安全政策取向的共识不及二战结束时期。”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美国的外交与安全目标及其必须“担当的世界角色仍是模糊不清的”。然而,在他撰写 NSC - 68 号文件时,他和他的同仁对“美国在物质上与政治上的安全所面临的威胁与挑战是非常明确而清晰的”。与冷战初期不同,他指出,今天美国所遇到的一系列外交政策问题“却是极为错综复杂的”。尽管这些新问题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似乎并不那么直接,但对于美国在维护全球稳定方面的利益仍是生死攸关的。因此,美国要从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者的角色中脱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要明确美国的安全政策,他指出,美国必须对其如何处理国际事务提出几个基本问题:(1)“我们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2)“我们在国际上的努力要达到什么目标?”(3)“为了追求这些目标我们应采取哪些手段?”<sup>②</sup>要回答这些问题,尼兹提出,美国领导人和战略设计者必须从弄清美国面临着的现实挑战、美国所应保证的国际领导地位

<sup>①</sup> Paul Nitze, “Postscript to NSC - 68: Toward a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131.

<sup>②</sup> 同上,第 132 页。

位以及为了保证领导地位美国的目标等相关问题。

首先,尼兹指出,美国冷战后所面临的安全挑战与冷战时期大致相同,但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造成的威胁——显得更加严峻。冷战的结束打破了两大集团之间的权利平衡,他分析,造成全球各地新的冲突的扩散,而这些冲突是极其危险的。例如,他解释说,“武器扩散导致小规模的武装能造成大规模的破坏。在某些冲突中,尤其是在前苏联地区,冲突各方装备有最具杀伤性的武器。某些争端牵涉的派别与境外势力有密切的联系,增大了冲突蔓延出边境的危险性。”与此同时,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着严重的军事威胁,其中最主要的威胁是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扩散以及弹道导弹扩散的危险。此外,“冷战的结束没有终止全球范围的武器部署。”而各国用于常规武器的花费仍然保持在每年约1万亿美元的水平上。如冷战时期一样,国际社会对于常规武器扩散的有效控制仍然有赖于若干有影响力的集团之间的合作<sup>①</sup>。

经济安全已经凸显为冷战后美国安全面临的一个新挑战。“尽管经济安全在传统上尚未被视为安全问题,”但尼兹强调,“以难以消除的全球性衰退为表现的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性提醒我们,发生在国外的经济事件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健康。”据此,他认为,美国经济上的脆弱性正成为一个安全问题,而美国已经无法如冷战初期那样具有采取单独行动便能遏制国际性经济威胁的能力。例如,冷战后出现的国际性的高利率,与美国联邦预算的赤字一样,阻碍了美国经济的顺利复苏。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大国间——特别是西方工业国家之间——“为了共同利益而有效地协调国际行动以求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已经变得十分困难。

---

<sup>①</sup> Paul Nitze, “Postscript to NSC - 68: Toward a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132.

尼兹举例说，在涉及关贸总协定(GATT)向世界贸易组织(WTO)转型的谈判中，“各国对于开放国内市场的态度显得[较冷战期间]更不情愿”。<sup>①</sup>

与经济安全相关联的是环境安全问题。自冷战结束后，尼兹认为，“环境问题比其他任何挑战都更为鲜明地体现了全球各国的互相依赖性”。尽管传统上这一领域一直未被视为国家安全问题，但是，尼兹解释，从形成原因和解决途径两方面来看，这也是国际性的问题，因为“全球气候变暖可能会对农业、海岸侵蚀、供水和人类及动物的栖息地产生剧烈的影响；臭氧的枯竭增大了人们患病的风险，对动植物的生命也构成了难以预料的威胁；物种的减少既威胁到遗传基因的多样性，同时又威胁到由这种多样性所带来的生物、经济和人类健康方面的益处；最重要的是，这众多压力的源头，失控的人口增长仍在加速。”<sup>②</sup>他强调，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和遏止，都需要美国发挥“清晰的领导作用”，否则华盛顿的国际权利地位将受到严重挑战，以至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其次，面对这些传统威胁和新的安全挑战，尼兹认为，美国在冷战后完全应该也能够如冷战初期一样确定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导地位。这是因为，美国依然拥有一系列“无人与之匹敌的特性”，其中主要包括：(1) 具有第一流的军事能力，政治影响力、经济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2) 迄今尚未表现出对他国领土存有野心。这些特性在漫长的冷战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使得美国不仅适于承担起世界领导者的角色，也“未负众望”。在冷战结束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尼兹肯定地说，“其他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不具备[美国]类似的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能力。”据此，就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而言，任何形式的“光荣孤立”的诉求，任何寄希望于

<sup>①</sup> Paul Nitze, “Postscript to NSC - 68: Toward a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132.

<sup>②</sup> 同上，第 132—133 页。

“集体安全”的“理想主义”的倾向，不仅被冷战证明是危险的，也将为冷战后的国际现实证明是不可取的。<sup>①</sup>

再次，尼兹坚信，冷战期间被证明有效的遏制战略仍适用于冷战后。至于美国到底在军事和外交战略层面上应该并可能做些什么，他认为，华盛顿的领导人完全有可能继续实施冷战期间行之有效的遏制战略框架下的多种政策。

第一，美国可以继续以核威慑为武器，不仅威慑其他“核大国”在任何情况下不敢首先对美国实施核打击，也起到遏止核武器扩散的作用。在尼兹看来，美国应该在保持对中国和苏联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保持绝对的核优势的前提下，通过军事和外交的手段“对苏联的几个继承国施加威慑力，阻止其使用核武器，并施加必要的影响以通过谈判削减其核武库，”进而确保“美国在这方面处于最为有利的位置”。

第二，在欧洲，美国必须也可能继续保持主控地位。即便是冷战结束，尼兹判断，欧洲仍然处于相对于美国的国际地缘政治的核心位置，美国在该地区经过百年的经营，已经取得了“维持和平”和“促进发展”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可运用我们优越的地位鼓励和推动和平解决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冲突尚未发展成内战或跨越国境的战争之前迅速加以控制和制止。”尽管美国应该继续参与维和任务，“如果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希望我们这样做的话”，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必须在欧洲保持大量驻军，而“只有当欧洲国家提出要求时，我们才会驻军，驻扎期限也将根据要求而定”。

第三，在远东，美国不应该因为冷战的结束而全然退出。尽管可动用的战略资源有限的现实要求美国不可能四面出击，对美国

---

<sup>①</sup> Paul Nitze, "Postscript to NSC - 68: Toward a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 133.

而言,也许最佳的选择是让“日本最终承担起领导角色”。然而,日本一旦扮演起“这样一种角色,将引起其他亚洲国家尤其是那些过去曾遭受日本统治的亚洲国家极大的忧虑”,结果可能造成新的、美国最终不得不介入的冲突。况且,“日本是否能将他国利益与其自身利益一视同仁,这种可能性是值得怀疑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领导他国,除非它有能力这样做)。”

第四,在中东,美国为了自身只会增大而不会萎缩的国家安全利益,必须强化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存在。尽管从二战结束起美国便在该地区处于一种“欲罢不能”的境遇,但是随着石油能源压力的激增、中东巴以冲突的泛化和新的军事平衡的变化,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选择只能是坚定和长期的介入。在尼兹看来,“最近在美国的推动下中东和平所取得的戏剧性突破再次证明只有美国才有资格在这一重要舞台上担任核心角色。”

最后,美国冷战后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取决于一个根本的因素,即:经济发展处于任何国家或地区无以比拟的绝对优势。冷战结束之时,尼兹指出,美国保持了经济的绝对规模(占全世界 GNP 的 20% 以上),使其在应对世界经济问题时不可避免地处于核心地位。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工农业规模巨大,对全球经济复苏来说,“美国不是作出巨大贡献就是成为一个主要障碍”。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如果美国要在全球舞台上担当强有力的角色,就必须改善“存在内部与外部的[限制经济发展的]因素。”<sup>①</sup>

据此,尼兹强调,美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全面遏制苏联“共产主义阵营”的胜利,是由于美国在发展军事的同时成功地保持了经济上的巨大优势。为了在冷战后保持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他认为,

<sup>①</sup> Paul Nitze, “Postscript to NSC - 68: Toward a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p. 133 - 135.

美国政治家和战略决策者必须认识到美国国内经济状况已经成为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最大的内部障碍”。他解释说，“我们的经济问题，尤其是我们陷入困境的预算和支出赤字平衡状况削弱了我们援助他人的行动能力。另外，美国公众对于美国广泛介入国际事务抱有传统上的怀疑态度，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经济活力有限的时代。”此外，美国成为世界领袖最主要的外部障碍是如何使各国协调一致、共同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从目前的情况看，尼兹指出，“对于如何处理日益增多的冲突和争端，国际上并无共识”；更有甚者，“美国与友邦和盟国的关系出现紧张，对军事威胁的下降有所认知，这些因素使得关注的中心转向了经济和其他事务。”<sup>①</sup>

因此，“为了分清解决这些问题的轻重缓急，”尼兹强调，“美国需要理清其政策目标。”数十年冷战的教训与冷战后的需要表明，美国基本的外交政策目标“应是容纳与保护存在于世界秩序总体框架内的多样性。”为此，美国的外交各项努力“要尽力形成这样一种全球性气候，各种不同的政治集团都能以其自身的，或许是某种古怪的方式而存在。我们应该寻求消除以武力与恫吓作为解决不同集团间争执的可取的手段的这样一种状况。”值得强调的是，尽管重弹世界体系的多样性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的老调，尼兹似乎在修正他制定 NSC - 68 号文件时所提倡的全面遏制的原则，靠近了凯南所倡导的“总体遏制、局部接触”的战略思路。

那么，应如何确定具体的“局部接触”的政策“原则”？尼兹的处方十分有趣。第一，他建议，美国“应致力于培育不同集团间的合作，[因为]这对于这些解决他们共同面临的问题是必不可少

---

<sup>①</sup> Paul Nitze, “Postscript to NSC - 68: Toward a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p. 133 – 135.

的”。其实质是“强调多样性对于处理那些确属各国的内部问题提供了某种准则”。第二，他认为，美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应是尊重主权，即，“不应将自己所偏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强加于别国。我们应尽可能地支持那些不威胁他国的合法政府”。第三，他强调，美国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同时，必须考虑能够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去维护“人权”。美国的领导人和人民必须认识到，“人类的基本权利高于国家主权，我们不必羞于为保护人权而奋斗。”<sup>①</sup>

基于这样的原则，美国首先应该强化基于“多边主义”的国际机制的建设和国际秩序的完善。尼兹分析，可以预见的是，“跨国界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因此，以国际组织为范式的“超国家机构在解决这类问题的过程中将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些机构在处理国际性问题时比缺乏协调中心的单个国家能力更强，效率更高。”只有当美国“准备以自己的表率担负起领导作用时”，美国才能施加足够的影响以建成一个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集体安全”和“共同发展”的世界。要有效地实现这一远景目标，美国必须全面加入这些超国家机构。

为了实现“局部接触”的目标，美国在其他需要国际通力合作的领域，也应起到表率作用。尼兹指出，如在限制世界范围内具有潜在危险的高科技武器的销售和转让方面，美国必须发挥领导作用。“正如我们在海湾战争中的领导地位源于我们具有将我们的军队置于沙特前线的意愿，”他强调，“我们是否有能力在解决其他问题时发挥我们的领导作用取决于我们是否具有理顺我们自身的经济状况并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解决问题的意愿。”<sup>②</sup>

---

① Paul Nitze, “Postscript to NSC - 68: Toward a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p. 133 - 134.

② 同上。

为了实现“局部接触”的目标，美国未来的领导地位也应类似于在海湾战争中所承担的一种角色：建立联盟并领导联盟对特定问题做出反应。由于冷战后安全形势的日益复杂化，需要美国和美国的盟友迅速应对的危机将会以“意想不到”方式和规模出现。此外，“根据其他国家的利益以及主要国家是否愿意支持我们所要采取的行动，形成每一联盟的组织基础必然是不同的，如联合国、其他超国家组织或某种特定的安排”。据此，尼兹认为，“当我们将这一模式在未来付诸实践时，我们应富于创造精神，使之适应各种特定的情况”。<sup>①</sup>

值得注意的是，与尼兹制定 NSC - 68 号文件相同的是，他仍然提倡美国在制定“冷战后”战略时，需要“以[外在]挑战来界定利益”，尽管这种界定“使得传统的对于美国安全利益的界定更为宽泛”。他的理由是：“全球性问题对美国极为重要，这些问题对美国的重大利益产生了影响，我们是唯一有资格发表这些主张的国家，这一切都需要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强有力的角色。所以，美国的国家安全新战略不应局限于对于安全利益的狭窄定义，而应该认识到对于国际合作的需要。”与制定 NSC - 68 号文件不同的是，尼兹开始承认美国的资源有限和发展经济实力的优先必要性，明确地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但他仍然十分肯定：美国“必须领导起迎接挑战的重任；如果我们将对这些挑战不屑一顾，我们将会发现它们对我们的利益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sup>②</sup>此外，尽管似乎已经不认为“全面遏制”是美国冷战后的唯一选择，尼兹仍然坚持遏制的不可替代性，唯一的变化是提倡比较接近凯南的“整体遏制、局部接触”的战略原则了。

---

① Paul Nitze, “Postscript to NSC - 68: Toward a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in Drew, *NSC - 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p. 135 – 136.

② 同上，第 136 页。

## 小 结

应该说，上述评论基本上未能跳出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长期以来对 NSC - 68 号文件所倡导和确定的全面遏制战略的“功过”与“是非”的评判框架。学者们的研究无疑受到了他（她）们自身的政治理念与治学方法的局限。如果参考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现”与新方法，同时将触角放在“文件”所表述的战略思想的产生渊源与原因上，评判的范围可能会更加宽泛，视野也会更广阔。对此，本书提出一些建议。

首先，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总文件”，NSC - 68 号文件一个重要部分是对美国所面临的以及可能面临的“外来威胁”的认知，那么，这些认知是如何产生的？产生的根据是什么？“认知者”自身的因素——如心理压力、机构内部竞争压力、个人战略思考的经验与能力等——是否会影响认知？如果可能影响，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即有无导致“错误认知”的可能？国际政治著名学者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以及理查得·勒伯(Richard Ned Lebow)都对“误知”产生的结构与非结构原因做过系统的研究。黛博拉·拉森(Deborah W. Larson) 1985 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 *Origins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遏制的渊源：一个心理角度的解释]，就是用政治心理学的分析方法解析杜鲁门政府实施遏制战略“认知”过程的一个极好的尝试。<sup>①</sup>

---

①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Robert Jervis, 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and Deborah W. Larson, *Origins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如何具体分析凯南、艾奇逊、约翰逊以及尼兹的“认知”心理，学术意义也十分重要。

其次，NSC-68号文件的撰写者们在政策内容表述上，使用了大量的“美国式的政治理念”，那么，他们的这些政治理念到底来自何处？这些政治理念与美国的主体政治哲学、政治文化有何“因果”或“互动”关系？围绕这些问题对NSC-68号文件的出台及其政策影响进行探讨，不失为从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看对外政策制定的一种研究方法。美国“思想”史学家布鲁斯·寇克里克(Bruce Kuklick)，曾经提出：NSC-68号文件的“炮制者”们，如尼兹、艾奇逊，甚至杜鲁门无一例外是美国所谓“改革了的新教[Reformed Protestantism]”主义与制度培养的政策制定者，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思维与认知——特别是对所谓“苏联威胁”的判断与解释——很难说没有受到美国“特色的”“新教主义”“价值观”、道德观或“善恶观”的制约。<sup>①</sup>如对美国对外关系史上重要的外交文件——如“共和党人文献[The Federalist Papers]”、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告别辞[Farewell Address]”、威尔逊的“十四点[Fourteen-Point]”宣言等——做类似这样的比较研究，也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

再次，NSC-68号文件在政策观点的阐述方法上较为特殊。那么，文件的本身有无“话语分析”的意义？特定的修辞与“话语”是否含有特定的政策内容与目的？如果借鉴法国史学、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分析法[discourse analysis]”，探究NSC-68号文件的制定者们是如何在修辞、语义的选择上，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赋予其一定的政治或政策意图的，也有望

---

<sup>①</sup> Bruce Kuklick,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ivision of Germany: The Clash with Russia over Reparation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Kuklick’s Commentary,” in May, *America’s Cold War Strategy*, pp. 157–159.

在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方面取得突破的可能。美国“修正派”学者艾米丽·罗森泊格(Emily S. Rosenberg)在这方面有过非常有启发的尝试,<sup>①</sup>但进一步拓宽触角的空间仍然很大。

---

① Emily S. Rosenberg, "Walking the Borders," in *Explaining the History for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ed. Michael J. Hogan and Thomas G. Paters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4–35; "Rosenberg's Commentary," in May, *America's Cold War Strategy*, pp. 160–164.



## 历史、现实与未来

以美苏“两大阵营”对抗为基本特征的冷战，经过长达近乎半个世纪的令人提心吊胆，终于于 1991 年以苏联的解体而告终。这场 20 世纪的“非传统意义的战争”，虽然结束得是那么突然、那么具有戏剧性。仅从耗时上看，冷战是同一世纪里的另外两场同样是全球性的“热战”所无以比拟的：冷战相当于打了 10 个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和 7 个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sup>①</sup> 虽然同样损失惨重，美国却认为自己是冷战最后的“胜利者”，至此，似乎“历史可以终结了”。<sup>②</sup> 无疑，失败的经历让人刻骨铭心，但胜利的记忆常常令人冲昏头脑，以至产生了“历史”与现实和未来的奇怪的关联关系。<sup>③</sup>

### 第一节 美国冷战遏制战略的误区

无疑，冷战是世界范围内“两极化”了的国际冲突。这一冲

① 参看：Gaddis, *We Now Know*, pp. 281—282。

②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Avon Books Inc, 1992), chapter one.

③ 关于此点，参看：Ernest R. May, “Lessons” of the Past: *The Use of Misuse of Hist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conclusion.

突表现为世界上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对峙，两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角力，两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竞争，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剧烈的军备竞赛。几乎所有民族国家的利益、威胁、资源和安全战略的界定，都无一幸免地受到这一泛化了的冲突结构的强力制约；几乎所有民族国家的人民——至少三代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都受到了冷战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体系无所不在的空前影响。20世纪的冷战是人类经历的一场非传统意义的“热战”。

美国作为这场战争中的主角，其对冷战的推动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可以肯定的是，华盛顿冷战战略的核心是遏制，并且从初期的“有限遏制”转向长期的“全面遏制”。遏制战略的形成，经过了从二战结束到朝鲜战争爆发时期近五个年头的酝酿与三个阶段的发展。这个时期的杜鲁门政府在制定遏制战略的过程中，虽几经反复，但确定遏制的基点从未动摇过。华盛顿选择遏制作为冷战的长期国家安全战略，从战后的历史环境考察，并非偶然。

杜鲁门执政伊始，便决心对莫斯科采取“强硬[Getting Tough]”的外交政策，与苏联按各自国际政治势力范围的外延划线，以阻止其在东欧以及地中海地区的扩张。这应该是对苏遏制思想的雏形。美国的“强硬”政策似乎无法奏效，仅仅通过“态度坚决”、“立场坚定”、“以一换一”的外交谈判，不仅没有“劝阻”克里姆林宫停止“西进”，同时对苏联的“南下”也显得束手无策。

凯南1946年初的“长电”，开启了“遏制战略”形成的第二阶段。美国这位为外界所知甚少的苏俄专家，立足于对苏联“历史意识”、意识形态、政治文化、领导人特性诸方面因素的分析，指出“东西方”间的冷战将长期存在，美国的应对只能是“战略性”的，而“动态性”的有限遏制则是最佳选择。基于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尚很遥远”的判断与对“美国资源有限”的认识，凯南的“动态遏制”重点在于：(1) 以经济援助确保美国对“工业中心(西欧、日本)”的

控制；(2) 以“堡垒防御”与苏联做“战略划线”；(3) 以政治运作分化苏联与其“卫星国”的关系；(4) 以国际建制控制苏联的核武器发展。“动态遏制”似乎也“低估”了苏联所谓“全球扩张”势头。1946年土耳其、希腊“危机”，1948年“柏林封锁”，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以及苏联原子弹实验成功，加重了华盛顿的“危机感”，进而为以 NSC - 68 号文件为标志的“全面遏制”出台创造了外部条件。

应该说，在 NSC - 68 号文件出台之初，杜鲁门对“全面遏制”——特别是对“全面遏制”所要求的大幅提高军费——仍十分犹豫，但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的爆发，似乎全面“证实”了凯南的继任尼兹的判断，进而完全打消了杜鲁门的顾忌，同时为政府全面动员美国民众支持冷战提供了契机。朝鲜战争首先“佐证”了 NSC - 68 号文件的基本思想，即美国冷战的全球安全利益，就战略重要性而言，已无主次之分；苏联领导下的“共产主义阵营”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武装侵略”所取得的“胜利”，都是对美国与“自由社会”的严重“挑战”；如果美国不予以“坚决反击”，必将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后果将不堪设想。

其次，受苏联控制的“朝鲜”对“自由国家”韩国的“武装进攻”，证明了 NSC - 68 号文件对“苏联将在近期以‘代理人[war by proxy]’武装挑战美国”的判断。朝鲜半岛发生的武装冲突表明，这种“代理人战争”对苏联十分有利：既无需直接参战，又能“损害”美国的“战略可信度”，并可以最小的代价、最大限度地消耗美国有限战略资源。如果美国仅依赖对苏联的核武器优势，已经无法制止克里姆林宫发动的“代理人战争”，而唯一的回应只能是“以牙还牙”。

再次，朝鲜战争“以事实”说明，美国的武装力量——特别是常规军事力量——已不足以在“不使用核武器”的前提下，实施“有限战争”，甚至“担负联合国警察”责任。为了“武装干涉”朝鲜，杜鲁门政府紧急动员军力、人力与物力，“联邦”军费开支预算，远远

超过了 NSC - 68 号文件所要求的 GDP 20%。<sup>①</sup> 尽管“朝鲜战争”很快被杜鲁门政府的批评者们看作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与错误的敌人”所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sup>②</sup> 但 NSC - 68 号文件并未遭到“贬斥”或撤消。

纵观美国冷战期间遏制战略实施经历，不难看出 NSC - 68 号文件深远的影响。它所提出的对苏“全面遏制”，尽管由于此后美国各届政府所面临的国内外“挑战”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侧重点，但其奠定的威胁与“利益”认知逻辑——即国际均势的任何一个变动都将产生“引一发而牵动全身”的结果——主宰了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对外“危机处理”的行为。

仅以亚洲为例。自 1953 年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生效后，美国就曾两次“武装介入”台湾海峡（1954—1955, 1958），以确保“非共产党控制”的台湾不“落入”共产党之手。<sup>③</sup> 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大力“援助”法国对越南殖民统治的“恢复”，并在 1955 年所谓“奠边府危机”发生时，甚至考虑使用“战术核武器”甚或“直接出兵”，以摧毁“共产主义”统治印度支那的“企图”。尽管“日内瓦协定”导致了法国从印度支那全面撤兵，华盛顿却贸然取代巴黎，不仅加强对越南的控制，还通过“东南亚条约组织 SEATO”构建了美国的“西太平洋”军事同盟。<sup>④</sup> 美国在东南亚的“愈陷愈深”，最终导致

<sup>①</sup> 参考：William Stueck, Jr., *The Korean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sup>②</sup> 参考：Rosemary Foot, *The Wrong War: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1950 – 1953*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sup>③</sup> Shu Guang Zhang,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 1949 – 1958*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sup>④</sup> Qiang Zhai, *The Dragon, the Lion, and the Eagle: 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 1945 – 1958*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越南战争”的爆发,致使华盛顿自朝鲜之后在亚洲打了一场“更加错误”的战争。<sup>①</sup>究其深层原因,无一不是由于 NSC - 68 号文件所制造的害怕“多米诺骨牌效应”心态作祟的结果。正是这种冷战心态,使得美国在亚洲多次卷入“热战”之中。

新兴的冷战国际关系研究表明,美对外战略考虑与安全政策制定呈现出相当程度上的误区。特别通过对华盛顿全面遏制战略渊源的追溯,研究者极易发现,美国在冷战初期的对外战略思考与决策,表现出诸多方面的“非理性”。

第一,美国冷战战略追求的是“绝对安全”这种非现实目标。“理性”国家安全战略策划的一个“底线”,是承认并遵守国际社会“无序”状态中的“势力均衡”规则。尽管“自保”是任何现代民族国家为了安全所“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则,但是任何一国的“绝对安全”必将造成另一国(或数国)的“绝对不安全”。就安全而言,国际间“双赢”结果只能建立在“相对安全”的基础上。尽管美国对外与国防决策者们——特别是“凯南们”——对传统的地缘政治均势理论不无耳熟能详,但在面对战后的“两极”安全态势时,却义无反顾地走向“极端主义”的不归路。无论是杜鲁门早期通过“软硬兼施”以求“将莫斯科纳入国际建制”的努力,还是凯南“军事上确保主要工业中心、经济上扶持对苏抵抗阵线、政治上瓦解共产主义阵营”的安排,或是尼兹的全球范围内长期对抗“苏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计划,无一不是为了实现美国的“绝对安全”:即最大限度地削弱战略对手苏联的战争“制造”能力、政治影响力和政权凝聚力,迫使其最终“分崩离析”,从而完全、彻底地根除所谓“苏联威胁”,并造成美国在国际安全环境中“单极独霸”条件下的“绝对安全”态

---

① George C.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 - 1975*, 2nd ed.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86); James S. Olson and Randy Roberts, *Where the Domino Fell: America and Vietnam, 1945 - 1995*, 2nd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势。正是为了这个目标,美国对苏联“共产主义阵营”的全面压力变成冷战的常态,而通过谈判、沟通、妥协而建立“合作”态势的姿态便成了例外。

第二,美国为了“全面遏制”而大幅提升国防力量,使冷战的“安全难题”更加恶化。尽管 NSC - 68 号文件否定了对苏实施“全面战争”的选择,但却提出了要按可能出现的国际安全“最坏情势”做军事与国防长期准备的理念。这种理念的“误区”表现为两方面。其一,任何“最坏情势”都具有不确定性,所以针对这种不确定“未来”所做的任何准备,无论如何量化,都只会是“不充分”,因此为了“充分准备”的资源配置便无止境可言了。其二,为了“最坏情势”做准备,从理论上讲,都是出于“自保”与“自卫”动机;然而,所有的这些“防御性”的安全准备,在现实与潜在战略对手眼中,特别是在全面对抗的条件下,便变成是“充满敌意”、“蓄意挑衅”、“图谋不轨”的“攻击性”行径;而后者则不得不加强自身的军事与国防准备,以应付可能的“最坏情势”。这便是古典“安全难题”的开启与“下滑”。冷战国际关系研究表明,杜鲁门政府后期在国内“扩军备战”与在国外“构筑同盟”,对此后美苏间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以及日趋白热化的“军事集团”对抗,难脱其咎,而美国不得不为了“最坏准备”长期、大量地投入资源而疲于奔命,则是咎由自取。

第三,美国认知威胁的“多米诺骨牌”逻辑,不仅使自身的国际安全利益难分轻重,也将国际政治地图“板块化”。NSC - 68 号文件对美国冷战战略决策的最大影响,应是其确定的“多米诺骨牌”逻辑。在这个逻辑的制约下,华盛顿冷战战略目的从保卫自身具体的国家安全利益演变成遏止“非共产主义”国家或地区“倒向”对立面,这就使得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界定产生错位现象:遏制本应维持“势力平衡”,但为了强化对盟友以及所有“自由国家”的“政治信誉”与战略“可信度”,遏制则导致对“威胁平衡[Balance of Threat]”的追求,其结果不仅使美国自身的威胁认知更加“主观化”,还使得“盟友”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从“利益平衡[Balance of

Interest]”出发,以“多米诺”结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采取“搭车[Bandwagoning]”的策略,最终得以操控(manipulate)美国的对外政策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sup>①</sup>这种现象成为调控美国与其盟友间“非对称”盟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于是,当决策者们认定“哪里有‘共产主义’得手的可能哪里便成为美国的核心利益”时,美国的国际安全利益便被无限地扩大了,从而导致美国对外安全、军事、外交、经济“承诺”的泛化与失控,同时陷美国于“无加选择”地介入国际冲突这种无可奈何的境地。

第四,从凯南到尼兹,华盛顿冷战战略决策形成了特定的“话语”框架,进而塑造与制约了美国的“冷战观”。比如,在描述美国的“根本目标”时,凯南的“长电”与尼兹的 NSC - 68 号文件,均频繁使用“自由社会”、“民主制度”、“人民福祉”等典型的西方政治话语;在界定苏联“共产主义”威胁时,则无一例外地使用诸如“集权”、“奴役”、“独裁”、“镇压”、“暴力”、“侵略”、“扩张”等贬义修辞。值得提出的是,所有这些冷战语汇,不仅重复地出现在 NSC - 68 号文件以后美国国家安全、外交、国防、军事战略以及对外情报的“密级”文件与报告中,还泛滥于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对外宣传诸如新闻传播、公共教育、学术研究、娱乐媒体,甚至教堂礼拜等“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公共话语”中。在“绝密”文件中选择这些含有浓烈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甚至宗教教义“色彩”的政治话语,不仅反映了文件撰写者们的“思维心态”,更为重要的是确定了政

---

① 关于“威胁平衡”、“利益平衡”,参看: Stev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关于“多米诺”与“搭车”,参考: Thomas J.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4(2) (Spring 1990): 138 – 168; Robert Jervis and Jack Snyder, eds. *Dominoes and Bandwagons: Strategic Beliefs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Eurasian Rim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策思考与阐述的定式,使得此后的战略策划很难摆脱这些“价值观沉重”的话语框架的束缚;而“公共领域”无加分析地接受这些美国式意识形态与“道德伦理”化的话语与思维,便使得美国冷战的“敌人形象”被定式化、通俗化,甚至“卡通”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凯南的“长电”与尼兹的 NSC-68 号文件开启了美国走向“安全国家 [a security state]”的大门,同时也为独特的美国冷战文化形成奠定了基础。结果,使得美国冷战战略思维变成一种冷战心态,甚至冷战时尚。<sup>①</sup>

第五,美国冷战国家安全战略决策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内政治的变数。理性的国家安全战略制定要求能够“游离”于诸如政党执政轮替、利益集团影响、官僚机构纷争、国内经济压力、社会文化潮流等“常变因素”的影响之外。美国冷战经历却说明,这种“理性”要求实属“理论家们”的幻想。从 1946 年到 1950 年期间,美国内政治正在发生繁杂的变化。其一,二战结束后经济转型所面临最为严重的问题,是如何抑制通货膨胀,扩大工业生产,以尽快吸纳大批退伍军人。因此,大力开拓欧亚市场和增加联邦支出以刺激经济增长,便成为对外安全战略考虑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隐藏目标[a hidden agenda]”。其二,此间的两党之争甚为激烈。自 1932 年失去对白宫的控制后,共和党一直致力于“夺回白宫”的“政治决战”之中,然而在 1948 年总统大选中的再次败北,使得共和党人利用他们控制的国会对民主党政府的打击更趋“惨烈”。反映在对外政策上,便施压杜鲁门政府加剧冷战。1950 年初开始发酵的所谓“麦卡锡主义”则是例证。<sup>②</sup>其三,华盛顿安全战略决策所依托的“军政”一体化,使得决策程序复杂化,机构间的互相竞争与互相制约愈演愈烈。特别是由于国务院、国防部等文官机构,在新

<sup>①</sup> 关于意识形态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参看: Michael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sup>②</sup> 参看: Alonzo L. Hamby, *Man of the People: A Life of Harry S. Trum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的“国家安全”决策机制内，急于挑战军方传统上对军事战略咨询、决策、实施、评估的“专利权”，以致在安全战略思考与提议上，不仅“急功近利”，同时咄咄逼人。如果说凯南在担任 PPS 主任期间尚能在取得战略思考的主导地位后仍积极争得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支持与谅解，尼兹接任该职后以及在制定 NSC - 68 号文件的过程中，几乎完全“忽略”了与国防部长约翰逊的沟通。应该说，NSC - 68 号文件并非是“军政”协作的产物，而反映的主要是文官机构内“冷战专家”们的立场，因此这个在几个月内完成的“急就章”式的战略文件，难免考虑偏颇，观点荒谬。实际上，“军政”双方在战略决策上的争斗贯穿了整个冷战时期。

第六，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决策中的“人为”因素不可忽略。任何决策都是“人”的行为，国家安全战略尤其如此。对此，美国冷战战略决策经历表现出一种奇特的现象：由于最高决策层对战略思考的重视，而出现了一批所谓“战略知识分子[Strategy Intellectuals]”。这些人常以“专家”的身份，或在政府内部担任战略政策研究工作，或在政府外(但由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中承担战略思想发展与诠释使命，实际上主导了华盛顿的冷战战略制定。二战结束后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意愿，正是由于凯南的出现，才得以“升华”为战略理念，进而成为国防外交政策的核心，而凯南的“现实主义”思想、“特殊主义”逻辑也贯穿于战略理念与操作政策之中。然而，当艾奇逊接任国务卿以后，凯南逐渐失势，以致最终让位于尼兹。在艾奇逊支持下，尼兹“修正”了美国“遏制战略”，并以“最高绝密文件”的形式，定出新的战略思维框架，其中“尼兹们”的“手印”比比皆是。此后，类似凯南、尼兹这样的“战略知识分子”层出不穷：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威廉·考夫曼(William Kaufman)和罗伯特·奥兹古德(Robert Osgood)；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罗伯特·麦克拉马拉(Robert McNamara)与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以及尼克松时期的基辛格。由于不同的“战略知识分子”的侧重点不同，使得美国冷战战略显得“前后不一致”，极易给对手

传递出“偏差”、“错误”的信息而造成对手误判，而造成原先可以避免的冲突爆发或导致本来可以缓解的危机升级。

第七，美国式的“实力的傲慢”造成对国家安全战略资源的配置与利用的无加限制。<sup>①</sup>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诸如工业生产能力、科技研发水平、公共财政收入、人力资源动员、能源交通通讯等战略资源都是有限的。因此，任何形式的战略决策与运作，在相当意义上，都是资源配置与利用的“艺术”。二战后的美国，由于其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的国家经济能力，以及作为两次世界大战主要战胜国的“显赫地位”，滋生了美国人（包括决策者与一般公众）对自身实力“不可战胜”的乐观与傲慢。于是，当确定发展军事国防与外交运作力量时，决策者由于这种“实力优越心态”，常常忽视“资源终究有限”这个原则，往往过高地估计自身对战略资源的动员与利用能力。如果说凯南按其“特殊主义”的思维仍希望美国的“动态遏制”承诺能够与自身资源相匹配，那么“尼兹们”则认为美国“无穷无尽”的战略资源完全得以保证他们所倡导的“全面遏制”。NSC-68号文件所表现出的“实力的傲慢”，实际上是其对美国整个冷战时期战略制定的又一大制约。尽管艾森豪威尔出于“保守的财政”政策考虑，缩减了联邦对常规武装力量的军费开支，但对核武器研发、对外援助以及“秘密行动”等有关安全战略的投入仍然巨大。肯尼迪与约翰逊时期，由于美国50年代经济的“腾飞”，在冷战对外行为上所表现出的“实力的傲慢”则登峰造极。然而由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惨痛教训”，“尼克松主义”与卡特的“人权外交”似乎在对美国战略资源认知上“有所收敛”，但到了里根时代，不考虑“资源有限”的“全面遏制”又创新高。

诚然，对美国冷战战略思考与决策的研究，都必须在研究方法上得到支撑，而历史分析法则是十分重要的方面。历史方法的核

<sup>①</sup> 参看 William J. Fulbright, *The Arrogance of Pow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7)。

心是立足档案文献以求做出“接近原来”的描述与判断。在过去的15年间,美国公布、解秘了大量冷战时期的军事、外交、经济档案,特别是有关1945—1972年期间的材料极为丰富。如杜鲁门到约翰逊时期所存的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等部门形成的文件均已系统开放,其中“精华”已由国务院以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FRUS] 分卷出版;尼克松时期的外交、军事部分虽还正在整理中,但美国国家档案文献局(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已通过“尼克松总统文献”项目将部分“白宫文件”提供学者使用,其中包括最新、最具价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献”。(关于中国则有洛德担任的“政策计划委员会”的文件卷)。除了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文献外,大量有关美对外政策的材料分别存于各个时期的总统档案馆,不少的个人文献则散存于国会图书馆、美国海军历史资料室以及大学图书馆内。本书所列举的档案文献,充其量只是美国已公布的对外与国防档案的样本。

## 第二章 美国冷战对华战略思考与决策

美国冷战时期的全面遏制战略直接和间接地制约了华盛顿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思考与决策。对此课题的研究,国内外的学术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学者仍旧可以——也需要——根据“决策论”的“动因[Driving Forces]”与“结果[Outcomes]”关联链,剖出若干个政策分析面,并将单个的决策行为放在一个较长的时段内“检验”,以求得出接近“普遍意义”的推论。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研究美国冷战对外关系中,特别是考察华盛顿的全面遏制战略的实施方面,如何“聚焦”在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上,对中外国际关系学者仍是一个较大的挑战。为了帮助热

心于这一领域的中国青年学者如何选择研究课题与确定“切入点”，本书在此提出一些议程设定建议，仅供参考。冷战期间美国的对华决策行为，至少可以在以下十个方面做深入系统的探讨：

第一，美对华战略考虑与决策。<sup>①</sup>具体的问题包括：冷战时期美对华战略决策，是怎样认知与界定“利益”与威胁的？两者间有无出现位置颠倒与混淆？如果存在这种情况，为什么？其政策上的影响与后果是什么？美国对华的军事战略到底是什么？具体哪些机构、部门与“专家”参与了对华战略研究？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冷战期间对华战略决策与实施有无“误识”、“误判”现象？如果有，造成的原因是什么？是思考逻辑的荒谬还是“机制性”的缺陷？是“人为”的因素还是“战略文化”在作祟<sup>②</sup>？

第二，美国对华经济“外交”。为政治目的开展的所谓“经济外交”，是美国冷战期间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政策面。华盛顿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武器的使用，呈现出从短暂的“正面运作”——如杜鲁门早期的经贸、经援“诱惑”政策——很快转向历时数十年“负面实施”的轨迹。后者包括对“军事战略物资”的禁运，对双边、多边贸易的封锁，对中国对外经贸的制裁，对任何形式的对华金融、物资、技术援助的堵截。牵涉面之宽，持续时间之长，均属罕见。不同时期的美国政府赋予这些经济武器众多的“政治目标”，诸如“惩罚中共对外侵略”、“在中苏同盟间打入‘楔子’”、“威慑中国的区域扩张”、“促进中国的政治变革”等等，不一而足。<sup>③</sup>那么，美国对华

<sup>①</sup> 参看：张曙光著，《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策：1949—1972》，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

<sup>②</sup> 关于“战略文化”，参看：Ken Booth, *Strategy and Ethnocentrism*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79); Zhang,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 1949 - 1958*.

<sup>③</sup> 参看 Shu 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 - 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经济外交”是否达到其所追求的政治目的？其具体操作到底是如何进行的？

第三，美国对华文化战略。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观、“现代化”制度等所谓“软力量”能否成为推动美国对外利益的政治武器？“理想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答案是肯定的。冷战时期美国为了政治目的对华实施了“文化战略”。华盛顿整个 50 年代对华“文化战略”的重点是堵截新中国取得西方“文化资源”，具体体现在通过“联邦调查局”、“移民归化局”以及部分“半官方”组织对中国留学生进行“劝说”、“威吓”、“感化”，为他们提供工作研究便利等，以阻挠数万留美中国学生回国。与此同时，至 60 年代初，美国通过“文化交流”、“教育交流”、科技发展项目加强了对台湾知识分子、“文化人”、教育、新闻传播界的“攻心战”，培植“现代化台湾人”的主体与意识。在 60 年代至 70 年代间，美对华“文化武器”又翻新花样，把文化、艺术、教育、卫生、体育的“有限交流”当作“胁迫”北京放弃与美对抗的“奖励诱饵”。此后，艺术、体育、卫生、新闻“交流关系”的先行发展，又成为“改善”中美冲突关系的“试探动作”。那么，美国对华实施“文化武器”直接与间接的动因是什么？华盛顿是如何评估“软力量”在对华政策中的作用的？

第四，冷战时期中美“外交”谈判。从 1949 年到 1972 年，中美在亚洲的对抗虽然“时间长”、“烈度强”、“危机四伏”，但两个“殊死相搏”的大国却维持着长期的“非正式”谈判。从 1949 年的“黄华—司徒雷登”，到朝鲜战争期间的“开城”和“板门店”，以至此后的“日内瓦”、“华沙”、“巴黎”、“北京”、“纽约”中美“沟通”与“谈判”，代表的则是中美间“打打谈谈”中“谈”的一面。这种“谈判”机制为何存在？华盛顿到底是如何“准备”、“运作”、评估谈判与实施“后续”工作的？这种“谈判”对中美从对抗走向缓和到底起何作用？更重要的是，中美“敌对”状态下的“保持接触”经历对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文化磨合”或“跨文化交流”理论有何实证意义？

第五，美国对华情报分析。美国冷战期间的战略情报分

析——特指“国家情报评估(NIE)”,“特别国家情报评估(SNIE)”,以及“每周情报简报(WIB)”——的出现及其对政策制定的参与,源于在朝鲜战争期间对中国“武装介入”误判后的“痛定思痛”。<sup>①</sup>由于其分析、判断与建议常常被直接纳入“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案,美国对华情报分析应该说对最高决策层影响甚大。那么,华盛顿情报分析家们是如何判断中国“使用武力”的可能?其依据的是中国的军事能力(capability)还是中国战略意愿(intention)?美国对华情报分析的材料来源到底是什么?有哪些通行的分析方法?美国对华情报分析实际上“政出多门”。那么,国务院、“中情局”与海陆空军各情报系统到底有何不同?它们间又是如何协调的?

第六,美国国务院内“中国手”作用。一般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很大程度受国务院内所谓“中国通”影响。然而,由于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对国务院内“中国通”——主要指那些对中国有研究或曾在中国工作过的外交官(如所谓的“四约翰”)——的清洗,该院内负责中国事务官员的背景、作用发生了实质性变化。<sup>②</sup>此后负责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中国处处长、“政策计划委员会[PPC]”的“中国事务”官员,以及驻台、驻港“外交官”与“顾问”,大多没有系统的“中国训练”,但却通过他(她)们的政策提案与“日常办案”,如“一支有形与无形的手”,在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政策,故谓“中国手”。

<sup>①</sup> 参看 Arthur B. Darling,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Rhodri Jeffreys-Jones, *The CIA and American Diplom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sup>②</sup> 关于杜鲁门时期对国务院内所谓“中国通”的清洗,参看: Gary May, *China Scapegoat: The Diplomatic Ordeal of John Carter Vincent* (1979); John Patton Davies, Jr., *Dragon by the Tail* (1972), and John S. Service, *The Amerasia Papers* (1971)。当时被从国务院“清洗”的主要“中国手”包括: John Carter Vincent; John Patton Davies, Jr., John S. Service, John King Fairbank, 即所谓“四约翰”。

这些“中国手”都是哪些人？他（她）们到底有何教育、从政、家庭背景、专业训练与国际事务经历？他（她）们在各个时期是怎样“制作”美国的对华政策的？

第七，美国盟国对华盛顿对华政策的影响。冷战期间，美国的主要盟国（英、法、德、日）和“区域友邦”（如中国台湾、韩国、南越甚至东盟国家）看似“跟着美国跑”或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政治支持与经济援助，但实际上对美国的“主动”影响不容忽视。特别是美国的“亚洲盟友”有明显的“搭车[Bandwagoning]”倾向。由于深谙美国朝野十分在乎所谓“政治信誉”的价值，它们不断以此“要挟”、运作华盛顿“一步步走向亚洲泥潭”。那么，这种“非对称”同盟关系是如何运作的？美国与这些东亚“小兄弟们”之间在冷战期间的对华政策上又是怎样相互揣摩、相互猜疑、相互利用、相互制约的？

第八，美国国会政治与“中国政策”制定。在考察美国对外政策制定时，国会的“干政”通常被忽略。实际上国会的作用甚大，特别在冷战中明显呈上升趋势。<sup>①</sup>尽管基于现实主义“国家安全利益应高于任何政党利益”的考虑，美国冷战期间确立了在对外政策上所谓“两党一致[Bipartisanship]”的原则，但白宫在对华战略思考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制于反映在国会中的政党之争。在对华政策上完全意识形态化了的“两党政治”，无疑影响了美国与对外与国防决策有关的“高级行政主管委任”、“机制设立”、“预算分配”、“法案制定”及“军事行动允准”等“行政”行为。另一方面，白宫也会有意利用国会为其对华政策服务。白宫与国会山之间就对华政策的“互动”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其特点到底

---

<sup>①</sup> 参看 James M. Lindsay, *Congress and the Politics of U. S. Foreign Poli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Richard Sobel, ed. *Public Opinion in U. S. Foreign Policy*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3)。

有哪些？

第九，美国“智库”与对华政策。“智库”的出现实际上是冷战的产物。特别是随着 60 年代美国政府对所谓“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加强与普及，“智库”与对外政策制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其中“半官方”的包括研究机构（如兰德、企业研究所、东西方中心、大西洋理事会、对外关系委员会），“非赢利基金会（如传统、福特）”以及设在大学的“区域研究”组织（如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亚洲问题研究所）。冷战期间，美国有关中国决策的“智库”到底是哪些？包括哪些“专家”？发挥了什么作用？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第十，美国“左翼运动”与中美关系。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将对外政策当作国内政治的延伸。冷战时期美国内政的一大特点是“左翼”政治、社会势力蓬勃发展，诸如劳工、“女权”、“民权”、“和平”、“反战”、“反文化”、“新左派”乃至“人权”等“左派激进”运动，均不同程度地成为影响与制约美国对外行为的“变数”。这些“左翼”团体对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有无影响？如果有，其影响是如何体现的？

冷战国际关系研究方兴未艾。由于其漫长的时间相度，由于其对 20 世纪世界深远与“震撼性”的影响，也由于其对新世纪国际关系转型成败的直接与间接的“惯性”制约，深入、系统、细致地研究冷战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都是值得重视的。经过约 40 年的进程，冷战国际关系研究已经产生出大量的学术成果。然而，由于更大量的文献档案资料仍在不断解秘，研究的空间仍然广阔。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些档案，力求体现出“立论有据”，仍然是对国际关系领域学者的重大挑战。毋庸置疑，单纯的历史方法有内在的局限性：决策行为在某个时间段就某个议题会表现出某种或多种特点，若要据此得出“普遍的”、“一般的”甚至“理论性的”结论，则必须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总体判断”与“基本假设”相结合。

### 第三节 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新冷战

历史是一面镜子,特别是关于战争的历史,应该是人类不得不经常认真照一照的一面镜子<sup>①</sup>。令人担忧的是,历史是史学家笔下的历史,是参与者记忆中的历史,是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教育载体所传承的历史。简而言之,历史为现实和未来所传达的信息,常常是被歪曲了的信息。那么,20世纪冷战的历史会给今天和明天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决策者们传递怎样的信息?更进一步说,美国冷战“胜利”的历史是否会令华盛顿的领导者相信冷战是应对现实和潜在威胁的最为理性的选择?

冷战结束以来,大国关系中最为堪忧便是中美关系。其中一个基本判断是中美之间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非对称,将会引发一个以中美长期对抗为核心的新的冷战。随着美国对伊拉克的“倒萨”战争的进退两难,随着华盛顿处理德黑兰与平壤的所谓“核危机”的一筹莫展,随着小布什政府的国际性反恐而导致国内经济增长缓慢、社会分歧恶化,甚至随着新奥尔良飓风事件引发的关于美国国家管理责任和能力的政治危机,一时间,太平洋两岸所有认为中美之间利益大于冲突的“有识之士”都不约而同地舒了一口气,历史似乎又一次证明那些对中美关系的“坎坷”感到担忧者有杞人忧天之嫌。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中美关系是否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喧闹了十几年的“中国威胁”论是否从此就会偃旗息鼓?解答这些问题的一个关节点是:作为冷战的胜利者,美国是否在调整其国家安全战略?

<sup>①</sup> Michael Howard, *The Lessons of Histo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中国在其新的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又是怎样的？

有充分的研究表明<sup>①</sup>，美国 20 世纪 90 年代初便开始致力于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其评估“旧”战略、塑造“新”战略的内外动力因素有四：

第一，以“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为标志的冷战结束，使得美国的国际安全态势(Security Posture)发生结构性的变化。经过近 40 年与苏联“共产主义集团”的全球范围内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对抗，美国自 19 世纪后期介入国际安全事务以来，第一次出现世界上不存在“一个能够与其相匹敌的战略对手[A Peer Strategic Competitor]”的情况。美国“单极独霸”的战略态势，促动着战略思考者、咨询者、决策者重新审视美国的冷战战略，而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勾画美国“冷战后”国家安全战略。其主要目标是如何通过新的战略运作，以保证冷战中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平衡所致的所谓“长期和平”，在“美国独自主控世界安全事务”的条件下得以延伸。<sup>②</sup>

第二，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所面对与身处的国际安全环境发生实质性变化。如果说华盛顿冷战期间的主要安全威胁来自苏联的战略核子威胁与“华沙条约组织”的常规军事威胁，然而随着“苏东战略板块”的解体，悬在头上 40 年的危险怡然消失，但是，众多难以名状甚至是稀奇古怪的新型威胁悄然兴起、迅速膨胀。如区域潜在对手的崛起、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无限制扩散、国际恐怖主义的恣意泛滥以及跨国与“非政府”势力对国际安全事务的任意渗透。如何面对这些不断上升的所谓“非对称威胁”，华盛顿的安全战略

<sup>①</sup> 参看：周建明，张曙光(合著)，《美国安全解读》，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年。

<sup>②</sup> 参看：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introduction.

调整似乎势在必行。<sup>①</sup>

第三，在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后的第一场由大国主导的局部热战——“海湾战争”中得以佐证的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军事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简称 RMA]”，成为美国从根本上实行“国防转型[Defense Transformation]”的动力保障。1945年原子弹的出现，推动了世界范围内近半个世纪的军事战略领域内革命性的变化。1991年美国与盟军打击伊拉克所首次使用的以信息技术为主体的“高科技”，西方军事战略学家预示，将以“军事技术的演变”引发新一轮“军事事务革命”。而美国作为这场新“军事革命”的“领头羊”，率先推动安全战略与“军事革命”的互动。<sup>②</sup>

第四，美国实施国际安全战略，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受其财政、经济状况所迫。90年代初“终于赢得冷战胜利”以及“顺当地打败伊拉克”使得美国政府的“政治资产”空前上升，但是，由于数十年的冷战消耗以及“里根供应经济”政策在80年代的不奏效，华盛顿承受着少有的经济与财政压力。“减税”、“减开支”成为美国大众对联邦政府的首要政策要求。更由于老布什忽视经济而能避免1992年落选的尴尬，接任的克林顿政府更加感受到如何通过国防转型以减少预算压力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无独有偶，1953年担任总统的艾森豪威尔，正是通过发展核武器、构建战略威慑的战略取

---

① 参看：Sam J. Tangredi, *All Possible Wars ? Toward A Consensus View of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2001 - 2025, McNair Paper 63 (Washington DC: NDU, 2000); William Cohen, “The Secretary’s Message,” in “The Report of 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Washington DC: GPO, May 1997)。

② 关于RMA，主要参考：Eliot A. Cohen, “A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Foreign Affairs*, p. 75, No. 2 (March/April 1996); Joseph A. Engelbrecht, Jr., et al., *Alternative Futures for 2025* (Maxwell Air Force Base, AL: Air Force University, 1996)。

向,平衡了中央财政,促进了美国持续10年之久的经济繁荣。<sup>①</sup>因此,美国进入21世纪的经济前景呼唤着国际安全战略的重新构建。“9·11”以及阿富汗和“倒萨战争”无疑增加了小布什政府的财政负担,实际上是美国盛行的“新保守主义”势力所不愿看到的。然而,通过国防转型提升经济的大政方针仍未动摇。<sup>②</sup>

毫无疑问,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实质上是作为“长期公共政策”形成的过程。其一般包含专家论证、公共讨论、共识形成、政策制定、效果评估等环节。任何一个环节上发生的不同内外因素决定了战略思维、理论、原则及蓝图产生的必然性,也使得这一动态化的决策过程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连续与非连续性。因此,为了更好地把握华盛顿面对新世纪的国际安全战略动向,就必须紧紧贴近酝酿其战略的“公共区域[public sphere]”与“话语体系[discourse dynamics]”。

考察过去10年间美国新一轮战略考虑的“公共区域”,大致可将其描绘成两条运作轨迹:自上而下、由里及外。“自上而下”,是指由国家安全战略决策层对职能部门所下达的战略调研任务,并由政府专门部门研制、撰写的战略报告,最后由决策层核准而形成的战略文献。从1991年到2005年,通过这一机制形成的美国战略考察成果多达7项,它们包括:《基本理论评估[The Base Force Review,简称BFR]》(1991);《自下而上评估[The Bottom-Up Review,简称BUR]》(1993);《武装部队作用与使命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Roles and Missions of the Armed Forces]》审核报告(1993);《四年防务评估[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简称QDR]》报告(1997);《国家防务专门小组[The National Defense

<sup>①</sup>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Dwight D. Eisenhower, 1953 - 1961*, (Washington DC: GPO, 1960 - 1961). Charles C. Alexander, *Holding the Line: The Eisenhower Era, 1952 - 1961*, (1975).

<sup>②</sup> 小布什2004年连任成功,尽管由于伊拉克战争出现的政治危机不断,仍继续留用积极主导美国的国防转型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

Panel, 简称 NDP]》研究报告(1997);《四年防务评估[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报告》(2001)以及《四年防务评估[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报告》(2006)。

此间,除了上述“国家级”项目外,华盛顿的主要国防与对外职能部门还不断出台专项或辅助报告。其中较具影响力的包括: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21世纪的星:新世纪陆军可拥有的战略技术[*Star 21: Strategic Technologies for the Army of the Twentieth-First Century*],”(1992);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The Chairman of Joint Chiefs of Staff),“对2020联合展望:美国为明天准备军事力量[*Joint Vision 2020, America's Military: Preparing for Tomorrow*],”(2000);美国21世纪国家安全研究小组(The U. S. Commission on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追求一个国家战略:为了维持安全、推动自由的联合行动[*Seeking a National Strategy: A Concert for Preserving Security and Promoting Freedom*],”(2000);美国国家利益研究小组(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美国国家利益界定[*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2000);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U. S.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为国防做预算:保持目前的力量水平[*Budgeting for Defense: Maintaining Today's Force*],”(2000);国家国际情报委员会(National Foreign Intelligence Board),“2015全球发展趋势[*Global Trend 2015: 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 Experts*],”(2000)和“2020全球发展趋势[*Global Trend 2020: 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 Experts*],”(2004)。

美国新一轮战略考察的另一个运作轨迹,是由内及外,即由政府内专门部门采取惯常的“委托”方式,聘请政府以外的战略研究机构以及人员做专项研究。在过去10年的运作过程中,逐渐凸显出“一个核心、多个基点”的架构。长期任职于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主任(The Office of Net Assessment)的文官安德鲁·马歇

尔(Andrew Marshall),由于其领导的办公室曾经在 80 年代中后期对苏联战略力量瓦解的“精确推测”,使得他在历届政府中作为国家安全战略思考的“大脑”地位十分显赫,可谓“九朝元老”。通过不断、频繁的“委托”研究,马歇尔与他主政的“净评估办公室”无与伦比地成为联邦政府联系非政府研究机构与人员的中心,以致长期与其竞争的国防部“国防情报局”也不得已而“臣服”。<sup>①</sup>经过多年经营,马歇尔发展数个著名研究机构作为定点,慢慢构成了美国安全战略研究“社会”。<sup>②</sup>

这些研究机构的成果大多作为公开文献得以发表,而正是这些文献,或者以学术著作的形式,或者以官方报告的形式,影响并制约着美国冷战后战略思考与公共讨论的“话语体系”。稍稍浏览美国的媒体、行政部门或“院外活动”机构为国会议员所做的简报,不难发现它们充斥了与新一轮战略思考相联系的“词汇”与概念。例如:“接触”、“既接触又遏制”、“非对称威胁”、“实力展示”、“第三次浪潮”、“军事革命”、“国防转型”、“新型武装力量”、“将战场照

① 参考: 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 Decision Briefing, “The ‘Marshall Plan’,” 12 February 2001。

② 其中成果斐然的包括:位于加州圣莫丽卡、华盛顿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位于华盛顿国家战争学院的“国家战略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位于华盛顿的“海军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Naval Studies, 简称 CNS]”;位于华盛顿的“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简称 AEI]”;位于华盛顿的“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位于华盛顿的“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简称 IISS]”;位于华盛顿的“布鲁金斯研究所[The Brookings Institute]”;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预算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 简称 CSBA]”;马里兰大学的“转型国家机构改革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The Informal Sector, University of Maryland, 简称 IRIS]”和杜克大学“三角安全研究项目[The Triangle Security Project, Duke University]”。上列所有研究机构在过去的十年间,都或多或少承接了马歇尔办公室以及国防部部门的研究委托。

亮”、“全球天网”、“C3ISR”、“精确打击”、“NMD”、“TMD”等等,不一而足。那么,基于上述公开的文献,美国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脉络到底是什么?

随着冷战的结束,遏制战略似乎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为了力图确保自己对整个世界的主导权,并利用冷战结束以后的有利形势,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追求自己的利益,对遏制这个已经证明是有效的国家安全战略难以割舍。

克林顿政府,经过对美国国家利益和对冷战后的安全环境评估后,提出了相对于遏制的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接触战略(Engagement Strategy)。其核心是:由于美国冷战以后已经没有战略竞争对手,故将继续在国际社会里运用它的全方位的影响,发挥强有力地领导作用,构建国际安全环境;在美国有核心和重要利益的地区确保和平和稳定,扩大自由市场和民主“板块”的范围;加强与盟国的联盟和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联合来创立更有利的国际环境,确保美国基本国家目标的实现。<sup>①</sup>

据此,美国国防部于 1997 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所谓“SRP”国防战略。这个战略的核心是:“构建[Shape]”——继续为促进美国的利益而构建战略环境;“反应[Respond]”——对直接的危机做出全方位的反应和“准备[Prepare]”——为不确定的将来的挑战做好准备。<sup>②</sup>这个战略的立足点是为明天和未来的威胁做好准备,塑造一个有利于美国的国际

---

① William Cohen, “The Secretary’s Message,” in “The Report of 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Washington DC: GPO, May 1997).

② 参看:“The Report of 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Part III , pp. 7 – 8; Thomas M. Jordan, Douglas C. Lovelace, Jr. , and Thomas-Durell Young, “‘Shaping’ The World Through ‘Engagement’: Assessing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s Theater Engagement Planning Process,” Army War College, (April 2000) .

环境,以维护美国对世界的领导地位不受挑战。同时,美国也必须继续在外交、经济和军事领域发挥领导作用,通过对可能成为未来地区竞争者的俄罗斯、中国的接触,以及通过对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国家和地区的接触,而把它们纳入到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去。

提出这个“参与战略”或“接触战略”,基本上依据了当时克林顿政府对安全环境、安全利益和外部威胁的判断。首先,当 21 世纪来临时,美国将面对着一个不确定的安全环境,既充满机遇,又饱含挑战。从积极方面来说看,美国处在一个战略机遇时期,这是因为:(1) 全球战争的威胁已经退去;(2) 美国的“代议民主制”和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观被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所拥护,为促进和平、繁荣和在国家间的合作创造了新的机遇;(3) 全球经济的持续活力使经济、文化和全球的相互作用发生转变;(4) 美国的联盟,如北约、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对美国的安全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使美国能够适应着今天的挑战,并为一个卓越的稳定和繁荣的世界提供基础;从前的敌人,像俄罗斯和其他的华沙条约前成员,现在正与美国合作处理一系列的安全问题。事实上,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把美国看作是可选择的安全伙伴。<sup>①</sup>

其次,美国的安全利益的内涵和外延较之冷战时期已经发生变化。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社会中,克林顿政府所确定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至少应该包括:(1) 保护美国的主权、领土和人口,阻止和威慑对美国国家的威胁,包括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进攻和恐怖主义;(2) 阻止敌对的地区联合或霸权的出现;(3) 确保航海自由和国际海洋交通线、航空线和太空的安全;(4) 确保对关键市场、能源供应和战略资源的不受禁令约束的进入;(5) 如果需要的话,阻止和击败任何可能的对美国盟友的侵略。<sup>②</sup>

① 参看:“The Report of 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Part II, p. 3.

② 同上,第 8 页。

再次,从这样的国家利益出发,克林顿政府认为,美国面对的仍然是一个危险的和高度不确定的世界,甚至判断至 2015 年美国可能面对大量的安全上的重大挑战。根据威胁的烈度和紧迫性,被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思考者们列为首要的威胁是美国将继续面对各种地区性的危险,而这种地区性威胁的来源首先是“无赖国家”。由于这些国家的受到“高压统治的威胁”,它们在关键地区拥有重要军事力量,极易“对我们的盟国和朋友进行大规模的跨边界的侵略”。在西南亚,“伊拉克和伊朗继续对他们的邻国和石油从这一地区的自由流动构成威胁,而石油通道在可见的将来,仍将是美国国家的要求”;在中东,“潜在的冲突将继续,直到这一地区有一个公正的和持续的和平,以及以色列的安全”;在东亚,“朝鲜半岛仍处于分裂状态。朝鲜继续增加它在韩国边界的侵略性的军事能力,和由于灾难性的经济条件所引发的巨大压力,它继续构成无法预测的巨大威胁”。<sup>①</sup>

此外,克林顿政府担心,地区性危险还来自与“破产”的和正陷入“破产”的国家,它们可以导致不稳定、国内冲突、人道主义危机,在这些地区的某些事件中,美国具有核心的或重要的利益。如同在索马里和前南斯拉夫所见的那样,现行政府已丧失了维持公共秩序和为他们的人民提供所需的能力,这为国内不稳定、饥荒、移民跨越国际边界的大规模移动、邻国的侵略行动甚至集体屠杀提供了温床。

最后,地区性危险另一个重要渊源来自于地区大国。克林顿政府认为有理由假定,不止一个有雄心的地区大国将有意愿和手段在军事方面挑战美国的利益。根据 1997 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的判断,尽管从整个安全环境来看,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地位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会被维持。在现在和到 2015 年的安全环境,不可能出现像冷战时期的苏联那样,能够在

<sup>①</sup> 参看:“The Report of 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Part II, p. 9.

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军事能力的“全球范围的竞争对手”。在未来的10—15年内,一旦美国的军事潜力被充分发动和部署到冲突地区,也不可能有地区大国或几个国家联合起来,积聚足够的常规军事力量来击败美国。但是,不排除在2015年以后,对美国将有可能出现一个地区的,或全球匹敌的军事竞争对手。尽管俄罗斯和中国各自的前途还不确定,但它们被认为有潜力成为这样的竞争对手。<sup>①</sup>

俄罗斯重新“崛起”的可能性一方面取决于它本身的经济复苏是否成功,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北约与俄罗斯所建立的政治、经济、军事伙伴关系,是否能改变俄罗斯的发展方向,从而把俄罗斯纳入到欧洲的安全建制中去。“俄罗斯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它发展经济的能力,反过来这又依赖于稳定的政治环境。俄罗斯在建设新的民主制度方面已取得了进步。”为此,美国已做出了广泛的努力,在许多事情上是成功的,例如与俄罗斯建立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伙伴关系。“俄罗斯与北约的协议将帮助它融入一个更大的欧洲安全建制中。这些协议也许能戏剧化地转变俄罗斯的态度,并构建一个不同的安全蓝图。俄罗斯的军队即将进行基本的转变,包括附加的缩减规模和重组,又将面对一个持续的进一步退化的过程。俄罗斯也将期望继续增强它的研究发展计划和战略核能力的现代化,以及它们持续行动效率的最大优先权。然而,要使大量的常规武器进入生产将依赖于它的经济复苏的成功。”<sup>②</sup>

在克林顿时期的战略研究人员看来,中国虽有可能成为地区性的军事大国,但中国必须面对国内的大量挑战,这些挑战可能减缓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步伐;同时通过美国的“接触战略”,可以“干涉”中国的发展方向和速度,使中国成为一个有利于地区稳定的国家,和一个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尽管“中国有潜力成为亚洲的

① 参看:“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Part II, pp. 3—4.

② 同上,第4页。

军事大国”,1997 年的《防务报告》解释,“中国可能继续面对大量的国内挑战,包括它的经济基础结构的进一步发展和在现代市场经济与威权的政治系统之间的突出矛盾,这也许将减慢它的军事现代化步伐。”<sup>①</sup>

很显然,即便是在 20 世纪末,美国的战略界虽然把俄罗斯与中国看作是未来可能的潜在的地区性战略竞争者,但由于这种前景在美国的“参与战略”或“接触战略”下有可能避免,因此在对威胁考虑上,并不把俄罗斯与中国作为首要考虑的现实威胁来源。此外,20 世纪 90 年代初海湾战争的经验,和 1994 年几乎一触即发的朝鲜核危机,使美国把所谓“无赖国家”可能对地区稳定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对美国本土和盟国的威胁提到安全战略的层面来加以考虑。美国强调的“SRP”的战略,其重点是为防止由“无赖国家”所挑起的地区性冲突。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建立在准备进行和打赢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大规模地区性战争的基础之上,以确保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不受挑战。这两场战争,一场是指在中东由伊拉克、伊朗,或利比亚所挑起的战争,另一场是指在东北亚由朝鲜挑起的战争。<sup>②</sup>

正是因为对主要的可能潜在对手俄罗斯和中国存在着接触的机遇与可能,当时的战略制定者认为,对于像俄罗斯和中国那样对美国和现有的国际体系并不满意的大国,可以通过非强制的方式来改善与他们的关系,来改善他们行为中不满足现状的因素,确保这些成长的大国所使用的方式与和平改变地区及全球秩序相一致。<sup>③</sup>当然,对于俄罗斯和中国,并不只采用接触的一手。1997 的

---

① 参看:“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Part II, p. 5.

② 参考: Raymond Tanter, *Rogue Regimes, Terrorism and Prolifer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xiii.

③ 兰德尔·施韦勒,《应对大国的崛起:历史与理论》,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罗伯特·罗斯主编,《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新华出版社 2001 年出版,第 17—18 页。

《防务报告》很清楚地指出，美国在进行接触的同时，也将保持对现在的潜在的竞争对手的军事优势。如果放弃军事优势，如同放弃美国对世界的领导一样，“世界将变成一个更加危险的地方，对美国、我们的盟国、朋友和利益的威胁将变得更加严峻。”<sup>①</sup>

因此，随着对威胁来源不同的界定和战略上的调整，冷战以后美国的军队规模大幅削减，国防预算也大幅减少。从 1985 年到 1997 年，美国的国防预算减少了 38%，从 4 000 亿美元减少到 2 500 亿，军队规模缩小约 33%，现役军人从 220 万减少到 145 万，驻扎在海外的军队也从 50 万减少到 20 万，预备役军人从 110 万减少到 90 万，在国防部任职的文职人员也从 110 万减少到 80 万，国防采购计划减少了 63%，仅为 440 亿美元。国防工业的雇佣人员也减少到 220 万。<sup>②</sup>冷战后美国军队规模、国防预算和军事工业的变化，虽然有“军事革命”所带来的变化，但从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其不以大国为主要对手的战略特点。

然而在 90 年代后期，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参与战略”或“接触战略”在美国的战略界引起很大的争议，受到广泛的批评。在这场战略界的辩论中，现实主义在美国的战略界重新占了上风，并主导着新一轮的战略评估。而新一轮的战略评估，主要围绕着按照国会要求将于 2001 年出台的《四年防务评估》。由于此时恰逢美国总统大选，特别是选举的结果是倾向于所谓“新保守主义”的共和党主政白宫，冷战后美国第二个“四年防务评估”的产生，从一开始便受到国内政治因素的左右。无疑，评估源于民主党的克林顿政府，此外 2001 年评估报告的准备工作起步于 1999 年，主要在民主党政府指导下进行。因此，布什政府是否有可能接受，或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上届政府的主张，便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政治议题。原定于 2001 年 6 月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经过数次延期，终于

① 参看：“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Part II, p. 5.

② 同上，第 2 页。

在“9·11”恐怖主义袭击后的10月1日由小布什的国防部长、“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拉姆斯菲尔德签发公示于众。<sup>①</sup>

有趣的是，尽管此前小布什政府“蓄意全面推翻”克林顿的美国“冷战后”安全战略定位，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仍然反映了90年代后期美国战略界的一些主要思路。<sup>②</sup>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专家小组”所做的“《2001年四年防务评估：由战略驱动的美国安全选择》”，仍是最后评估报告的蓝本。这份所谓“专家报告”产生的缘由，是由于2001年恰遇美国总统换届，为防止因政府换届而导致战略评估衔接中断，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希尔顿将军经与国防部、国务院、国安会、国会相关委员会协商，对2001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由政府之外的专家小组独立研究取得共识，于1999年9月在国防大学正式成立“2001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专家小组”，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希尔顿将军授权开始工作。希尔顿的授权同时规定：该小组的任务是进行2001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的基础研究，以为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提供理论的基石；该小组的工作原则是必须独立于美国国防部和其他政府机构；该小组有权调阅政府各机构公开与非公开的相关报告，也

① 参看：Senior Defense Official, “Background Briefing on the QDR,” DoD, News Transcript, October 1, 2001, <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同时参看：Philip Gold, “Rumsfeld’s Revolution: Is the Big Shift in Defense Really Happening At Last?” Discovery Institute Occasional Paper, 30 June 2001; “Rumsfeld-Style Military Reform,” *Washington Times*, 8 June 2001; “Why the Pentagon Fears Rumsfeld’s Review,” *The Seattle Times*, 13 June 2001。

② 例如：美国国家情报理事会的《全球趋势2015：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的对话》、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在1999、2000年发表的麦克乃尔60号报告《新军事革命：盟国的视角》，麦克乃尔61号报告《把明天的战场照亮》、麦克乃尔62号报告《米洛斯岛人的报复：非对称威胁和下四年度防务评估》、麦克乃尔63号报告：《所有可能发生的战争？2001—2025年未来安全环境的共识》。对这些报告的分析，参看：周建明，张曙光，《美国安全解读》。

可以根据需要组织非政府研究机构与人员做委托研究。<sup>①</sup>

事实上,较之于 1997 年的报告,新的战略评估,在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界定上,并没有提出不同的界定,只是更为集中、更为具体了。例如,1997 年的报告所界定的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至少应该包括五个方面:(1)保护美国的主权、领土和人口,阻止和威慑对我们国家的威胁,包括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进攻和恐怖主义;(2)阻止敌对地区的联合或霸权的出现;(3)确保航海自由和国际海洋交通线、航空线和太空的安全;(4)确保对关键市场、能源供应和战略资源的不受禁令约束的进入;(5)如果需要的话,阻止和击败对美国盟国和朋友的进攻。<sup>②</sup>但在 2001 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美国持久的国家安全利益被归纳为三方面:(1)确保美国的安全和行动自由,包括:美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及

<sup>①</sup> “2001 年四年防务评估专家小组”由国防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国际安全资深顾问米歇勒·佛罗诺伊(Michele Flournoy)女士任组长,该女士也是麦克乃尔 63 号报告:《所有可能发生的战争? 2001—2025 年未来安全环境的共识》的主要作者。事实上麦克乃尔 63 号报告和 62 号报告一起,成了“《QDR2001: 由战略驱动的美国安全选择》”报告的基础和主要观点的来源。小组的其余四个成员分别来自各个军种,他们既参与过各总部的战略策划,又都是国防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海军陆战队的 Frank Mckenzie 中校、空军的 Philip Ruhleman 中校、陆军的 John Spinelli 中校、海军的 Sam Tangredi 舰长。他们所做的工作是把自 1996 年以来美国政府和非政府所做的有关美国未来安全环境和战略的报告加以整理和分类(例如,关于对未来安全环境的判断,该小组依据 36 份内部报告,其中包括来自国务院政策计划署、研究评估处、由安德鲁·马歇尔负责的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参谋长联席会议、各军种的情报部门以及军事院校的研究部门的报告),寻找出共识,列出未达成共识,但需要重视的判断,以为国防部制定未来战略提供分析的基础和选择。参看: Michele A. Flournoy, *QDR 2001: Strategy-Driven choices for America's Security* (Washington DC: NDU, 2000), pp. 3~9.

<sup>②</sup> DoD, “The Report of 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May 1997, Section II.

自由,美国公民在国内外的安全,以及美国的要害基础设施的安全;(2)履行国际承诺,包括:确保盟友的安全与繁荣,防止敌人主宰关键地区,尤其是欧洲、东北亚、东亚沿海地区(从南日本海到澳大利亚到孟加拉湾),以及中东和西南亚,西半球的和平与稳定;(3)推进经济繁荣,包括:提升全球经济的活力和生产率,保卫国际海域、空域和外空以及信息交流通道的安全,控制进入关键市场和获得战略资源的自由。<sup>①</sup>

从新的防务评估中可以看出,美国战略界的战略思考和设计重点,不是重新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而是更加清晰地确定未来臆断时期美国可能所面临的威胁。这种评估事实上隐含着美国把确立自己在世界上独霸的地位作为衡量威胁的出发点,按照这种条件来评估未来的安全环境。正如评估者们所解释的,“评估工作的第一步是确定什么是未来,或更恰当一点,我们计划的未来会有哪些不同?选择的范围会是什么?未来的安全环境将给美国提出什么样的挑战和机会?我们应当期待什么样的发展?我们预期要面临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威胁?我们应当规划什么样可能发生的战争,来准备我们的武装力量,并希望通过我们的政策、计划和行动对其加以遏阻?”<sup>②</sup>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战略界对未来国家安全形势的评估,强调的可能存在和出现的威胁以及美国遏制这些威胁的机会。这样一种变化完全符合了以新保守主义为执政指导的小布什政府在处理对外和安全事务方面的诉求,其中包括:美国式民主制度为主导的政治变革、自由经济为动力的全球化和单边干涉主义为核心的

---

①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A,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September 31, 2001), p. 2.

② Sam. J. Tangredi, “All Possible Wars? Toward a Consensus View of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2001 – 2025,” Chapter One, “Sifting the Sibylline Ashes,” p. 1; McNAIR Paper 63,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2000).

霸权稳定。这些诉求与冷战初期和冷战巅峰期(里根时代)美国遏制战略的思维,几乎是如出一辙。如果说前者对二战胜利和“缓和”成功导致淡薄国家安全意识感到极度担忧,后者则坚持分享冷战后的“和平红利”的想法是十分可怕的,因为,“冷战后的世界——一个因共产主义崩溃和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使人们感到飘飘然的世界——被证明是一个分析起来更加困难的环境,特别是在沙漠风暴行动胜利后明显的稳定效果和缺乏明显的安全威胁的情况下。”<sup>①</sup>

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思考和设计者们的眼中,21世纪美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孕育了危机,充满了变数,甚至比冷战时期更具危险。根据他们的描述:

美国现在面对着一个冷战后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威胁更加直接,更加分散,在某种程度上也更加明显。这是一个解放了的俄罗斯并没有发展出和美国结为伙伴的稳固外交关系的世界;……这是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存仍未能阻止亚得里亚海沿岸一系列种族战争的世界,而亚得里亚海沿岸正在迅速地变成西欧人的避暑区;这是一个30年一系列军备控制条约和建议仍未能阻止其他国家——甚至那些被假定为在冷战时期不结盟的国家——建立他们的核武库的世界;这是一个尽管联盟国家对伊拉克军事力量的压倒性胜利,但并没有能遏阻其他独裁国家一直在对他们邻居进行侵略性蚕食的世界。<sup>②</sup>

据此,美国战略思考的“大脑”们判断,21世纪最初20年将危机四伏,丝毫不容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掉以轻心,因为,他们解释,“这是一个并没有结束危险和混乱的世界,这是一个靠强权而不是

<sup>①</sup> Flournoy, *QDR 2001: Strategy-Driven choices for America's Security*, pp. 10–12.

<sup>②</sup> 同上,第12页。

靠法律来治理的世界”。<sup>①</sup>

在美国战略界看来,冷战结束和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并没有改变国际社会运作的基本逻辑。当今的世界仍然是一个靠强权,而不靠法制或合作的世界,即美国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所认为的是一个无政府的“原始丛林”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如果要继续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不受挑战,作为美国行为的基本逻辑是凭借实力和强权,而不是公理和法律。这种思维逻辑,对于希望追求一个国与国之间关系平等、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的人来说,不仅是难以接受,而且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对于基于现实主义理论的国际社会来说,却是天经地义的。因为这里的基本逻辑是讲实力、讲权力,而不是靠国际伦理与道德或国际合作建制。于是,像冷战时期那样对现行和未来所有可能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的势力进行遏制,便成为一个理性的选择。

小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思考与设计者们相信,今天的美国具有较之冷战期间更强的实施全面、长期遏制战略的能力。首先,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具有像美国那样的地缘安全保障。美国东临大西洋,西邻太平洋,南邻墨西哥,北邻加拿大,没有地缘政治上的直接威胁;美国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具有最强大的防务力量;美国在欧洲具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同盟,在亚洲有日本、韩国等盟国和与东南亚国家不同程度的安全合作,在大洋洲有与澳大利亚的军事结盟;美国已经没有了冷战时期的对手——苏联,已经没有一个能够对美国直接构成威胁的大国作为对手。

其次,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掌握着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无与伦比的经济、科技和资源优势。美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从冷战以后占世界 GDP 25%的基础上大幅度提升,目前已超过 30%。在所有

---

<sup>①</sup> Tangredi, "All Possible Wars? Toward a Consensus View of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2001 - 2025," Chapter One, "Sifting the Sibylline Ashes," p. 2.

先进的科学技术领域中,美国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而且在许多领域都是遥遥领先的。最重要的,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掌握着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比拟的军事优势。无论从军费的开支,从军队的装备,还是从全球的作战力量的投送能力和对海、空和太空的控制权来看,美国已在世界上占了独一无二的地位,美国战略界自己也承认,不仅现在,而且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会有同等级别的军事竞争者。从外交的影响力来看,美国几乎与所有发达国家都结成了盟国,并且长于在国际事务中操纵、玩弄于股掌之中,其影响力也超过所有其他国家。<sup>①</sup>

即便在这样“优越”的安全条件下,美国的战略界所思考的,并不是如何运用手中的资源去领导建立一个在所有国家不分大小、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来推进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他们眼里,和平与发展并不是时代的主题。时代的主题与冷战时期没有本质的区别,当今世界仍是以国家或国家集团为基本单位,靠实力来获取和保护自己的利益。这既是美国战略界基于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世界观,也是美国国家战略行为的基本逻辑。<sup>②</sup>它与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战略的逻辑并没有根本的区别。<sup>③</sup>尽管美

① 周建明,张曙光,《美国安全解读》,第17—18页。

② 参考: William S. Cohen, *Annua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Congress*, 2000 (Washington DC: DoD, 2000); Ashton B. Carter and John P. White, *Keeping the Edge: Managing Defense for Future* (Cambridge MA, and Stanford, CA: MIT Press, 2001); Chairman, Joint Chiefs of Staff, *Joint Vision 2010* (Washington DC: DoD, 1996), and *Joint Vision 2020* (Washington DC: DoD, 2000); Robbin E. Laird and Holger H. Mey, *The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Allied Perspectives*, McNair Paper No. 6,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pril 1999); Carter and White, *Keeping the Edge: Managing Defense for Future*; Carl H. Builder, “The American Military Enterpris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Changing Role of Information in Warfare*, Santa Monica: Rand, 1999; Patrick M. Cronin, *2015: Power and Progress* (Washington DC: NDU, 1996)。

③ 周建明,张曙光,《美国安全解读》,第17页。

国武装部队深陷“倒萨战争”的泥潭,尽管美国与欧洲盟国的战略同盟关系达到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尽管美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仍呈负面<sup>①</sup>,2005年由美国国防部主持完成的第三个《2005年四年防务评估》,仍然强调了美国需要长期遏制主要来自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威胁和潜在的战略对手如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挑战。<sup>②</sup>

据此,有理由认为: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正在或极有可能回归冷战时期的遏制。但是,这个分析只是部分地解答了本书和本章提出的美国是否正在或可能发起实质是遏制中国崛起的冷战问题。通过对美国国防战略界对中国的实力和威胁评估的不懈努力中所体现出的学说原则、思辨逻辑和论证基础的仔细剖析,有研究指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思考,起码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理由是:由于中美之间操作“威胁平衡”的空间仍然大于操作“利益平衡”的空间,美国政府内外仍热衷于渲染“中国威胁”的势力,今后仍将一如既往地强调中美关系的“不可调和”性。<sup>③</sup>

## 小 结

在美国,“中国威胁”论已经从“公共讨论”和“思辨认知”的层面逐步向“战略判断”的层面发展,已经由主要积聚于美国开始向

① 参看美国 Pew Research Center 通过对 6 个国家进行民调后,2005 年 6 月 23 日发布的,“American Character Gets Mixed Reviews: U. S. Image Up Slightly but Still Negative,” [www.pewglobal.org](http://www.pewglobal.org)。

② Jack Spencer and Kathy Gudgel, “The 2005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Strategy and Threats,” WebMemo #728, [www.heritage.org/Research/NationalSecurity/wm728.cfm](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NationalSecurity/wm728.cfm).

③ 张曙光,周建明,(合著),《实力与威胁:美国国防战略界评估中国》(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5 年),第一章。

欧洲——特别是欧洲大陆国家——漫化，而这一趋势短期内可能因其他重大事件而平静，但不会也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逆转。主要有五个理由。

第一，中美实力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是美国“中国威胁”论的核心来源。只要这种“实力对冲”或“威胁平衡”的结构一天得不到根本改变，美国将不会停止视北京为其战略对手。在现今——甚至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无序的国际环境中，任何一个处于实力上升阶段的“革命性”大国(A revolutionary power)，无论如何委曲求全，对已经取得主控地位的大国(An established power)仍是难以忽视的挑战和威胁。

第二，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在对华政策上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无论是“反共产主义”还是“反威权独裁主义”，无论是泛化“西方人权”观还是推行“美国式民主”制度，无论是推行“发展伦理观”还是提升“现代社会文明”，美国受意识形态驱动的各种势力都会长期聚焦于中国。即便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完全“西化”了，这样的情形仍难在短期内改变。做出这样的判断实不为过。

第三，“中国威胁”经过冷战结束后十多年的炒作已经成为美国内政治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属性是“选举政治”。无论是总统大选，还是国会的“中期选举”，参选者的政治炒作已经成为一种常态；随着经济和大众传播的“全球化”，竞选更加离不开对国际性议题的炒作。共和与民主两党——甚至任何第三势力——都已经对利用“中国问题”去吸引公众注意力以获取和增强政治资本的运作十分娴熟，这种政治行为惯性在美国今天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并不可能在一夜间消失殆尽。

第四，转换迅速的美国公共话语已将“中国威胁”变成一种独特的话语体系。思维和认知反映于语言，同时语言也制约着思维和认知。从克林顿时期的“对现状不满者”、“地区挑战者”，到小布什政府所界定的“战略竞争者”，乃至近期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立克提出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并非是些仅仅为了哗众取

宠的宣传性口号和修辞。其背后所蕴含的认知的形成非一日之寒,对后者的根本改变恐怕也难一蹴而就。<sup>①</sup>

第五,美国的“疑华、惧华、反华”势力,随着“新保守主义”的不断泛化,趋于强势。<sup>②</sup>这些势力尽管各自的“政治议题[Political Agenda]”不尽相同,但对“中国威胁”所表现出的热情与执着,并非会由于短暂的中美高层互访和不断推进的经贸关系而淡化与消融。作为其中另一坚强堡垒的美国国防战略界,也将长期视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为美国的最大战略挑战者<sup>③</sup>。

那么,美国的对华遏制具体将以何种形式体现?从华盛顿的战略态势看,美国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对中国的遏制将会是动态的和有限的。<sup>④</sup>在安全战略层面上,这样的遏制至少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美国将确保对中国的战略威慑。特别是在战略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美国将通过构建保持相对于中国的“第二次打击”和“预防性打击”的绝对优势,确定中美间的战略威

---

① 张曙光,周建明(合著),《实力与威胁:美国国防战略界评估中国》,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5年,第一章。

② 持续活跃而且极具影响当数:(1)关心“负面新闻[Negative News]”的主流媒体;(2)反“全球化”的“非政府组织”; (3)出于意识形态考虑的“人权观察者[Human Rights Watchers]”; (4)保守的“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 (5)极力维护社会福利的工会; (6)高举“反压迫、反独裁”的美国犹太人社团(American Jewish Community); (7)为“外国代理人[Foreign Agent]”进行“院外[Lobby]”或“公关[Public Relations]”活动的唯利是图的机构。

③ 美国国防部2005年7月公布的最新《中国军力报告》,除了强调所谓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经济威胁”和“资源威胁”外,还提出了中国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地缘威胁”,甚至“间谍威胁”。仔细阅读这份报告,很难相信中美之间仅仅是“缺少”互信。

④ 至于美国的对华遏制有无可能从动态、有限转为全面和无差别,作者认为,在可预见的时间相度内可能性不大,制约的要素包括美国所面对的安全威胁的多样性和可动用的战略资源的有限性。

胁平衡。

第二，美国将通过新一轮军事变革提升常规力量的综合发展，确保对中国在关键区域内——台湾海峡、东北亚、南海——的军事胁迫力，以期中国被迫放弃使用武力作为保卫和实现国家安全利益的选择。

第三，美国将通过对关键性技术、金融流、通讯、交通、战略资源贸易的控制，确保中国的“高端”现代化处于停滞和过度依赖的地位，以致正在进行中的军事现代化半途而废。

第四，美国将按照华盛顿自设的条件与中国就“争端”进行谈判，目的并非就事论事，而是要迫使中国改变对外政策行为，接受西方制定的国际关系规范，最终被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之中。

第五，美国将通过以“民主、自由、开放”为内涵的意识形态体系，影响中国的民主化、法制化进程，以期在中国政权的内部不间断地发生“颜色革命”，最终完成“政治西化”。

毋庸置疑，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是 20 世纪国际关系的一个特定时期。至于冷战能否——是否已经——成为未来国际关系的一种常态，国际关系学界至今尚未形成共识。<sup>①</sup>然而，历史是残酷的，对一个大国而言，如果从历史中寻求错误的教训将是灾难性的。希望冷战的历史警钟能够长鸣。

<sup>①</sup> 作者于 2006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2 日参加了由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与美国杜鲁门总统图书馆共同在美国堪萨斯城举办的题为“冷战国际关系的新展望”国际研讨会，对此得出鲜明的印象。





## 凯南“长电”

861.00/2-2246 号电报<sup>①</sup>

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凯南)致国务卿  
密级 莫斯科 1946 年 2 月 22 日 21 时

国务院 2 月 3 日第 284 号电令<sup>②</sup>要求回答的问题,既复杂又非常敏感,既与我们常规思考极为不同,又对分析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十分重要,我实在无法将我的回复既压缩在一份简单的电文中,又避免造成我认为是非常危险的过分简单化。据此,我希望国务院能够容忍我将我的回复用五个部分提出。这五部分的小标题分别是:

- (1) 苏联战后[战略]思维的基本特征;
- (2) 这一思维的背景;
- (3) 这一思维在政府政策层面的反映;
- (4) 这一思维在非政府层面的反映;

① 原文在美国国务院编撰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全文公布。*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 Vol. VI, pp. 696 - 709. 译者张曙光。

② 这个电文的原文尚未解密,根据《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6 年第六卷,国务院针对斯大林和苏共领导人关于选举的一些讲话,要求凯南提出评估,并指出:“对这些公开的政策在未来执行层面上的意义,我们欢迎您提出解释性的分析。”*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 Vol. VI, p. 696, note 44。

(5) 从美国政策角度的可行性推断。

请允许我先就对电报通讯所造成的负担表示歉意。然而，所涉及的问题，特别是考虑到目前发生的事件，是那么的急迫、那么的重要，我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如果这些问题确实需要我们予以重视的话——[采用如此长电的形式]是值得的。

下面是我的解释。

**第一部分 苏联政府宣传机器所宣扬的战后[战略]思维的基本特征如下：**

(A) 苏联仍处于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长期看来，取得并保持永久的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正如斯大林 1927 年对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所表述的：

“在国际革命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将会出现两个世界规模的中心：一个是社会主义中心，吸引着所有倾向于发展社会主义的国家；一个是资本主义中心，集结着那些希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这两个中心之间为了争夺世界经济主导权的斗争将会决定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命运。”<sup>①</sup>

(B) 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受到它本身固有的多种矛盾的困扰。这些冲突无法通过和平的妥协得以解决，其中最大的是美国与英国之间的冲突。

(C) 资本主义内部的冲突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战争。由此产生的战争可能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资本主义内部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一种是对社会主义世界的侵略战争。聪明的资本

---

<sup>①</sup> 原文对此摘录并未注明出处。经查阅，本文引自斯大林“和一个美国个人代表团的谈话，”参见《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年。

家们,为了规避资本主义内部的冲突,尽管是徒劳的,但会倾向于发动第二种战争。

(D) 对苏联的侵略,尽管对侵略者来说最终将是灾难性的,但也会减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因此,必须不惜一切地予以制止。

(E)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尽管对苏联意味着危险,但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却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特别是只要苏联保持军事上的强大、意识形态的一致和对目前杰出领导人的忠诚。

(F) 必须牢记的是,[苏联] 并非认为资本主义世界都是敌人。除了那些不可救药的反动分子和资产阶级,它还包含了:(1)一些可以由共产党组织团结起来的开明的积极分子;(2)其他一些力量,其态度、追求和行为恰巧在“客观”上对苏联的利益有益(目前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这些力量被称为进步和民主分子)。为了苏联的目的,必须对这些力量加以鼓励和利用。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些反动力量中,最具危险性的是那些被列宁称之为人民的假朋友,也就是所谓温和社会主义者或社会民主领导人(换言之,即非共产主义左翼分子)。这些人比那些彻头彻尾的反动派更为危险,这是因为后者至少是以真实的面目出现,而前者是在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迷惑人们,为反动资本者服务。

关于前提就是这些了。那么,依据这些前提到底能对苏联的政策做出怎样的推断?大致如下:

(A) 所有[的政策]都必须为了发展苏联相对的力量,令其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要素。相反,所有能够削弱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和影响的机会,都必须紧紧抓住,无论是以集体的,还是以单个的形式。

(B) 苏联以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朋友的所作所为,都必须是致力于利用和加深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假若这些

分歧和冲突不断深化，最终引发一场“帝国主义”的战争，那么，这场战争必须演变成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发生的革命起义。

(C) 对世界上的“民主进步”力量，必须最大限度地予以利用，以期按照苏联的利益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造成压力。

(D) 必须与世界上的[温和]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领导人作不懈、无情的斗争。

## 第二部分 [战后苏联战略]思维的背景。

在分析这样的[苏联]政党思维的实践层面上的细节之前，对这个思维的某些方面，我希望提请注意。

首先，这个思维并不代表俄国人民的自然思维。总的来讲，俄国人民大致上对外部世界是友善的，乐意了解外部世界，渴望以他们认为所具备的优势去衡量外部世界；最重要的是，他们也期盼着和平生活，希望能享受劳动的果实。政党路线只是体现了那些由政府宣传机器向大众不遗余力、坚持不懈灌输所展现的信条，而大众“在心底深处”常常对那些信条存在着惊人的抗拒情绪。但是，这样的政党路线对那些权利机器的主宰者们——包括政党、秘密警察和政府——的思维和行为，却具有约束力，而我们所不得不应付的也就是这样一部分人。

其次，必须提请注意的是，上述政党路线所依据的前提条件，大多并非真实。过去的经验表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和互惠互利是完全可能的。发达国家内部的冲突，已不再源于资本者对生产资料的占取，而只是反映了发达的都市化和工业化之间的矛盾；俄国迄今仍未经历工业化和都市化发展所产生的矛盾，原因并不在于其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仅仅是出于它的落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冲突并非一定导致战争；起码并非所有的战争是由于这个原因而爆发的。在今天谈侵略苏联的

可能性,特别是在消灭了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以及近期的[美苏合作]示范<sup>①</sup>之后,真是无稽之谈。如果不受到坚持敌对和颠覆势力的挑衅,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完全能够保持自身的和平,也能够与苏联和平相处。最后,任何一个精神正常者都没有理由怀疑西方国家的温和社会主义者的诚意。例如,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只要有机会,他们总是致力于改善劳工大众的生活条件,否认他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是不公正的。

这些前提之所以是错误的,是由于每一个都基于[二]战前的经验,而且每一个前提的谬误之处都被那场战争所充分证明。事实上,英美间的分歧并非西方世界的主要分歧。除了那些轴心国,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为了解决自身的分歧而加入反对苏联的十字军远征。苏联不仅没有将一场帝国主义的战争演变成内战和革命,却为了共同的目的和承诺,不得不与资本主义国家同仇敌忾,并肩战斗。

尽管如此,所有这些毫无根据并被证明是错误的判断,在今天,仍然被大胆地提出。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苏联党的路线并非基于对俄罗斯外部局势的客观分析;这意味着苏联党的路线的制定与俄罗斯以外的条件无任何关联;这还意味着苏联党的路线的产生只是出于在俄罗斯战前就存在的、今天仍然存在的内部的本质上的需要。

克里姆林宫对世界事务神经质的认知的最深处是俄罗斯传统的、本能的不安全感。起初,这种不安全感,产生于一个和平地生活在广袤而无法设防的平原上的农作居民与一群凶暴的游牧民为邻的结果。最近的这场战争,由于俄国人打交道的是经济发达的西方人,使得[俄国人]对地区内出现较之以前更

---

<sup>①</sup> 指美国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结成的反法西斯的协约同盟,以及战争结束初期,双方就解决战争遗留问题和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等方面的合作。

强大、更发达、组织更严密的社会产生新的恐惧。但是，这种新的不安全感与其说是在折磨着一般俄罗斯民众，毋宁说是在折磨着俄国的统治者。这是因为，俄罗斯统治者无疑感觉到，他们的统治是一个形式上相对无序的统治，其心理基础脆弱而且虚假，无法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相提并论。因此，他们一向惧怕来自外部的渗透，惧怕与西方世界直接接触，对一旦俄罗斯人民了解了外部世界的真相或是外国人民了解了俄罗斯内部的真相所可能带来的后果担忧不已。结果，为了求得安全，他们学会的只是如何彻底地置对手于死地的方法，从没考虑与对手建立契约和妥协。

马克思主义在西欧传播了半个世纪毫无建树，但在俄罗斯却能星火燎原、一举成功，这绝非偶然。只有在这样一个从未拥有过和睦的邻邦，甚或在其内部和外部也从未产生过得以容忍的力量均衡的国土上，一个崇尚社会间的经济冲突是无法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的学说的民族中，马克思主义才能得以发扬。自建立了布尔什维克政权<sup>①</sup>之后，由于列宁的诠释，马克思的教义变得更加凶狠好斗，更具排他性，成为激发不安全感的无与伦比的动力，正因为此，那些布尔什维克统治者们对不安全的感受，要比俄罗斯历史上的任何统治者都要强烈得多。也正是在这种教义所蕴含的利他主义的内涵中，他们找到了本能地惧怕外部世界的正当理由，找到了除了独裁而不知如何统治的根据，找到了没有他们不敢实施的残暴的因由，也找到了他们要求别人做出牺牲的根据。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他们的所作所为荡涤了哪怕只是一个细微的伦理价值。今天，他们已经离不开这样一个教义了，因为这个教义已经成为他们在道德与思辨上让别人不得不倾倒的遮羞布。没有了它，他们在历史面前，与俄罗斯一长串的为了内部的脆弱寻求外部

---

<sup>①</sup> 指 1917 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后，由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政党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

安全,以至不断提升军事力量的凶残而骄奢的统治者们相比,充其量只能排在这些统治者的尾末。这就是为什么苏联的目标总是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衣钵严格包装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任何人不得轻视苏联[对外]事务中教义重要性的原因。这样,苏联领导人(by? 尚未解密,编者注<sup>①</sup>)迫于历史和现状的实际需要,就提出一种教条,把外部世界描绘成为一个罪恶的、敌视的、威胁着苏联的世界,并认为这个世界内部滋生着蔓延疾病的细菌,注定要被越来越多的内部骚动所破坏,最后难逃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力量的致命一击,从而让位给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这种论点为苏联扩充国家警察与军事力量提供了依据,为将俄罗斯人民与外部世界隔离提供了理由,为完全体现俄罗斯统治者本能和特性的不断扩大警察权限的压力提供了正当性。从本质上讲,这只是躁动不安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的稳步前进,而在一个流延了数个世纪的运动中,进攻与防御的理念一直是不可救药地混为一谈的。但是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的伪装下,对绝望的、饱受战争创伤的世界人民做出涂上蜜糖的承诺,这个运动因此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危险,更加险恶。

苏维埃政党的教义喧嚷,就大多数提出的人而言,并不能认作一定是虚狂的,或是诡诈的。这些人大多对外部世界不甚了解,思想上过于依赖,以至不会对(解密时省略了,编者注)自我催眠术质疑,也不会对他们乐于而且容易相信的东西轻易提出疑问。最后,我们仍然面对一个尚未解开的谜:在这个国家到底有谁——如果确有此人的话——能够获得对外部世界准确而不偏见的信息。由于这个政府在充满了东方式的秘密和阴谋氛围中运作,歪曲和毒化信息来源和内容的可能无时不在。俄罗斯人对客观事实的不信

<sup>①</sup> 美国联邦政府在公布外交与国防档案文献时,常常依据所谓国家安全保密原则,将公布的文件中的某些段落或文字涂黑,称尚未公布。以下相同。

任——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承认客观事实的存在——使得他们坚信所有表述的事实都不过是为了某种险恶目的所服务的工具。人们有足够理由怀疑，现今的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大阴谋中的一部分。作为众多中的一员，我就怀疑斯大林本人能否得到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的信息。这里可以充分衡量俄罗斯人如何实施微妙的诡计，在这点上，俄国人过去擅长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伎俩，大有施展的余地。外国政府无法将他们对俄关系的立场和理由在俄国决策者面前清晰地表述——实际上往往只是受到那些看上去彬彬有礼但身份模糊、鲜为人知的所谓顾问们的接待，对这些人，既不能轻易约见，也无法产生影响。在我看来，这是最令人焦虑的莫斯科外交特征。西方政治家要想有所建树，就必须了解这里所面对困难的实质之所在。

### 第三部分 苏联[战后战略]思维在政府政策层面的反映。

至此，我们已经了解了苏联计划的内涵与来龙去脉。那么，在政策的实施层面上，我们又会面对什么？

正如国务院询问电报所隐含的，苏联的[对外]政策是在两个平台上操作的：(1) 政府平台，体现了那些以苏联政府名义采取的动作；(2) 隐秘平台，表现为那些由某些机构采取的但苏联政府否认是由其指使的行动。

这两个平台所展现的政策，均旨在服务于[本文]第一部分所表述的(A)和(D)基本政策目标。通过其他平台所采取的行动会有很大差异，但在目的、时机和效果方面是相互呼应的。

至于政府平台的政策，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方面：

(A) 所有旨在增强和提升苏联政权权威和信誉的国内政策，包括：强化军事工业化进程；最大限度地发展武装力量；为了向外国人宣传所做出的大规模展示；那些为了掩盖弱点、迷惑对手的对内长期秘密行动。

(B) 在时机成熟和成功有望的时候,所有为了扩展苏联力量的试图。目前,这样的试图主要集中于被认为具有现时战略需要的几个相邻地区,如伊朗北部,土耳其,也有可能包括波恩荷尔姆(Bornholm)。然而,一旦隐秘的苏联政治影响在新的地区取得成功,其他地区也会被受到考虑。以此类推,一个“友善”的波斯政府会被要求为苏联在波斯湾开放一个港口。假若西班牙共产党取得政权,苏联有可能立即启动对在直布罗陀海峡建立基地的诉求。当然,诸如此类的动作,只有在非政府的[平台]准备完成后才会以政府的名义来推行。

(C) 只要看到有扩张苏联实力或限制和减弱其他国家实力的机会,俄国人是会以政府的名义参与国际组织。对于联合国,莫斯科从不认为该组织是为了建立一个基于相互利益和共同目标的永久稳定的国际社会的机制,而只是看作是一个为了私利能够利用的场合。只要这个判断和诉求不变,苏联将留在联合国内。但是,一旦认为该组织只是令他们难堪、限制了其势力扩张,一旦发现通过其他途径能够实现自己的扩张目标时,苏联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联合国。此举的隐含意义是:他们坚信自己已经强大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不惜通过撤出联合国而与其他国家决裂,将对其目标和安全有威胁的联合国变成一个无效机构,并用一个符合他们利益的国际武器取代之。因此,苏联对联合国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样几个因素:其他国家对该组织的忠诚度,以及这些国家为了通过联合国推动和平和实现代表我们思考方式的具有希望的国际生活观所做出的努力,所表现的决心和所展示的团结。请允许我重申:莫斯科对联合国的理想并无任何抽象意义的首肯,它对该组织的态度主要源于实际的和策略上的考虑。

(D) 对殖民地和落后的、依赖他人的地区和人民,苏联的政策,即便是通过政府平台实施的,都将是削弱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些地区]的实力、影响甚至与这些地区的接触的实现,因为,

从理论上看,一旦这样的政策实施成功,那么这些地区将会出现权利真空,有利于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势力的渗透。在我看来,苏联施压要求参与[联合国]托管的安排,表现的是企望在这些地区处于能够弱化西方影响的地位的要求,并非为了构建一个能够发挥苏联影响力的渠道。尽管也期望建立这样的渠道,但苏联倾向于依赖其他的渠道,而不是通过政府的托管安排。据此,我们可以预见,苏联将会要求参与所有涉及托管和类似的机制,并通过所获取的地位削弱西方对这些地区和人民的影响力。

(E) 俄罗斯人将会竭尽全力地与所有可能倾向于反对西方权利大国的国家发展正式关系,加强苏联的影响。这种政策倾向将会广泛涉及诸如德国、阿根廷、中东和其他国家。

(F) 在国际经济领域,苏联的政策将集中于对苏联和苏联控制的相邻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绝对主宰地位的诉求。但是,这将是个潜在的政策,就其公开表述的路线来看,具体的政策尚不清晰。自战争结束后,苏联政府对涉及对外贸易的议题表现出奇怪的缄默。假若有可能争取到大批量的长期的信用贷款,我相信苏联政府会如 30 年代那样对建立一个国际经济交流的必要性表示口头上的赞同。否则,我认为,苏联的对外贸易有可能仅限于苏联自己的安全区内,包括在德国的占领区,官方对国家间发展经济合作的基本原则会采取漠视的态度。

(G) 关于文化交流,苏联对加深国家民族间文化了解的必要性也一样会表示口头上的赞同,即便是这样的表态,一旦在实践中被认为有损苏联民族的安全,便会被取消。苏联涉及这方面的政策表现仍将限于那些毫无生气的交流方式,包括牢牢控制下的官方访问和活动,铺天盖地的伏特加酒,以及冗长而缺乏任何长久意义的讲话。

(H) 在此之外,苏联与各个外国政府的官方关系将按所谓“正确”路线的实行之,即: 将无例外地强调苏联的威望和代表性,同时也将强调礼仪——而非良好的风度——的任何一个细

微之处。

**第四部分 以下部分可以被认为是我们对苏联为了其基本政策目标在非官方或是隐秘的(如那些苏联政府否认参与)的平台上将会实行的方式和方法的预测。**

在这个平台上实施[苏联]政策推介的机构如下：

1. 其他国家共产党内部最为核心的部分。尽管此类人具有与他们的真实身份无关联的公共面貌,但他们实际上联系紧密,形成了一个世界共产主义的地下活动中心,恰如一个隐秘的“共产国际”,受到莫斯科的严密控制和指导。这个内部核心的成员,尽管他们所隶属的是个合法的政党,但他们的活动是通过地下管道进行的。记住此点,十分重要。

2. 共产党的一般成员。请注意此类人与上述人员是有区别的,而这个区别近来越来越大了。过去,外国共产党的活动多为公开和秘密、合法和阴谋的混合,这个现象十分令人费解的——或者对莫斯科而言起码是不方便的,现在,几乎所有的秘密活动均仅限于党内的核心部分,并有效地转入地下,今天的…般党员已经不被信任,甚至对运动的真实情况都不甚了解,只是作为各自国家内部政治运动的真诚参与者而被推出,对该党与外国政府的隐秘的关系一无所知。只有在那些共产党仍具有人数上优势的国家,这些党员分子才会经常参加活动,并以集体的形式出现。作为一条规则,他们只是被用来对那些不太会被怀疑是苏联政府的工具的组织,根据具体需要和可能,进行渗透发挥影响,甚至予以控制,以便达到通过(省略,仍未解秘,编者注)组织[代为行动]——而非以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采取直接行动——的目的。

3. 各国都有大量属国家级协会和团体的此类组织,完全可能通过上述渗透的方式受到影响和控制。这些组织一般包括：工

会,青年联合会,妇女协会,民族团体,宗教组织,社会机构,文化社团,自由主义的刊物,出版社等等。

4. 国际组织同样存在着[共产党]通过对不同的国家社会部分施加影响而遭受渗透的可能。最有可能发挥这种影响的有工会、青年联合会和妇女联合会。对此特别需要提出的,而且几乎具有致命的重要性的,是国际工人运动。对这个运动,莫斯科看到了能够让西方政府在国际事务中无法集中注意力的可能,也看到了建立国际性的“压力”组织以逼迫某些国家的政府采取有利于苏联的行动或停止不利于苏联的政策的可能。

5. 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和它遍布海外的分会,以及通过这些教堂与一般的东正教教堂的联系。

6. 泛斯拉夫运动以及其他源于苏联境内少数民族——如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土库曼人等——的运动。

7. 那些愿意或多或少为苏联的政策目的效劳的外国政府与执政集团,诸如目前的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政府、北波斯政权、中国共产党集团等。这些政府和势力,不仅其宣传机器被苏联所利用,而且在具体政策上也会相当大程度地服务于苏联。

可以预料的是,由这些势力组成的这样一个广泛、庞大的机器将会受到[莫斯科]的利用,尽管利用的程度会因人而异、因势而异,但在方式上会出现如下几种:

(A) 打击主要西方国家的政治与战略潜在力。在这些国家内,将会出现旨在打击人民自信心、破坏国防建设、激化社会与工业动乱以及挑起任何形式的分裂的活动。所有心怀不满和受到不公正待遇者,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民族的,都将被挑唆通过以消灭社会中敌对势力为目的的暴力方式去寻求正义和解决问题,而非通过调解和妥协的方式。于是,穷人将会与富人形成对立,黑种人将会与白种人形成对立,年轻人将会与年长者形成对立,新来者将会与久居者形成对立,不一而足。

(B) 特别地通过非政府平台挑起暴力,以削弱西方大国在殖

民地、落后地区或依赖他人的民族地区的实力和影响。为此，西方殖民统治的所有错误和不当将会受到毫无保留地揭露和利用。西方大国内部的自由主义势力将会动员起来反对殖民主义政策。附庸国人民对宗主国的不满也将会受到挑唆。尽管这些殖民地和附庸国家的人民会被鼓励争取实现脱离西方大国统治的独立，实际上，由苏联控制的傀儡政治势力会在积极准备，一旦独立实现，他们即会上台控制政权。

(C) 任何一个有可能阻碍苏联的政策目的推行的外国政府将会受到下台和解散的压力。这种压力可能在三种情况下出现：政府公开直接反对苏联的对外政策目标(如土耳其, 伊朗)；政府关闭国境线以阻止共产党的渗透(如瑞士, 葡萄牙)；政府在那些对共产党控制十分重要的人群中争取道德认同的力度很大，如英国的劳工党政府。(有时，上述两种情况在同一国家出现。一旦如此，共产党的反击将会尤其激烈和残酷。)

(D) 作为一条法则，共产党分子在国外的活动，是为了消灭个人任何形式的独立，无论是经济上的，政治上的，还是道德方面的。他们的制度只能对付那些已经被迫完全依附于更高的权威的人。据此，所有经济上独立者——诸如企业经营者、不动产拥有者、成功的农民和艺术家，以及所有在当地社区具有信誉和起领袖作用的人，例如受人爱戴的牧师或地方政治人物，都是需要被诅咒、被打击的人。即便是在苏联内部，地方官员也会不间断地异地任职，以防他们在一地扎根太深。苏联这样的做法实在不只是一个巧合。

(E) [莫斯科]将会竭尽其能，使得西方主要大国出现相互敌对。在美国人民中，将会造出反英的舆论，在英国人中，将会煽动反美的情绪。包括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将会出现反对盎格鲁-撒克逊权利的言论。所有存在这些情绪的国家，将会受到进一步煽动，那些不存在这些情绪的国家，将会受到挑唆。所有能够诋毁和破坏(解密时省略了，编者注)任何形式的、将俄罗斯排

斥在外的团结和一致的可能都会受到利用。因此,任何形式的国际组织,只要有碍共产主义分子的渗透和控制,无论是天主教会(解秘时省略了,编者注),国际经济合作组织,或是贵族和皇室的国际同盟,必将处于来自(解秘时省略了,编者注)的议论炮火攻击之中。

(F)总而言之,苏联通过非官方平台的所作所为,从性质上看,是消极的,具有破坏性的,是为了摧毁苏联控制以外的所有力量的根源而设计的。这与苏联与对手不能妥协、建设只有在共产主义势力取得控制后才能开始的本能认知是完全相符合的。然而在此背后,所实施的是对外国政府不懈的、坚忍不拔的渗透压力,直至取得对政府内主要机构——特别是警察系统——的控制。苏联的政权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警察政权,由于沙皇时代的半明半暗的专制阴谋传统,他们已经习惯了将使用警察力量放在首要考虑的位置。任何人在探测苏联人动机时都不得忽视这一点。

## 第五部分 从美国政策角度的可行性推断。

概括起来看,我们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政治力量,它坚信与美国的妥协根本不可能,坚信为了苏联权利的安全必须破坏我们的社会的内部和谐,必须消灭我们赖以生存的传统生活方式,必须摧毁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权威。这个政治力量孕育并成长于极其深厚、极其强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思潮之中,完全控制了世界上最伟大之一的民族和人民的能量和世界上资源最为富饶的国土。此外,这个政治对手还拥有一架能够在其他国家发挥影响力的经过精心制作的庞大的组织机器,这部机器具有惊人的灵活性和持久性,操纵这部机器的人,他们采用地下方式的技巧和经验是史无前例的。最后,从其基本反应上看,这个政治对手对现实似乎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对其而言,人类社会浩瀚

的客观事实，不是作为不断衡量和改进思维的参照系，而是作为一个用来人为地、随意地选个别现象去支撑其早已形成的思维的百宝囊(*grab bag*)。这种对待客观事实的态度与我们恰恰相反。显然，这里所描绘的并非一幅让人赏心悦目的前景。然而，如何面对这样一个对手和力量，无疑已成为我们外交上从未经历的最大挑战，恐怕也将是我们未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应该是我们目前的政治与政策设计者制定[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对于这样的挑战，必须以战争期间解决重大战略问题时的全面、慎重和小心对待它，而且如果必要，还要在计划方面做出同样大的努力，来处理这个问题。至于答案是什么，在这里我是无法提出的。但是，我希望能借此明确地表述我的观点：我们完全具有解决这个难题的力量，而且完全可以避免采用一场大的战争的形式。为了支持我的这一观点，请允许我提出如下一些更令人振奋的观察：

(1) 苏联的实力，与希特勒的德国不一样，既不是基于长期阴谋策划，也不具备冒险性。它如果按计划行事是不会得逞的，它也冒不必要的风险。因为它对理性分析无动于衷，对逻辑的力量又是高度敏感。基于这个理由，当任何时候出现抵抗时，它是可能——常常也这样——退却的。所以，假若它的对手拥有足够的力量并明确地展示使用这个力量的决心，那么，[它的对手]实际上使用这个力量的可能几乎不存在。[我们]只要将类似的局势妥善地处理好，那么，出现拿声望做赌注而介入军事冲突的必要性也是很小的。

(2) 面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世界，苏联人仍然是处于弱势的一方。因此，苏联人能否扭转劣势，取决于西方世界所展示的团结、坚定和魄力的程度。而我们具备影响这个因素[即提升西方国家团结，编者注]的实力。

(3) 作为一种内部政权的形式，苏维埃政权的优越之处迄今尚未得到证明。它仍然不得不证明，这个政权是能够经受得住权

利从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向另一个人或团体交接这样一个根本的考验。列宁的逝世，是这个权利的首次交接，它所产生的影响让苏联国家 15 年间不得安生。斯大林的去世或退休，将是这个权力交接的第二次考验，而即便这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这样的考验。由于它近期的领土扩张，苏联统治制度将会碰到一连串更多的麻烦，而这些麻烦曾令过去的沙皇们头痛不已。在这里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自从内战结束之后，俄罗斯广大民众对共产主义教条的心理反感，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在俄罗斯，政党已经成为一个庞大而有效——起码在目前——的独裁统治机器，但是，这个政党已经不再是鼓舞人们情感的源泉。据此，[苏维埃]运动的内部健康和长久并不可以看作是一个确定的事实。

(4) 所有苏联安全区域以外的苏维埃式的宣传，本质上是消极而具破坏性的。因此，通过充满智慧和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宣传将其打败，相对是容易的。

基于上述理由，我认为，我们应该冷静、理智地处理俄罗斯问题。至于具体如何实施，我谨希望以本文的结束语的方式提出以下建议：

(1) 我们的第一步必须是对我们所面对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质予以了解，并认识其客观存在。我们必须像医生诊断一个难以控制的不可理喻的病人那样，用同样的勇气，同样客观态度，同样的中立立场和同样的决心去研究这个问题，避免受其感情上困惑或干扰。

(2) 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公众，了解俄罗斯问题的真相。对这一点的重要性，我无论如何强调都是不过分的。为此，单靠新闻界已无法做到，政府必须担负起主要责任，因为政府对所面对的实际问题的认识更为清晰，处理问题的经验更为充分。我们没有必要在问题的黑暗面前怯而止步。我相信，一旦我们的民众了解到这个情势的真相，那种歇斯底里地反苏情绪将会得到大大缓解，因为没有什么再比不知情要更为危险，更为可怕。当然，认为更多地

暴露我们针对苏联的困难以至不利于美苏关系的观点也成立。我认为,假如真的存在着危机,那么,我们就必须有勇气去面对它,而且越早越有利。但是,我实在看不出我们会触发怎样的危机。即便我们追求的是与俄罗斯人民的伟大友谊,我们在国内的[政治]赌注也是很小的。实际上[在俄罗斯],我们没有什么投资需要保护,不会失去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贸易,不需要保护多少本国公民,也没有太多的文化交流需要保留。我们唯一的赌注,是我们希望得到的,而非我们实际上已经拥有的。我坚信,只要我们的公众受到教育,只要我们与苏联的交往完全置于现实的客观的基础之上,我们实现期望的可能性将会大得多。

(3) [我们应对苏联问题的挑战]相当程度上必须依赖于我们社会的健康和活力。世界共产主义就像是一种恶性的寄生虫,只会在生了病的肌肤组织上生存。在这一点上,国内和对外政策便交织在一起。每一个能够解决我们自身社会问题[的政策],每一个可以提升我们自己人民的自信心、纪律性、士气和集体精神的勇敢而坚定的举动,都是针对苏联的一个外交胜利,这要比数千个[与莫斯科之间产生的]外交文件和共同声明要更有价值得多。假若我们无法消除宿命论的影响,无法改变我们的社会面对[外部]挑战的漠然,莫斯科将得分,因为莫斯科无法不利用[我们的]这些[弱点]在外交政策上获利。

(4) 我们必须对其他国家展现和描绘出一个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但要比以前更加积极、更加富有建设性的世界的前景。只是希望别人按我们的政治模式发展是远远不够的。不少的国家与人民,起码在欧洲,由于过去的经历已经疲惫不堪,而且[对历史的重演]惧怕万分,因此,他们对自身的安全的兴趣远比对抽象的自由要大得多。他们需要的是领导,并非只是责任。我们必须比苏联提供更多他们所需求的领导。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俄国人是一定会责无旁贷的。

(5) 最后,我们必须对坚守我们的人类社会的信念和方式充

满自信和勇气。毕竟，在应对苏联共产主义挑战中最大的危险，是我们让自己变成了我们所需要应对者那样。

凯 南

## 附件二

# 国家安全委员会 20之4号文件<sup>①</sup>

1948年11月23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致总统  
最高机密  
华盛顿

“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关于美国抗击苏联  
针对美国的安全威胁的目标报告注解”

参考文件：A NSC 20, 20/1, 20/2 以及 20/3  
B 中央情报局 60-80 号报告

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第二十七次会议上讨论了上述报告的草

① 本文件译者：张曙光。文件背景介绍：在1948年5月，杜鲁门总统指示国防部长詹姆斯·福来斯特（James V. Forrestal）为1950财年准备一份不超过15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从当时的国际安全局势来看，他认为，美国没有必要同苏联进行战争。一个月过后不久，即在1948年6月24日，苏联进行了封锁柏林的行动，福来斯特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开始怀疑不足15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是否能够维持适当的军事态势。结果，在1948年7月10日，福来斯特给杜鲁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写信，请求“准备一份报告，详细说明并评估在未来将面临的危险，明确我们的目标，以及拟订出为实现这些目标所要采取的行动。”这份请求作为的NSC-20号文件于1948年7月12日提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作决策参考。在乔治·凯南领导下的国务院政策计划署当时已经起草了一份（转下页）

案,决定通过,但要求对草案中的 22-d 段落予以修改。

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总统批准文件的结论部分,并批准将文件发送美国政府所有有关官员,作为他们工作的参考和指导。

西德尼·索尔斯(Sidney W. Souers)

## 报告全文如下

### 问题

1. 考察和评估目前苏联对我们国家安全所造成的现实的和可以预见的威胁;设计我们的政策目标和目的,以便指导抗击这些威胁的方法和措施的制定。

对威胁本质的分析

2. 苏联领导人的意愿和能力,以至其所追求的政策对美国的

---

(接上页)名为“Factors Affecting the United States Defense Arrangements in Light o Soviet Policies [苏联政策中影响美国国防部署之性质的因素]”的政策报告。该报告对美国安全中的隐患作了评估,并依据这些评估考虑如何设定美国的国家安全目标。这些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达的任务而上交的政策报告,便成为编号为 NSC - 20/1 和 20/2 号的政策文件。而福来斯特所提出的最后一项要求,即拟订出为实现目标而应当采取的行动,则在 NSC - 20/3 号草稿文件中得到论述,最后在得到总统核准之后,成为正式指导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的 NSC - 20/4 号文件。由于国务院政策计划署积极参与了该文件的撰写,所以毫不奇怪,这份文件通篇反映了乔治·凯南的遏制思想。基于“发展一定水平的军事战备状态,以此作为遏制苏联侵略的必要措施……以及在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能够为立即介入战争和进行全民动员作好充分准备”的考虑,国防部长福来斯特在此后的一星期里请求杜鲁门总统将 1950 财政年度中的国防预算增加到 169 亿美元。由于在不到两个月前的竞选中,杜鲁门曾呼吁将国防开支削减到 50 到 70 亿美元,因而考虑到“政策立场的一致性”要求,杜鲁门便没有接受福来斯特的要求。

安全造成威胁,而这个威胁将是为没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所面对的最大的威胁。

3. 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苏联的行为表明,苏联领导人的最终目的是要摧毁这个世界。苏联领导人认为,苏联共产党是世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军事先锋队,而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基地,苏联只有在世界上所有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力量受到削弱,数量得以减少,以至共产主义势力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统治地位,才可能获得安全。战后[苏联]最高的、最近期的目标就是对西欧取得控制,而美国对苏联的抵抗被认作是其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障碍。

4. 苏联领导人似乎在通过以下手段以实现其目标:

A. 试图在所有具有权利和影响的地区楔入苏联控制的势力,在其他国家抓住一切由于虚弱和不稳定所产生的机会,并利用这些机会,最大限度地对这些国家实施渗透、宣传以及强大的苏联军事实力的压力。

B. 对所有抗御共产主义目标实现的势力进行政治、经济和心理战,特别要对西欧国家的重建和合作进行阻挠和打击。

C. 由于坚信共产主义关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信条,尽最大可能地快速发展苏联及其卫星国的战争能力,应对预期中战争。

苏联的近期目的和远期目标,对美国的安全都是有害无益,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如此。

5. 目前,在不诉诸武力的前提下,苏联威胁美国安全的能力包括如下几方面:

A. 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力进行全面和有效地集中。

B. 通过现代独裁控制下的高强度宣传活动,利用其伪科学的劝说力和感召力,向其他国家人民宣扬并许诺[共产主义]是带给他们包治百病的一剂药方。

C. 使用半个世纪里得到研究和实验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对他国进行颠覆、渗透和夺取政权。

D. 使用俄罗斯及业已控制的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对[美国]实行军事威吓,在必要时,实施军事打击。

E. 近期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由于受到刚刚结束的战争所累,所出现的相对高强度的政治与经济的不稳定,以及为这些国家提供市场和原料的那些殖民地和落后地区所出现的不稳定。

F. 由于一些民主国家为了民主自由而不愿限制某个团体的活动,由于这些国家未能揭露共产主义的险恶和虚伪,[苏联政权党]便能够充分利用这些国家赋予共产主义分子和受到他们愚弄的支持者的宽容空间。

6. 要对苏联上述不诉诸战争就能对美国产生威胁的各种方法做出准确的衡量近乎不可能。能否对这些方法做出准确的衡量,基于一系列无法预测的因素,其中包括:[苏联]在其他地区所遇到的抵御的程度,美国政策的有效性,以及苏联权利结构内部的关系变化,等等。但是,假若美国在过去的两年中不采取积极的措施促进和支持西欧和地中海国家对共产主义压力的抵抗,今天,西欧的大部分地区的政权已经旁落共产主义手中了。目前,由于我们对那些有可能对共产主义有机可乘的局势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并实现了根本扭转,共产主义势力起码在Luebeck-Trieste一线以西的国家要实现政治控制的可能,已经微乎其微了。相反,由于在这些地区政治攻势的失利,铁幕<sup>①</sup>后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以至[莫斯科]政策可能主要从加强防守方面考虑了。但是,仍然无法假定的是,苏联的政治攻击和颠覆活动的能力会在下一个十年持续下降;反之,他们可能比现在更加危险。

---

① 指时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在美国的一次公开演讲首称,认为苏联全面封锁东欧国家与西方接壤的边境,是“降下了一面大铁幕”。因此,“铁幕”成为冷战的一个极富说明意义的政治符号和标签。

7. 在目前的情势下,苏联通过使用武装力量威胁美国安全的能力,是现时的,也是危险的:

A. 苏联尽管不具备对美国本土或是西半球实施持久、直接和致命的军事打击能力,但具备对美国本土或是西半球实施有危害性的潜艇攻击和有限的单程轰炸的能力。

B. 目前的情报分析指出,苏联军事力量具备在 6 个月内攻占欧洲大陆和近东直至开罗的能力,同时具备在发动此类军事行动时保持对远东大陆的重要战略地区的占领的军事能力。此间,英国也将会受到严重的空袭和导弹袭击的危害。

C. 假若拥有充足的时间,假若苏联领导人得以巩固苏联的统治并将欧洲纳入苏联的体系内,苏联对这些地区的占领将提升苏联的战争能力。最终,苏联将得以集中所有的攻击力量,对美国的安全构成难以接受的威胁。

8. 但是,在欧亚地区的迅速军事扩张将会给苏联的后勤保障能力带来负担,也会给苏联的经济造成严重的制约。假如苏联介入一场与美国的战争,在美国的战略攻势之下,苏联的武装力量是否仍具有控制已占地区的能力值得怀疑。假如美国针对苏联卫星国实施心理战和其他颠覆行动,苏联将会在其控制的地区内面对不断加剧的不满、不忠和地下反对行动。

9. 根据目前的情报推断,本报告第七节 A 段所描述的苏联力量将会不断增强,到 1955 年前,苏联可能将具有使用核生化武器对美国进行空袭的能力,具有使用潜艇(包括发射短程导弹)实施更大规模打击的能力,以及具有为了夺取前进基地进行空降行动的能力。但是,只要美国的武装力量得以有效生存,苏联即便到那个时候也无法成功地攻占美国。到 1958 年,苏联可能将继续拥有攻占西欧、近东以及远东部分地区的能力。

10. 如本报告所描述的,苏联相对于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能力,除非受到下列因素的制约,否则会不断提升:

- A. “经济振兴计划”<sup>①</sup>的成功。
- B. 西方联盟的发展，并得到美国的支持。
- C. 美国、英国和其他盟友国家的军事力量的效率得以增长。
- D. 苏联内部的分歧出现发展，以及苏联与其卫星国之间出现裂痕。

11. 苏联已经挑起了一场与美国争夺权利的斗争。尽管无法十分有把握地预见目前的政治较量是否或者何时会导致一场武装冲突，但是，战争的威胁无时不在。

A. 虽然苏联将会发动涉及美国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无法排除，但是，经过对有关因素进行细致的考量，可以确定的是：苏联政府目前没有计划实施将刻意涉及美国的主动性的军事行动，仍然试图通过政治手段加上军事威胁以实现其目标。

B. 战争有可能由于直接接触的武装力量之间发生的意外而爆发。

C. 战争也有可能因为误判——各方对对方的底线没有确切地衡量——而爆发。苏联会由于对美国使用武力抗御对美国安全无法容忍的威胁的决心和意愿发生误判而贸然发兵。这种可能完全存在。

12. 除了战争的危险之外，另一种也必须予以防御的可能的危险是：苏联的政治攻势极大地损害了美国的相对地位、加强了苏联的势力，最终，不是我们在不诉诸武力的条件下被彻底打垮，就是我们在十分不利、十分危险的条件下被迫介入战争。我们外交政策中的摇摆不定、对敌绥靖或光荣孤立的理念将会对这样的结果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至我们失去盟友，失去影响。此外，我们内部的分裂和受到颠覆，我们经济上由于衰退或通货膨胀而出现的不稳定，以及我们过度的、不切实际的军备和对外援助支

---

<sup>①</sup> 指美国国会 1948 年通过的由杜鲁门政府提交的援助欧洲国家的 Economic Recovery Program 简称 ERP 计划。

出，也都会对上述结果起到促进作用。

13. 为了抵御对我们国家安全所产生的威胁，为了构建一个有益的、长期互利的美苏人民的关系，本政府必须设定好原则性的目标，以至确定我们无须诉诸武力时所能够达到的具体目的，以及一旦战争爆发时我们能够实现的具体目的。做到这一点十分重要。

## 结论

### 美国安全所面临的威胁

14. 在可以预测的未来，美国安全所面临的最为险恶的威胁源于苏联的敌对意图和不容忽视的实力，也源于苏联制度的本质。

15. 目前苏联所实施的政治、经济和心理战，除非美国和其他非共产主义国家的政策能够对其予以足够的抗御，对减弱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相对的影响，对不诉诸武力就能破坏美国的传统制度，具有潜在的危害性。

16. 即便是按照普通的深谋远虑的原则，与苏联战争的危险足以要求美国及时地、确切地做好准备：

A. 即便现时的分析表明苏联领导人目前不可能企图采取涉及美国的军事行动，但苏联主动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无法排除。

B. 目前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战争由于苏联误判美国使用其能够使用的所有力量保卫安全的决心和误解我们的意图，或者由于美国对苏联对其所采取的行动的反应的误断，而爆发的可能性将持续存在。

17. 苏联对欧亚地区潜在资源的控制，无论是通过武装侵略的手段，还是通过政治和颠覆的方法，对美国而言，在战略上和政治上，都是不能接受的。

18. 美国在和平时期和战争阶段保卫安全和实现[战略]目标的能力将会由于以下重要的内部因素的发展而遭受严重打击：

- A. 严重的间谍、颠覆和破坏活动,特别是受到共产主义势力的有效协调和指挥的。
- B. 持久的或是受到夸大的经济不稳定。
- C. 国内政治和社会的分裂。
- D. 过分的和不适当的军备和对外援助支出。
- E. 和平时期对我们资源过分的或浪费性的使用。
- F. 由于摇摆不定,绥靖主义,对外政策实施上缺乏技巧和想象,或是由于收缩在世界范围内承受的责任,造成美国权威和影响力减弱。
- G. 对苏联具有迷惑性的战术上的变化所产生不切实际的安全感得以蔓延。

#### 美国针对苏联的目标与目的

19. 为了抗御苏联对我们国家安全和生存的威胁,我们针对苏联的平时和战时的一般目标应该为:

- A. 将苏联的实力和影响减弱到令它无法再威胁由民族国家所组成的国际社会的和平、民族独立和稳定。
- B. 促使俄罗斯现行政权对国际关系的运作发生根本的变化,令其按照联合国所确定的准则和目的行事。

在实现这些目标时,必须倍加小心,避免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经济、价值和制度体系造成永久的伤害。

20. 为了避免战争的前提下实现我们的基本目标,我们应该竭力追求下列[政策]目的:

- A. 鼓励和促进苏联在目前围绕俄罗斯传统边界线的过度权利和影响得以不断退却和削弱,鼓励和促进苏联的卫星国成为独立于苏联的实体。
- B. 鼓励俄罗斯人民不断转变态度,以期制约苏联目前的行为方式,支持那些具有能力和决心取得和保持民族独立的势力复兴[传统的]民主生活方式。
- C. 破除那些远离苏联军事影响的人民对从属于莫斯科的幻

想,努力使全世界看清和认识到苏联和苏联控制下的国际共产主义政党的本质,并对共产主义势力采取一个理性的、现实的态度。

D. 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迫使苏联政府能认识到推行其基本理念在客观上的不可取性,能接受遵循按联合国章程所制定的国际行为准则行事的必要性。

21. 这些[政策]目的的实现要求美国必须:

A. 将军事准备保持在能够常备不懈的水平上,并作为对苏联侵略企图的威慑,作为对其他国家抵御苏联政治攻势的鼓励,作为一旦战争在即、需要迅速的战争动员和即刻出兵的可以胜任的基础。

B. 加强美国的国内安全,消除破坏、颠覆和间谍的危害。

C. 最大限度地发展我们的经济潜力,包括加强我们和平时期的经济,以及确保战争时期可以动用的战略储备的建立。

D. 促进所有非苏维埃国家转向美国,与我们发展关系;对其中有意愿、有能力的国家,[我们要]帮助他们增强经济和政治上的稳定以及发展军事能力,使得他们能为美国的安全做出重要的贡献。

E. 向苏联的权利结构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特别是对苏联与其卫星国之间的关系施加压力。

F. 加强对美国民众不断地教育,使他们对我们安全所面临的威胁保持警惕,以便他们能够对我们所不得不采取的方法予以支持。

22. 一旦发生对苏的战争,我们必须努力通过军事的和其他武器,创造一个既能使我们的目标得以实现又不必事先要求[苏联]无条件投降的环境。作为和平目的补充的战争目的包括:

A. 取消苏俄对战争结束后得到[国际社会]允许成立的苏联国家边境以外的所有地区的控制。

B. 摧毁在所有非共产党国家内存在的共产党联盟的领导者得以对其个人或集体施加影响、发号施令的机制。

C. 确保战争结束后在传统的俄罗斯国土上建立的一个或多个政权：

- (1) 不再具备发动侵略战争的军事力量。
- (2) 与外部世界接触时不再像现在那样拉下铁幕。

D. 此外，即便战争结束后在苏联的某些地方仍存在着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必须确定，它不得对苏联军事工业的潜在力量有任何足够的控制，以至其能够对其他国家或对战后在传统的俄罗斯国土上建立的政权发动类似战争。

E. 创造一个战后的环境，使之能够：

(1) 遏制任何对美国安全和国际和平造成威胁的权利关系的发展。

(2) 确保一个基于战时控制时期确立的目标和原则的有效的国际组织的成功发展。

(3) 确保在美国尽早地、可行地终止战时控制。

23. 在追求上述战争目的的实现过程中，涉及边界调整、敌方国土上的政府架构、少数民族的独立，以及战后对由于战争所造成不可避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瘫痪的调整的责任等，我们必须避免出台任何轻率的、不可改变的政策和承诺。



## 国家安全委员会 68 号文件

NSC - 68：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和计划<sup>①</sup>

(1950 年 4 月 14 日)

按照 1950 年 1 月 31 日总统令，提交总统。

绝密

华盛顿 1950 年 4 月 7 日

### 目 录

#### 分析

- 一、目前世界危机的背景
- 二、美国的基本目标
- 三、克里姆林宫的基本企图
- 四、存在于美国目标和克里姆林宫企图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中的根本冲突
  - A. 冲突的性质
  - B. 目标
  - C. 手段

① 本文件由向丽华翻译，张静一校，张曙光二校。

五、苏联的意图和能力——现实的和潜在的

六、美国的意图和能力——现实的和潜在的

七、目前的危险

八、核军备

A. 对美国和苏联核力量的军事评估

B. 核武器的储备和使用

C. 核能的国际监控

九、可能采取的行动选择

A. 第一种选择——延续现行政策,包括为执行这些政策所制定的行动计划

B. 第二种选择——孤立

C. 第三种选择——战争

D. 剩下的选择——在自由世界迅速构建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

结论和建议

结论

建议

以下报告旨在回应 1950 年 1 月 31 日的总统令。该命令内容为：

考虑到苏联的裂变炸弹能力和潜在的热核炸弹能力,总统指示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对我们和平和战争时期的目标,以及对我们的战略计划中实现这些目标的有效性进行重新审查。

建议发布上述总统令的文件部分内容为：

必须考虑到,当一个方案旨在确定现实可行性时,继续执行该

方案的决定,是否对一些更为基本的问题提前做出判断,说明:(1)如果热核武器的测试成功,那么,是否应该储备这种武器;(2)如果储备了这种武器,那么在战争中能够使用这些武器的条件有哪些。如果对热核武器的测试是成功的,那么,处于与裂变武器一样目的,生产和储备这种武器的压力将极大地增加。涉及使用这类武器的政策考虑只有作为对这个国家平时、战时的战略计划相称的总体再检测的一部分,才能够对它进行充分评估。此类重新检测的工作在考虑国家政策时,不仅需要重视可能的热核武器,也需重视裂变武器——这是因为考虑到苏联所具有的这两种武器潜在的能力。就包涵于此项问题中的道义、心理和政治问题,我们都需要加以考虑,并给予应有的重视。进一步而言,这次检测的结果对于之后是否会要对协议的性质进行修正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协议包括对核能进行国际控制,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寻求同苏联达成一致的。

## 分 析

### 一、目前世界危机的背景

过去 35 年中,世界经历了两次巨大冲突的全球战争。它目睹了两次范围和强度极大的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它也看见了五个帝国的崩溃——奥斯曼、奥—匈、德国、意大利与日本和英法两大帝国体系的急剧衰落。在整整一代时间里,国际力量的布局已经根本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对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证明,无论它拥有多大的优势力量,也不可能克服它所面临的由其他国家联合而成的强大力量。国际舞台上一再表现出周期性的冲突和战争,但是,主权和独立国家的体系仍维系着,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取得对这个体系的霸权。

现在,有两组复合因素基本上改变了这种历史上的力量布局。

第一，德国和日本的失败，英、法两个帝国的衰落，是与美、苏两国的发展和权力日益倾向于这两大中心的过程相互作用的。第二，苏联虽不像是以前那样的霸权追求者，但它受到反对我们的一种狂热信仰的驱使，力求把它的绝对权威强加给外部世界。因此，在苏联方面，冲突事件已是传染性的，无论是暴力的或非暴力的冲突，总是随时发生。随着大量可怕的破坏性武器的发展，如果冲突进入全面战争阶段，那么，人人都将濒临全面毁灭的危险。

一方面，世界人民渴望着免除因原子战争危险而引起的忧虑。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宫统治地区任何进一步的扩大，都将使集结一个强有力的足以抵抗克里姆林宫的联盟成为不可能的事，在这种意义上说，这个拥有力量优势的共和国和她的公民们又面临着严重危险。

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严重的，不仅是这个共和国而且是文明本身的完善或者全部毁坏。这些问题不容我们从缓考虑。凭着良知和决心，本政府和它所代表的人民现在就必须采取新的重要决定。

## 二、美国的基本目标

美国的基本目标就在《宪法》的序言里：“……为了建立更为完备的联邦，树立公正，维护国内治安，建立共同防卫，增进公共福利，并且保证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所享有的自由和繁荣。”实质上，基本目标就是保证我们建立在尊严和个人价值基础上的自由社会的完整和活力。

对这一目标的追求将导致三种现实的出现：我们有获得正如《宪法》和《人权法案》所确定的个人自由的基本要素的决心；我们有建立起自由和民主体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条件的决心；我们有必要时以战斗来保卫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决心，正如《独立宣言》所说，“怀着深信神祇佑之信心，我们仅以我们的生命、财产和神

圣的荣誉相互共同保证。”

### 三、克里姆林宫的基本企图

那些控制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人的基本构想是：维持和巩固他们的绝对力量，首先是在苏联，其次是在那些处于他们控制之下的区域。然而，在苏联领导人的心目中，这一构想的实现要求急剧扩展它们的权威，最终消除对它们权威的任何有效反抗。

因此，这个构想企望，建立在彻底推翻或是破坏非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府机器和社会结构；并代之以从属且受控于克里姆林宫的政党机器和机构之上。为达到那个目的，苏联竭力控制欧亚大陆的大多数人民。美国是非共产主义世界中的主要实力国家的中心和反对苏联扩张的堡垒，那么美国就是它的最主要的敌人，如果苏联要实现其基本企图，就一定会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推翻或破坏自由世界的完整和活力。

### 四、存在于美国目标和克里姆林宫企图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中的根本冲突

#### A. 冲突的性质

克里姆林宫将美国认作是它实现其基本企图的唯一主要威胁。处于法制政府管理之下的自由观念，和在克里姆林宫的残酷集权统治之下的奴隶制观念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随着在第一章里提到的实力的两极分化，加上这两个对抗者均独占核武器，从而导致危机。自由思想对奴隶制的思想具有特别的、无法忍受的破坏性。但是奴隶制思想却无法破坏自由思想。奴隶国度力求消灭自由思想挑战的这种无可替代的目的，就使两大力量处于截然对立的位置。这一事实本身使目前的力量分化具有危机的性质。

自由社会将个人价值作为个人本身的目的，只是要求个人进

行适度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克制；自律和克己使每一个个体的权利与其他个体的权利相一致。个人自由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为个人负有责任，即在行使自己的自由时，采用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他人的自由；另一方面是正面责任，即创造性地使用自己的自由，并将其用于建设一个公正的社会。

从这个具有责任的自由思想中，我们可以获得不可思议的多元化和更深切的宽容和自由社会的法制性。这就是对自由人民力量的解释，它构成了完整和充满活力的自由民主体制。自由社会尽力建立和能够使用其中的每个个体都有机会实现他的创造力的环境。这也同样解释了为什么自由社会能容忍那些在社会内部运用它们的权利来破坏它的人。根据同一原理，在国家关系中，力量和诉诸于力量的思想支撑起了自由社会的主要信心；它认为无需强迫，迟早都能使所有社会与它协同一致。

自由社会不惧怕多元化，反之欢迎多元化。它对素不相容的思想保持善意，并从中获得力量。它是一个思想能够自由交换的市场，而且忠诚可靠，自由人类能从中取得最好的商品，在运用他们的选择时更充分地实现自己的力量。

自由思想是历史上传播最广的思想，远比屈从于权威的思想传播广泛。这是由于在由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带着获得绝对权威的意愿进行统治的社会中，是容忍不下自由的宽宏气度的。独裁者所掌握的绝对权力——是强有力意志的绝对权力——其他意志必须屈从于该意志，在扭曲了的信仰的强迫之下，个人不得不使自己让步。这是这种信仰的第一条。他发现了一——也唯独发现了——他存在的意义在于服务于这个体制的目的。这种体制几乎成了上帝，那么，服从于上帝的旨意就变成服从于这个体制的意志。仅在表面上服从于这个体制却不够——甚至就是甘地的非暴力政策也不被接受——因为反抗的精神和对更高一级权威的虔诚仍可能会保留下，个体还不是完全屈服的。

[克里姆林宫]在苏维埃国家内部强行要求对所有人的毫无例

外的绝对权力,这也适用于所有的共产党和处于苏联控制之下的国家。如此一来,斯大林就宣称,正如布尔什维克党反复强调的那样,列宁主义的理论和策略对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都具有强制性。于是,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被界定为毫不犹豫地维护苏联立场的人;在卫星国中,真正的爱国主义就是热爱苏联。据此判断苏联的“和平政策”,在其党代会上被说成是“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更为有利的形式”,便成为分化和破坏非共产主义世界的策略;因此苏联寻求的和平是同苏联政策保持绝对一致的和平。

反自由的奴隶制解释了铁幕、孤立和社会的目的是获得绝对的权利的专制政治等现象。自由思想的存在和延续是对奴隶制社会根基的永恒威胁,因此自由在世界上的长期存在是令专制者无法容忍的。力量的两极分化是新的现象,并造成持续的危机,引起奴隶社会与自由社会的不可避免的对立。

对自由制度的攻击现在遍及全球。在目前力量两极分化的情况下,任何一处自由制度的失败也即意味着自由制度在任何其他地区的失败。捷克斯洛伐克[自由制度]受到破坏对我们造成的打击,是不能以捷克斯洛伐克对我们的物质重要性来衡量的。从物质意义上讲,它的能力早在苏联掌握之中。但是当捷克斯洛伐克制度的完整性遭到破坏时,我们在不可估量的价值观念范畴内遭到的破坏,远大于我们所遭受的物质损失。

尽管不情愿但我们的自由社会不得不承认,苏联体制向我们提出了生死挑战。从未有其他任何一种价值体系与我们本身固有的价值体系是如此对立;它意在破坏我们价值体系的意图是如此难以替代;如此擅长于利用我们社会中出现的各种最为危险、分裂的趋势;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如此有力地在世界各地唤起人类本性中的非理性成分;没有任何别的国家能够如此全力支持不断增长的巨大的军事实力中心的支撑。

## B. 目标

自由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以及必须要获得使这些观念能不断

发展的物质环境决定了自由社会的目标。因此,从逻辑上和事实上讲,克里姆林宫对美国的挑战不仅是针对我们的价值观念,而且是针对我们用于保护这些价值观存在的环境的物质能力。这是一个同时包含了战争与和平的挑战。因此,我们在确定和平与战争时期目标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1. 我们不仅在实施国家生活时要肯定我们的价值观,而且在发展我们的军事、经济力量方面,都必须使自身强大。

2. 我们必须在自由世界里建立一个成功运作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发挥领导作用。不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只有通过切实确保我们的根本价值观念,我们才能维护自身的完整,否则不能真正挫败克里姆林宫。

3. 除了保证我们的价值观念之外,我们的政策和行动必须致力于促成苏联体制在性质上发生根本的改变,这种旨在挫败苏联的企图的改变是第一步,或许是最为重要的一步。如果这种变化是苏联社会内在力量作用的结果,而且在最大规模的范围内发生,那么很清楚,这种做法不仅耗费更小,也更有效。

目前这个面临核战争威胁的世界正在不断地收缩,仅是尝试着组织克里姆林宫企图的实现,还远远不够;因为国家间缺乏秩序的状况令人越来越难以忍受。这个现实把领导世界的责任加在了我们的身上,把这一责任加进了我们的自身利益当中。它要求我们竭尽全力,接受其必然的风险,通过采取与自由、民主原则相符的手段建立起秩序和公正。我们不应对苏联提出过高的要求,仅要求它在平等和尊重别国权利的基础上,同其他国家一道参加秩序的构建。在这一要求之下,我们必须同我们的盟国和以前的殖民地国家一起,寻求在意见一致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球社会。它的框架不能是生硬的。它应由很多具有巨大的、不同的能力和资源以及军事潜力的国家社会所组成。冲突的种子将不可避免地存在并继续不断生成。承认这个,只是承认不可能有最终的解决方法。在一个

没有最终解决冲突办法的世界上,不承认冲突是极为危险的。

自由社会的所有这些目标在和平与战争时期都是有必要且切实可行。但是,所有为了增强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和国家安全的考虑,都要求我们通过冷战战略来实现这些目标。只有通过发展自由世界的道德和物质力量,才能使苏联政权信服其基本假设的错误,才能实现与苏制定具有可操作性协议的前提条件。只有通过实践展示我们制度的完整和活力,自由世界才能拓宽可行性协议涵盖的范围,才能指望逐渐使苏联接受现实,以至在总体上最终挫败苏联的企图。即便这种可能不出现,我们也有可能制造一种使苏联进行自我调整,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放弃它的企图,在可以容忍的限度内与非共产主义世界共处的态势。即便如此,也将是自由民主思想的一个胜利。因此,这必须是美国政策的当前目标。

即使发生战争,我们也没有理由去改变我们的总体目标。然而这些目标并不包括[要求苏联]无条件投降,镇压俄国人民,或是消除俄国经济潜力。这种做法只会无可挽回地把俄国人民推向奴役它们的这个政权。这些目标应该着力于使苏联接受具体且有限制的、同时对建立一种[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些条件具体为:在这个国际环境中,自由体制得以繁荣发展,俄罗斯人民将有机会决定自己的命运。如果我们能使俄国人民在这样的努力中成为我们的盟友,这将会明显使我们的任务更为轻松,胜利更有把握。……<sup>①</sup>

在 NSC 20/4(1948 年 11 月 23 日)中提出的目标——摘引于第十章——与在本文中提到的目标完全一致,它们依然是正确有效的。但是,加在我们身上的不断增强的冲突,要求对这些目标在重点方面和附加内容上有一些改变,这已是十分明显的。考虑到苏联具有潜在的裂变武器和热核武器能力,日趋激烈的斗争要求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我们不能期待冲突程度会持续降低,除

① 原文中标明删减。

非或者等到苏联体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 C. 手段

在为达到目的所使用的手段上，自由社会的选择是有限的。

强制即意味着否认自由，除非它是为了保障所有人权的实现。对内和对外使用武力，对自由社会来说，是万不得已的最后一招。只有当一个人或其中的一群人威胁到其他个体或人群的基本权利时，或是当别的社会企图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时，这种强制手段才是被允许的。自由社会珍视和保护少数人反对多数人意愿的权利，把它当成一种基本权利看待。因为，这些权利对于每个个体来说都是不可剥夺的。

因此，对自由社会而言，诉诸武力与强迫，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都是困难而又危险的行为；只有在面对更大危险时，这种行为才可能被接受。所以采取这种行动的必要性必须清晰并令人信服；行动必须向绝大多数人表明，这样做只是对自由思想本质一个无法避免的例外情况。否则，在执行这种行动后，自由人民的复兴能力将可能会受到危及。

在执行其基本企图时，克里姆林宫能够选择它认为适宜的一切手段。由此，它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几个可能的区域，选择在它认为有利可图的层面进行斗争；同时在其没有做好斗争准备的时候，并享受在这些层面存在的“虚假和平”所带来的好处。在意识形态或心理学的层面上，为人类思想而斗争的矛盾冲突是世界性的。从政治和经济水平上看，在国家内部和国际关系层面上，实力之争正变得异常激烈。从军事方面看，虽然克里姆林宫利用其庞大军队威胁邻国，支持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在有利情况下，毫不犹豫地通过其代理人诉诸武力，但是在和平问题上，它还是小心翼翼，力图不在技术操作层面上破坏和平。然而，它还是在加紧行动，努力实施其基本企图，并为此使用在目前情况下适合的一切手段。如此一来，我们就不可避免的被苏联拖进了这场由于我们的目标和他们企图之间的差别而产生的冲突之中了。

我们没有选择的自由，在使用武力的问题上更是如此。使用武力不仅是自由世界的最后的手段，而且它也无法最终解决思想领域的根本冲突。只有通过适时的、长期的表明自由思想的优势所在，奴隶制理念才能被粉碎。仅有军事胜利，只会部分的或许是暂时的缓和根本冲突；因为我们虽然在一段时期内破坏了克里姆林宫威胁我们安全的能力，但是集权主义者势力的复兴，苏联体制或其他专政体制的重建，都会长期拖延，除非我们在这个根本性的冲突中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所以，现实的和意识形态上的考虑，都迫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别无选择，唯有通过展示自由思想在建设性应用方面的优越性，同时尽力采用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来改变世界局势，以此挫败克里姆林宫的企图，加速苏联体制的衰退。

对我们而言，当我们寻求用其他方式建立起一个我们自由社会得以兴盛发展的环境时，军事力量不过是通过威慑可能对我们的进攻以服务于国家目标，即在必要时，通过战争击败任何侵略者来保卫我们自由社会的完整和活力。然而对克里姆林宫而言，军事力量是用来支持、服务于其基本企图的。一旦出现对其实现目标有利的条件，它会毫不犹豫地使用侵略性的武力。所以在我们各自对待使用武力的态度上，也反映出我们的基本目标和他们的基本企图之间的差异。

当自由社会的基本价值观面临威胁时，我们自然会采取行动，包括使用武力来保护这些价值观。任何用来挫败克里姆林宫企图的隐秘的或公开的、暴力的或非暴力的手段都不会使我们制度的完整性遭受危险；此外，我们以言行强化我们的价值观的必要性，也令我们不应缩手缩脚。当然，这些行动一定要被认为确实适合于[我们的那些]目标的实现，而且它们不会过分或错误地运用以致我们代替那些奴役人民的邪恶者，成为人民的敌人。

然而一旦战争来临，武力的作用到底是什么？除非我们在使用它时，令俄国人民明白我们是致力于反对[苏维埃]政权和它的

侵略力量,而不是反对他们的利益;否则,将反而使这个政权同它的人民在一条对我们来说最不合适的战壕里联合起来,战至最后;如果是这样,不仅没有一个问题能得到解决,而且反倒产生出新的问题来,我们的基本原则也将被迫受到玷污和破坏。在使用武力中,如果我们不表明我们目标的性质,那么,我们的基本目标从一开始就会受挫。《联邦制拥护者[Federalist]》一书中如是说:“任何采用的手段都必须与其产生危害的程度相称。”这种危害可能是一场全球性战争,或是苏联为了有限目标而发动的局部战役。面对这两者的任何一个,我们都应该在可以避免的情况下挑起冲突,因为这将会使冲突成为一场毁灭性战争。但是,如果我们有力量击败苏联为了有限目标的进攻,其利很可能大于弊,因为我们又可能制止一场全球战争。我们使用武力的目标,必须是为了强制对方接受与我们目标相一致的条件;因此,我们使用武力的能力必须与我们能否长期坚持的限度相匹配,同时也应该与我们面对任务的范围相匹配。

## 五、苏联的意图和能力——现实的和潜在的

### A. 政治方面和心理方面

克里姆林宫谋求世界统治权的计划始于国内。独裁统治者首先关心的是保障它的力量和权威在国内的基础。铁幕将苏联人民与世隔绝,苏联[政权]在国内不断进行着政治大清洗,国家内务部实行着制度化、组织化的犯罪。这些都是说明克里姆林宫感到国内不安全的证据;“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压控制力,全部用于在经济、生活方式和人们的意识上强加其绝对的权威”<sup>①</sup>的这些做法,较从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通过东欧卫星国里类似的证据也可以导出

---

① 原文中注摘自维辛斯基《苏联国家法律[The Law of the Soviet State]》第74页。

这样一个结论：这种同样的政策，尽管尚处在初级阶段，已然实行于克里姆林宫的[海外]殖民地上。

作为集权主义者的独裁政府，克里姆林宫实施这些政策中的目标是让人民从现在起在主观上完全服从于它的控制。集中营就是由这些政策所塑造的社会的典范，在这种社会里，人的人格变得如此支离破碎和反常，以至于他用自我贬抑的方式义无反顾地在这个社会中生活。

克里姆林宫对在其控制以外地区的政策是，消灭对它意志的反抗，扩张它的影响和控制。之所以遵循这样的政策，是鉴于在第四章中所列举的原因，它无法容忍自由社会存在，即便是最为温和、并且无害的自由社会对它来说也是一个冒犯、一个挑战，并意味着具有破坏性的影响。考虑到克里姆林宫的性质以及我们所收集的证据，这一政策所指向的目的，很明显与那些在已建立起控制的区域实行的如出一辙。

在追求这个政策的过程中，唯一能限制克里姆林宫使用何种手段是其对利弊的分析。信条(doctrine)不是个限制因素，它只是指导其使用暴力、颠覆、欺诈等手段，并拒绝考虑道义。由于克里姆林宫坚信自己不可战胜，并在任何情况下都主观地忠实于理论，以至于其过去的或现在的宣言、条约都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判断其将来的行动提供可靠的指导。在使用战争这个手段上，对其唯一明显的限制就是对可行性的估量。

关于美国，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是基于其对美国战略和策略层面上对其产生影响的判断：我们不仅是摆在它和世界领导权之间的最大的障碍，而且还是唯一能从自由世界和苏联世界中释放出对它具有破坏性力量的国家。因而，克里姆林宫的对美政策被一种奇特的对美仇视和害怕的混合情感所驱动。它的战略是：在我们这个国家和自由世界其他国家里(这些国家是我们实力基础之所在)，竭力破坏我们的综合力量。在这当中，它既坚持条约文本，又遵循一条对其有利的原则——冒最小的风险、受最少的约束，力

求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目前这一战略的使用，是俄罗斯传统的谨小慎微心理的新的表现形式。然而，根据苏联的理论或实践，我们还没有理由确定：一旦克里姆林宫确信它可以通过最后的突然一击而促使我们败亡，它仍不会去那样做。

在考虑苏联集团的潜在能力时，必须记住的重要一点是：与我们相反，他们正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几近可能的最大限度。同样与我们不同，苏联能用较少的投入办更多的事——它的生活水平比较低，所需不多就能令经济保持运作，即使装备与[官僚]机构不够精巧，军事机器也能有效运转。

由于克里姆林宫无可避免的好战态度，苏联世界的能力正被充分利用。它之所以如此无可救药的好战，是因为它既控制了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运动，同时也为世界革命运动所控制；因为它是俄帝国主义的继承人；还因为它是集权主义者的专制统治。持续的危机、冲突和扩张就是克里姆林宫好战精神的本质表现。这个推动力使苏联所有的能力得以强化。

克里姆林宫明显的力量之源是两个庞大的机构：共产党组织和秘密警察。在党内，克里姆林宫拥有一个在国内专门强化意识形态统一性的机制，在国外则作为宣传、颠覆和进行间谍活动的工具。在其警察组织中，它有一个国内的镇压工具，以保证在目前情况下克里姆林宫的长期安全。这两个基础组织的行动，不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大规模的或是通过单独的代理人进行，它们所表现出的潜力都是史无前例的。「共产」党、警察和苏联引人注目的军事机器这三位一体的结合，就在自由世界的众多民众中造成了一个[西方世界]无法与苏联的实力相抗衡的总体印象。

克里姆林宫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众多主张，构成它另一个巨大的力量来源。尽管苏联世界中受到控制的独裁者们如果不是讥笑挖苦，至少也是以冷漠的眼光看待[克里姆林宫]把苏联体制与共产主义[运动]一体化、推行所谓和平运动以及成为殖民

地人民代言人等一系列活动，但是自由世界中比较脆弱的国家与地区却有可能被〔克里姆林宫〕的这些“主义”所吸引、所迷惑。这些“主义”特别是在亚洲找到了一个响应者<sup>①</sup>。尤其是当这些亚洲人看到苏联是如何令人信服地从一个落后的社会变为世界大国之一所取得的飞速进步时，便会对这些“主义”留下深刻的印象。由此，在其宣扬要成为新的普世信仰的源泉和模范“科学”社会时，克里姆林宫却玩世不恭地利用广大人民〔渴望进步〕的真诚愿望，当起国际〔进步〕运动的领头人，并据此攫取其中的一切好处。

最后，我们还应该考虑〔克里姆林宫〕的另一种潜力，严格地讲，既非源于制度，也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无关，即：苏联在策略层面上出奇的灵活性的确已成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主要由于苏联政策行为的机会主义性和非道德性。将这种完全无道德限制的机会主义行径与其秘密行事、暗箱操作的特色相结合，克里姆林宫就具有了让人难以应对的能力，它可以在最广阔的战略空间内，用秘密行动的方式，快速开展行动。

克里姆林宫最大的薄弱之处就在于它同苏联人民的关系的基本性质。

这种关系的特征表现为普遍的猜疑、惊恐和指责。在这种关系里，克里姆林宫不仅是为了它的权力，也是为了它能继续生存，而依赖于被发明出来的复杂的高压统治体制。因此，整个苏联结成了铁板一块正是依靠它外圈的铁幕和内部的铁窗，而非由于任何自然的凝聚力。这些人为的一统机制从未受到外界强力的挑战，因此，它脆弱到何种程度还并不清楚。

苏联同它的卫星国和这些国家人民的关系同样是其脆弱的另一面。民族主义依然是能对政治情绪起影响的强力因素。然而，克里姆林宫过分地要求它的卫星国不仅接受莫斯科的无上权威，

<sup>①</sup> 这里指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译者注。

而且坚信并正式宣布接受其在意识形态上的首要地位和克里姆林宫的不可战胜，这些行径与臭名昭著的殖民主义罪恶相混合。当然，这些过分要求只有通过极大的强制才能得以实现。据此，如果一个卫星国感到它能够实现相对于克里姆林宫的独立，正如铁托所做的那样，那它就很有可能与苏联反目。

简而言之，苏联的思想和实践，都是与人类最美好的、最强的潜在本能与追求相背道而驰的。它剥夺了人类最基本的希望。如果在面临一个积极肯定人类富有建设性和充满希望的本能，并能实现人们基本期望的对手时，苏联体制将被证明是不堪一击的。

斯大林的继承权问题也是克里姆林宫的薄弱环节。在一个通过暴力与恐吓来获得无上权利的体制中，权力过渡很可能会导致一段时期的不稳定。

从真正意义上讲，克里姆林宫受制于它自身的推动力。如果[克里姆林宫]在进一步的强行扩张中遇上了能够实施反压力而令其不得不停止扩张的强大对手而受到挫败，那么，[苏联的]这种推动力就会成为一个不利因素。然而，克里姆林宫却不能缓和危机或松懈军事动员，因为这么做将导致自身推动力的丧失，从而使苏联体制内部衰退和消亡的种子开花、结果。

当然，克里姆林宫意识到了这些弱点，但同时它也十分确信，在当前世界局势下，这些弱点的制约性只能是第二位的。只要克里姆林宫保持主动进攻态势，只要它一直进攻的政策未受到一个明显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占优势的反对力量的挑战，那么，它的弱点大部分都将无法产生作用，甚至还会被它的成功所掩盖。克里姆林宫还没有真正的理由去担心，或由于体制内部的枯朽而关注这些弱点。

## B. 经济方面

克里姆林宫任何经济意图都是与其总体政策相联系的。在苏维埃统治的世界里，经济本身并不是一个目的。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即使是和经济有关，也是意在将经济发展用于增强整体实力，

尤其是增强苏联制度下制造战争的能力。独裁者的物质利益是严格服从于其制度的利益的。

关于能力,即便对苏联的生产报告做最乐观的估计,苏联总体经济实力与美国相比仍大致为 1 : 4;这不仅反映在国民生产总值上(1949 年,苏联为 650 亿美元,美国为 2 500 亿美元),而且还反映在 1949 年重要物资的产出上:

	美 国	苏 联	苏联及其东欧国总和
钢锭(百万吨)	80.4	21.5	28.0
原铝(千吨)	617.6	130—135	140—145
电力(10 亿千瓦时)	410	72	112
原油(met 百万吨)	276.5	33.0	38.9

假设美国维持目前的政策并仍可能保持现有的优势,苏联将会通过对某些产业持续并相对于美国更多的资本投入,而有可能使它与美国经济整体实力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

倘若美国全力以赴[与苏竞赛],则将能够迅速转变这种趋势。今日之苏联,是建立在发展生产几近极限的基础之上的。不论莫斯科做出怎样的努力,也只能对其总体生产水平带来微不足道的增量。然而在美国,一种绝对的快速[经济]增长则完全可能实现。不过,存在这样一种事实:只要苏联已经完全真正动员起来,而美国至今为止尚未开始积蓄力量,那么,在力量之争中,美国实力的强大与优势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起作用的。此外,苏联获得核能力已经证明,至少在和平时期,专制国家能比其他民主国家都更容易的将其力量集中投入到任何指定的发展计划中去。

苏美之间在其他领域——包括总体技术能力,劳动力资源的熟练度,劳动生产率等——的差距与其在生产力方面的差距是一

致的。但是在科学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当苏联能利用欧洲技术与人才的条件下，美国所具有优势的大小尚难以确定。

### C. 军事方面

苏联为实现其统治全球的构想，正在全力发展军事力量。事实上，苏联拥有的武装力量远远超过保护其国家领土所需的力量。当然，苏联很可能认为这些武装力量仍不足以发动一场将迫使美国卷入其中的战争。但在和平时期，这些过多的力量加上刚刚发展的核能力，一方面给苏联实现其目标提供了强大的施压力量，另一方面也可被[克里姆林宫]用以威慑它的侵略对象不得采取任何抵抗苏联和冒可能的战争风险的行动。

假定 1950 年会爆发战争，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苏联和它的卫星国现已准备充分，能够突然发动或进行下列攻击：

- a. 侵占西欧，但可能不包括伊比利亚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内，向原油产地近东和中东开进，巩固共产主义在远东的利益；
- b. 对大不列颠岛发动空袭，对在大西洋和太平洋西方国家的交通线实施空中和海上打击；
- c. 对经过选择的目标实施核打击，现在这种打击可能包括对在阿拉斯加、加拿大、美国等地的目标。另一方面，这种核打击可能采取在其他行动的配合下，将会剥夺英国作为有效的联盟军事力量行动基地的功用。对苏联而言，它还应有能力阻止任何类似“诺曼底”的、意在强行重新进入欧洲大陆的两栖联合行动。

在苏联完成战争发起阶段，并巩固了对西欧的控制之后，它能同时进行以下行动：

- e. 对大不列颠岛实施全方位空袭和有限的海上攻击；
- f. 入侵伊比利亚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 g. 在近东和远东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继续进行北美大陆的空中打击和对大西洋、太平洋交通线的空中和海上攻击；

h. 在其他地区进行牵制性的军事进攻。

在上面第二、第三段列出的进攻行动当中,苏联同时具有对自身和它所控制的卫星国大片领土的空中防御能力,这一能力足以抵抗——虽无法阻止——盟军对它们的空中打击。

目前尚不能确定,在保障其卫星国军队甚至是自己的军队进行长期作战方面,苏联是否拥有足够的军力储备和军需供应能力。由于还存在着卫星国反叛的可能性,苏联可能不会全面装备卫星国的军队,因为这样做对其自身不利。

对由于[美国]在执行 1948 年经过修正的“经济合作法案 [Economic Cooperation Act]”以及 1949 年的“共同防御协助法案 [Mutual Defense Assistance Act]”过程中,所逐渐产生和积累的针对苏联的不利因素,目前还很难做出正确的评估。但应该能预见到,随着这两个[计划]的实施,接受[援助]国的内部安全状况会因此得到不断改善。另外,由于美国强硬的军事立场,以及随着西欧国家军事装备的逐渐增加,西欧诸国抵抗苏联行动的决心应该增强,以至在战端开启之时,得以拖延[苏联军事]行动和全面占领西欧所需的时间。尽管美国的支持坚定了这些国家的决心,但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目前的援助方案对这些国家军备的增加,不会在 1952 年之前发挥任何重要作用。除非西欧国家的军力因为比目前计划更大、更快的援助而得以极大的提高,这些国家即使到 1960 年也无法具备战时有效抗衡苏联的军事力量的可能性非常大。考虑到苏联的军事实力,西欧盟军长期的军事目标必须以增强该地区军事力量为前提,而对该地区军事力量的增强必须达到:足以威慑苏联不敢发动一场大战,或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拖延苏联对西欧的占领,或者在可能的情况下,能在欧洲大陆建立一个抵抗苏联进攻的桥头堡。

我们无法确知苏联具体的核能力。但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人员判断(其意见与政府、陆军、海军、空军以及核能委员会均相一致),苏联生产和储备裂变炸弹的能力将会在下列范围之内:

1950 中期	10—20 枚
1951 中期	25—45 枚
1952 中期	45—90 枚
1953 中期	70—135 枚
1954 中期	200 枚

必须承认,这个判断是建立在对苏联活动尚不全面的观察之上的,仅代表了众所周知或可以推断的苏联工厂的生产能力。但如果[苏联]还存在其他的能力,那么,这种估计将误导我们,使我们对自己的核储备量产生优越感,尤其对苏联可能发动攻击的时机估计错误。反之,如果苏联在运作过程中遇到困难,那么,这个估计便会显得过高。已有一些证据表明,苏联正在竭力获得对于研究和发展热核武器至为核心的某种材料。

苏联现已拥有能投送核弹的飞机。我们的情报人员估计,苏联现有的核弹投送能力,已远远超过运送其现有核弹所需的能力。苏联对目标投放的精确度,目前我们还没有确切的评估。但一般都认为,苏联向目标投弹的精确度是无法与我们相比的,但正在计划中的一个评估很可能得出击中目标与投放弹数相比为 40%—60% 命中率的结论。因此,苏联拥有的核弹储备达到 200 枚之日,便是对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之时。这是因为如果[苏联]对美国的目标投放 100 枚核弹就足以对这个国家造成严重破坏。

目前,苏联拥有相当数量的核储备。如果假设它将实施强力突然袭击,再进一步假设它的核打击,除了美国及其盟国目前制定的防御计划外,将不会遇到更为有效的抵抗,那么,这些进攻造成的后果将包括:

- a. 核废料堆放在大不列颠岛上,以至于西方诸国无法再将它

当成基地来使用；

- b. 对西欧重要的中心地区和交通线的破坏，解除了西方力量的有效防御；
- c. 对美国和加拿大的至关重要的区域施行破坏性打击。

此外，如果苏联在其可观的核储备基础上再拥有热核武器，那么，它导致的破坏将大大增加。

在这十年中，苏联的防御能力将有可能增强，尤其是通过发展和使用现代航空技术，空中预警和通讯装置，以及防御制导武器等。

## 六、美国的意图和能力——现实的和潜在的

### A. 政治上和心理上

我们现在设计的总政策可以描绘为构建一个使美国制度能够生存和繁荣的世界环境。因此，它拒绝孤立原则，确认我们积极介入国际社会[事务]的必要性。

这个总目标包括两个辅助政策。一是致力于发展一个健康的国际社会的政策，对此，即使没有苏联威胁，我们也应当实行。其次则是遏制苏联体系的政策。这两个政策紧密相关，而且相互支撑。当然，它们之间的差异基本上是确定的，并有助于更清楚地了解我们正在从事的努力。

实施发展一个健康的国际社会的政策是为了[我们]长期的建设性事业，对此，我们已经开始进行了。正是这个政策使我们成为联合国的强有力发起者。当然，它也是我们长期努力创造和发展美洲国家体系的主要原因。像遏制政策一样，它是我们重建西欧的努力基础。我们大多数的国际经济活动同样都可以按此政策的意义来解释。

在一个权力两极分化的世界上，旨在发展一个健康的国际社会的政策，对我们的力量而言，远比任何时候更为必要。

至于遏制政策,它是运用除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来实现如下的目标:(1)阻止苏联力量的进一步扩张;(2)揭露苏联意图的虚伪;(3)诱使克里姆林宫收敛其控制和势力;(4)培养苏联体系内破坏性的种子,迫使克里姆林宫至少要把它的行为限制在适合于国际准则的范围内。

我们依靠的是自己的实力优势和与我们价值观一致的其他国家的可靠联盟,过去是、将来也是执行上述政策的基点。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军事力量。遏制的理念要求必须保持强大的军事姿态,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1)这是我国安全的最终保证;(2)是实行遏制政策的必不可少的后盾。遏制,实际上是一种深思熟虑的逐步施加高压的政策,假如没有精良的、随时可动用的军事力量作为支撑,那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恐吓的政策。

同时,我们要时常准备与苏联谈判,这对成功地执行遏制政策也是必要的。我们现在所处的外交僵局正倾向于破坏遏制的目标,因为它在增强了紧张程度的同时,使得苏联的收敛和调整更加困难。此外,它限制了我们的主动性,并剥夺了我们与苏联体系进行斗争时发挥道德优势的机会。

在实施遏制政策中,[我们应]尽可能避免直接向苏联的权威挑战,使苏联在压力面前退却,但尽可能少丢面子,并从它的退却或利用我们给它留下的机会中捞取政治利益。这是施加压力的最好的方法。

我们对遏制的这两个基本方面执行得不够准确。在迅猛增强的苏联军事力量面前,我们的军事力量相对下降了。正因为这个和其他的原因,现在我们发现自己针对苏联的外交陷入了僵局,以致克里姆林宫的野心越来越大,双方都紧紧抓住自己的利益,我们的决策面临困难。

在考察我们能力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有一个相关的问题——这些能力用来干什么?这个回答不能只是消极表述为反对克里姆

林宫的企图。它同时还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为了实现美国的根本目标，二是为了构建一个我们的自由社会能够生存和繁荣的国际环境。

我们是具备这些潜力的，我们知道这些潜力存在于经济和军事领域之中，同时也包括政治和心理方面。绝大多数美国人都相信，激励我们社会的价值体系——自由、宽容、个人重要性以及理智高于意愿等原则——是正当的，较之于苏联行动的动力源更为正当。若把它转换成与其他民族人民的生活相关的原则，那么，我们的价值体系，对那些数以百万计的、仍在权威主义里寻找着能够摆脱忧虑、困惑和不安的避难所的人们，或许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毋庸置疑的是，我们的民主制度也具有团结人民的特性。事实上，我们的社会[结构]比苏联制度更具有凝聚力。这是因为苏联制度下的团结一致是通过强迫、恐怖和恩惠等手段人为造成的。这也说明在我们社会中，表现出的全民共识有着稳固而又坚实的基础。这也进一步显示在美国发生革命的可能性，远低于处于苏联制度控制下的地区。

这些能力构成了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强大的潜在力量。我们本身所具有的潜力，有力支持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价值观，并能够有效地向世界其他国家展示我们制度的生命力。我们的世界观本质上的宽容，我们的慷慨大方，我们的积极进取，以及我们在国际关系中的不图私利，都是我们潜在的、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因素。

以上就是我们潜在的能力。在我们的潜在力量和目前实际使用的力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表明我们的很多力量尚未得以实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世界的情况。它的能力是逊于我们和我们盟国的，但是它将这些能力都调动起来，并几乎发挥到极限。

只有经过传统的民主进程才能使美国人民的无穷力量得以充

分发挥：这一进程要求，首先，必须将目前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状况的大量信息公诸于众，并保证它们真实可靠，那样才能形成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明智的公众意见。在充分理解我们共和国所面临的事态后，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才有可能达成共识。只有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产生代表国家意志的决心，才能将这种决心清晰地、毫不犹豫地表达出来。当然，只有政府采取主动才能启动这一进程。

民主道路比独裁道路更难走。这是因为：在寻求保护和实现个人权利的过程当中，民主道路要求个人能理解、判断、积极参与到日渐复杂的现代社会及其存在的问题当中；要求他能够在以下情况中运用自己的辨别力：即在通过自由言论来寻求真理时，个人知道何时应该信守原则，并将必要的容忍和必需的强制区别开来。自由社会是脆弱的，因为人们的行为很容易过头：思想过度开放，就会一相情愿地期待着罪恶的构想变成高尚的目的；坚持信念过了头就会形成对其他的可能视而不见；过度容忍就滑入对阴谋纵容的歧途；当更多稳健的措施不仅更适合，而且也更有效的时候，却过多地诉诸暴力。

面对行事秘密却行动迅速的独裁政府时，我们同样显得脆弱。这是因为民主进程必须公开，并按既定程序进行。我们的弱点目前已暴露无遗，因而极易被对手利用。因此，在面对独裁挑战之时，我国政府不应只在较小的力量范围内行动。民主只有在获得了毫无疑义的全面优势力量时，才能够弥补它本身的脆弱性。

在同我们盟国关系的某些方面，同样也正是这个制度的优点阻碍了我们。与强制和屈服相比较而言，我们与盟国是在说服和赞同的基础上发展关系的——这是我们的力量源泉。但显而易见的是，一旦我们与盟国出现了分歧，这将成为我们的一个弱点。有时，这种分歧源自于我们无法控制的外部；有时，又来自于我们的内部，例如我们自身的急躁，以及对那些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人期望

过高缺陷,对此,我们可以有所作为。

自由世界内其他国家的整体力量,是对我们自身能力的潜在补充。甚至还可以说,苏联世界的能力,特别是那些失去苏联的束缚和压迫的人民的能力,最终也可被我所利用。

正如我们自身的力量超过苏联一样,自由世界其他国家的能力也大于苏联集团内其他国家的力量;但这些力量也同我们的一样,尚未能有效调动起来,以用到反对克里姆林宫企图的斗争中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自由世界的其他国家缺乏联合的意识、信心和共同的目标。即使是在自由世界中最有共同性、最为发达的地区——西欧,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

正如我们展示了自己的实力、自信、道义感和政治方向一样,这些物质[力量]同样也将在西欧被动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期待拉美、亚洲和非洲等国家的政治口吻将有一个极大的转变和提高,也可以期待苏联的独裁者会开始真正的醒悟。

若没有我们坚定的决心,自由世界的其他国家几乎必然要出现意志消沉、士气下降的情形。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盟友不仅会成为我们的负担,而且最终会使苏联的力量加大。

总的说来,盟国的能力消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发挥作用。如果我们下定决心,不仅能在我国内部聚集起潜力,而且会调动其他国家的内在潜力,并使这些力量为我方利用。

## B. 经济方面

### 1. 能力

与苏联集团的战时经济相反(参看第五章 V - B),美国经济(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由世界的经济)目前的目标,旨在提高生活水平。美国军费预算只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6%—7%(而苏联为 13.8%)。1949 年,我们北大西洋组织成员国只将国民生产总值的 4.8% 用于军事目的。

两种经济不同的侧重点意味着,自由世界准备一场战争的

战备状况，与苏联相比，在走下坡路。[我们]在军用终端产品与设备的生产与分配上的直接投资几乎为零。我们接受军事训练的人相对也很少，武器生产率也不高。不过，如果给予美国和西欧经济足够的时间以转换到战争状态，那么，我们的能力将是极大的。考虑到苏联的军事能力，[我们]则存在这样一个直接与战争胜负相关联的重要问题，即：一旦战争发生，我们是否有时间动员我们优势的人力、物力资源投入战争。（参看第8、第9章）

美国用以支持国内经济、军事实力增强并协助国外[盟友]的军备重整的经济能力，不会像苏联那样受到生产能力低下的限制，而[唯一的]限制只是[我们]是否决定为了上述或其他目的对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只要打下公众的理解和意愿的必要基础，只要能够提供用于应付财政赤字的援助，即便是西欧也能将资源的较大部分用于防御。

一些统计值将有助于阐明这一观点：（表1）

表1 东西方1949年用于投资总和、国家防务以及消费品的资源总量份额(均为百分比)

国 家	投资总和	国 防	消 费
苏 联	25.4	13.8	60.8
苏联势力范围	22.0a	4.0b	74.0a
美 国	13.6	6.5	79.9
欧洲北约成员国	20.4	4.8	74.8

a 为大致估计[参照原文件注释]

b 包括苏联占领德国的部分；否则为5%[参照原文件注释]

现在苏联将其可利用全部资源的近40%用于军事目的的投资，很大一部分用在了支持战争的军工企业上。据估计，即使出现

紧急情况，苏联也无法将这一数字提高到 50% 以上，也无法以 25% 的幅度增长。而美国仅把大约 20% 的资源用于防卫和投资（加上对外援助则为 22%），而且投资也极少用在军事工业。在紧急时刻，美国能动用超过 50% 的资源用于军事目的和对外援助，或是目前数量的 5—6 倍。

通过对重要产品使用的统计也能证明同样的观点。苏联目前把钢锭生产总量的 14%、原铝的 47%、原油的 18.5% 用于军事目的，而美国使用的相应比例为 1.7%、8.6% 和 5.6%。对这些材料，除了美国比苏联的产量更大之外，苏联用于军事目的的资源实际消耗量也远远超过美国：如，钢几乎是美国的两倍，铝则要多用 8%—26%。

关于自由世界明显比苏联集团具有更大的经济优势的最具说服力，大概是下列依据我们对所拥有数据的比较分析。这种判断是建立在可靠的比较数据基础之上的（主要依据 1948 年的《欧洲经济观察》）。（表 2）

表 2 东西方经济能力的比较数值统计

	美国 1948 — 1949	欧洲北 约国家 1948 — 1949	总 计	苏联 1950 年 计划	卫星国 1948 — 1949	总 计
人口(百万)	149	173	322	198a	75	273
在非农业机构的就业率(百万)	45	—	—	31a	—	—
国民生产总值(十亿美元)	250	84	374	65	21	86
人均国民收入(美元)	1 700	480	1 040	330	280	315
生产量 b						

(续表)

	美国 1948 — 1949	欧洲北 约国家 1948 — 1949	总 计	苏联 1950年 计划	卫星国 1948 — 1949	总 计
煤(百万吨)	582	306	888	250	88	338
电力(十亿千瓦时)	356	124	480	82	15	97
原油(百万吨)	277	1	278	35	5	40
生铁(百万吨)	55	24	79	19.5	3.2	22.7
钢(百万吨)	80	32	112	25	6	31
水泥(百万吨)	35	21	56	10.5	2.1	12.6
汽车(千辆)	5 273	580	5 853	500	25	525

a 为 1949 年数据[参照原文件注释]

b 对欧洲北约成员国和苏联卫星国而言,该数量包括主要生产者的产量  
[参照原文件注释]

应该指出,这些比较统计并未充分表现出北约成员国的相对水平,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1)加拿大被排除在外,因为缺乏该国相关的数据;(2)苏联的数据是 1950 年制定的目标(在第四个五年计划中提出的),超过了它的实际生产率,并被认为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了它实际的产量;(3)欧洲北约成员国的数据是 1948 年的真实数据,但从那时起,这些国家的产量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

不但如此,美国还能够取得产量的绝对增长,由此为加强自身以及盟国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增加资源配置,而不致使现实生活水平下降。在 1948 年第一个季度和 1949 年第四个季度之间,工业品产量以 10% 的幅度下降;1944 年和 1949 年间大约以 25% 的速

度下降；至 1950 年大约有 475 万失业者，而 1943 年和 1944 年失业人数分别为 107 万和 67 万。国民生产总值从 1948 年达到顶峰时期（1948 年为 2 620 亿美元，在 1949 年下半年则为 2 560 亿美元），到 1949 年开始缓慢下降。1944 和 1948 年间，就固定价格而言，则大约下降了 20%。

经济活动一旦恢复高水平的运转，正如总统《经济报告》（1950 年 1 月）指出的那样，美国很快就能拥有每年 3 000 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经济]取得这个方向的进展，将会允许我们致力于美国和自由世界经济军事力量的增强，而后者也会对前者有推动作用。更进一步讲，如果能实现经济飞速发展，我们将无需降低国民生活水平以使力量得到增强，只需从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加值之中抽出一部分为[军力增长]所需的资源。在考虑美国所能采取的行动时，这些事实都是需要予以重视的（参看第九章）。

## 2. 意图

对外经济政策是施行美国对外关系的一个主要手段。这种手段能按照有利于本国安全和福利的方式，有力地影响世界环境，但如果这种手段考虑不周或使用不当，则会危害到我国家利益。它是一种特别适合于我们能力的手段，前提是坚持自己的目的，并就实现这种潜力形成共识。最后，它还是一个极适合于冷战状态的手段。

上述分析已说明，在挫败克里姆林宫企图的计划中，一个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在自由国家中发展成功运作的体制。很明显，经济条件是我们反抗苏联的颠覆和侵略所需意志与力量的基本要素。

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就是为了帮助在自由世界中建立这样的制度和条件。这个政策的基本特征简述如下：

（1）帮助欧洲复兴并建立一种欣欣向荣的经济（欧洲经济复兴计划）；

（2）帮助其他那些由于战争或冷战而产生特殊需要且我们在那儿有特殊利益并有责任满足它们的要求的国家。（如给予日本、

菲律宾和朝鲜的经济援助,以及由进出口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印度尼西亚、南斯拉夫、伊朗等国提供的信贷。)

(3) 帮助发展落后的地区(如第四点计划和向众多国家——与在第2点中提到的国家有些重复——提供的借款和信贷);

(4) 对北约成员国、希腊、土耳其等国提供军事援助;

(5) 在东西方贸易中,限制向东方出售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货物;

(6) 购买和储备战略物资;

(7) 致力于重建一个基于多边贸易、关税壁垒降低和货币可自由兑换的国际经济(例如关贸总协定—国际贸易组织计划,互补贸易协定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与发展银行的计划和用于解决美国国际收支平衡问题的计划)。

从短期和长远方面来看,这些政策计划均意在增强自由世界的能力,继而为了挫败克里姆林宫的企图。除了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一致和不协调之外(我们正把这些问题与美国收支平衡问题联系起来研究),从总体上讲,美国在实施一种有力支持其全部目标的对外经济政策。但无论如何都需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考虑到各种不同的需要与突发情况时,现行的和目前制定出的计划,将来能否充分支持这一政策。

在经济领域,去年不是[双方力量对比]决定性的一年。苏联在将东欧卫星国的经济整合到本国经济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仍面临诸多困难,尤其是和中国的关系。而自由国家的很多成就也可圈可点,但未来所面临的问题同样十分严重。客观地说,没有一方能够宣称,在这一领域,它已拥有较一年前具有更大的优势。因此,“未来发展趋势如何”便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对此,似乎可以得出好几种结论。第一,苏联将其备战和自由世界非备战状况之间的差距正在人为地扩大。较之自由国家,苏联把资源的更大部分用于军事目的,特别是针对军事力量的重要

成分，苏联投入的绝对量更大<sup>①</sup>。第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加上南亚和东南亚其他区域的政治经济状况，都为共产主义在这个多事之地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了跳板。共产党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给苏联经济增加一些负担；但由于该地区自由国家所面临着社会和经济问题，这可能为共产主义扩张提供更为有利的机会。第三，苏联在欧洲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如果它巧妙地利用这种地位，那就会极大危害西欧经济，使得一些特定的国家尤其是德国和奥地利保持倾向西方的努力难以为继。第四，除了（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因为）铁托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行为以外，苏联加速了将其卫星国经济纳入自身经济体系之中，而提高受其控制下的这一区域的自给自足程度。

第五，与此同时，西欧在美国人（以及加拿大人）的帮助下，达到了空前的生产水平，但面临着美国援助将会迅速减少的前景，而这种减少是在西欧只靠自身努力仍无法达到与美元地区相近的发展水平之前。在“经济一体化”方面，它也进展缓慢。而这种一体化会在很长时期内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并提供有利于政治稳定的经济环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种一体化运动进展不够快，以至于无法为联邦德国提供在西方的确切的经济机会。英国仍面临着经济问题，若要解决这些问题，这可能要求英国克服政治上的困难而降低其生活水平，或是得到比预期更多的美国援助。同时，如果[我们]希望继续保持英联邦国家的稳定，并使其在南亚或东南亚作为反抗共产主义扩张的中心，那么，英国的地位就有必要加强。此外，英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对于构建西欧防卫能力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第六，亚洲一些目前还算温和的政府，虽比起该国政权任何可能的继任者来说可能更认同我们的目标，但是这些政府的稳定性是值得怀疑的。经济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对其经济发展援助只是

<sup>①</sup> 原文中为斜体，以示强调—译者注。

作为一种手段,其重要作用是给予亚洲人民在本国政府统治下提高生活水平抱以希望。但更重要的措施可能还在于加强中央机构,改善经营管理,发展完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以保证在这个结构中,亚洲人民能更有效的利用他们庞大的人力、物力资源。

第七,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有迹象表明,[美国的受援国正在对]我们由于国内财政压力而逐渐收缩对外援助表现出失望,对由于过度乐观地估计[我们的]原则规模与持续时间产生绝望,并对[我们]在激化的冷战背景下持续加强自由世界备战能力的理性与否表示怀疑。

第八,有理由推测,在未来几年的时间内,除非能有比目前实施的计划更为积极的政府方案出台,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将经历经济活动上的严重衰退。

简而言之,如果展望未来,那么目前制定的计划是不能满足自由国家的需求的。造成困难的原因,并非在于政策不准确或是犯方向性错误,而是在于为了达到目的所制定的政策在出台时间与影响上的不充分。在下一章,我们会谈到这种状况固有的风险和将采取的行动。而如何让我们重整旗鼓,以扭转目前的趋势和实现我们提到的基本目标,将在第9章中简述。

### C. 军事方面

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单一的国家相比,美国拥有最大的军事潜力。然而,美国相对苏联所具有的军事弱点包括现存力量和总人力方面存在数量上的劣势。在现存力量处于弱势的同时,美国还缺乏一个在战时可以利用的永久性战略基地,以便于运用现存的和即刻可以使用的力量和武器装备。

的确,美国武装力量确实比以往任何和平时期都强大,但是我们拥有的军事力量与我们承担的义务是极不相称的。同时,我们的力量与目前承担的义务之间的关系,并非是指导[我们政策制定]的唯一因素。世界局势与[我们的]义务一样,也是指导性因素。由此,应该将我们的军事力量与我们面临的世界局势更为正

确地联系在一起。如果把这两者联系到一起考虑，并以世界局势[的变化]权衡我们的军力，很明显，我们的军事力量就变得极不充分了。

如果战争会在 1950 年打响，那时美国和盟国将有进行防御行动的军事力量，以便提供可靠的措施来保护西半球，以及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基地和重要的军事交通线；尽管不太充分，[我们]仍将有能力保护在[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近东和中东的重要军事基地。我们也将有能力对苏联制造战争能力的战略要点实施强有力的空中打击。

与苏联相比，美国和盟国目前具有的各种有效力量和物质资源的水平，限制了上一段提到的行动规模。为了使之与我们面临的侵略威胁和总体战略计划相一致，只要在不损害到自身采取行动所必需的物质条件下，美国必须尽可能地向盟国提供大量的、不间断的军事援助。

如果美国和盟国的潜在军事力量得以迅速有效的发展，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拥有足够的力量来威慑战争，或者，如果苏联选择了战争，这种力量也足以反抗苏联最初的进攻，控制住其牵制性进攻行动，同时实施反击，以期对苏联的能力造成更大的破坏力和影响。但是，若从军事角度看，这不仅要求具备必要的军事力量，同时还要开发和储备各类先进武器。

在目前和平时期，我们还需要 2—3 年的时间来促进军事力量中物质方面的增长。如果一旦宣布出现紧急状态或在战争时期，通过实行全国力量总动员，我们能在更短的时期内增强这种力量。但是，任何和平时期力量的增强，不仅要考虑到在战争中这种力量的军事作用和是否符合美国推行的针对苏联当前和长期外交政策，还要考虑现时情况的实际。如果我们现在就采取行动以提高我们的军事力量，那么，美国就有能力消除在它的军事力量和面临的紧急状况二者间的失衡状态，最终获得“冷”战的主导权，以及在战争中，即便无法完全阻止苏联进攻，但至少也能极大地延缓其进

攻行动。

## 七、目前的危险

### A. 总体危险

综上所述,很清楚,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们制度的完整性和生命力处于前所未有的危险之中。即使没有苏联,我们也会面临自由所需要的调整秩序、安全、必要的参与等自由社会遇到的巨大问题,这些问题在工业时代增强了许多倍。我们应该面对这一现实,即在这个不断缩小的世界里,国家间的无序状态已经越来越无法让人忍受。克里姆林宫试图将它的秩序强加到各国头上,其结果必然是破坏我们自由和民主制度。而克里姆林宫拥有核武器这一事实,又为它的构想与企图注入新的力量,增大了对我们制度的威胁。这种情况给目前世界上存在的令人不安的、无序的均衡状态增加了新的压力,使人们产生了新的怀疑,即:这个世界是否能长期忍受这种紧张状态,而不至于只按某些人的意愿建立起某种秩序。

我们面临的这些危险具有新的规模,这与我们正在进行的全面斗争大致相称。对任何一个自由社会来说,从来就不可能取得彻底的胜利,因为我们还从未完整地获得过自由和民主,只是一直都处于对其追求的过程中;但是,如果被集权主义者所打败,那么[我们的]失败将是彻底的。在这个已经被分化、不断萎缩的世界里,这些危险在逼近我们,以致我们在有效的应付这些危险或被这些危险所制服这两者之间最终没有选择。

### B. 具体危险

从苏联的理论和实践中很清楚地看出,克里姆林宫企图用冷战的方法把自由世界置于其控制之下。他们惯用的技巧是通过渗透和威胁进行颠覆活动。我们社会的每一个机构都是它企图用来破坏和反对我们目标的工具。那些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物质和道德

力量的机构,显然是其首要目标,即:劳工联盟、民用企业、学校、教堂和所有影响舆论的宣传工具。诚然,他们的行为还没有达到使这些机构明显地服务于苏联的目的而不服务于我们的目的,从而尚未成为我们的经济、文化和国家混乱的根源。但是,按照我们的价值观,作为自由制度优越性组成部分的质疑和多样性,它所特有的弱点和问题,人们自由享受的权力和特有权力,随着对我们自由的最后进攻而来的混乱和破坏,所有这一切无不是克里姆林宫实现其邪恶目的的机会。由于我们的防御和报复手段受到一些原则和顾忌的限制而被(苏联)乘机获得好处,但正是这些原则和顾忌给了我们真实意义的自由和民主。我们的顾忌并不能阻止那些以“道德服务于革命”为唯一准则的人。

因为我们或其他尊重我们制度的人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克里姆林宫进攻的理想目标,所以这一起就列入了克里姆林宫的算计之中。在他们不受惩罚而我们会受凌辱的地方,他们都不会失其时机。因此,我们在 30 年代力图用来恢复经济活力而现在用来恢复自由世界经济活力的措施,同样受到攻击。我们力图用来帮助自由世界的军事援助,在上一次战争的初期就受到了共产主义者的疯狂谴责,当然,现在我们发展自己和盟国充足军事力量的努力也同样遭到谴责。

同时,为了进行威胁性的渗透,苏联正寻求建立独一无二的军事力量。在它所了解的力量的唯一意义中,它寻求向自由世界证明:力量和使用力量的意志在克里姆林宫方面,那些没有力量的人是废物,注定要灭亡。在地区事件中,为了地区性胜利和增加整个自由世界的恐惧与失败情绪,它进行威胁和包围。

对立的大国每一方都拥有原子武器,任何一方不会(出于不同原因)信任另一方,这就助长了对我们的突然袭击。它同样助长了更多的暴力行为,并通过冷战残酷地执行它的计划。特别是,如果克里姆林宫认真注意到我们不可能只进行防御战争的话。它还助长对其他国家的蚕食侵略,设想我们除非遭到直接进攻,否则不会

从事原子战争。我们要冒所有这些危险，并且要冒由于我们无法判断和选择，不能执行一条基于对每一方做出合理估价的坚定路线而增加的混乱和不能行动的危险。

因此而阻止或延误我们采取必要措施来保卫我们制度的完整性和生命力，这种危险是巨大的。我们的盟国将丧失决心的危险更大。在这种状态下逐步削弱我们，使我们成为强弩之末，并产生疑惑和反责，把我们的选择缩小到从未有过的狭小和绝望的境地，这是所有一切危险中最大的危险。例如，很清楚，我们现在的弱点使我们无法在任何一个至关重要的压力面前做出有效的反抗。我们向克里姆林宫施加的唯一威慑就是：我们会在任何一个我们不能控制其局面的关键问题上发动毁灭性的全球战争。

在任何一种压力面前，面临在投降或发动全球战争之间没有更好的选择，这种危险的本身是非常糟糕的，但是，它在冷战中强加给我们的软弱地位又使这种危险增加了许多倍。我们不是表现强大和决心，而是继续停在软弱和绝望的边缘，并正在变得软弱和绝望；然而，我们必须赢得冷战的胜利，因为克里姆林宫的计划和我们的基本目标都给予它以首要地位。

然而，要挫败克里姆林宫的构想，单靠我们是无法完成的。对此，我们将在第9章B节中分析。力量集于一个中心，集于美国，只是两个最为重要因素中的其中一个。第二个因素是，如何避免我们的盟国和潜在的盟国在挫折感和苏联的威吓之下走向中立，以致最后处于苏联的统治之下。如果在德国发生了这种情况，那么对整个西欧、最终对我们都将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诚然，要使我们自身变得强大，这也存在着危险。这要求美国人民作出巨大的牺牲和自我克制，他们将不得不放弃一些与它们的自由密切联系的福利。此外，没有什么能比取得他们的充分理解更为重要的了。反之，如果他们只是从表面上理解，或是对问题缺乏充分的认识，那么，我们面临的危险就非常明显了，以至于我们有可能采取一些措施，而危及我们制度的完整性。在我们表

明一定要实现基本目标的意志过程中的任何时刻，克里姆林宫都可能会决定发起一场全面战争，或为了考验我们而使用过分的手段。这些就是在使我们自身变得强大后有可能招致的危险，但是比起我们力求避免的那些危险来，只能算是小的了。我们缺乏维护我们基本目标的意愿，要比我们可能所犯的任何错误，或是我们为了表明意愿而实施的任何攻击行动，都更有可能使我们的基本目标遭受失败。历史上，没有任何人只是以证明自己无碍于他们的敌人，便能够保护他们的自由的。

## 八、核军备

### A. 对美国和苏联核力量的军事评估

1. 美国现已具备相当的核能力，包括颇具规模的数量和投弹能力。如果能得到有效利用，将足以对苏联发动战争的能力造成严重打击。然而，即使这种打击对预定目标系统造成了彻底破坏，是否会迫使苏联谈判，或者是否能阻止苏联在西欧目前能调动的地面力量的抵抗下占领西欧，尚不能确定。但是，不管怎样，率先的核攻击会削弱苏联对其军事机构和平民的供应和装备的能力，以便提供美国在持久战中能获得发展综合军事优势的可能。

2. 随着苏联核力量不断增长，它将具备越来越强的能力来袭击我们的核军事基地和设施，以此来严重削弱美国执行上述打击的能力。在不远的将来，苏联极有可能拥有数量众多的核弹和足够的投弹能力，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目前防空能力并不充分的英国，是否能作为前沿基地，以便美国可以用作主要发动进攻的依托？

据估计，在以后四年中，苏联将具备巨大的打击能力，只要它发动突然袭击，只要我们没有比现在制定的更有效的措施来阻止这种攻击的话，它将足以严重摧毁美国若干极为重要的中心地区。这种打击将对美国造成极大的破坏，以至大大削弱美国在经济方面的优势地位。

若要有效遏制苏联的核能力,除了其他措施之外,[美国必须]大大增强空中预警系统,防空体系,以及有效发展和使用已经和军事防御体系完全合而为一的民防工程。

只要无法排除苏联实施突然袭击的可能,或者只要我们不去改进现行的防御政策,那就存在着苏联率先实施核打击的可能性,而他们的核能力迟早会发展到这种程度。

3. 核战争的初期,采取主动行动与出其不意打击的优势很大。而一个生活在铁幕后面的警察国家,由于具有必要的安全保障与决策高度集中的优点,更易将这种优势发挥至顶点。

4. 此时此刻,我们的核报复能力大概足以阻止苏联对我们和其他自由国家蓄意发动军事进攻。但是,当它认为它有足够的核能力对我们实施突然进攻以削弱我们的核优势,并建立起对其极为有利的军事态势时,克里姆林宫可能会无法抵御[对我]实施快速而隐秘的打击行动的诱惑。处于这样一种关系当中的两个核大国,其结果,很可能不是遏制战争,而是引发战争。

5. 尽管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增加核武器的数量及威力来确保任何核报复的有效性,但这本身似乎并不能改变上述判断的基本逻辑。[所以,我们]有必要大大增强陆、海、空三军实力及防空和民防体系,以确保自由世界在苏联按计划于 1954 年发动进攻时能承受住苏联突然核打击所造成的重负,保证自由世界能继续实现既定目标。此以,加强上述力量,也将能保护和增强我们的反击能力,以致可能将苏联认为发动进攻最有利的时机推迟,从而使我们赢得额外的时间,以便我们促使苏联体制改变的政策发生效果。

6. 如果苏联在美国之前发展了热核武器,那么,整个自由世界遭到苏联日益增强的压力的威胁将大大增强,美国遭受进攻的危险也将大为增加。

7. 如果美国在苏联之前发展了热核武器,美国就能够暂时对苏联施加更大的压力。

## B. 核武器的储备和使用

1. 根据上述分析,如果能从和平时期的国家军备中有效地消除核武器,无疑将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在有效削减核武器的前提下所衍生的另外需要保证的[政策]目标,将在第 9 章中讨论。如果未能保证实现这种裁减和附加目标,那么,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像对待其他必须考虑的事一样尽快发展核力量。然而,不管从哪方面看,我们都必须尽快增强陆、海、空力量,同时把我们盟国的陆、海、空力量也提高到一定的程度,使我们在军事上摆脱对核武器的深度依赖。

2. 如我们在第 4 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很重要的一点是,只有使用核武器的必要性十分明确,形势迫不得已,并得到我们绝大多数人民同意的情况下,美国才能够动用这种军事力量。除非是把动用武力作为对侵略的反应,同时侵略必须是明白无误、迫在眉睫并取得绝大多数人民对使用武力的支持,否则美国是不能介入战争的。一旦战争到来,我们若要动武,就必须是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而且我们动用武力的程度,必须与我们可能面临的任务范围相一致。

在与苏联的全面战争中,[我们]必须预计到,在使用核武器时,双方都将采用各自认为最有利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考虑到我们相对苏联进攻时的脆弱性,有人提出我们只能将核打击作为对苏联首先实施核攻击的报复手段。然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且仍然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应该充分发展我们自己和盟国的非核(常规)军事力量,并充分利用苏联政治上的弱点。然而,一旦战争发生,我们能否保证苏联不会随时使用核武器以便我们朝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向不断前进,对此,我们不能确定。只有在我们获得了占绝对优势的核力量和制空权后,苏联才可能受到遏制而无法使用核武器,从而保证我们朝实现这些目标前进。

如果苏联按照我们现在的估计发展核武器,到 1954 年,很难想象,一旦战争爆发,苏联领导人会限制自己不使用核武器。除非他们异常自信,认为用其他手段就能够达到目的。

如果由于苏联首先使用了核武器,我们不得已实施核报复,或

是由于我们没有其他办法来达到目的而不得不使用核武器,这都要求我们用核力量来打击的战略和战术目标,以及使用核力量的方式,必须与那些[我们所追求的]目标相一致。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如果热核武器被证明是可靠的,而且会极大增强我们的实力,那么,我们应该生产和储备热核武器。但是,由于现在我们还没有充分了解它的潜力,因而目前还无法得出将在战争使用它的结论。

3. 有研究报告建议我们宣布,除非是针对报复侵略者首先使用核武器,否则我们是不会使用它的。这样宣布据说会降低苏联对美国及其盟国实施核进攻的危险性。

由于我们目前常规武器的发展状况相对来说是处于无准备状态,因此,这样宣布将会被苏联解释为我们承认自身有极大的弱点,同时,我们的盟国也会把它看成是我们要甩掉它们的明显暗示。此外,这样宣布是否会成为苏联决定进攻美国的重要参考因素,还是非常令人怀疑的。应该能估计到是,苏联在决策时,它对我们军事实力的衡量的重视,远胜过我们宣布使用此种能力的方式。

除非我们打算放弃这些目标,否则就不能公布这个[我们]将确实执行的宣言。只有在我们确信我们将处在一个不用通过战争就能实现目标的有利地位,或在即便爆发战争,也不必依赖于核武器来实现我们的战略和策略目标时,方可采纳此举。

### C. 核能的国际监控

1. 对影响国际监控效果的某些基本要素的讨论有助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保证在第9章中讨论的附加目标能得以实现。

2. 任何一场持久的战争,没有一个国际监控体制能阻止核武器的生产和使用。即使是最有效的国际控制体制,它本身也只能提供: a. 保证从国家和平时期的军备中消除核武器; b. 对违规行为发出即时通报。一个有效的国际监控体制应能保证在发出核袭击警报后能有一段[无核打击]时间。

3. 国际监控体制如何保证从发出警告到核武器可能用于战争的[无核打击]时间,还有赖于一些因素。

单方面销毁现有的炸弹储备,销毁保护性外罩和发射装置,这种做法本身几乎无法保证获得这段时间,因为保护性的外罩和发射装置极易生产,甚至可以秘密进行,而武器装配根本就花不了太多时间。

如果在某种程度上削减了现存的可裂变材料,同时有效地控制裂变材料在以后的生产,战争才有可能不会始于突然的核打击。

为了保证从发出核威胁警告到有足够数量的核武器可供使用之间的时间差,我们有必要破坏[对方]所有能大量生产裂变材料的工厂。然而,这种行动将要求一些需要大量裂变材料用作和平用途的工厂暂停生产。

对核原材料生产和储备的有效控制,会进一步延长国际核军控能够保证的无核打击时间。既然苏联人已经掌握了生产核武器的技术,那么,从破坏国际监控协议到生产核武器这两者之间的时间差,会比我们在 1946 年做出的估计要大大缩短,唯有生产热核武器和其他新型武器等领域有可能例外。

4. 发出核威胁警告的确定性同样有赖于若干其他因素。由于缺乏诚信机制,人们将怀疑,是否能够建立一个可以确定违反核协定的警告系统。如果核原料和裂变材料由国际组织所拥有,如果对危险设备的拥有和操作完全属于国际管理范围内,如果[核查]专家有绝对自由进入到苏联任何一个地方(同样也可以进入到控制协议签字国领土上的任何区域)进行检查,对秘密违约行动的有效控制才会成为可能。随着苏联裂变材料储备的不断增长,他们可以暗中保留下,并且不向检察机构报告的裂变材料数量也会在增长。从这一点上讲,协议能够越早缔结,它所能提供的安全保障就越大。随着技术的发展,单体核反应堆的体积可能变小,能量消耗减少,因此,在暗中得以生产运行的可能性也就增大了。热核武器的发展将使破坏性加强,因为一定数量的裂变材料就可以

使危险数倍增加，其结果必定是做出秘密生产核武器的决定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5. 我们还应该考虑到国际监控相对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代价。如果协商制定一个有效的国际监控机制成为可能，那么，比起苏联来，美国就极有可能丧失更多的核武器储备和生产能力。然而，在充分的核查机制中对检查人员完全开放领土将使苏联受到比美国更大的冲击。此外，如果监控机制包括销毁所有的大型核反应堆，并由此暂停核能的某些和平用途，那么，苏联就会为它需要大量的新式能源而叫屈，在这方面苏联做出的牺牲就要比美国更大。

6. 美国和全世界人民都渴望从核战争的危险中得以喘息。然而，目前最主要的困难就在于，这个喘息将很短暂，我们无法充分注意到它将于何时结束。然而由于这种安排将有利于美国，因此有两点非常重要：双方都诚实地遵守这个协议，并且尽可能来防止对它的破坏。

7. 如果苏联按联合国计划要求的那样开放自己的领土，对于通过有效的联合国计划的国际监控体制保证安全来说，就是最大的贡献。但是，这种开放，与苏联为保持现有体制的现状的努力程度，是格格不入的。这就是苏联拒绝接受联合国方案的一个主要原因。

由艾奇逊·利连撒尔委员会<sup>①</sup>发起，并逐渐形成目前联合国计划的研究，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光靠对核设施进行检查是无法保证监控的。而另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则，世界范围内的从矿藏资源开发到裂变材料的最终使用，都要由国际权威机构所拥有并实施操作。对于实施有效监控来说，由于这个条件意味了主权转让的必要性，因此，苏联目前对此无法接受，而对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来说，这一点又必不可少。

另外，监控主体不受到苏联直接或间接的掌握也同等重要。

---

<sup>①</sup> 指“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大卫·E·利连撒尔(David E. Lilienthal)。

由于苏联认为,任何一个不在它统治之下的国家,就一定是在美国的潜在(如果不是现实的)统治之下,那么,美国和非苏联世界所必须坚持的任何立场,苏联都将拒绝接受。此点已然十分清楚。

在销毁大型核反应堆及储备的裂变材料得到有效执行的条件下,阻止突然的核打击将成为国际监控所带来的主要的、立竿见影的益处。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苏联是不会同意消除大型核反应堆的,除非我们明白无误的证明,为和平目的而生产核能是根本不现实的。基于同样的道理,它也不会同意销毁裂变材料储备。

最后,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苏联的政策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否则我们就不得不认为苏联缺乏诚意。然而,如果苏联体制本身的性质没有发生改变,期待其政策会发生变化是令人怀疑的。

从上述考虑我们可以得知,在通过协商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国际监控机制之前,美国和苏联的相对实力对比必须有所变化。在这种机制成为可能之前,苏联不得不在和解和妥协方面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让步,这个结论在国家核能委员会于 1948 年 5 月 17 日向国家安全会议提交的第三份报告中得到证实。报告中称:“……在要求这一领域内的国家都加入到国际社会这个问题上,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无法保证他们接受这一问题的性质和程度。……因此,委员会不得不承认,有关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核能的协定,其本身依赖于在更广泛的政策领域内实行合作。”

简而言之,只有当克里姆林宫的企图遭到挫败,以致苏联的政策出现真正、彻底的改变,通过协商制定一个有效的国际[核]监控计划才有可能实现。

## 九、可能采取的行动选择

**介绍** 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凸显出以下四种方案备选。它们是:

- a. 继续执行目前的政策,包括为其制定的一系列现行实施计划;
- b. 孤立;
- c. 战争;
- d. 尽快在 a 项基础上增强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力量,并且有可能的话,在无战争时期保持国家间的有序状态,并为自由世界一旦遭到打击做好准备。

### 谈判的作用

必须把谈判和这些行动选择联系起来考虑。一个谈判者总是试图达成一个比他现实条件要求的更为有利的协议,至少不能低于谈判的基本诉求。不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国家间的关系亦复如是。关于任何谈判的议题,比起自由国家来,苏联拥有以下几个优势:

- a. 对涉及其国内情况的一些重要事件,苏聟能够实行保密;因此比起自由世界对苏联的了解来,苏聟能更多的洞悉自由世界的现状;
- b. 它不必对公众意见做出必要而认真的回应;
- c. 它不用同其他国家就它将提出和接受的条件进行磋商;
- d. 在对它控制的人民施行[舆论]封锁时,它还能影响其他国家的公共舆论。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优势。加上我们实力地位日渐趋于不利,这些优势如在下面的 A 部分中提到的那样,正阻碍着双方达成协定。虽然美国现在主要在核武器方面可能拥有充足的力量对苏联施行有力进攻,并有把握在一一场持久战中最终取得胜利,但是这个力量还不足以使美国在冷战中取得进展。

问题是如何在自由世界建立以遏制苏联进攻的强大力量为依托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使苏联调整自己以适应这种环境,逐渐撤退,最终彻底改变它的政策。在第 8 章中就已表明,对核能真正的有效控制将要求苏联开放其领土,并用其他方式来证明它的诚意与和平共处的愿望,以便反映出——或至少是开始产生——苏联

体制内部的变化。

显然，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无法通过谈判制定出一个解决办法，从而使苏联体制内部发生变化。那么，谈判又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首先，作为坚定本国的政策和计划以挫败克里姆林宫的构想的一个条件，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的公众要求自由世界也应准备同苏联在公平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谈判。国内外的一些人认为，同苏联是有可能达成平等协议的。特别当苏联发出和解的信号——即使是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时，这种观点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因此，自由国家必须随时准备谈判，并力求主动适时提出对苏谈判。他们必须确定谈判的基调以及接受——不同阶段——协议的底线。从自由世界较为广泛的舆论出发，这些条件必须是公允的。这就意味着，它们必须与积极的和平计划相一致——要符合联合国宪章，至少，也要有利于联合国或其后继组织实施有效军控。这些条件只能要求苏联做出上述行为并参与到世界组织当中。如果苏联不愿意接受这些条件，或根本没有诚意来遵守这些条件，那么将证明这样一个事实：苏联根本就不不会这么做，除非苏联政策发生根本改变，从而导致其体制的改变。

因此，确定坚定有力的谈判立场，是意识形态冲突中一个不可缺失的因素。在做出发展军事实力决定后的一段时间里，任何按照国务卿在伯克利演说<sup>①</sup> 中提到的路线，提出对整体解决方案进行谈

---

①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 1950 年 3 月 16 日于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演说中指出，只要苏联在 7 个领域的政策行为有所改变，美苏之间的“和平共处”才有可能。这 7 个领域包括：(1) 与奥地利、德国和日本签订和约，在远东地区缓和压力；(2) 从苏联目前控制的“卫星国”撤军，并减少影响；(3) 在联合国内采取合作的政策；(4) 接受核军备和常规军备的国际控制；(5) 放弃对“非直接侵略”的追求；(6) 对美国的政府官员予以礼遇；(7) 允许更多的外国人和思想进入苏联。参看：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27 March 1950, pp. 473–478.

判的要求和企图,都只是一个策略。然而,在决定并开始构筑自由世界力量的同时,这样的策略起码可以用来赢得人民对计划的支持,减少目前面临的战争的危险。所以,对美国来说,必须尽快确定谈判的立场,并在谈判的目标和条件上同主要盟国达成一致。

其次,假设美国同其他自由国家进行合作,决定开始增强自由世界的力量,假设克里姆林宫选择了和解的道路,这样可能达成协议的范围便扩大了,美国就有必要并且愿意就各种具体事宜与克里姆林宫不断地进行谈判磋商。

在同美国的谈判中,克里姆林宫将会追求三个主要目标。一是消除美国的核能力;二是阻止自由世界有效动员其庞大的潜在人力、物力资源;三是迫使美国从欧洲和日本撤军,并不再承诺予以保护。苏联是否愿意就上述目标做出重大让步,取决于它对西方的能力和弱点(尤其是西方坚持抵抗的意志和能力),与自身的能力和弱点所做出的对比评估。但是,至少在目前情况下,苏联是不可能做出会使它采取重大让步的评估的。

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同苏联谈判的目标(除了上面讨论的意识形态目标之外)是:以正式并且有利于我们巩固和增强地位的方式记载下苏联在世界上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新的政治、心理和经济环境的过程。苏联之所以可能采取了这种调整,是由于我们采取了第四个行动方案;同时,作为构成该行动方案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将对这一过程提供有力支持。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将在需要之处记录下苏联逐步撤退的过程,并通过谈判促成这一过程。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总比诉诸战争要合算得多。

必须没想到,只有当苏联认为,不管何时何地,能够有机会通过存心欺诈的行为(并且它总是有机会这么做)而不承受任何损失,并能从协议中获益更多的时候,它才有可能接受谈判协议。所以,我们必须谨记,任何协议都必须能够予以实施,并通过反制方式使得防止任何违反和破坏协议的行为成为不可能。

这就进一步表明,我们必须仔细考虑订立协议的顺序。即

使假设在增强自由世界的常规兵力和武器的实力方面,我们取得了极大的进展,核能控制协议也将导致美国会比苏联裁减更多的军备。由于苏联计划的一部分是试图用常规兵力和武器进攻西欧和其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任何[核军控]的协议都有可能被苏联接受。因此一旦美国处于战争爆发后,由于先前已经将自己的最具威力的武器裁减,而不得不匆忙再行发展核武器。

据此,目前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将不得不在坚持缔结控制非核武器和军备的协议的同时,也要考虑缔结其他条约,特别是在同德国、奥地利、日本缔结和平条约,并力求逐渐减弱苏联对其卫星国的影响。假如,出乎我们的意料,苏联接受了协议,保证对核能和常规军进行有效控制,而它政策的本质却未有丝毫转变,我们将不得不极其审慎地考虑能否接受这样的协议。不过,目前这样局面出现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其他国家,大大加强了它们的常规军备武器力量,以至于足以反抗或阻止苏联相应力量的进攻,我们将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按照任何顺序,同他们就各类事宜进行协商,寻求达成协议。这种情况下,针对这些问题的谈判便变得更加可能了。

第三,除了上面讨论的意识形态力量之外,谈判在我们发展自由世界力量的过程中将起到作用。这在与德国、奥地利和日本等国的关系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构建力量的过程中,自由国家最好能将苏联排除在外,分别同德国、奥地利和日本单独订立条约,以保证这些国家的能量和资源用于支持自由世界。同时,这样的和平条约能使上述国家获得自由,受到充分的安全保障,加入到联合国或区域性乃至洲际性国家联合组织当中,并使这些国家联盟依据联合国宪章,为国家的和平发展和政治、经济生活提供安全保障和大量的机遇。当然,除非苏联在先期谈判中表明自己不会接受这样的和平条约,否则,将苏联排除在外而订立这样的条约是非常困难的。

无论从谈判还是从构建自由世界力量(参考下列 D 部分)的关系角度看,自由国家之间在地区范围或更广泛的基础上建立更紧密的国家联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谈判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方案,而是一种可以赢得对建构力量计划支持的手段。在必要并可行的时候记录下冷战的进程,并可在帮助减少战争风险的同时,有利于今后的发展。最终,我们的目标是同苏联(或继其之后的国家)通过谈判来解决争端,使得全世界可以信赖它,并将此作为实现和平的工具。但要强调的是,任何这样的解决方案都只能记载下自由世界在全球建立起一种成功的政治经济体制并最终完全挫败克里姆林宫统治全球的构想所做出的努力与成果。下面几节的分析指出,为了构建这样一个世界体制,我们必须扩大并加速执行现行的政策。

#### A. 第一种选择——延续现行政策,包括为执行这些政策所制定的行动计划

##### 1. 军事方面

在目前计划的基础上,美国具有巨大的军事潜力,虽然它的实际力量有所提高,但较之苏联却处于下风,尤其是在考虑到苏联可能的重核武器能力甚至热核武器能力方面。而整个自由世界与整个苏联体系相比,这种劣势也是同样存在的。如果战争于 1950 年或未来几年爆发,美国及其盟国除了拥有强大的核打击力量之外,将只能一面尽量拖延战争的进展,一面全力准备实施反攻的力量。若对保卫美国和它的重大利益及维持冷战中的主动权等一系列要求以及对目前的力量进行客观评估,便不难发现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不断增大的惊人悬殊。

对苏联政策的分析表明,美国和自由世界其他国家现存和潜在的军事实力,以及自由世界反对苏联进一步扩张的坚强决心,都未能使苏联从总体上减少对我们的压力,或者放弃冷战主动权的追求。恰恰相反,苏联长期追求一种大胆的外交政策,只是当它通

过试探发现自由世界反抗其侵犯的决心和能力时，才会调整其外交政策。自由世界的相对军事能力正在走下坡路，对抗苏联的决心也将进一步削弱，结果包括美国在内的自由世界整体的安全将遭受威胁。

从军事观点看，如果美国现行的和制定出的计划不发生变化，我国现实和潜在的力量作为制止战争的威慑效果将会越来越衰微。因此，国家战备状态的提高就日益显出它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为了阻止苏联发动战争，也是为了支持国家政策，以扭转我国现在处于国际关系中的不利地位的趋势。为了实现本报告提出的目标，并使美国免遭灾难，先决条件就是要增强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军事力量。

幸运的是，由于国会制定了政策，政府在组织和经济领域内也积极执行这些政策，美国的军事机构得以发展成为一个统一有效的力量。因此，在这一基础之上，我们能够以最大的效率，最为经济的方式，来不断增强我们自身的力量。

## 2. 政治方面

苏联在与自由世界的斗争中，一直都在争取主动权。它拥有的核能力加上在远东的胜利，使其信心不断增长，同时也不断增加西欧和自由世界其他国家的紧张与忧虑。我们无法确定，苏联将如何更为积极地寻求[冲突中的]主动权；我们也无法确定其他国家对此做出反应时所表现出的实力与弱点。然而，已经有迹象表明远东局势正在进一步恶化；还有一些迹象表明，西欧[抗拒苏联的]的士气和信心也可能在减弱；此外，目前德国的形势走向也不明朗。如果无法阻止对现已苏联采取在第五章中提到的军事行动（如果苏联选择了这样做的话）的疑惧在自由世界中扩散，那么，自由国家抵抗的决心可能会减弱，以至它们将不得不寻求一种中立地位。

从政治上看，若任由目前的情况发展下去，其所包含的军事意义便意味着美国，尤其是其他国家将转为防御状态，或执行一

种危险的虚张声势的政策；因为能否在冷战中获得强有力的主动权，是与集中目前和准备可以投入使用的力量密切相关的。

自由世界的现实力量与它所受到的威胁极不对称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自由世界拥有的经济和军事潜力，远远优于苏联和它的卫星国。苏联实力以及其政治上推行扩张政策的阴影，沉重地笼罩着西欧和亚洲。自由世界——在现存实力的形式上——缺乏足够的手段，来制止其局部扩张。由此，美国将更经常的面临一个两难境地：面对苏联控制力的有限扩张，要么只能对一个局部危机做出全面战争的反应，要么只能选择无所作为（除了采取一些根本没有任何效果的抗议或居于两者之间的措施）。因此，持续目前趋势很可能导致我们在苏联直接或间接的压力下逐渐撤退，直到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已完全丧失了我们核心利益的地区。换句话说，如果缺少必要的决定和行动，美国将不得不退回到固守西半球的孤立主义之中。即使持最乐观的看法，这个行动也只会带来短暂的休战，而最终结果则是：或是我们投降，或是在处于最不利的地位、在最不利的条件下，与已经控制所有或大部分欧亚国家的苏联帝国打一场防御战。

### 3. 经济和社会方面

正如在第6章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目前执行的外交经济政策和计划，将无法解决国际经济平衡问题，尤其是美元[与其他国际货币存在巨大]的差别问题，也就无法建立起有助于很多重要的自由国家政治稳定的经济基础。

“欧洲经济复兴计划”曾经成功地帮助西欧恢复并扩大生产，也是防止共产主义对西欧进行腐蚀渗透的主要因素，然而，它在帮助西欧重新获得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与其潜力相称的影响力方面，几无建树。若要在这方面取得进展，就必然需要旨在实现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计划，而这样的政策计划均须得到美国和西欧国家的一致支持，并要求美国比预期的要求更深入地参与其中。

“第四点计划”和其他援助项目如果照现在制定的内容,不足以帮助其他重要国家建立有效机构,也难以改善它们对自身事务的管理,并无法使其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很多相对温和国家的现政权,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菲律宾,将无法重塑或维持它们的权威,难以得到广泛的公众支持,除非它们在更快发展经济、改善社会结构方面得到比现在实施计划更多的援助。

联邦执行机构现在正在研究美国的国际收支均衡问题以及美国可用来建立国际经济平衡的措施。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应该对其在安排方面予以大的优先。然而,除非有一个同样富有远见和活力的政治军事计划能与之相配,对其进行补充,否则我们就无法成功地遏制克里姆林宫的扩张,并迫使其退缩。

#### 4. 谈判

简而言之,如果[我们]继续执行目前的政策计划,自由世界就不能有效地利用其巨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潜力方面的优势,在各个国家间建立起可以接受的国际秩序。然而,如果我们不扭转目前的趋势,那么,自由世界如今已无法令人满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将对美国愈加不利。

这一状况不利于我们同苏联进行成功的谈判。这是因为有关重要悬而未决事务协议中的条款将反映现状,这样的条款对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其他国家来说,即使不是灾难性的,至少也是绝对无法接受的。除非立即做出决定,采取行动,在最广泛的程度上大力加强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力量;否则,要想通过谈判,制定一个能为我们接受的解决方案,不仅不会有多少成效,而且可能会严重耽误我们采取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力量的时机。

尽管美国现已具备在战争中对苏联实施强烈打击的能力,但目前的现实就是这样,原因之一是美国并未打算威胁利用核优势,迫使苏联接受协议。从目前的趋势看,苏联是不会撤退的。对达成整体和解方案来说,唯一可以想象的基础就是,双方建立并力图维持所谓势力范围和非势力范围——对这样的“结果”,苏联无疑

会竭尽全力谋求其利益的最大化。鉴于苏联的构想就是要统治全球,因此,认为德国、日本或其他重要国家能在两极分化的世界格局中维持其中立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 B. 第二种选择——孤立

如上所示,继续现行的趋势将逐渐导致美国从目前在欧亚的绝大部分军事义务中脱身出来,并在西半球实行孤立。这种做法并非源自理智而冷静的决定,而是由于美国没能采取必要的行动以使我们的能力与承担的义务相一致,而致使我们在压力下被迫撤退。这个压力可能来自我们的盟国,除非它们对我们在自由世界加速建立一个成功发挥作用的政治、经济体制有足够的信心,否则它们可能将试图寻找别的“解决方法”。

目前有一些人宣扬我们对外要采取孤立的政策。表面上看,把孤立作为一种行动方案还是有吸引人之处的,因为它通过减少我们的义务,来使我们承担的义务与自身能力相一致,此致我们能够集中目前(甚至是在未来社会减少)的国防军费开支用于美国自身的防卫。

这一观点忽视了双方能力的相对性。若美国处于孤立地位,我们极有可能要面对的是,苏联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军事抵抗,就能迅速地控制大部分欧亚国家。由此,苏联将获得远远胜过我们的潜力,并进而迅速地发展这种潜力,以消灭我们的实力;因为即使我们保持孤立,也依然会对它全力想把自己的秩序强加到国际社会的挑战和阻碍。除了我们完全向它屈服以外,再没有别的什么办法能使克里姆林宫对我们不抱有敌意。最终,我们的孤立选择将令我们要么举手投降,要么孤军奋战,以非常有限的防御和反击能力来对抗强大的苏联(除非我们侥幸指望苏联偶然犯了错误如过度扩张或其他原因,从而导致它从内部开始出现自发性的破坏,否则这些就是必然的可能)。

更有甚者,主动选择孤立忽略了其将给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带来微妙却巨大的影响。在苏联控制自由国家后,显然,很多

的美国人会因为放弃了以前的朋友和盟国而深感愧疚并对此负有责任。当苏联动员欧亚诸国的资源,增强其军事实力,并增大对我们安全的威胁时,一些人可能会接受它提出的条件以求“和平”,但更多人会热衷于建立一个军事管理机制,以求允许我们把绝大部分资源仅用于防御美国。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国家的士气将会更加低落,我们体制的完整性和活力也将遭到破坏。

若采取这个行动方案,那就不需要谈判了,除非是完全接受克里姆林宫提出的条件。那样,我们将要丧失一切重要的东西。

在遵循孤立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这样的可能,即:很多美国人可能会支持孤注一掷对苏联及其控制的区域,通过使用大规模破坏性的现代武器,实施令苏联无法抵抗的突然打击,以此来彻底改变力量均势。然而,苏联在我们发动类似进攻之前,似乎不太可能就此坐以待毙。即使苏联束手就擒,而且我们的进攻也取得了成功,但在这样的一场战争之后,美国为了在国际社会——特别在多年受到苏联控制的国家中——重建可接受的秩序,也将面临十分严峻的任务。这些任务是如此艰巨,成功的机会是如此的渺茫,以至于理智告诉我们,必须用别的手段来达成我们的目标。

### C. 第三种选择——战争

一些美国人倾向于在不久的将来以战争方式对抗苏联。毫无疑问,倘若我们实施“预防性”战争——即:我们采取军事进攻并非是由于我们或我们的盟国首先遭到进攻,对此美国人民显然是难以接受的。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认为,既然现在苏联和自由国家事实上已处于战争状态,那么我们也就处于战争状态;而且在目前对我有利的情况下我们能够看出,苏联在使用其全部军事力量方面还存在着不足,那么我们就更应该采取相应的行动。一些人进一步认为,除非处于战时的危机当中,否则自由世界很可能无法动员资源,并使可动员的资源用于战争,也就难以阻止苏联为了控制世界的扩张行动,并迫其退缩。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个强有力的论述。但是,目前反对战争的呼声如此之强,自由世界不得不表

明：这种论调是错误的。崇尚战争的论调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即：美国能够发动并延续一场具有极大冲击力的战争；在长期作战当中，能为自由世界赢得决定性的优势，或许还能获得战争的优先决定权。

然而在目前，美国发动有效进攻行动的能力仅限于使用核武器。我们能够对苏联发动强大打击，但是，即便对苏实施突然打击也不足以迫使苏联投降，克里姆林宫依然能够使用手中的力量来控制大多数甚至全部欧亚国家。这将意味着一场长期而又艰巨的斗争，这场斗争将破坏西欧的自由制度，使热爱自由的人民遭殃，而西欧的再生能力也将遭到致命的打击。

除此之外，不管苏联最近做出的行为多么具有挑衅性，对它实施突然打击总是令美国人民反感的。虽然，美国人民最终会统一起来支持这场战争；但是为突然发动袭击承担相应责任所带来的冲击，从道义方面来说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人们会对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的说法表示怀疑，同时还会质疑我们是否曾诚挚地致力于寻求制定和平解决方案的各种可能性。在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欧，假设是在苏联控制时期消灭了那些能言善辩的持不同政见者后，这样的质疑声音会更大。这样就很难在战后建立起令人满意的国际秩序。这样一场战争的胜利，仍然会使得我们在意识形态的根本斗争中未能接近胜利。

对上述因素的考虑至关紧要，因为这些因素的影响难以估量，而且这些考虑排除了进攻的可能性，除非由于针对我们的攻击正在进行或将要发生，我们将进攻明确地当成了反击的手段。（利用现代武器率先发动进攻带来的军事优势已日渐重要，这就要求我们随时提高警惕，以便我们一遭进攻就能全力反击，并且，可能的话，在苏联的打击实际发动之前进行。）如果第4章的论点能够得到认可，结论则是：[对冷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唯有通过稳定发展自由世界的精神和物质力量，以及将此种发展的影响力扩散到苏联世界，从而引起苏联体制内部的变化，以此来挫败克里姆

林宫的计划,才能保证唯一确定的胜利。

#### D. 剩下的选择——在自由世界迅速构建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

比现在所计划的更迅速地建设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和因此在自由世界产生的信心,是与努力实现我们的基本目标相一致的唯一方针。要挫败克里姆林宫的计划,需要自由世界通过一种成功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影响力]对苏联进行猛烈的政治进攻。这些都需要充足的军事后盾的支持。我们必须拥有能够阻止苏联的扩张、必要时击败苏联的侵略及其发动的有限和全面的军事行动的军事力量。自由世界的潜在力量是巨大的,它用来解决政治经济问题的智慧和意志决定着发展这些军事力量的能力和抵制苏联扩张的意志。

##### 1. 军事方面

在第 6 章就已指出,美国的军事能力从性质上讲,战略上是防御性大于进攻性,潜力大于实际力量。根据对过去以及武器发展趋势的分析,现在和将来显然都不会存在绝对[安全]的防御。战争史表明,只有通过进攻才能获取有利的战争决定权。即使是一个成功的防御战略,不仅要求防御力量保住核心位置以争取军事动员和准备进攻的时间,同时要求进攻力量打击敌人,令其手忙脚乱。

现在具备的或即可投入使用的力量必须满足支持外交政策的施行和防止灾难的出现这两个基本要求。为了满足第二点要求,我们现有的和准备动员的力量至少要能执行以下基本任务:

- a. 保护西半球和重要的盟国区域,以便于它们自身的战争能力得到发展;
- b. 在集聚克敌制胜所要求的进攻力量时,提供并保护军事前进基地;
- c. 实行进攻行动,破坏苏联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打乱敌人部署,直到美国和其盟国积蓄起充分的进攻力量投入战场;

- d. 保护和维持交通线,以及对执行上述任务来说必不可少的基地;
- e. 向盟国提供援助,有利于它们实现自己在上述任务中所起的作用。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上述任务要求美国及其盟国将军事力量增强到这样的程度:联合力量至少在战争初期和在整个战争过程当中对于完成这些任务来说应该是绰绰有余的,同时还要胜过苏联及其卫星国所能动用的力量。具体讲,重要的并不是发展与苏联具有的一一对应的各种力量,而是要为以下各方面提供充分的保障:在美国、加拿大遭到空袭时提供保护;在英国、西欧、阿拉斯加、西太平洋、非洲、近东和中东,以及到达这些地区的交通线遭到空中或地面打击时,能提供保障。此外,在增强我们实力的过程中,必须要加速开发利用我国和其盟国的科技潜力,以加大我们的技术优势。

为了保护我们免遭灾害,同时也为了支持外交政策,我们非常有必要拥有具备这种规模和性质的力量。实际上,比起提供胜利所必需的巨大力量和军事调动基地来,更大规模的现行与时刻准备着的力量,对于威慑未来侵略者来说更为必要。比如说,在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后的胜利者有能力赢得战争,但是却没能保持一股时刻准备着的以阻止战争的爆发的力量。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没有足以支持强硬外交政策的军事力量。无论如何,为了支持一项坚定的政策,以制止克里姆林宫,并迫其放弃对世界统治权的追求,脚踏实地快速增强自由世界的力量极为重要。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此外,美国和自由世界现在还没有一支现行、常备不懈的军力抗击苏联采取的局部行动,因而不得不对[苏联的]得手保持沉默,或者因为这些局部行动而发动一场我们还未做好准备的战争。这种状况已在我们盟国尤其是在西欧产生不安和焦虑。对它们而言,发动全面战争意味着苏联首先对西欧的全面侵占。因此,除非

我们的联合力量得到迅速提高，否则我们的盟国将越来越不愿支持我们的强硬外交政策，而逐渐致力寻找别的出路，即使它们明白绥靖即意味着失败。采纳第四项行动方案的一个重要优势就在于它的心理效应——恢复[自由世界]对将来的信心和希望。当然，我们要承认，对这个行动方案任何形式的宣布，都会被苏联在其和平运动中加以利用，并且对自由世界的一些区域产生不利的心理影响；只有在我们的力量得到必要增强之后，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因此，不管在宣布政策时，还是在采取的措施当中，我们都必须着重强调其主体的防御性质，并尽可能减少国内外的不利反应。

## 2. 政治和经济方面

当前我们的此项目标，是使我们在冷战中重新取得主导权，使苏联更容易进行自我调整：首先是缓解紧张状况和减少压力，其次是逐步撤军。为了这些目标的实现，加强军事实力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美国不能独自提供增强实力所需的资源、建立反抗的手段，其他自由国家也必须承担部分负担，但它们承担负担的能力与决心却取决于我们自身力量的增强以及对外政治经济政策的充分性。正如上文强调的那样，改善自由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是增强反抗决心和手段的必要基础，也是实现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完整和活力、最终取得我们的胜利的必要措施。

与此同时，我们应采取积极的措施，以减少克里姆林宫在苏联及其控制范围内的实力和影响。目标就是建立不受克里姆林宫控制的友好政权。对于限制克里姆林宫的意图、打乱它的行动、迫使苏联相应地提高资源消耗来说，这个行动是必不可少的。换句话说，就是以苏联的冷战之道还治其身。

一个旨在迅速增强实力和改善政治经济环境的计划，将对我们的勇气和才智提出极高的要求。这个计划将代价高昂，且充满了风险。但是不充分的、或是半途而废的应付措施，将会[令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并且更加危险，因为这些措施不仅不能适当地防止战争的发生，可能会导致战争的发生。因此，[我们的]财政预算

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我们的国家与民族独立处于至关重要的关头。

为了赢得和平，挫败克里姆林宫的构想，我们应该设计一个全面的决定性计划，并使这些计划得以延续直至实现我们的国家目标。这将可能包括：

1. 建立一个能够实现我们的长远目标的完备的政治经济结构；
2. 大幅增长军事开支，使其足以满足在 D - 1 节中所列任务的需要；
3. 大幅增加军事援助项目，以促成合作，并满足我们盟国充分并有效地实施在 D - 1 - e 所列任务的需要；
4. 在一定程度上增长[对外]经济援助计划，并确定这些计划的[长期]执行，直到实现它们的目的为止；
5. 按照总统批准的条款，为解决美国国内收支平衡的问题取得通力合作；
6. 实施一系列旨在让其他国家人民对我们力量和意愿建立并保持信心的计划，从事公开的心理战，瓦解苏维埃盟友对苏联的忠诚，用其他方式挫败克里姆林宫的企图；
7. 在经济战和政治战、心理战领域内，加强并采取准确及时的秘密手段及行动，以期在经过选择的[苏联]战略卫星国内煽动和支持动荡和叛乱；
8. 增进国内安全，发展民防工程；
9. 改善和加强情报工作；
10. 减少联邦用于防御和对外援助以外的其他开支，如有必要，可以将这类计划部分推迟；
11. 提高税收。

作为这一计划得以成功的先决条件，首要的是：a. 向国会领导人进行咨询，使该计划得到国会两党一致的立法支持；b. 向公众全面陈述目前国际趋势的实情和其中内涵。

这一计划要求付出很大代价,但在此必须回顾一下(如第 5、第 6 章所分析的)苏联与非苏联世界之间存在的潜在能力的不平衡状态。目前苏联将其可以利用资源的 40%(国民生产总值加上赔款,在 1949 年约为 650 亿美元)用于军事开支(占 14%)和投资(占 26%),其中很多都用在了能够支持战争的企业。在紧急状况时,苏�能将这一资源配置额提高到约 50%,或按 25% 增长。

美国目前只把约占国民生产总值(1949 年为 2 550 亿美元)的 22% 用于军事开支(占 6%),对外援助(占 2%)和投资(占 14%),用于军工企业的资金则很少。(正如在第 5 章指出的那样,由于苏联的军事和民用生活水平极低,苏联每花费一美元所获得的“战斗值”大大超过美国之所得。)在紧急时刻,美国能将 50% 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这些目的(就如在二战中所做的那样)。这些开支较之目前是成倍的增长,并用于直接或间接的军事目的和对外援助。

从经济总体角度来看,这个计划不会导致生活水平的下降,因为该计划能够提高国民生产总值,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将能满足加大军事和对外援助的支出需求。二战带给我们最有意义的经验是,美国经济在开足马力运行时,既能为军用民用消耗提供巨大能源,同时又能保证较高的人民生活水平。在允许价格变动之后,从 1939 年到 1944 年间,尽管政府使用的资源总量以每年 600—650 亿美元的速度(按 1939 年价格)增加,个人消费开支也以每年 20% 的速度增长。

比较苏联和美国潜力的结果,同样适用于苏联世界和自由世界。对于美国所能采取的行动方案,这个结果也具有头等的重要性。

这个比较重新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关于自由世界能否建立有效运作体制的问题,不在经济领域内,而属政治领域。建立这样的体制,要求自由国家与联合国的观念相一致,在结成更为密切的国家联盟问题上,取得更快进展。显然,实现我们的目标要求有一

个职能增强的联合国或其后继组织，在一个基于自由和公正的体制内，维护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与秩序。同样，这个共同的目标，能在任何一地唤起自由人类潜在的精神力量，并获得他们对这样的积极计划的热心支持；这个旨在和平的计划，不仅仅只是为了挫败克里姆林宫的企图，更是基于对未来的展望。为此，短期的牺牲将微不足道。

苏联在发展核能和其他能力的过程中，造成了对自由世界的威胁，而这种威胁将会不断地迅速增加。目前，美国拥有了明显超过苏联的核优势，这同美国和自由国家在其他武器装备上所具有的潜力一道，阻止了苏联的侵略行为。这为美国提供了一个与其他自由国家一同增强实力的良机，从而有力地支持以挫败克里姆林宫的计划为目的坚定的外交政策。我们目前努力的目标，就是在自由世界建立起成功运作并得到充分的军事力量支持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延缓和防止灾难性事件的发生。考虑到苏联可能拥有裂变武器甚至热核武器能力，如果我们继续执行目前的各种计划，这种灾难有可能于 1954 年发生。但只要我们现在就做出迅速有力的反应，可以说，这个灾难发生的日期将会被推迟。从而我们将争取一段时间推动和解，迫使[苏联]撤退或接受失败，或促进苏联体制内部发生重大的变化。我们拥有的时间不多，我们在做出加强军事力量决定上拖延得越久，随之而来的战争风险也就越大。

## 结 论 和 建 议

### 结 论

上述分析表明，苏联拥有裂变武器甚至热核武器能力，极大增加了其对美国安全的威胁。这种威胁与在 NSC - 20/4<sup>①</sup>（总统于 1948 年 11 月 24 日予以批准）中提到的威胁，具有同样的性质，但

① 参看“附件 2”。

是比以前估计的要更加紧迫。特别是美国现在面临着一种意外的可能,即在接下来的四五年当中,苏联将会具备发起突然核进攻的军事能力。它将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以至于美国必须在整体上不断的增强空军、陆军和海军力量,核能力,军事防空和民用防空体系,以此来遏制战争,并保证我们在遭到首次打击后幸存下来,继续朝最终目标前进。此外,这个紧急情况要求我们不断致力于情报和[科技]研发领域的工作。

考虑到危险临近, NSC - 20/4 对苏联威胁的判断,现在依然是正确的:

14. 在可以预测的未来,美国安全所面临的最为险恶的威胁源于苏联的敌对意图和不容忽视的实力,也源于苏联制度的本质。

15. 目前苏联所实施的政治、经济和心理战,除非美国和其他非共产主义国家的政策能够对其予以足够的抗御,对减弱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相对的影响,对不诉诸武力就能破坏美国的传统制度,具有潜在的危害性。

16. 即便是按照普通的深谋远虑的原则,与苏联战争的危险足以要求美国及时地、确切地做好准备:

a. 即便现时的分析表明苏联领导人目前不可能企图采取涉及美国的军事行动,但苏联主动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无法排除。

b. 目前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战争由于苏联误判美国使用其能够使用的所有力量保卫安全的决心和误解我们的意图,或者由于美国对苏联对其所采取的行动的反应的误断,而爆发的可能性将持续存在。

17. 苏联对欧亚地区潜在资源的控制,无论是通过武装侵略的手段,还是通过政治和颠覆的方法,对美国而言,在战略上和政治上,都是不能接受的。

18. 美国在和平时期和战争阶段保卫安全和实现[战略]目标的能力将会由于以下重要的内部因素的发展而遭受严重打击:

a. 严重的间谍、颠覆和破坏活动,特别是受到共产主义势力

的有效协调和指挥的。

- b. 持久的或是受到夸大的经济不稳定。
- c. 国内政治和社会的分裂。
- d. 过分的和不适当的军备和对外援助支出。
- e. 和平时期对我们资源过分的或浪费性的使用。
- f. 由于摇摆不定, 绥靖主义, 对外政策实施上缺乏技巧和想象, 或是由于收缩在世界范围内承受的责任, 造成美国权威和影响力减弱。
- g. 对苏联具有迷惑性的战术上的变化所产生不切实际的安全感得以蔓延。

尽管如第 18 段所述的不利因素的进一步发展将严重削弱美国和盟国应对苏联威胁的能力, 但是自 1948 年以来, 我们在奠定发展军事实力的基础方面已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分析同时也证明: 不管在和平年代, 还是在战争时期, 我们针对苏联的目标, 正如 NSC - 20/4(第 19 段) 所指出的那样, 依然是正确的。我们在第 20、21 段论述的目标和措施, 也同样正确。我们就是在这些目标和措施的基础上, 制定出目前的安全方案和战略计划的。

19. a. 将苏联的实力和影响减弱到令它无法再威胁由民族国家所组成的国际社会的和平、民族独立和稳定。

b. 促使俄罗斯现行政权对国际关系的运作发生根本的变化, 令其按照联合国所确定的准则和目的行事。

在实现这些目标时, 必须倍加小心, 避免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经济、价值和制度体系造成永久的伤害。

20. 为了避免在战争的前提下实现我们的基本目标, 我们应该竭力追求下列[政策]目的:

a. 鼓励和促进苏联在目前围绕俄罗斯传统边界线的过度权利和影响得以不断退却和削弱, 鼓励和促进苏联的卫星国成为独立于苏联的实体。

b. 鼓励俄罗斯人民不断转变态度,以期制约苏联目前的行为方式,支持那些具有能力和决心取得和保持民族独立的势力恢复[俄国传统的]民主生活方式。

c. 破除那些远离苏联军事影响的人民对从属于莫斯科的幻想,努力使全世界看清和认识到苏联和苏联控制下的国际共产主义政党的本质,并对共产主义势力采取一个理性的、现实的态度。

d. 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迫使苏联政府能认识到推行其基本理念在客观上是不可取的,使他们能遵循联合国章程所制定的国际行为准则行事。

21. 这些[政策]目的的实现要求美国必须:

a. 将军事准备保持在能够常备不懈的水平上,并作为对苏联侵略企图的威慑,作为对其他国家抵御苏联政治攻势的鼓励,作为一旦战争发生,需要迅速的战争动员和即刻出兵的可以胜任的基础。

b. 加强美国的国内安全,消除破坏、颠覆和间谍的危害。

c. 最大限度地发展我们的经济潜力,包括加强我们和平时期的经济,以及确保战争时期可以动用的战略储备的建立。

d. 促进所有非苏维埃国家转向美国,与我们发展关系。对其中有意愿、有能力的国家,[我们要]帮助他们增强经济和政治上的稳定以及发展军事能力,使得他们能为美国的安全做出重要的贡献。

e. 向苏联的权利结构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特别是对苏联与其卫星国之间的关系施加压力。

f. 加强对美国民众不断的教育,使他们对我们安全所面临的威胁保持警惕,以便他们能够对我们所不得不采取的方法予以支持。

考虑到苏联目前和将来所具有的核能力,若按照现在的计划和方案,不管是在时机上,还是在范围上,美国在实现必须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方面所能采取的行动都是不充分的。

若按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较之苏联和其卫星国,自由世界的力量将会严重衰弱。出现这个不利趋势,不是因为我们所设立目标有错误,而是由于我们目前执行的计划方案不够充分。这些趋势导致[国内]孤立倾向的出现。这种倾向的出现并非出于慎重的决定,而是由于我们缺乏能确保在与苏联的冲突中难以掌握主动权的必要基础。

作为自由世界的力量中心,美国负有艰巨的领导责任。我们必须用积极的计划来组织和集中自由世界的力量、资源以促进和平,通过在自由世界中创造一个克里姆林宫被迫适应的环境来挫败它统治世界的计划。没有这样一种在美国领导下的共同努力,我们在压力面前将不得不逐步退却,直到某一天我们发现自己丧失了重要的利益。

通过更迅速更集中地建立美国和自由世界其他国家的实际力量来扭转这种倾向是绝对必要的。分析表明,这将要付出代价,并需要对国内财政和经济进行重要调整。

然而,若要实现力量的加强,除了纯粹防御苏联威胁的行动之外,必须有一个更为积极的计划。这个计划将照亮通向和平和秩序的道路,建立一个基于自由和公正的、正如联合国宪章所期望的体制。此外,这个体制必须设计出一系列自由世界得以利用的政治经济措施,在军事盾牌的保护之下,实施冷战战略,以挫败克里姆林宫的计划。因为每一个有利于保护我们基本价值观和国家安全的因素,都要求我们实施冷战战略,增强军事实力保持威慑,最终不必使用武力。我们唯一确定的最终目标,是通过稳步发展自由世界的精神和物质力量,并将此影响扩展到苏联世界,从而引起苏联体制内在的改变,迫使克里姆林宫的计划遭到彻底失败。这样一个积极的计划,是同我国的基本目标相一致的。如果我们要夺回并拥有主动权,如果我们要争取最后胜利,并在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其他国家中获得必要的支持和合作,那么,这个计划就必不可少。

这个计划还应包括一个同苏联谈判的方案。当然,它不仅要与我们的目标一致,同时必须得到我们盟国的认可。美国和盟国,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应该随时准备就符合我们目标的条件同苏联谈判。但目前的世界局势是不利于我们同苏联进行谈判的——因为重要的未解决事务将反映[实力不对称的]现状,这对于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其他国家来说,即使不是灾难性的,肯定也是无法接受的。在决定开始加强自由世界的力量后,美国才可以主动寻求谈判,以期促进克里姆林宫能在新的局势下愿意接受和解的进程。即便未能取得成功,克里姆林宫不愿接受公平的条件,或不信守这些条件,都将有助于自由世界统一认识,着力支持实施加强力量建设的必要措施。

总之,我们必须通过迅速持久地建立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通过旨在扼杀苏联的创造性的坚定计划,迫使苏联承认自由世界有决心和能力在新形势下挫败克里姆林宫。如果没有它们,自由世界就没有决心和能力挫败克里姆林宫以它的意志统治世界的计划。这些都是最终迫使克里姆林宫放弃现行行动的方针,并在重要问题上通过谈判达成可接受的协定,以防止战争的唯一方法。

上述计划的完全成功最终取决于美国政府、美国人民和所有自由人民对如下问题的认识:冷战事实上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自由世界的生存处于危险之中。成功的重要前提是与国会领导人协商以便使该计划成为不分党派的立法支持的目标,并向公众充分说明当今国际形势的现实和意义。由于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该计划的执行需要我们所有的智慧、牺牲和团结,并且需要不屈不挠的决心,直到实现我们国家的目标。

## 建 议

希望总统阁下:

a. 同意上述结论;

b. 在总统的不断监督和其他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下,指导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对实现我们的目标来说必要的基础上,尽可能长时间切实实施上述结论提出的各项建议行动。为此目的,作为相关部门的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或它们的代表,以及其他应该参加的部门,可组建一个经过调整并得到加强的参谋研究机构,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之下,提出供国安会讨论的合作计划。

# 冷战国际关系研究

## 英文文献书目<sup>①</sup>与简介

### I. 冷战国际关系研究英文必读书目

Fry, Michael, ed., *Statesmen as Historians: History,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Kremlin.* (1991)

Gaddis, John Lew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Security Policy.* (1981)

George, Alexander L., *Bridging the Gap: Theory and Practice in Foreign Policy.* (1993)

Goldstein, J., and R. Keohane,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1993)

Iriye, Akira, *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1997)

Kolko, Gabriel. *Confronting the Third Worl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 - 1980.* (1988)

Jervis, Robert.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6)

Lundersiad, Geir. *The American "Empire": And Other Studies of U. S. Foreign Policy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1990)

May, Ernest R., *Thinking in Time: The Uses of History for Decision-Makers.* (1986)

① 此书目为作者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博士班“美国冷战国际关系研究”课程使用的参考书目，[ ]中文字为作者对该书的简评。

Murller, John. *Retreat from Doomsday: 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 (1989)

Paterson, Thomas G., *Meeting the Communist Threat: Truman to Reagan.* (1988)

Trachtenberg, Marc. *History and Strategy.* (1991)

## II. 冷战起源(1945—1953)研究英文书目

Alperovitz, Gar., *Atomic Diplomacy: Hiroshima and Potsdam, Expanded and updated edition.* (1985) [“修正学派”中关于美国二战中对日使用原子弹战略意图最具影响的专著,作者认为杜鲁门政府决定使用核武器并非为了尽快结束对日战争,而是旨在“恐吓”苏联。]

Anderson, Terry H., *The United States, Great Britain, and the Cold War, 1944 - 1947.* (1981) [基于近期解密的英国外交与国防档案,较系统地分析了华盛顿和伦敦在冷战初期的互动。另请参考下列的 Hathaway 的专著。]

Arkes, Hadley., *Bureaucracy, the Marshall Plan,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1973) [关于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决策过程的最为权威的专著。另请参考下列的 Hogan 的专著。]

Banac, Ivo., *With Stalin Against Tito: Cominformist Split in Yugoslav Communism.* (1985) [较为翔实、客观地分析了苏联与南斯拉夫战后发生分歧的政治因素,但尚未得以使用苏联解体后公布的“斯大林文献”。]

Blair, Clay, *The Forgotten War: America in Korea, 1950 - 1953.* (1987). [对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安全与政治原因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解读,但未能脱离美国中心立场的限制。]

Blum, Robert J., *Drawing the Line: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Containment Policy in East Asia.* (1982)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阐述了美国出于冷战的战略考虑将东亚界定为“战略要地”的政策思路和脉络。]

Boll, Michael., *Cold War in the Balkan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Emergence of Communist Bulgaria, 1943 - 1947.* (1984) [通过聚焦于保加利亚描述了美国对战后苏联在东欧扩充影响的关注和反应。]

Borden, William S., *The Pacific Alliance: United State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and Japanese Trade Recovery: 1947 - 1954.* (1984) [对华盛顿如何通过保护和重建日本的核心工业以服务于美国在东亚的安全利益,

不失为一个有意义的解释。]

Borg, Dorothy, and Waldo Heinrichs, eds., *Uncertain Years: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47 - 1950.* (1980) [虽仅为一本论文集,但是中美“解冻”后的最具影响的关于中美冲突起源分析的学术著作。]

Buhle, Russell D.,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in Asia, 1945 - 1954.* (1981) [是“越南战争”结束后关于美国冷战条件下的远东政策起源的最为系统的分析之一,其“利益层次”分析框架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Bullock, Alan.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 (1983) [通过对英国前外交大臣 Ernest Bevin 的个人因素的分析,反思冷战初期美英关系的构建。]

Campbell, Thomas M., *Masquerade Peace: America's UN Policy, 1944 - 1945.* (1973) [是描述美国在建立联合国过程中的政策考虑和实施评估的较为客观的一本专著。]

Caridi, Ronald J., *The Korean War and American Politics: The Republican Party as a Case Study.* (1968) [尽管为越战期间的学术产物,但是通过深度案例分析解读美国的国内政治如何影响对外政策的不多见的一个成功尝试。]

Caute, David. *The Great Fear: The Anti-Communist Purge under Truman and Eisenhower.* (1978) [详细地描述“麦卡锡主义”对美国社会和生活的负面影响,但缺乏分析深度。]

Chang, Gordon H.,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 - 1972.* (1990) [从美苏中的“三边关系”探讨冷战在东亚延伸的轨迹,隐喻美国失去了避免与新中国对抗的机会。]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1994) [全面地利用了中文资料和文献,客观地分析了新中国对外政策的起源,并对中美冷战对抗的动因提出了“革命外交”的分析框架。]

Cohen, Michael J., *Truman and Israel.* (1990) [是对杜鲁门政府在冷战大背景下促进以色列建国的政策脉络的系统梳理。]

Cummings, Bruce.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Liber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Separate Regimes, 1945 - 1947. Vol. 1.* (1981) [作为朝鲜战争起源的“修正派”代表人物,通过对朝鲜半岛二战后政治经济状况的深入分析,提出了朝鲜战争的“内战”本原的观点。]

———.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The Roaring of the Cataract,*

1947 - 1950, Vol. 2. (1990) [全面地利用了朝鲜战争期间由“联军”缴获的朝鲜官方文献,试图解释美国和西方介入朝鲜战争的“遏制民族解放运动”的效果。]

Dinnerstein, Leonard. *America and the Survivors of Holocaust*. (1982) [是迄今关于美国在战后如何对待欧洲的犹太移民和“难民”的标准解释。]

Dobbs, Charles M., *The Unwanted Symbol: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Cold War, and Korea, 1945 - 1950*. (1981) [是对美国在战后至朝鲜战争爆发前针对朝鲜半岛战略和政策考虑的一个综述。]

Donovan, Robert J., *Conflict and Crisis: The Presidency of Harry S. Truman, 1945 - 1948*. (1977).

———. *Tumultuous Years: The Presidency of Harry S. Truman, 1949 - 1953*. (1982) [作者虽然是一名记者,但善于利用原始档案和文献,所完成这两卷本,是关于杜鲁门政府外交与内政较为全面的一个历史考证。]

Eckes, Alfred E. Jr., *A Search for Solvency: Bretton Woods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1941 - 1971*. (1975) [仍不失为考察美国战后对通过国际组织重建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努力的参考书。]

Elliott, Mark R., *Pawns of Yalta: Soviet Refugees and America's Role in their Repatriation*. (1982) [一本少见的关于二战结束后美国协助苏联将被法西斯德国在对苏战场上俘虏的苏军战俘遣返回国的记载,讲述了战时的盟友在战争结束时走向分裂的一个小故事。]

Erickson, John. *The Road to Berlin: Continuing the History of Stalin's War Against Germany*. (1983) [从俄罗斯的“传统不安全”意识出发,试图分析斯大林在二战结束后仍对德国威胁难以释怀的政策心态,并解析1948年柏林危机的起源。由于缺乏俄罗斯文献的支撑,难免偏颇。]

Farrar-Hockley, Anthony. *The British Part in the Korean War, vol. 1, A Distant Obligation*. (1990) [基于新解密的英国外交和国防文献,客观地描述了伦敦针对朝鲜战争的安全和外交考虑,体现了“老牌帝国”的现实主义政策倾向。]

Ferrell, Robert H. ed., *Off the Record: The Private Papers of Harry S. Truman*. (1980) [基于杜鲁门总统的“个人文献”,试图勾画这位颇具争议的冷战总统的复杂的个性和心理,对研究领导人“个性”与决策的关联关系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Fifield, Russell H., *Americans in Southeast Asia: The Roots of Commit-*

ment. (1973) [是对美国如何在日内瓦之前逐步陷入东南亚的一个较为全面的综述。]

Finn, Richard B., *Winners in Peace: MacArthur, Yoshida, and Postwar Japan*. (1992) [虽然仅参考了美国文献,但对盟军对日占领期间日本以 Yoshida 为代表的政界精英如何为了日本的利益操控麦克阿瑟、遏止美国文化和意识形态输入等“软抵抗”方面,作了较有新意的分析。]

Foot, Rosemary, *The Wrong War: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1950–1953*. (1985) [迄今为止关于美国和西方盟国如何贸然扩大朝鲜战争决策内幕的最为权威、最为客观的专著。]

———. *A Substitute for Victory: The Politics of Peacemaking at the Korean Armistice Talks*. (1991) [借鉴传播学中的“谈判”与沟通理论,细致地分析了美国以及西方盟友针对朝鲜停战谈判的政策行为,凸显了民主国家的国内政治对外政策的制约作用。]

Freeland, Richard M., *The Truman Doctrine and the Origins of McCarthyism: Foreign Policy,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l Security, 1946–1948*. (1972) [与内政决定外交的观点相悖,通过对杜鲁门政府的冷战条件下的对外援助政策对麦卡锡主义泛滥的助长,提出对外政策也会影响内政的生态。]

Fried, Richard M. *Nightmare in Red: The McCarthy Era in Perspective*. (1990) [是从政治、社会层面对麦卡锡主义的起源和泛滥进行反思的最为权威的专著之一。]

Gaddis, John Lew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1982) [作为“后修正派”的代表人物,作者对美国在冷战的全盛时期的遏制战略内涵和政策考虑出现的变化作出了最为权威的解释,并对遏制的对称性与非对称性提出了理论建构。]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1972) [从“后修正派”的立场出发,依据美国解密的外交和国防文献,提出冷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源于华盛顿对苏联威胁的误识和误判。]

Gallicchio, Marc S., *The Cold War Begins in Asia: American East Asian Policy and the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88) [依据美国新近解密的外交和国防文献,指出冷战在东亚的扩大,部分由于美国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战略考虑,部分因为“日本帝国”垮台所造成地区政治真空。]

Garver, John W.,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 - 1945: 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1988) [从二战期间的美国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合作和分歧,探讨了冷战在亚洲扩展的渊源,特别分析了中国“民族主义”对中美关系构建的影响。]

Gormly, James A., *From Potsdam to the Cold War: Big Three Diplomacy, 1945 - 1947*, (1990) [利用美国和英国的官方文献,通过聚焦于战后的国际会议,分析大国外交与沟通的成败,解析冷战形成的原因。叙说流畅,但分析深度不够。]

Goncharov, Sergei N.,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1993) [作为中美俄学者的罕见合作,依据三方历史文献,探究朝鲜战争的起源,不失为一个“国际史”比较方法的有益尝试。]

Green, David. *The Containment of Latin America: A History of the Myths and Realities of the Good Neighbor Policy*, (1971) [从“新左派”或“修正派”的立场出发,解析并批评美国战后对拉美国家的政策,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值得注意。]

Hahn, Werner G., *Postwar Soviet Politics: The Fall of Zhdanov and the Defeat of Moderation, 1946 - 1953*, (1982) [是关于战后初期苏联领导层内部政治斗争与对外政策取向关联关系的一个较为深入的分析。]

Haines, Gerald K., *The Americanization of Brazil: A Study of U.S. Cold War Diplomacy in the Third World, 1945 - 1954*, (1989) [基于美国外交文献,全面地描述了美国在冷战初期对巴西政策的思考与实施轨迹,在学术上回应了“新左派”的意识形态化了的观点。]

Hamby, Alonzo L., *Beyond the New Deal: Harry S. Truman and American Liberalism*, (1973) [属关于杜鲁门政府的内政和“自由主义”改革要求部分地决定了美国的冷战政策倾向的一部权威著作。]

Harbott, Fraser J., *The Iron Curtain: Churchill, Americ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88) [通过研究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对外政策考虑,探讨领导人个人对冷战选择的影响,是一本力作。]

Hathaway, Robert M., *Ambiguous Partnership: Britain and America, 1944 - 1947*, (1981) [应与上面列出的 Anderson 的著作对照、比较。]

Herken, Gregg. *The Winning Weapon: The Atomic Bomb in the Cold War, 1945 - 1949*, (1980) [是关于核武器如何影响在美国冷战初期国际安全战略构建与转型的最为权威的一本专著。]

Herring, George C., Jr., *Aid to Russia, 1941 - 1946*. (1973) [从“后修正派”的立场出发,分析为什么美国在二战期间对苏联的经援和军援未能对战后美苏合作起到促进作用,仍属关于这个题目的最客观的研究。]

Hess, Gary R., *The United States' Emergence as a Southeast Asian Power, 1940 - 1950*. (1987) [详细地描述了美国如何在冷战思维的指导下逐步将东南亚视为“关键性”的安全利益所在,但在分析框架上未有创新之处。]

Heuser, Beatrice. *Western Containment Policies in the Cold War: The Yugoslavia Case, 1948 - 1953*. (1989) [再次从多文献、多文化的角度分析苏联和南斯拉夫在冷战长期走向“分裂”的渊源,在研究方法上有新意。]

Hixson, Walter L., *George F. Kennan: Cold War Iconoclast*. (1989) [试图通过分析凯南的人生轨迹和职业生涯解读美国遏制战略的始作俑者的战略思维,但由于未能使用凯南的私人档案,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Hogan, Michael J., *The Marshall Plan: America, Britai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47 - 1952*. (1987) [从“修正派”的立场出发,通过深度分析美国战后对欧洲实施的马歇尔计划的政策制定,指出华盛顿的冷战政策的文化渊源为所谓的“liberal corporatism”。]

Hutson, James A., *Outposts and Allies: U.S. Army Logistics in the Cold War, 1945 - 1953*. (1988) [尽管是一本军事史的专著,但通聚焦“后勤保障”体系的建立和运作折射美国冷战“全球化”的政策思考和外交运作,十分有意义。]

Inoue, Kyoko. *MacArthur's Japanese Constitution: A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Study of its Making*. (1991) [作为跨学科研究冷战起源的尝试,作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盟军占领期间《日本宪法》的撰写与解释,试图揭示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制约作用。]

Ireland, Timothy P., *Creating the Entangling Alliance: The Origins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1981) [对“北约”组织的最初形成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但要和以下列出的 Kaplan 的专著对照参考。]

Iriye, Akira. *The Cold War in Asia*. (1974) [仍为解析“雅尔塔”体系如何在东亚崩溃的最具经典的描述,但在理论层面上显得苍白。]

Isaacson, Walter and Evan Thomas. *The Wise Men: Six Friend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 — Acheson, Bohlen, Harriman, Kennan, Lovett, McCloy*. (1986) [通过对美国冷战初期的一组“冷战思想家”的集体描述和比较分析,试图揭示华盛顿决策圈中的“精英”是如何影响战略“思辨”的。]

Jones, Howard. "A New Kind of War": America's Global Strategy and the Truman Doctrine in Greece. (1989) [再度解析冷战初期杜鲁门主义形成的深度背景,指出,该政策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以“反共产主义”为核心的对外政策的正式开始。]

Kahn, E. J., Jr., The China Hands: 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 (1972) [指出,由于“麦卡锡主义”对杜鲁门政府的国务院中熟悉中国事务的所谓的“中国手”的清洗和迫害,造成了美国失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

Kaplan, Lawrence S., The United States and NATO: The Formative Years. (1984) [迄今仍为美国构建“北约组织”的战略和外交考虑的最为权威的成果。]

Katz, Barry M. Foreign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Analysis in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1942 - 1945. (1989) [通过对美国二战期间的“战略服务办公室[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中“研发小组”活动的分析,揭示知识分子是任何被政府“动员”起来用自己的知识和学养为战争服务。属此类课题的首个较为成功的研究成果。]

Kaufman, Burton I., The Korean War: Challenges in Crisis, Credibility, and Command. (1986) [以领导人“政治信誉”为分析框架,试图解析美国武装介入朝鲜战争的决策行为,史实充分,但分析深度欠缺。]

Kennan, George F., Memoirs: 1925 - 1950. (1967) [作为冷战初期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作者试图通过“自述”的形式再度批判当时华盛顿的“全面遏制”政策,希望美国的冷战政策回归“现实主义”的路径。]

Kolko, Joyce and Gabriel Kolko. The Limits of Power: The World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 - 1954. (1972) [作为西方冷战研究的“修正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作者对美国的冷战政策进行了最为激烈的批判。]

Kovrig, Bennett. Of Walls and Bridg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Eastern Europe. (1991) [为“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最早的重新分析美国针对东欧国家冷战政策的力作。可以期待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东欧外交文献的解密,此类研究成果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Kuniholm, Bruce R.,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 Great Power Conflict and Diplomacy in Iran, Turkey, and Greece. (1980) [通过对美国在冷战初期的对伊朗、土耳其和希腊的政策分析,指出,美国在近东的“扩张”和建立势力范围并非自觉自愿,而是受到当地政治势

力的“邀请”。明显的“后修正派”观点。]

Kunz, Diane B. *Butter and Guns: America's Cold War Economic Diplomacy*. (1997) [作为“新冷战史”学派的一员,作者对美国冷战期间的“经济外交”的运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描述,但由于时间与专题跨度过大,而显得分析深度不够。]

Larson, Deborah Welch. *Origins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1985) [以政治心理学的认知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依据美国的外交档案,试图透析杜鲁门遏制战略的思辨渊源。]

Leffler, Melvyn P.,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1992) [强调美国冷战战略设计中的经济因素,但不同于“修正派”的经济利益驱动立场,提出华盛顿的决策者将经济实力作为国家安全政策“基石”的观点。]

Levine, Steven I., *Anvil of Victor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1945 - 1948*. (1987) [通过分析战后初期大国在中国东北的折冲,指出,亚洲的冷战起源于“满洲政治危机”。]

Lindis, Mark. *Joseph McCarthy: The Politics of Chaos*. (1987) [基于“发展心理学”的假设,创造性地重新解读“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得以盛行的社会文化根源,属跨学科研究冷战起源的力作。]

Louis, Wm. Roger.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1945 - 1951: Arab National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Postwar Imperialism*. (1984) [通过对照解密的美国和英国外交档案,比较“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治冲突,细致地描述了英美在冷战初期针对中东民族国家建设的政策。]

Lowe, Peter.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1986) [尽管是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一部简史,但在对美国冷战初期东亚政策的批判性分析方面有新意。]

Lundestad, Geir. *The American Non-Policy towards Eastern Europe, 1943 - 1947: Universalism in an Area Not of Essential Interest to the United States*. (1975) [作为冷战研究的“后修正派”代表人物之一,通过对美国二战结束前后的东欧政策的比较分析,指出,华盛顿在东欧与苏联的对抗完全出于“被动”,从“无意识”走向“有意识”。]

———. *America, Scandinavia, and the Cold War, 1945 - 1949*. (1980) [作者认为冷战初期美国对北欧国家的政策,并非出于一个“新帝国”的版图要求,而是受到战后当地“社会民主”运动的推动。]

Lytle, Mark Hamilton. *The Origins of the Iranian-American Alliance, 1941 - 1953.* [尽管聚焦于二战结束前后美国和伊朗的关系,但对华盛顿针对中东地区的冷战安排的了解具有参考价值。]

MacDonald, Callum A., *Korea: The War before Vietnam.* (1986) [从“危机管理”的假设出发,认为美国介入朝鲜战争受制于冷战国际安全的结构。]

Maddox, Robert James. *From War to Cold War: The Education of Harry S. Truman.* (1988) [根据杜鲁门对冷战重要性的认知过程,提出领导人在安全与外交事务决策中的“受教育曲线”的观点。]

Matray, James. *The Reluctant Crusad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Korea, 1941 - 1950.* (1985) [作者从美国太平洋战争中针对朝鲜半岛的战略考虑至朝鲜战争爆发前,细致地分析了冷战在东亚得以延伸的结构性因素。]

McCormick, Thomas J., *America's Half-Centur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in the Cold War.* (1989) [从“修正派”的立场,提出美国的“跨国公司”和州层面的政治精英对华盛顿冷战政策决策和执行的“决定性”影响作用。]

McMahon, Robert J., *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ruggle for Indonesian Independence, 1945 - 1949.* (1981) [通过考察美国对印尼民族独立运动的态度和政策,提出,华盛顿的对外政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制约而无法理清“利益”与“资源”之间的关系。]

Marrill, John. *Korea: The Peninsular Origins of the War.* (1989) [尽管和现存关于朝鲜战争渊源的成果有重复之处,但不失为一本较客观地从“地方”政治与国际政治互动过程探讨国际武装冲突渊源的力作。]

Messer, Robert L., *The End of an Alliance: James F. Byrnes, Roosevelt, Trum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82) [从美国战后对外政策决策机制转型的角度细致地分析了杜鲁门和他的国务卿伯恩斯之间复杂的个人关系对决策的影响。]

Miller, Aaron David. *Search for Security: Saudi Arabian Oil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9 - 1949.* (1980) [属关于美国战后全球战略形成过程中对石油这一战略资源考虑的最佳之作。]

Miller, James Edwar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aly, 1940 - 1950: Th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Stabilization.* (1986) [是对美国战后针对意大

利国家重建和纳入“西方民主”体系政策的最为权威的专著。]

Mosley, Leonard. *Marshall: Hero for Our Times*. (1982) [仍为关于马歇尔对美国冷战初期的对外政策影响的最为客观的力作。]

Nagai, Yonosuke, and Akira Iriye, eds.,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1977) [由美国和日本学者撰写的关于冷战在东亚起源和发展的论文集,描述性强于分析性。]

Naimark, Norman N., *The Russians in Germany: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Zone of Occupation, 1945–1949*. (1995) [从社会史的角度描述冷战初期苏联对德国的占领,着眼点不仅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隔阂,也显现了文化冲突的作用。]

Ninkovich, Frank A., *The Diplomacy of Ideas: U.S. Foreign Policy and Cultural Relations, 1938–1950*. (1981) [从文化外交的层面,探讨美国冷战期间如何将“价值观”纳入国家利益中考虑,并分析其成败。]

Nitze, Paul H., *From Hiroshima to Glasnost: At the Center of Decision, A Memoir*. (1989) [以自传体的方式,描述美国冷战的战略思考和外交政策,其中不乏为自己长时间参与华盛顿对外决策的思维逻辑——特别是“全面遏制”观——进行“事后”辩护之处。]

O'Neill, William L., *A Better World: The Great Schism: Stalinism and the American Intellectuals*. (1982) [从“精英文化”的视角,试图分析冷战期间“斯大林主义”对美国“激进”知识分子的影响。由于观点的“冲击性”,该书长期被视为具有争议的学术著作。]

Pach, Chester J. Jr., *Arming the Free World: The Origins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 1945–1950*. (1991) [依据新近解密的美国国防与军事档案,细致地描述了美国在“和平”时期扩充军备的政策轨迹,特别值得注意推荐的是作者对华盛顿对外军事援助行为的分析和辩护:美国的军援政策是出于加强对“非共产主义”国家政治和心理影响力的目的,而非为了战争准备。]

Parks, J. D., *Culture, Conflict, and Coexistence: American-Soviet Cultural Relations, 1917–1958*. (1983) [并非一部成功的著作,但仍为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美苏政治利益冲突不可调和的有益尝试。]

Paterson, Thomas G., *On Every Front: The Making of the Cold War*. (1979) [虽然已属陈旧,但仍为一本简洁地描述冷战起源的教科书。]

Patterson, James T., *Mr. Republican: A Biography of Robert A. Taft*. (1972) [从美国的政党政治的层面,探讨共和党的政策运作如何制约了

民主党政府在冷战初期对外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Pisani, Sallie. *The CIA and the Marshall Plan*. (1991) [是研究冷战国际关系中“情报”因素的最佳之作之一。]

Pogue, Forrest C., *George C. Marshall: Statesman, 1945 – 1959*. (1986) [另一本关于马歇尔对美国战后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制定发生“个人”影响的力作。]

Pollard, Robert. *Economic Securi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5 – 1950*. (1985) [提出“经济安全”考虑——并非苏联威胁——决定了美国冷战对外政策制定的观点,强调美国在国际间强力推动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制度是出于对自身经济安全的担忧。]

Ra'anan, Gavriel D., *International Policy Formation in the USSR: Factional "Debates" During the Zhdanovschina*. (1983) [认为克里姆林宫的“派别斗争”决定了苏联与西方社会“为敌”的战略选择。资料浅显,论据不够,不乏牵强之处。]

Radosh, Ronald, and Joyce Milton. *The Rosenberg File: A Search for the Truth*. (1983) [政治上颇具争议,作者根据“内部档案”称 Julius Rosenberg 的确犯了充当苏联的间谍,犯有“叛国罪”。]

Rearden, Steven L.,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trategic Doctrine: Paul H. Nitze and the Soviet Challenge*. (1984) [是对保罗·尼兹与美国冷战战略观和国防逻辑思维形成的一个简洁的描述。]

———. *History of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Vol. 1: The Formative Years, 1947 – 1950*. (1984) [作为官方信任的史学家,作者细致地描述了美国国防部建立初期的机制变化。]

Reardon-Anderson, James.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1944 – 1946*. (1980) [仍为西方学者描述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对外政策渊源的力作。]

Reid, Escott M., *Time of Fear and Hope: The Making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1947 – 1949*. (1977) [作为加拿大的一位资深外交官,作者详细地描述了“北约”组织形成初期美国和加拿大的战略和外交互动关系。]

Rose, Steven T., *American War Plans, 1945 – 1950*. (1988) [依据解密的美国国防决策文献,详尽地揭示冷战初期五角大楼内的“参谋长”们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准备“预案”的内幕。]

Ruddy, T. Michael. *The Cautious Diplomat: Charles E. Bohlen and the Soviet Union, 1929 – 1969*. (1986) [采用传记的形式为曾经担任美驻苏大

使、国务院的资深苏联专家,被“修正派”定性为“冷战狂”的伯伦进行辩护,指出伯伦试图推行的是一个温和的对苏政策。]

Ryan, Mark A., *Chinese Attitudes toward Nuclear Weapon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Korean War*, (1989) [题目要比实际内容更具学术意义。作者的研究受到资料和方法的极大限制。]

Sachar, Howard M., *Europe Leaves the Middle East, 1936-1954*, (1972) [是一本描述美国不断介入中东地区政策背景的研究,仍具影响。]

Schaller, Michael.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1985) [尽管研究粗糙、文字粗拙,仍不失为关于美国战后对日占领的一部力作。]

--. *Douglas MacArthur: The Far Eastern General*, (1989) [用传记的形式,描述了麦克阿瑟对美国东亚政策的影响。]

Schilling, Warner R., Paul Y. Hammond, and Glenn H. Snyder. *Strategy, Politics, and Defense Budgets*, (1962) [仍然是关于美国冷战初期公共财政的考虑如何制约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设计的力作,指出,杜鲁门对NSC - 68号文件所要求的大幅增加军费实际上抱犹豫的态度。]

Schonberger, Howard B., *Aftermath of War: Americans and the Remaking of Japan, 1945-1952*, (1989) [从机制建立的层面分析美国在战后对日占领政策和行为的绩效,提出麦克阿瑟并未取得他自己所宣扬的“政绩”。]

Sheng, Michael M.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97) [是十几年来关于“谁失去了中国”争论中最令人信服的力作,但其以意识形态作为主要分析平台的视角有一定的局限性。]

Sherry, Michael S., *Preparing for the Next War: American Plans for Postwar Defense, 1941-1945*, (1977) [依据美国官方文献,细致地解析了华盛顿二战期间军事战略专家们为未来“对苏”战争做准备的思考,强调了“战略考虑”在冷战国际安全关系中不可忽视的作用。]

Shlaim, Avi.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 A Study in Crisis Decision-Making*, (1983) [仍然是关于二战结束后欧洲爆发的第一个“大国危机”的权威解释。随着新的档案的解密,对“1948柏林危机”应该出现修正性的研究。]

Shulman, Holly Cowan. *The Voice of America: Propaganda and Democracy, 1941-1945*, (1990) [尽管只聚焦于“美国之音”在二战欧洲战场中的运作,但提出了“软实力”——意识形态——对政治宣传的支撑问题,对从文化冲突的角度理解冷战起源有启示。]

Sigal, Leon V., *Fighting to a Finish: The Politics of War Termi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1945.*, (1988) [就如何采用“组织程序”的分析框架研究对外政策和行为的结果,提出了一个较好的样本。]

Smith, R. Harris. *OSS: 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s First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1972) [尽管出版年代陈旧,但对美国的对外情报“帝国”CIA 的前身“战略服务办公室”(OSS),作出了背景性的描述。]

Snetsinger, John. *Truman, the Jewish Vote, and the Creation of Israel.*, (1974) [从杜鲁门应对美国国内政治压力着手,分析美国“被迫”绑上以色列战车的动因。]

Spanier, John W., *The T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and the Korean War.*, (1965) [尽管出版年代已久,但仍不失为描述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朝鲜问题上发生“军政”冲突的权威性成果。]

Stairs, Denis. *The Diplomacy of Constraint: Canada, the Korean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74) [罕见的从加拿大政府的角度探寻朝鲜战争“国际化”的原因。]

Stavrakis, Peter. *Moscow and Greek Communism, 1944 - 1949.*, (1989) [现存最具权威的关于二战结束之际苏联针对希腊及其周边地区政策考虑的专著。]

Stephanson, Anders. *Kennan and the Art of Foreign Policy.*, (1989) [依据美国遏制战略设计者凯南 30 至 50 年代的政策思考报告,试图勾画出他关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和界定。]

Stueck, William Whitney, Jr., *The Korean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1995) [迄今为止,用“国际史”的方法解析冷战的第一次“热战”——朝鲜战争——中大国关系对冲的最为成功的力作。作者尽管不具备母语以外的其他语言能力,但尽力收集了非英语的文献材料,基本保持了客观的学术立场。]

Taubman, William. *Stalin's American Policy: From Entente to Détente to Cold War.*, (1982) [是关于冷战初期苏联对外政策的最为权威的专著之一。阅读此书,有必要同时参考近期出版的基于苏联外交档案和“斯大林文献”的著作。]

Thompson, Kenneth W. and Steven L. Rearden, ed., *Paul H. Nitze on National Security and Arms Control.*, (1990) [除了分析尼兹在 NSC - 68 号文件出台过程中作用,作者用较多笔墨描述了美国的这位“冷战狂”促进国际反“核扩散”的努力。]

Tucker, Nancy Bernkopf. *Patterns in the Dust: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1949 - 1950.* (1983) [是关于冷战初期到底是否存在中美避免对抗机会的学术争论中的一个力作。作者依据大量的美国文献资料,指出,美国的政治生态环境制约了杜鲁门政府对新中国采取现实主义的政策。]

Urban, Joan Barth. *Moscow and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From Togliatti to Berlinguer.* (1986) [迄今唯一关于莫斯科在战后针对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态度和政策的研究。]

Wall, Irwin 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Postwar France, 1945 - 1954.* (1992) [较为平衡地利用美国和法国解密的文献,深入地研究了华盛顿与巴黎就法国的战后重建所出现的目标和理念分歧,指出,冷战的大环境相当大的程度上界定了法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重塑,是探讨国际关系对内政影响的一个成功范例。]

Watt, D. Cameron. *Succeeding John Bull: America in Britain's Place, 1900 - 1975.* (1984) [作为英国史学家,作者通过比较英美的“世界帝国”路径,描述了华盛顿战后取代伦敦成为“世界性强权”的战略取向。是比较与宏观国际关系史的一个具有启示意义的力作。]

Westad, Odd Arne.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93) [利用多国档案和多种语言文献,详尽地描述了战后大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政治博弈,只是对冷战与“革命”的关系未能形成有理论意义的分析框架。]

Wittner, Lawrence S., *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Greece, 1943 - 1949.* (1982) [对杜鲁门主义在战后希腊的运作提出细致的分析和有力的批判。]

Yergin, Daniel. *Shattered Peace: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1977) [通过聚焦于美国战后的国家安全机制的调整,试图透析华盛顿的“官僚体制”如何利用冷战战略计划和未来战争准备以实现政治利益诉求。]

Zhang, Shu Guang.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 1949 - 1958.* (1992) [利用中美的档案资料文献,从威慑关系着手,分析美国与新中国在冷战东亚战场的对抗,提出了“双向威慑”的理论分析框架。]

- Mao's Military Romanticism: China and the Korean War, 1950 - 1953. (1995) [通过对中“抗美援朝”军事斗争的描述和分析,提出了“军事浪漫主义”对安全战略行为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

